IZGUBLJENA BITKA
J.V. STALJINA

蘇南衝突內幕

(1948—1953)

〔南〕弗拉迪米爾·德迪耶爾著
達 洲譯

南 粤 出 版 社

蘇南衝突內幕

(1948—1953)

〔南〕弗拉廸米爾·德廸耶爾著

達 洲譯

南粵出版社

IZGUBLJENA BITKA

J.V. STALJINA

SARAJEVO 1969

根據薩拉熱窩"光明"出版社1969年版譯出，略有刪節。

蘇南衝突內幕（1948—1953）

（南）弗拉迪米爾・德迪耶爾著

達 洲 譯

出版：南粵出版社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十號1102室
SOUTH CHINA PRESS
Rm. 1102 Chung Shang Bldg.
10 Queen Victoria St. Hong Kong.

印刷：中華書局香港印刷廠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一九七九年七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每册港幣二十元

出版說明

本書作者弗拉迪米爾·德迪耶爾，是南斯拉夫著名歷史學家、法學家和政論家。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三年期間，任南共中央委員、中央宣傳部負責人、中央國際聯絡部負責人、政府新聞局局長、政府發言人、駐聯合國代表。一九五四年因支持吉拉斯被撤職，先後在美、英、北歐一些大學任教。曾應英哲學家羅素邀請，與法國讓·保羅·薩特等歐美著名人士組成「越南戰爭罪行國際審判法庭」。一九六七年起為塞爾維亞科學院院士。著有《鐵托傳》、《巴黎會議》、《美國紀行》、《南阿關係》等書。

本書出版於一九六九年，作者在前言中說，促使他寫這本書的直接原因是蘇聯一九六八年八月伙同華沙條約其他四國出兵侵佔捷克斯洛伐克，使南斯拉夫受到威脅。作者在扉頁上還表示，這本書是獻給蘇侵捷時在布拉格當衆自焚身死以示抗議的捷愛國青年學生揚·帕拉赫的。

這本書對一九四八年蘇南衝突的由來和經過，提供了南斯拉夫方面的材料和看法，同時也涉及與此有關的一些事件，如九國共產黨情報局的成立和活動、阿爾巴尼亞的科奇·佐治案件、捷克的斯蘭斯基案件、匈牙利的拉伊克案件、保加利亞的科斯托夫案件等。作者在南歷任要職，與鐵托關

係密切，書中透露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可以作爲了解和分析上述歷史事件及南共觀點的參考資料。

《共產黨情報局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情況的決議》一文，因與本書內容有關，故由本社作爲附錄收入，以供讀者參考。

南粵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三月

前言

這本書談的不是一九四八——一九五三年間所發生的事件的經過，而是我本人在這些事件中的經歷。

這本書是首先在盧布爾雅那的《勞動報》，隨後在《新馬其頓報》，薩拉熱窩的《解放報》以及最後在貝爾格萊德的《政治快報》上發表過的一些文章的滙編。

這些文章有三個主要來源：

我爲我寫的《當代南斯拉夫史》一書所搜集的文獻，

我在一九四八——一九五三年間的日記，

我對這一時期的回憶。

促使我着手寫這些文章的直接原因是蘇聯和東歐另外四國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裝侵略。

我花了整整三個月的時間來寫這些文章，把別的工作全都放下了。驅使我這麽做的是，如同二十年前一樣再次危及南斯拉夫的威脅。我相信，年輕一代在這些文章中可以找到材料，使他們得以對蘇聯和南斯拉夫一九四八——一九五三年間的衝突的實質得出自己的結論。

弗拉迪米爾·德迪耶爾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六日於博希尼

目錄

第一章　暴風雨之前

一九四八年一月，我本當到中國去，設法寫一本關於中國革命的書。作此行的想法，是鐵托同志提出的。一個冬天的夜晚，我到他那裏去，把我寫的關於巴黎和會的書的第一份送給他。他沉思着，想着什麽。他說：

「你難道不能寫一本這樣的書，談談中國革命，我們這裏關於中國革命寫得不多。」

這個建議使我感到意外。我開始喃喃地說，那樣，我就得撂下一切工作。當時，我担任新建立的總理府新聞局局長的職務。此外，我又是南共中央鼓動宣傳部新聞鼓動處領導人，南斯拉夫出席聯合國大會年會的正式代表以及南斯拉夫派駐（聯合國）處理人道主義、社會和科學問題的第三委員會的正式代表。我還常在高級黨校講授國際關係，我還是南斯拉夫體育協會的主席，還在編輯《三十天》這份月刊……

「你要是願意，這一切你全都可以撂下……中國是最重要的……你又喜歡寫作……只是，我担心你的身體。去年你在莫斯科陪卡德爾時，頭上的傷不是又使你犯了癲癇嗎……我担心你的身體經不住長途跋涉，你又得處在游擊戰的環境下……而且你還有個家……」

我暗自感到羞愧……我想幹我的老行當——從事寫作，我又想担任黨和國家的職務，兩者總是使我感到難於分身……誠然，戰爭結束以來，我在三年內發表了四本書，我一直在記日記，這是有某種野心，還是對我們中間那些最優秀的同志的責任感？他們犧牲了，我就有義務盡我所知、盡我所能，把現在的鬥爭寫下來……過去，我也考慮過這一點……對於我所担任的工作，我也是出於責任感担負起來的。但是，難道僅僅是出於責任感嗎？隨職務而來的一切，出頭露面啦，別人對我的奉承、讚揚啦，能够對別人的命運作出决定啦，這一切難道不吸引我嗎？……就在那一瞬間，我覺得，鐵托同志本人幫了我很大的忙，爲我開創了可能性，使我得以從事我最有心於從事的活動，也就是說，從事寫作。寫作，對我來說，是最親近的，因爲通過寫作，我又一次——我不知道有過多少次了——經歷在游擊隊的那些日子……

我回想起一九四一年，第一次攻勢之後，當時我不知道怎麼來當好政委的角色，鐵托同志就建議我記日記。現在，他又給我提出了好建議——讓我寫一部關於一場偉大的、生氣勃勃的革命的書。

但是，我没有馬上就找到話來表達我的這番認識。我試圖用笨拙的說笑來避開它。誠然，在大多數情況下，我的笑話是針對別人的（因此，我得了「瓷器店大象俱樂部主任」的外號），但是，這一次我弄巧成拙了：

「我的身體，你不用担心……不錯，我是百分之九十的殘廢軍人，正因爲如此，我只能以百分之十的能量來幹蠢事，要是我完全健康的話，我就會以百分之百的能量來幹蠢事了……」

後來，我振作起精神，接受了到中國去的建議。當我出來時，在寒冷的夜晚，我自問道，一個人怎麼有時候變得耳不聰目不明……作一次遥遠的、激動人心的旅行，去迎接這樣的事件，難道不

比呆在新聞局裏制訂工作條例，規定官員應當關緊抽屜……等等更爲美好嗎？

大清早，我就到外交部找東歐司司長伊沃·韋伊沃達①，請他辦理途經蘇聯的過境簽證，以便我進入中國北方，毛澤東的總部設在那裏。

爾後，我就整理了我自己有關中國的材料，並要人提供新的材料。戰爭爆發前夕，我曾在貝爾格萊德半合法地出過一本有關中國、有關中國游擊隊的書。在這件事上，米洛萬·亞克希奇幫了我的忙，他是參加一九三〇年在烏拉圭舉行的世界足球錦標賽最傑出的守門員，按職業來說，是開書店的。總的來說，在運動員中間曾有許多同我一起工作過的進步人士。在國家足球代表隊有名的後衛米盧廷·伊夫科維奇博士，右鋒，也是國家代表隊隊員亞歷山大·蒂爾納尼奇以及我少年時代的同學，巴爾幹田徑賽冠軍德拉戈什·斯特萬諾維奇的幫助下，我們成功地抵制了柏林的奧林匹克運動會。

米洛萬·亞克希奇同意由他的書店以白熊叢書爲名出一套書。這樣，我們就出了談斯達漢諾夫的書，出了坎特伯雷教長約翰遜的俄國記遊以及馬辛上校談紅軍的書。關於中國的書，我採用了埃德加·斯諾、史沫特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共產國際地下機關刊物《國際通訊》的成員的文章，編成一本完整的書。我特別注意在書中吸取中國游擊隊員的經驗。

這本書遭到查禁，但是在亞克希奇和黨的通訊機關的幫助下，這本書在南斯拉夫全國散發了三千多本。戰時，我在波斯尼亞的一個游擊隊裏找到了一本，當時，我感到很高興。書中記載了游擊

---

① 伊萬·韋伊沃達（一九一一—　），曾參加西班牙內戰，一九四一年參加南人民解放鬥爭，一九四四年任南通社社長，戰後任副外長，駐巴西、捷、英、法等國大使。伊沃爲伊萬之昵稱。——譯者

隊的神聖格言：「人民是水，游擊隊員是魚」，這一條對所有的解放運動都是適用的，不論它們彼此相距有多遠。

我和斯雷滕·茹約維奇①是戰後最先會見中國游擊隊員的兩個南斯拉夫游擊隊員。那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在舊金山的費爾蒙特旅館裏。聯合國組織成立大會當時正在這個太平洋濱海城市裏舉行。率領南斯拉夫代表團的是伊萬·舒巴希奇②，斯雷滕·茹約維奇和我是代表。

蔣介石的代表團也在舊金山，代表團裏有一個共產黨人——中共政治局委員董必武。

當時，盟國三强認爲，它們通過彼此間的協議可以來解決革命蓬勃展開的一些國家的內部關係，因此發生了上面列舉的那樣的荒唐情況。不過當時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我也沒有想到在蔣介石的代表團裏會有共產黨人這樣的事！

我第一次遇見董必武是在蘇聯外長、蘇聯代表團團長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一次招待會上。我眼不離莫洛托夫，當時我是第一次見到他。莫洛托夫走到茹約維奇和我的身邊（茨爾尼③穿着將軍制服，我穿的是上校制服），向我們介紹了一位年長的、很有風度的中國人。在場的還有幾個波蘭人以及捷克人，莫洛托夫開始向周圍的人敍述南斯拉夫游擊隊員是如何同德國人鬥爭的。烏克蘭

---

① 斯雷滕·茹約維奇（一八九九— ），一九二二年加入南共，至一九三七年任歷屆南共中央委員，一九四一年參加南人民解放鬥爭，爲塞爾維亞地區游擊隊司令，南游擊隊最高統帥部成員，戰後任財長，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四八年因贊成情報局決議，被解職。後任南經濟研究所所長，《戰鬥報》新聞出版社經理。——譯者

② 伊萬·舒巴希奇（一八九二—一九五五），克羅地亞農民黨領導人，曾任南王國倫敦流亡政府副首相，一九四四年與鐵托合組南人民解放民族委員會，任副主席，一九四五年在聯合政府中任外長。後辭職。——譯者

③ 茨爾尼指斯雷滕·茹約維奇。——譯者

外長，共產國際原來的書記季米特里·馬努伊爾斯基更爲熱情煥發地繼續談論這一話題。他是一位動作十分活躍的人，頭髮已完全斑白。他用他那不大的拳頭敲着我的胸脯，對一個波蘭人說：

「這位上校，當德國人在德爾瓦爾空降想俘獲鐵托時，挺身而出，救了統帥的命，而自己挨了三顆子彈……」

我緊握雙手求告：

「不是這麼回事……」

馬努伊爾斯基再次輕敲我的胸脯：

「你看看，南斯拉夫游擊隊員多麼謙虛……他們對自己的功勳隻字不說……」

隨後，他向我眨眨眼，把我往一旁拉了拉，悄聲說：

「我是故意在波蘭人和捷克人面前這麼說的，讓他們看看，情況最危急時應當怎樣戰鬥……」

馬努伊爾斯基沒有想到，這番想出來的故事恰好打中了我的痛處——使我想起我的一些最好的同志犧牲了，而我却受到了懲罰，在他們死後還要活着。

那位年長的中國人看着、聽着這一切，臨走前給了我一張名片，上面用英文印着：

「董必武

中國出席聯合國關於國際組織會議代表。」

他說，他想見見茹約維奇將軍和我。我們握手時，他要我把名片還給他，他拿出鉛筆來，在上面寫上了他在費爾蒙特旅館裏的房間號碼——一四八〇。

當晚，我又去見電影導演、記者奧森·韋爾斯。他還在一九四二年時就開始維護游擊隊員，揭

露德拉扎·米哈伊洛維奇①。我們是在舊金山認識的，那天晚上，我要給一批美國記者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他也想參加。

聽了馬努伊爾斯基那番話之後，我情緒很不振作。而記者們的情緒就好像是勝利者似的，他們向我提出了有關德國人的許多問題，他們不把德國人叫德國人，而是叫做弗里茨和蠻子。有一個生在加利福尼亞的約克軍士，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臨近結束時，在德軍撤退時曾俘虜過一百二十四個德國人。問題都是本着下面這樣的精神提出的：

「上校，您是否打死過成百名德國人？」

我挖苦地回答說：「嗨，要是每一個游擊隊員打死一百個德國人，戰爭早就結束了，因爲再也沒有德國人了！」

「您是否打死了五十個？」

我沉默不答，過了一會兒，第三個又問道：

「那麽，您是否至少打死過十個德國人？」

我振作起精神來，並開始解釋，我參加過幾次戰鬥，但是我不知道，我打死了多少個德國人。記者們不滿意，有一個記者刺耳地說：

「您的傳記說，您曾三次受傷……」

---

① 德拉扎·米哈伊洛維奇（一八九三—一九四六），二次大戰時，任南流亡政府大臣、軍隊參謀長，並爲反動民團組織切特尼克的頭子，一九四一年投靠德意法西斯佔領當局，與南共領導的武裝部隊作戰。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六日被判處死刑。——譯者

這時，我再也忍耐不住了：

「是的，我曾三次受傷，但是這三次，全是在我從戰場上逃跑的時候，子彈打中我的，因爲游擊隊員的能耐就在於決不充當敵人的靶子。」

奧森・韋爾斯開始大笑，在這批幼稚愚鈍之輩中間唯有他明白，我想講的是什麽。

第二天是星期天，茹約維奇通知我，蘇聯代表團秘書諾維科夫來過，傳來了口信，説莫洛托夫邀請我們到加利福尼亞一遊。

我們乘小汽車前往帕洛阿爾托城，著名的斯坦福大學就設在那裏。我們在郊外的一個小地方進了午餐。到飯館吃飯的人認出了莫洛托夫，開始向他鼓掌。一位年紀較大的人叫了起來：

「瞧那個俄國人，靴子上還有雪……」

飯館女老闆最後走到莫洛托夫身邊，擁抱了他，並説，她有個兒子在太平洋服役，她相信，盟國不久就會勝利，她的兒子也就會回到她的身旁。

我們大家都爲這些場面所感動。傍晚，茹約維奇和我同中國人董必武呆在一起。他年紀比較大，有六十多歲，舉止很有風度。他先向我們叙述了自己的生平。他的俄語講得很好。他是中國共産黨締造者之一。他參加了一九二一年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此以前，曾當過國民黨的領導人。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没有隱瞞自己的社會出身：

「我生在一個地主的家庭裏，青年時在日本上大學。」

他曾是出席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産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在蘇聯呆過多年，曾

在列寧大學學習。一九三〇年回到了中國，到了江西解放區，在那裏被選進中央委員會。

他向我們談了同蔣介石的鬥爭、長征、他在陝北的工作。他在陝北任黨校領導人。

一九三七年，他被指派爲中共代表團成員，代表團的任務是同國民黨締結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綫協定。自一九三七年起一直到前來舊金山，他一直是以周恩來爲首的共產黨駐重慶代表團的成員。

我們向他叙述了我們的鬥爭，市民和農民的態度，談話一直進行到黎明。使茹約維奇和我感到意外的是，就戰略和策略而論，中國革命和我們的革命竟有那麼許多共同點，儘管我們沒有任何直接的接觸。

董必武告訴我們，不久中共將舉行第七次代表大會，他將把主要材料寄給我們。他給了我一份關於中國解放區的備忘錄，並問我們能否在我們的報上發表。我答應他，我們將在我們的報上發表。

我回到國内後，在我的朋友維利·亞格爾的幫助下，我爲董必武的備忘錄寫了一篇序言，我們在《三十天》雜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號上把兩篇東西都發表了。我當時是該雜誌的主編，亞格爾是編輯。

請看我們這篇序言中的幾段：

「聯合國舊金山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中的共產黨代表用英文發表了這個備忘錄。在此以前，世界公衆只是泛泛地了解到，數以千萬計的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正在中國北方和其他地區十分成功地同日本侵略者展開鬥爭。八路軍和新四軍在這些地區對日軍勝利地進行了數百次的戰鬥，重慶的中國反動政府却完全停止對日本人作戰，而準備發動内戰。世界公衆不了解關於中國北方地區的這場鬥爭和生活的具體和詳細的消息。蔣介石在這些地區周圍佈置了一百萬最精銳的部隊，目

的在於進行封鎖，不讓人民軍隊的主力去把中國其他地區從日本人手中解放出來。重慶的新聞檢查又禁止記者向國外拍發越過封鎖傳出的有關北方地區的消息。

這個備忘錄第一次把這些地區在抗日鬥爭中在戰爭方面的巨大貢獻，把解放區人民的經濟、政治和文教組織呈獻於世界公衆面前。

舊金山會議開後六個月的今天，日本投降三個月後的今天，這個備忘錄的意義毫無所失。它對於理解中國所發生的事件，今天如同五月份它在舊金山發表時一樣重要。中國北方地區，自一九三六年起，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一直是中國爭取獨立和民主化的鬥爭中心。日本投降以後，北方地區的這一作用絲毫沒有改變。這些地區今天依然是爭取中國民主化，爭取使中國完全擺脫封建主義、反動派和外國帝國主義的鬥爭的中心和基地。這一備忘錄發表以後，代表封建地主、上海的銀行家以及外國帝國主義利益的蔣介石重慶反動政府，就發動了早就作了準備的內戰。它的目的是窒息有九千萬中國人民參加的，並正向中國其他地區發展的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

要對中國的現狀有一個完整的概念，只消對日本投降後的事件作一番簡短的回顧。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最初，蔣介石要求八路軍和新四軍不要去解除日本軍隊的武裝，而八路軍和新四軍曾經勝利地同日本軍隊整整打了八個年頭的仗。同時，他却下令華北的中國僞軍解除日本人的武裝，『維持治安』。重慶政府的部隊同時又對八路軍和新四軍發動進攻。倫敦《工人日報》十月初報道，蔣介石在這些戰鬥中蒙受慘敗，人民的軍隊完全殲滅了他的第八軍和第八十一軍，俘虜了這兩支部隊的指揮官高樹勳將軍，他立即發表了告蔣介石其他軍隊的宣言，呼籲他們停止內戰。

在美國軍隊的積極支援下，蔣介石繼續打內戰。美國的一些報紙認爲，美國要對中國的內戰負

巨大的責任。因爲，開明的《新共和》雜誌指出，『蔣介石在外交上、經濟上和軍事上完全依附於華盛頓』。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將軍說，他的任務只是解除在華日軍的武裝。同美國外交部有密切聯系，代表美國金融界利益的《時代》雜誌，在十月二十二日的一期上描述了駐華美軍的具體作用。《時代》說，八路軍和新四軍打算解除華北日軍的武裝。《時代》寫道，美國外交官和武裝力量粉碎了共產黨人的計劃。在共產黨中國的心臟地區，美國空軍第十軍從漢口和上海運來的蔣介石第九十二軍和第九十五軍迅速佔領了淸朝古都北京。美國飛機把蔣介石的第九十四軍運到了被新四軍包圍的上海。而廣州由他的美國軍官訓練出來的新一軍佔着。」

《時代》繼續說，「在中國沿海，八路軍只佔着一個港口——烟台。但是美國强大的海軍却在這個港口前巡航。美國海軍陸戰隊開到了重要港口天津和靑島並佔領了這兩個港口。以後，它將把這兩個城市轉交給蔣介石。美國用劍來支持果斷的外交。共產黨人制止不了美國。美國堅決支持、援助、加强蔣介石……」

這篇序言最後說：

「以工會爲首的美國日益廣泛的民主人士要求美國政府立即從中國撤出全部美軍，停止干涉中國的內政。這些人士指出，蘇聯由於同中國簽訂了尊重並加强中國的獨立的條約，而贏得了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羣衆的好感，而美國的干涉，促使他們把美國看成是中國的獨立和民主的敵人。」

關於一九四五年春天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我們只收到了通訊社的消息。蘇聯的報刊上沒有報道這次代表大會的幾個主要報告。然而董必武通過英國共產黨人寄給我一份毛澤東的

報告。這一報告，長約四十頁，發表在《三十天》的三月號和四月號上，題目是：

《毛澤東
爲建立新中國而鬥爭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在中共七大上的報告》。

我寫了幾句話作爲介紹：

「這篇報告儘管是在八個月以前作的，對於想研究中國問題的人來說，它仍有巨大的裨益。」

董必武的備忘錄和毛澤東的報告，都由斯爾詹・普里察自英文譯出。

日子一天天過去，簽證之事，蘇聯一直沒有作出答覆。韋伊沃達向我解釋說，蘇聯的外交機器運轉十分緩慢，需要有耐心。他還向我談到，密洛凡・吉拉斯①認爲，這樣的外交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中已是落後的了。

印度共產黨中央領導的一封信改變了我的計劃。這封信是致南共中央的：

「親愛的同志們：

我們將自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舉行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我們領導熱烈邀請你

---

① 按「吉拉斯」以前被誤譯爲「德熱拉斯」。在塞爾維亞文中，爲 БИЛаС，拉丁化寫法爲 **Dilas** 或 **Djilas**。**Dj** 係一個字母。故誤譯爲「德熱拉斯」。吉拉斯的昵稱爲「吉多」。——譯者

黨派一名代表前來參加代表大會。

我們是在我國人民的生活出現一個重要的、決定性的轉折點的時候舉行代表大會的，我們確信南斯拉夫共産黨的一位兄弟的代表的出席，將有助於增進對我國人民面臨的問題的了解和實現我國人民同南斯拉夫人民建立兄弟聯系的願望。

鑒於强大的南斯拉夫共産黨的代表的出席定將鼓舞我們的代表大會在團結印度全體民主力量上發揮真正的作用，確保印度在爭取和平、自由和社會主義的鬥士的隊伍中佔據應有的地位並贏得爭取印度完全獨立，擺脱英美帝國主義奴役的鬥爭，我們熱誠地請求你們做必要的工作，使你黨的一位兄弟的代表出席我們的代表大會。

致以熱烈的兄弟般的問候。

總書記J·P·喬希」

南共中央國際部領導人，黑山①老共産黨人尼古拉·科瓦切維奇建議我，由我去參加這次代表大會，爾後設法經由緬甸，進入華南，那裏游擊運動又開始興起。他説，他將向中央提出這樣的建議。建議被採納了，黑山的詩人拉多萬·佐戈維奇也被指定爲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代表，他是以十分嚴格，首先是對自己十分嚴格而出名的。

關於我將到哪裏去，目的何在，我對家裏人什麼都没有説。仍然在照戰前和戰時的地下工作時的習慣辦事。例如，我的愛人韋拉很長時間不知道我在中央鼓動宣傳部工作。有時候，她到革命大

① 卽門的内哥羅。——譯者

街馬戴拉大廈前等我，戰後不久，中央就設在那裏。大廈上沒有掛牌子，而她又不想問，但是，有一天她忍不住了：

「今天晚上，我在等你出來時聽到你對那個小通訊員說：『把他捆起來，不然他就要胡鬧了』。你到底在哪個機關裏工作？」

我像瘋子似的笑了起來。有人給中央送了條大狼狗。有人把狗直接送到馬戴拉大廈來了，狗就到處亂竄。爲了免得把人咬了，我叫通訊員把它捆起來，再來研究如何處置……

只是在那時，我才向韋拉承認，我在中央鼓動宣傳部工作。我還向她透了點風，說我要去印度，或許走得還要遠一點。她傷感地望着我，我接着說：

「你要知道，我們始終是革命者……黨第一，然後才是個人的生活，家庭……要是我發生什麼意外，你會受到照顧的……」

行前有許多工作要做。此外，我閱讀了我能得到的有關印度的所有材料。戰前，我曾譯過帕爾姆·杜德關於印度人民和印共的鬥爭的書，該書是由左翼書籍俱樂部出版的。一些篇章我曾在戰前的《三十天》雜志上發表。這樣，我就重温了我對於印度政治史的知識。

在出發作這次遠方之行的前兩天，鐵托同志的秘書布蘭科·武契尼奇通知我，要我當天晚上到鐵托同志在德迪涅① 羅馬尼亞大街的家裏去。

---

① 貝爾格萊德市郊風景區。——譯者

午後五點左右，我就往鐵托的家走去。夜幕早就降臨。這是一個有點異常的二月。儘管當時下了很大的雪，很冷，但是那幾天的天氣很暖和，與其說使人想起冬天，不如說使人想起春天。

我慢慢地走到羅馬尼亞大街十五號。入口處的軍官立即給我開了門。我沿着一條很熟悉的小徑，向鐵托的別墅走去。這條小徑，長三十來米，穿過一座很大的花園。小徑兩旁種着一些矮小而又長得很壯的樹，樹冠彼此交叉，因此形成一個綠色的華蓋。每當我沿着這兩行樹，走過長滿了濃密的常春藤的花園院牆的時候，總是覺得很愉快。

我又來到了小徑盡頭的鐵托的家門前。這是一幢儉樸寬敞的兩層別墅，戰前爲某個工程師所擁有，同周圍別的別墅沒有區別。一九四四年十月，當我們的部隊解放貝爾格萊德時，這幢房子裏臨時安設了我們的一個軍的司令部。後來，人民解放軍最高統帥部搬進來了。戰爭結束後，鐵托就留在別墅裏了。

來客一進門就到了一個大客廳，四周的牆上裝飾着木刻，刻有民間歌詞和米羅斯拉夫福音上的引語。這是原來的主人留下的。左邊是餐室，右邊是工作間，木樓梯伸展到樓上。我走向寬敞的工作間，在那裏，在一個角落裏放着鐵托的桌子。中間放着十二把皮椅子和一張開會用的長桌子，在另一頭是爲招待來客而準備的傢具。

我進去時，鐵托正坐在桌子後面工作。他放下了一直在看的報告，向我揮了揮手，指着房間的另一頭，邀我坐下。我覺得他很疲倦。這使我感到意外，因爲他平時看上去不是這樣的。我曾經多少次就近觀察過這張有生氣的黝黑的臉龐，高高的前額，突出的顴骨，鮮明的銀髮。我又想起，每當別人問我，鐵托什麽樣子時，我總是不能如實地描繪他。我認爲，這主要是由於在這張臉龐上堅

定果斷和善良溫順同時奇怪地混雜在一起，他的笑容和透人心肺的藍色的眼睛尤其如此。

鐵托點燃了烟卷，把烟卷習慣地裝進他那鑲有銀邊的黑烟嘴裏，抽了起來，並很快地把腿叉了起來，我等待着開始談我的旅行。這時他望着我，像是想談某個複雜的問題而又想聽聽我的意見。他這種目光我是很熟悉的。

這一切都發生在片刻之間。我認識鐵托已經有整整十年時間了，同他經常保持接觸，儘管如此，我還是猜不着他要對我說些什麽，當他不是像意料中的那樣問起我的印度之行，而是對我說了下面這番話時，我感到意外：

「你是否看到了羅馬尼亞在搞些什麽名堂？他們下令，把我的像片全都拿掉了！你或許已經從外國通訊社的消息裏看到了？」①

突然間，他的嚴肅的語調使我感到吃驚。這些消息我已看過，但是我完全確信，這是根本不可靠的。

---

① 這一消息登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時南通社的《參考新聞》上。消息稱：

二月十二日巴黎電：法國報紙談「布加勒斯特的橱窗取下了鐵托元帥的像片」。

南通社記者報道：

今天的《費加羅報》以《布加勒斯特的橱窗取下鐵托的像片》爲題刊登了該報記者發自維也納的如下一則消息：

「據來自布加勒斯特的消息稱，羅馬尼亞共產黨下令從南斯拉夫政府首腦的像片同斯大林元帥、季米特洛夫和格羅查陳列在一起的所有橱窗中，拿掉鐵托元帥的像片。布加勒斯特流傳有關鐵托元帥的形形色色的流言，鐵托的地位現在看來並不像人們一般以爲的那樣穩固。他似乎已失去了莫斯科的信任。這些流言迄今尚不能予以證實，但是是值得記載下來的。」——作者

在同鐵托談話時，我始終覺得自己顯得笨拙，對於他提出的問題，我通常不能把我想說的意見說出來，往往是脫口而出。就這樣，從我的嘴裏說出了這麽一句話：

「這又怎麽……這一切難道不是司空見慣的揑造？」

突然間，他的臉上掠過一陣憂傷的陰影。這時我才仔細地看了看他的臉龐，清楚地看出他的臉龐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在我看來，這副臉龐變得有點陰沉，某種嚴重的憂慮的痕跡深嵌在上面。從眼窩上看出，上一夜他没有睡多久。

我一下子明白了，我一進房間時產生的疑問是有根據的。鐵托疲憊不振。突然之間，我明白了，發生了某種重大的事件，某種嚴重的事件，它折磨着鐵托，在他的臉上留下了如此明顯的痕跡。

鐵托再一次煩躁地把一條腿換擱到另一條腿上。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似乎是聽到了我那令人不安的問題，他接着說：

「你是個幸運的人……這就是說，你還什麽都不知道！戰時，第五次攻勢時，當德國人從四面八方把我們包圍了，那時的日子是多麽美好！那時我們知道，我們只剩下我們自己，我們盡我們所能突破了包圍，而現在……有一切條件來幫助我們了，俄國人却來妨礙我們。」

我感覺到我的雙腿在打顫。片刻之間，我什麽話都說不出來。一些想法閃電般掠過我的腦海，交織在一起，幾乎構成了某種肉體上的痛楚。這時，我想起了幾天前我同蘇聯對外文化協會駐貝爾格萊德新任代表加里寧的談話。他對我說，南斯拉夫人不喜歡蘇聯，學俄文的人少，學英文和法文的人多，說保加利亞完全不一樣，那裏的蘇聯之友協會幾乎有一百萬會員。我没有把加里寧的這番話當作一回事，因爲我弄不明白，蘇聯的這個芝蔴綠豆官怎麽能够教訓起南斯拉夫來了呢。我當時

笑了笑，只是說：「當然囉，保加利亞是這樣。他們在戰時，在決定生死存亡的關頭沒有趕得及喜歡蘇聯，現在想彌補上。」這就是說，這位前不久才從莫斯科前來的勤於職守的官員是按照自上而下的某種指示說這番話的。我記起來了，他曾吹噓說，是「日丹諾夫親自」把他派到南斯拉夫來的。我在想，對我們嘮叨這種無稽之談是多麼傲慢無禮。我把這一切同鐵托現在對我說的話聯系起來了。這就是說，這不是偶然的事，而是同蘇聯發生衝突，同斯大林發生衝突。但是，這是不可能的！很可能是發生了誤會。在這個國家裏，有誰不喜歡蘇聯？我們怎麼能夠同斯大林吵架呢？我似乎覺得，好比有人對我說，我們在同我們自己發生衝突。這一切馳過我的腦海。

鐵托覺察到了他的話給我留下了什麼樣的印象。鐵托慢條斯理地、在我看來是有點溫存地繼續講下去，似乎是想透徹地、逐步地給我指明我們面臨的一切是什麼。慢慢地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他臉上的皺紋和那疲憊的神情從何而來。這裏涉及的是一項生命攸關的決定，或許是我們現代史上最爲生命攸關的決定。問題不在於個別人，而在於南斯拉夫的命運，整個這個國家的人民的命運。鐵托的聲音把我從緊張的沉思中驚醒：

「我們先看看，下一步會是什麼。卡德爾、吉拉斯和巴卡里奇都在莫斯科。」

「難道他們不是去討論軍事援助和對我們的工業投資？」

「不，不只是關於這些。而是涉及到嚴重得多的事情。我們正在等待，他們隨時可能回來。」

這個話題的談話就到這裏爲止。我們把話題轉到印度上。後來我辭別了。在行前的兩天內，我老是在考慮鐵托對我講的那些話。

遙遠的印度之行

早自少年時代起，當我第一次走向遠方時我就學會了保存自己，使自己在感情上不爲新的國家、新的人、新的印象所吞噬，以致使我不能實現我爲之前往的目的；應當始終做到自制，集中精力於自己的天地。

而爲了做到這一點，在作這樣的旅行時，我總是帶上一本少年時就吸引我注意的書。路上，我瀏覽這本書，可親可愛的文字又使我回想起以往的日子。

當我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經由布拉格、阿姆斯特丹和羅馬（當時對我們南斯拉夫人來說，這是同東南亞的唯一的聯系途徑）前往印度時，我帶上了我十四歲時就喜愛上的兩本書：馬塔武列的《布爾奈老兄的强壯的伙計》和揚科·克爾斯尼克的《佃户之晝》。後一本書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回憶，原因是我從托米奇教授那裏得了五分，因爲我把克爾斯尼克的這本書讀了好多遍。

後來，當我閱讀了約萬·茨維伊奇關於黑山人、黑塞哥維那人、波斯尼亞人和我故鄉的其他山裏人的社會心理學的著作時，我才發現了我這種愛好，這種少年時代就開始養成的習慣的部份奥秘。我是否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科學上所謂的强烈的迪納拉型人①。茨維伊奇賦予這號人不少長

---

① 南學者把南人種分爲以下五類：黑塞哥維那和黑山的迪納拉型（源出迪納拉阿爾卑斯山，特點是體型高而强壯）；南斯拉夫北部和西部的阿爾卑斯型（身材稍矮）；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的波羅的海型（身材中等，圓胖）；達爾馬提亞和馬其頓（部份地區）的地中海型（身材較矮，但是體格匀稱）；帕農型（身材矮小粗胖）。——譯者

處，但是也有許多破壞性特性。他對迪納拉型人的個人迷信，也即自我陶醉的批評使我感到慰藉。黑山人，一旦會走路，十韻脚的詩就出口成章，就自認爲是本村最了不起的英雄。我的少年時代的這一愛好事實上豈不就是自我崇拜，拜倒在自己脚下，整日地在喬裝打扮，自我陶醉。

但是這一回我不需要心愛的書。別的事使我感到壓抑，完全佔據了我的思路。我一再考慮我從鐵托同志那裏聽到的關於同俄國人發生衝突的一切，我不知多少次地自問道，這一切是否不過是一場惡夢而已。

這些惱人的想法甚至使我忘記了飛機的航行。我並不喜歡乘飛機。戰時我恨飛機——德國飛機，而一九四五年，當我同舒巴希奇和茹約維奇一起前往舊金山時我又恨盟國的飛機。當我們在飛往美國之前在卡薩布蘭卡加油時，切特尼克分子破壞了我們所乘的「解放者」大型飛機的自動駕駛儀。飛機在大西洋上空突然頭朝下直往下掉，發動機轟鳴着，飛機兩翼受了傷——駕駛員好不容易才把我們救了出來。自那時起，我在飛機上再也睡不着覺。眼睛一閉，耳朵就聳了起來，因爲我覺得發動機又像那個三月的夜晚那樣在轟鳴。

但是，鐵托的話使得我連這種危險也忘掉了。我們飛經匈牙利，飛機緊挨着寒冷的白雲飛行。下着雪，我們在南斯拉夫早就在盼雪了，大家認爲我們的收成取决於雪。駕駛艙裏的領航員預報說，我們正接近布拉格機場。我們開始下降，降得越來越低。離地面總共只有一百公尺了，但是還是什麼也看不見。駕駛員不敢冒險往看不見的地方降落，决定轉回到布爾諾。

飛機裏引起了一陣騷動，可以聽到心情不安的旅客發出煩躁的聲音，但是這種聲音似乎是從很遠的遠方傳到我耳朵裏來的。

或許在他們看來，我顯得勇敢。而我，則在自問，同俄國人的這種種誤會到底是怎麼發生的？是否僅僅是誤會，還是……我在思想上還不能够接受別的可能性。如果不是，那麼幕後又是什麼呢？

這些想法不斷地折磨着我。後來，在我從布爾諾乘火車前往布拉格時是這樣。我在赫拉德查尼宮散步時是這樣，這一次我不再注意布拉格豪華、樣式奇異的圓屋頂。在荷蘭等飛機，我試圖埋頭欣賞倫勃朗的《警衛換崗》時，也是這樣。飛機從阿姆斯特丹機場起飛了，我一隻耳朵聽着佐戈維奇同捷克斯洛伐克人討論現代藝術時，仍然是這樣。

這種沉重、陰鬱的想法老是不停地出現。而且越來越强烈。誤會從何而來？從我們方面來說，沒有任何緣由。不過，你再冷靜地看看吧！斯大林怎麼會犯這樣的大錯，這樣的根本性錯誤？不過，是否還是他對；蘇聯是十月革命的國家，是一個已經有三十年歷史的社會主義國家。他們有大量的革命經驗。我們黨多年來帶領我們走的不是同一目標嗎？我們黨不是教育我們要無限熱愛這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嗎？不是教育我們把斯大林當作偉大的領袖和導師嗎？但是，蘇聯機器上的那顆小螺絲釘——加里寧——怎麼如此無恥地造我們的謠，而且正如我後來所看到的，又是奉命造謠呢。黨不是教育我們要熱愛蘇聯，也就是尊重真理嗎？因爲一個進步的革命的運動不可能撒謊。這會使它完蛋。它的根基恰恰就在於使人們了解關於社會的真理。它的主要力量就在這上面。因此它必須在生活的一切領域爲真理而鬥爭。

思想是能够使人痛苦的，是能够使人感到壓抑的。我覺得，我懂得區分真理與謊言。

强有力的四引擎飛機越過地中海，在下面遠處克里特島沐浴在一片絳色之中。我們在陽光下繼

續飛行，似乎我們通過陽光在往太陽上爬。貝魯特和背後的高山呈現在視野中。但是，我看不見，或許只是朦朧地預感到而已。我開始慢慢地平靜下來了。我的目光落到了《布爾奈老兄的强壯的伙計》上面。就這樣，我走的是另一條路，仍然回到了我的少年時代。我又担心起飛機來了，我又用一隻耳朵來聽發動機的響聲。一直到卡拉奇和加爾各答，我都没有睡着。

在達姆—達姆機場上（上個世紀，這裏曾是英國的彈藥庫和武器庫，那可怕的達姆—達姆彈就是在這裏開始製造的），印度同志中没有一個人前來迎接我們。曾經經由孟買發了電報，通知了我們抵達的確切時間。

我們叫了一輛老式的福特牌出租汽車。司機是個錫克教徒，大鬍子，包着包頭。他不停地按橡膠大喇叭。

一小時後，我們到了印共總書記喬希那裏。在馬路上，牛安詳地在車道上漫步。有時，我們得在它們面前停住車，直等到它們願意走開爲止。

我們被領到市中心的一座旅館裏。我走到看門人那裏，向他要電話簿，我從上面找到了各家報紙的電話號碼。

「哪一家是這裏的左派報紙？」

「最後那一家！」

我們找這家報紙的編輯部找了很久。實際上，這只是一間大屋子，編輯、行政人員和報販都在一起。他們盤腿而坐，在捆報紙。這使我想起了我們戰前的進步報紙的編輯部。我們向主編説明了我們是誰和要找誰。

死神與加爾各答城

當飛機從阿姆斯特丹經過二十八小時飛行把我們送達加爾各答時，我第一次明白了一個可怕的事實：西歐是飄浮在世界性的貧困和絕望的大洋中的一個富裕之島。我們離開了阿姆斯特丹和它的運河，這個城市十分清潔，「蜜掉在人行道上，你都可以舔起來」。現在我們置身於加爾各答的人羣中，在這裏，成千上萬瘦弱的人們睡在馬路上，在馬路上大小便，在馬路上接點雨水洗臉，在馬路上，在那種非人的貧困中死去。

人又矮又小，在馬路上曳足而行的牛皮包骨頭、沒有吃飽、無精打彩，樹木纖細。人也好，動物也好，植物也好，一切都衰敗退化。有五百萬、六百萬、七百萬或者八百萬人口的加爾各答像貝爾格萊德當年的成千上萬吉普賽人的棚户，爲犬牙交錯的柏油馬路所隔開，而市中心則是英帝國政權的象徵——幾座聖喬治式的官邸，富麗堂皇的跑馬場和旅館，門前的警衛揮舞着很粗的竹棒驅趕着這些不幸的人們。

鑒於代表大會的開幕從二月二十二日推遲到二月二十八日，我們就意外地有了空閑時間。我連博物館都未能去，印度黨的材料也看不下去，我把大部份時間花在馬路上，觀察這一不幸的人民。河上是一些奇怪的船隻，同諾亞方舟相似。在人行道上睡覺的窮人中間也有區別。每二十來個人中有一個幸運兒，搞到報紙，把報紙鋪在地上，人躺在報上。其餘的人直接躺在柏油路上。在一個緊

挨一個的身體上面有一張床，床上有一個胖子。他甚至有一雙鞋，他怕別人把鞋偷走，就把每隻鞋都放在床脚下壓着。要是有人想偷鞋，就得抬動整張床，就會把他驚醒。

再遠一點，在一棵没有樹枝的樹下，有一個鐵匠和一個鐵砧。他有一隻貓，用繩子拴着。他靠着樹坐着，望着滿天星斗，恰如荷蘭的資產階級呆在自己燈火通明的房間裏。

談帝國主義的書，我讀過幾十本，但是最使我震撼的莫過於這批受盡折磨的羣衆的場面了。英國統治了印度兩個多世紀，使一切社會關係都僵化了，不讓社會力量得到發展，維護閉塞和落後。

這些人的貧困，人和自然的這種普遍的蜕化，不是某些生來就有的特性造成的後果，而是長期忍飢挨餓的結果。在塵土中爬來爬去的孩子們的黑眼睛中閃爍着久遠年代的某種憂傷，似乎先輩們的一切苦難全都反映在這一對對扁桃形的黑眼睛裏。

印共中央的同志們告訴我們，没有哪個城市的死亡率超過加爾各答的了。在印度的這一地區，人們的壽命平均不超過二十六歲，而在英國和荷蘭則是七十歲以上。這種大規模的橫死每年帶走了多少潛在的偉大作家、音樂家和科學家？以世界上這樣的不平等關係給帝國主義上供，代價是高昂的。

我回到了旅館，拿起了克爾斯尼克的書，我自問道，我們自己在近代史上在人的生命上付出了多麼高昂的代價，才得以擺脱壓迫和非人的關係。我曾在什麼地方看到，説我們在拿破侖的戰爭中在「邊屯區」損失了百分之十一的人口，而在一八七五年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起義中，據估計有四分之一的居民離鄉背井。第一次世界大戰又使我們損失了多少？據某些統計材料説，從多貝爾多布

到卡伊馬克查蘭①我們犧牲了一百九十萬人。而在上次大戰中，幾乎損失了兩百萬人。這是我們給帝國主義上的供。

加爾各答天花和霍亂肆虐。（印共）同志們要我們打防疫針，預防這兩種凶症。報紙報道說，每天都有幾百人死去。我打了預防針後發起高燒來了。

天氣本來就很熱。透過旅館房間的窗户，我看見一些很大的鳥，張開了翅膀，幾乎就站在空中。在昏迷之中，我似乎覺得有一隻鳥銜着一隻人手。幾天以後，當我清醒過來時，我向一位印度共產黨人叙述我在鳥的嘴裏看到了什麽時，他對我説，這不過是一場惡夢而已。只是在孟買存在帕斯教派，這一教派的人把死人放在建有高台的城堡上，事先把死人的四肢弄斷。食肉鳥就降在屍體上，叼走身體的各個部份。

我們走訪了離加爾各答三十來公里處的一個村莊。房屋都很矮小，是泥土蓋的。我們訪問了一位農民積極分子。屋内都很清潔，用石灰粉刷過。他招待我們吃某種罕見的水果。這位農民很機靈。儘管窮困潦倒，但却懷着自豪感。我們交談了同地主的關係。聚集了十來個男人和女人。這些人的舉止使人想起我們的馬其頓人。他們聽着別人講話，如果同意，就慢慢地摇着頭。

我們在返回加爾各答時，遇到了一個年青的南斯拉夫人。他叫杜尚·普哈洛。他參加了東南亞青年和學生代表會議。二月二十七日午後五時許，加爾各答的印度演員協會設茶會招待出席青年代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與地利軍隊和意大利軍隊曾在多貝爾多布激戰；一九一六年塞爾維亞軍隊在卡伊馬克查蘭曾同保加利亞、德國聯軍激戰。——譯者

表會議的代表。佐戈維奇和我也被邀請出席茶會。但是在臨行前，印度黨書記J·P·喬希找我們談話。我們晚了半個小時才抵達舉行招待會的所在地，在那裏我們看到的是警察和救護車。一批來路不明的人，配備着衝鋒槍和手榴彈，衝了進去，向站在牆邊，安靜地喝着茶的客人們開了火。招待會的東道主跳了起來，來到了殺人兇手的面前。來賓中沒有人受傷，但是兩名印共黨員——就職業而言是演員——蘇希爾·穆克吉和巴布馬達布·格澤犧牲了，另有七個人受傷。

不知道是誰僱傭了殺人兇手。據說，他們屬於錢德拉·鮑斯運動。他曾是甘地的弟子，一度當過印度國大黨的主席。三十年代曾到過歐洲，一九三六年前後訪問過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政治報》（我當時在該報工作）的一位編輯曾派我去採訪鮑斯。他談到英帝國主義在印度的罪惡，我寫了一篇很長的採訪記。然而，新聞檢查槍斃了這篇文章。後來，鮑斯脫離了國大黨，戰時投靠日本，寄希望於緬甸的日軍把印度從英國統治下解放出來。他甚至組織了一支印度軍隊，但是在一九四五年失蹤了。據說，他死於飛機失事。他在加爾各答還有很大的影響，民間傳說他尚活着，有朝一日會來解放印度。

到底是不是他手下的人進行這次襲擊，始終弄不清楚。我當晚被叫到警察局，一位警察——英國軍士同我談話，印度當時雖已獨立，但警察還沒移交到印度人手裏。這個英國人十分客氣地對我說，警察不能保證我們的安全。我表示明白他的告誡之意。

第二天傍晚，我們出席了犧牲了的印度同志的葬禮。送葬隊伍的先頭打着一面降了半旗的紅旗。行列中有幾千名工人。靈柩上蓋着世界民主青年聯盟和國際學聯的旗幟。旗幟是越南代表帶來的。

革命的本能

是否只是窮困使人民造反，對革命來説，是否有自發性就够了，還是意識形態也起着重大作用？當印度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在穆罕默德·阿里公園在一頂大帳篷裏舉行時，我考慮了這個問題。代表們盤着腿坐在放在地上的墊子上；他們中間工人不多，農民更少，中產階層的人最多。他們是從遼闊的印度國土的各地來的，在印度，講着二百多種不同的語言。

我的思緒飛回了國內，想起了我們在自發性和意識形態問題上的經驗。譬如在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據統計，自一八〇六年至一九一〇年曾發生過三十來次農民暴動、自發的起義，但是全都失敗了，因爲没有意識形態①，没有先進的社會階級來指揮起義，來給起義確定目標。因爲只有在自發性同革命組織相結合時，才能爆發完全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我們的各個國度内也都產生過自發的抵抗，也都要求變革，要求讓新的階級來掌政，但是全都落空了，因爲没有名副其實的意識形態。

但是在我們這個世紀，每一場革命都爲過渡到高一級的社會提供了一些新東西，提供了新的形式，新的可能性。就形式而言，兩個一模一樣的革命，是不可能找到的。這裏最重要的是：革命的

① 原文如此。意指先進思想。——譯者

主觀力量應當找到最符合各國具體條件的形式。因此，這裏涉及的是革命的本能。

許多共產黨在這一考試中名落孫山。我認爲印度黨考得也很糟。我得到的印象是，印度共產黨人在自己近代史最具決定意義的時刻，沒有足够地深入實際，深入本國的歷史條件，而是指望得到外來的指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們宣稱，這是一場帝國主義性質的戰爭，希特勒德國進攻蘇聯六個月之後，他們還採取這樣的態度。後來，印共中央糾正了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路綫，但是印共中央又盲目地跟着印度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跑，放棄一切鬥爭，不去爭取無產階級在印度人民的人民解放鬥爭中的領導權。甚至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幾乎毫無保留地幫助英國資產階級，而國大黨的許多著名黨員却被關在監牢裏。這樣一來，共產黨人由於自己的過錯而脫離了印度廣大羣衆。

法國黨，至少它的一翼，自一九三九年八月直到德國進攻蘇聯，也犯了類似的錯誤。挪威黨的情況就更糟了。它的正式機關報《工人報》一九四〇年五月一日歡迎希特勒軍隊開進挪威，認爲這是從西方帝國主義那裏拯救挪威的證據。而當挪威黨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以後號召挪威羣衆起義時，沒有什麼人跟它走。

我認爲，南斯拉夫共產黨在自一九三九年八月簽訂蘇德條約至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這一段危急的時期內，作爲愛國力量，在羣衆中間是保住了自己的聲譽的。我們猛烈地抨擊了西方列强，但是對於希特勒我們也沒有吝惜火藥。里賓特洛甫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的照會裏解釋德國爲什麼要進攻蘇聯時，除了蘇聯背信棄義的其他「證據」外，還援引了斯洛文尼亞共產黨中央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的一份批評了德國的宣言以及南共中央的另一份宣言。這就不足爲奇了。

這就幫助我們保住了對羣衆的影響，使我們得以順利地展開人民解放鬥爭。但是，應當成爲革命者，應當感覺到羣衆的脈搏的確切的跳動，既不多，也不少。而印度同志們的革命藝術怎麼樣呢？這次代表大會正是要重新改變路綫。主要報告是由左翼領袖B·T·蘭那地夫作的。他在報告中尖銳地譴責了總書記J·P·喬希近三年來的機會主義路綫，指責他沒有看到印度資產階級扮演了賣國賊的角色，同美英帝國主義達成了妥協。喬希的路綫是「直接反對印度羣衆爭取完全獨立的鬥爭的，便於印度資本家和地主實行恐怖和對印度工人和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

蘭那地夫說，喬希的一大錯誤是他反對農民羣衆同封建主和地主展開鬥爭。

海得拉巴邦①的特蘭甘納地區的農民代表杰萬達馬的講話博得了熱烈的掌聲。他給代表大會帶來了海得拉巴起義農民的問候，自一九四六年以來，在地方黨組織領導下，那裏就爆發了反對海得拉巴土邦王恐怖統治的武裝起義。特蘭甘納的農民在共產黨人的領導下，擺脫了土邦王的枷鎖，組織了游擊隊，創建了印度第一個解放區，那裏有五百萬人。兩千多個村莊的警察派出所和村鎮公所被消滅了。儘管海得拉巴土邦王調動了大批軍隊，起義仍在發展。解放區現正在鏟除大莊園，把土地分給農民，着手建立人民委員會。

休息時，我同杰萬達馬這位農民共產黨員以及他的來自特蘭甘納的同志們交談了起來。他們感興趣的是，我們在解放區如何組織政權，如何把傷員隱藏得讓敵人找不到以及我們爲什麼建立無產者旅。

① 原文如此，海得拉巴實爲安得拉邦首府。——譯者

代表大會第二天，我發了言，轉達了南斯拉夫共產黨的祝賀。我對發言作了仔細的準備。佐戈維奇幫了我很大的忙。當我走上講壇時，響起了對鐵托同志的致敬聲，我有點胆怯。每當我發表講演或作報告時，常有這種情況。所有這一切都是年青時的一次心理創傷的結果。一九三六年，我在倫敦當了一年《政治報》記者後，從那裏回到了貝爾格萊德。我的文章發表在《政治報》的頭幾版，這一切使我忘乎所以。我當時自視甚高，自以爲多瑙河也拜倒在我的膝下。我的幾個同志，黑塞哥維那人米羅·波帕拉、阿夫多·胡莫和切多·克魯舍瓦茨邀請我到貝爾格萊德法學院體育廳作一次報告。我同意了，但是我没有想到要作點準備。我走上了講台，大廳裏座無虛席。這是黨組織大家來聽的。我開口講了，可是只聽到喃喃細聲。我的祖母、母親和姑母都坐在頭幾排裏劃十字，而我進退兩難，直到米羅·波帕拉跳上講台，他說：「我們請德迪耶爾三天內寫好講稿來作報告，他筆頭比口頭强。」

這是我一生中所受到的很好的一課。三天後，我帶着寫好了的講稿，面對擠得滿滿的大廳，安然地批判起英國社會來了，而稿子幾乎連看都没看。

青春是多麼美好，一切都可能發生，一切似乎都很簡單。

去中國無路可走

在印度共產黨加爾各答代表大會期間，我没有忘記探索經由緬甸進入中國的可能性，這是我在

貝爾格萊德時作的計劃。在參加代表大會的外國代表團（總共只有三個：澳大利亞、緬甸，而來自歐洲的只有南斯拉夫）中間，有緬甸共產黨總書記德欽丹東。

對於我提出的問題，他的反應是否定的。緬甸本身處在動盪之中，蔣介石在緬中邊界上派有重兵駐守。加爾各答和德里每天早晨出版一份編排得很好的報紙《政治家報》，上面登有世界各地的消息。該報經常向讀者報道中國的鬥爭。報上甚至載有漂亮的中國小地圖，我每天早晨把它剪下來，同德欽丹東一起研究毛澤東的部隊在河南省以及後來在瀋陽附近的進展。

有一天早晨，我們正在閱讀鞍山市和一些大鐵礦獲解放的消息，又有一個人加入了我們的行列。他就是中國記者章漢夫，他是《新中國每日新聞》的編者，當時在採訪代表大會。他有最新的幾期新華通訊社電訊稿，這是每天在香港出版的，這上面對於中國的鬥爭以及解放區的生活有比較全面的報道。

在認識了他以後，對於經由緬甸進入中國一事，我也徵求過他的意見，但是他搖搖頭。

外國代表中間還有一位有趣的人物：澳大利亞共產黨主席L·沙基。他在前來加爾各答途中曾會見過馬來亞共產黨人，帶來了他們對印度同志們的祝賀。沙基喜歡討論理論問題，因此有一次在休會期間，從午後五點到六點，我們幾個人開始探討馬克思的絕對貧困化和相對貧困化的理論。

沙基斷言，深刻的絕對貧困化席捲了整個東南亞，窮人越來越窮，一小撮形形色色的剝削者把越來越多的財富抓在自己手中。他接着說，不應閉眼不看這樣一個事實：世界這一地區人口的增長是巨大的，這是一場名副其實的爆炸，儘管死亡率很高。對於印度資產階級解决這個問題的可能性，他的看法格外悲觀。據他認爲，東南亞確實處於深刻的革命形勢之中，鑒於美帝國主義試圖填

補英、法、荷蘭等帝國主義的削弱所造成的真空，情況就尤其如此了。

我完全同意他的估計。但是，在另一個問題上，我們未能取得一致意見。在那些日子裏，在印度（共產黨）領導人蘭那地夫和特蘭甘納的農民共產黨員之間展開了一場公開的討論：在革命中，突擊隊的基地應設在哪裏——設在城市裏還是農村裏。蘭那地夫斷言，共產主義運動必須在城市無產階級中扎下最牢固的根，他並批評特蘭甘納的同志們，因爲他們把農民看作是主要基地。

沙基完全站在蘭那地夫一邊，而我向他提出了另外的理由。意識形態必須是工人的，工人必須成爲最堅强的核心，但是印度還沒有工業化，農民構成了人民的大多數。而革命不能沒有受壓迫的羣衆——這裏主要是指農民羣衆。沙基援引共產國際的決議，而我以列寧爲例說明，正是他第一個在一個主要是農民的國家裏領導了一場革命，正是由於他的革命本能把他引向社會矛盾最尖銳的地方。他不得不依靠工人階級核心和工人的意識形態，因爲這是革命取得成功的前提，但是他沒有脫離農民羣衆。

沙基對我們說，馬來亞局勢十分緊張，隨時都可能爆發人民起義。德欽丹東也說緬甸的局勢是爆炸性的。沙基問我們，要是我們是馬來亞和緬甸的共產黨人，我們會怎麼辦，我們是否會舉行革命起義。

回答是，每一個黨都應對本國國內形勢、社會矛盾和主觀因素作出估計。外界很難提出意見。我們一九四一年開始鬧革命時，我們沒有向任何人徵求意見。

但是，整個東南亞的貧困化如此嚴重，地主階級用武力野蠻地維持自己的制度。帝國主義的活動一點沒有削弱，甚至加强了，它們企圖使世界這一地區返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狀況，這使得

人民只能用武力，也就是通過革命來回答整個這一暴力和壓迫的制度。

自一九四八年三月以來，已過去好多年了。在好幾個方面可以聽到這樣的說法：「南斯拉夫人在加爾各答兜售冒險主義的主張」。有幾位研究現代史的歷史學家要我對這個問題作出比較確切的回答。有一次是在一九五七年，我同比萬就印度共產黨一九四八年的立場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我們當時在英國議會裏遇到了克里希納·梅農。我記得，他當時是印度國防部長。梅農很冷淡地同我打了個招呼。後來，我就同比萬展開了討論。

我首先指出，陰謀論又在抬頭。早在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時，國王及其制度的失敗了的支持者們硬說什麽「人民是聽話的，沒有理由造反，是新教徒、互濟會員和猶太人這樣一些外來的代理人把人民引向造反」。而今天的替罪羊是共產黨人。華盛頓的宣傳更是進一步發揮了這一老的陰謀論。

在印度的某些地區，例如在特蘭甘納，早在一九四六年就開始了游擊隊運動。而印度共產黨在一九四八年才作出爲加爾各答代表大會所採納的新政策方針。

整個東亞在窮困、非正義的局面中掙扎，帝國主義撲向它，人民除了赤手空拳起來保衛自己以外，別無它途。

的確，我們未曾隱瞞自己的看法。我們當時剛完成了革命，我們當時年輕，滿懷激情。我們想援助世界上一切被壓迫的人民盡早獲得解放。我們只是證實了世界這一地區的共產黨人自己得出的結論而已。

最後我還對比萬說，即便現在，也即一九五七年，我又處於一九四八年在加爾各答時的處境

下，我也不可能作出別的回答。鑒於這九年來的事態發展證實了L·沙基的一些預言，那就更加如此了。東南亞的窮人變得更窮了，富人變得更富了。像瑞典人古納爾·米達爾這樣一些嚴肅的經濟專家也開始有這樣的看法。毫無疑問，漸進的道路要來得緩和，不那麼痛苦，但是如果沒有別的道路可走，那就只有革命。革命的到來，是不取決於你願意還是不願意。

比萬對我的觀點是諒解的。但是當我同歐洲其他許多社會民主黨人討論世界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之間的鴻溝，討論進化和革命時，情況就不是這樣了。

惡夢是事實

隨着我在印度的逗留臨近結束，我日益思念國內，特別是我臨行前鐵托同志對我說的同俄國人的衝突日益浮現於我的心頭。這一切是不是一次嚴重的誤會？難道這不會很快就得到調停嗎？我自己對自己說，決不會那樣的。這場衝突對於世界進步事業意味着什麼呢，這只會使印度、使世界上像印度一樣的國家的千百萬追求正義和平等的人民的鬥爭變得更爲困難。

就這樣，我自己安慰自己說，這一切都會得到調停的，我在印度的最後幾天裏覺得，所有的誤會都會得到解決，甚至認爲已經解決了。

對於這一點，我已開始堅定地相信了，因爲我願意這麼相信，精神上我幾乎已恢復了平靜，甚至認爲，鐵托對我說這一切，是一個自尊心受到傷害的正派人的自然的反應。尤其是在加爾各答的

最後一天，我更是產生了這樣的信念，那一天我被邀請在市中心舉行的一個大型羣衆集會上發表講話，到會的有加爾各答五萬多名工人。

這是印度共產黨代表大會最後一次公開會議。宣讀了代表大會的全部決議，外國代表講了話。當我提到鐵托的名字時，致敬的呼聲響徹雲霄。大會後，我又是何其興奮地瀏覽了送給鐵托的禮物——用印度的各種文字印刷的他的講話。

就這樣，我焦急地返程，返回歐洲，乘飛機經孟買、巴士拉、開羅和羅馬，又從羅馬乘火車返回貝爾格萊德。我在家裏會聽到什麼樣的消息呢？誤會是否消除了？這一切是否只不過是一場惡夢而已？在我看來，火車簡直在爬行，在各個車站上停靠的時間太長。

我終於在三月二十二日清晨抵達貝爾格萊德。我趕緊回家，跟家裏人打了個照面，洗了把臉，馬上趕赴中央委員會大樓，進了密洛凡·吉拉斯的辦公室。他坐在桌子後面在寫什麼東西。我進去時，他繼續在寫，甚至没有發現我進房間了。整整過去了一分鐘時間。突然，他注意到了我，他從椅子上跳了起來，走到我身邊。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同俄國人的事怎麼樣了？」

「不妙，俄國人不讓步。事情正變得越來越糟。俄國人在撤退專家，他們說，在我們這裏他們處於不友好的氣氛中。」

我沉默不語。這意味着，我的全部希望都落空了。

我回到家裏。童年時代的兩個朋友，運動員德拉戈什·斯特萬諾維奇和畫家拉萊·伊萬諾維奇在家裏等我。從中學時代起，每年秋天和春天，我們都一起進行越野賽跑。他們兩人穿着運動衫、運動褲，準備從我家裏出發，經班諾維山和科舒特尼亞克，跑十來公里，跑到塞尼亞卡。這一次我

高興地接受了他們的邀請。儘管我沒有訓練，一路上我一直領先，我簡直是在折磨自己，好像我就可以逃離吉拉斯告訴我的可怕的消息似的。

但是，沒有挽救的辦法。過了幾天，我就相信這一點了。《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的編輯部設在貝爾格萊德，一九四七年秋，在波蘭成立了情報局組織，出席的有蘇聯、南斯拉夫、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法國和意大利等國共產黨的代表。曾作出决定，這個新組織的所在地設在貝爾格萊德，它的報紙的編輯部也設在貝爾格萊德。

《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的主編是蘇聯官員帕維爾·尤金。我們的鮑里斯·齊海爾是他的副手。鑒於佐戈維奇和我曾就印度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情况寫過一份報告，有人對我說，最好再給尤金的報紙寫一篇文章。我很快就把文章寫成了，佐戈維奇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我採納了他的意見。

我把文章交出去了，但是沒有登出來。鮑里斯·齊海爾對我說，尤金對文章有些意見。文章根本沒有在這張報紙上登出來。我收到了退回來的手稿。

我曾考慮過，尤金爲什麼不願發表這篇文章。誠然，蘇聯黨没有派代表參加加爾各答代表大會，蘇聯報紙除了幾條乾巴巴的消息外也沒有對代表大會作報道。

我把整篇文章又讀了一遍，這時我才明白尤金爲什麼不登它：莫斯科有人不樂意看到我們的革命經驗在印度受到如此高的評價。現在讓我們看一看文章中的幾段話，這幾段話儘管是在整整二十年前寫的，現在在第一次公諸於世：

「……中央政治局委員蘭那地夫代表印共中央對這一自我批評性的報告作了說明。蘭那地夫是

在某些時期內，特别是近幾年來反對J·P·喬希的機會主義路綫的一派的領袖。他指出，整個中央委員會經過長期的鬥爭，現在一致指出，自己的路綫是錯誤的。蘭那地夫接着說，南共中央的理論資料、鐵托同志在人民陣綫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以及卡德爾同志一九四七年一月的文章《略評國際事態發展的某些問題》，幫助了印共中央認清自己的機會主義路綫。蘭那地夫代表印共對南共中央提供的這種幫助表示感謝，他又說，南共中央的主要理論資料已譯成印度多種文字，是黨員在代表大會前必讀的材料……

……代表大會經過兩天討論後通過了關於印共新路綫的總決議。決議要求建立民主陣綫，來同美英帝國主義以及出賣民族利益、同帝國主義妥協的印度大資產階級作鬥爭。決議還談到民主陣綫的綱領。綱領包含以下各點內容：

第一，完全脱離不列顛帝國，使印度恢復完全真正的獨立。

第二，建立代表人民意志，而不是代表資本家意志的民主政府，這個政府將不同英美帝國主義勾結，而同民主國家結成聯盟，以加强和平和國際合作。

第三，通過以所有成年人都享有投票權和比例代表制爲基礎的憲法，它將保證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民主，保障勞動人民擁有充分的經濟力量。

第四，給各民族以自決權，包括分立權在內。在自願基礎上建立印度聯邦，建立語言自治省……

……綱領中有一條要求廢除大莊園，消滅英國在印度的資本，對主要工業部門實行國有化以及把反動分子從軍隊和國家機關裏清除出去……

……代表大會結束時召開了一次公衆集會，加爾各答五萬多名工人到會。在這次公衆集會上，澳大利亞共產黨和南斯拉夫共產黨的代表講了話，接着印共中央委員鮑瓦尼森和丹吉向到會羣衆談到了印度共產黨的新路綫……」

第二章　分裂的由來

一九四八年一月初，我們的一個軍事代表團前往莫斯科（斯韋托扎爾・伏克曼諾維奇—泰波談黨在軍隊中的工作的某些問題，科查・波波維奇談裝備問題，米亞爾科・托多羅維奇談軍火工業問題，伊沃・魯卡維納談海軍問題）。同時，俄國人給鐵托同志打了一份電報，要求南共中央的一位政治局委員，可能的話，要求密洛凡・吉拉斯前往莫斯科，討論某些對外政策問題，首先是阿爾巴尼亞問題。這樣一來，吉拉斯就同軍事代表團一起前往莫斯科了。

他們在那裏呆了一個多月，但是他們的工作毫無結果。斯大林在第一次會見時向吉拉斯建議說，南斯拉夫「應當吞掉阿爾巴尼亞」，並要求他按照這一意思打份電報給鐵托同志。斯大林還答應說，軍事代表團的所有要求都會得到滿足，但是一切仍然處於僵局。

一月底，保加利亞總理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前往羅馬尼亞訪問，訪問時，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回答了記者提出的一個問題：是否要建立巴爾幹聯邦或巴爾幹邦聯。季米特洛夫說，這個問題爲時尚早，但是「一俟建立這樣的聯邦或邦聯，我們的人民不會去問問帝國主義，也不會考慮他們的反對，他們將從自身的利益以及其他國家人民和他們所必需的國際合作的利益出發自己來解決問

題。」

然而，一月二十九日，莫斯科的《真理報》却公開攻擊季米特洛夫，强調「這些國家不需要成問題的和虛構的聯邦或邦聯，也不需要關稅聯盟，而是需要像九國共產黨衆所周知的宣言正確地指出的那樣，通過動員和組織內部的人民民主力量來加强和捍衛自己的獨立和主權。」

二月初，斯大林邀請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的最高級代表緊急前往莫斯科開會。實際上這是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斯大林對南斯拉夫的獨立和主權進行公開攻擊的第一階段。但是，問題不只是涉及我國的命運。如果南斯拉夫被套上枷鎖，蘇聯對所有東歐國家的控制就會加强，而在國際工人運動中就會出現共產國際一九四三年解散前那樣的對莫斯科完全俯首聽命的狀態。

應斯大林之召，保加利亞聲望最高的領導人季米特洛夫、科拉羅夫和科斯托夫趕緊前往莫斯科。斯大林本來希望約瑟夫・布羅玆—鐵托也去參加二月會晤。他也曾經表達了這樣的願望，但是鐵托同志出於扎戈爾耶地方富有反叛精神的被壓迫的佃農的本能，似乎感覺到克里姆林宮裏準備的不是同志式的交換意見，而是不容有保留意見的發號施令，因此他沒有接受邀請。他身體本來也不怎麽好，有患胆囊結石的一些初期徵象。俄國人没有掩飾自己的不滿。我在自己的日記中記下了亞歷山大・蘭科維奇的如下的話：「俄國人本來指望代表團中有鐵托，他没有去，使他們氣得發瘋。」

鐵托的預感是有道理的。我們派到莫斯科去的代表愛德華・卡德爾、弗拉迪米爾・巴卡里奇和密洛凡・吉拉斯聽到的是斯大林怒氣冲冲的獨白。儘管從表面上來看，他的毒言惡語大部份是對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講的，但是通過季米特洛夫，他也指向我們。斯大林在談話中間突然要求立即在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之間建立聯邦。實際上，這只是他的叫人一眼就看穿了的把戲。斯大林還批

評南斯拉夫政府，因爲南斯拉夫政府應阿爾巴尼亞政府的邀請向阿爾巴尼亞派了一些部隊去保衛阿爾巴尼亞南部邊界。我們的代表團一致得出結論，認爲斯大林提出的新要求是居心險惡的。季米特洛夫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會後，他對我們的代表團推心置腹地説：「這裏的問題不在於批評我的談話，而是另一碼事……我們和你們要建設好，要容易得多，因爲我們的生產力水平比蘇聯高得多，我們百姓的文化水準比蘇聯的高。」

應蘇聯政府的要求，在同斯大林會晤兩天後，於二月十二日簽訂了蘇聯政府和南斯拉夫政府相互磋商對外政策問題條約。蘇聯政府於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廢除了這項條約。

我們的代表團回到了貝爾格萊德，密洛凡·吉拉斯親手起草了二月十日同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有歷史意義的會晤的報告，他在報告中還加上了自己的看法。

南共中央三月一日開會，會議批准了南斯拉夫代表團在莫斯科會晤中所持的立場。

斯大林的第一輪就這樣失敗了。他所施加的壓力的逐步升級以及所採取的各種形式都有詳細的規定。他是否事先就制定了使南斯拉夫屈服的戰略計劃，不得而知。蘇聯一九四八年的檔案尚未公諸於世供科學地探討。沒有這些檔案，是不可能從歷史的角度作出比較完整的評價的。但是顯而易見的是，根據現在所知道的情況和目擊者記載的或者記得的一系列事實，根據斯大林死後在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所了解到的情況，斯大林並没有對南斯拉夫制定過這樣一個戰略計劃。他首先是一個講究實際的政治家，他確信設下的陷阱是會成功的，要是這一嘗試未能得逞，他會想出第二種更狡猾更危險的辦法。

斯大林和南斯拉夫之間進行的這樣一種類型的鬥爭，進行了整整四個年頭，從一九四八年一月起，一直到一九五三年三月他死去。斯大林發動了一系列攻勢，這些攻勢記載如下：

（一）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在莫斯科會晤時直接施加壓力，以便迫使南斯拉夫投降。通過這種辦法實行的「悄悄地扼殺」的做法，剛邁出第一步就失敗了。

（二）試圖在南共中央内部挑起衝突，特別是指靠安德烈·赫布蘭和斯雷滕·茹約維奇，指靠南斯拉夫内部的所謂的「健康力量」。這些措施還伴之以「黑色宣傳」①的影響，通過西歐的資産階級報紙和通訊社散佈消息，説什麼鐵托失寵了。斯大林自信這第二種辦法會成功，因爲他同時還以經濟封鎖來威脅南斯拉夫。一九四八年春天他在克里姆林宫裏曾説過：「只要我彈一下小指頭，鐵托就完蛋了」。這一攻勢也不了了之。

（三）第三次進攻是作了比較廣泛的設想的。斯大林決定從意識形態上把南斯拉夫革出教門，同時由世界共産主義運動對南斯拉夫施加壓力，説什麼反革命已在南斯拉夫取勝，需要以社會主義的名義拯救南斯拉夫。爲此目的，斯大林在三月、四月和五月給了南共中央幾封信，這幾封信應當是絶密的，但是他却發給了所有的共産黨。這些黨又從自己方面對南斯拉夫施加壓力。

（四）通過情報局（把南斯拉夫）公開革出教門。斯大林一再試圖讓南共中央代表出席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會議，這次會議把南共公開革出教門。

---

① 按西方的心理戰有所謂「白色宣傳」、「灰色宣傳」和「黑色宣傳」之分。「黑色宣傳」是指以匿名散佈流言蜚語，使對方被動，處於困境。——譯者

（五）加緊經濟封鎖，同時莫斯科設法組織南斯拉夫將領阿爾索・約萬諾維奇①外逃，企圖組織某種政治中心，以實現斯大林的目標。

當這一切都無所結果時，斯大林就着手實行完全的經濟封鎖，以發動侵略相威脅，在東歐國家舉行公審以便把東歐各國完全置於蘇維埃國家控制之下，挑起邊界事端，迫害南斯拉夫少數民族，指控南斯拉夫是侵略成性的法西斯國家，一直到對南斯拉夫發動公開的武裝侵略。斯大林作爲聰明的政治家，還是懂得在這最後一着前停步，因爲他不能預料，這一切會把他引向何方，這會只是一場局部戰爭呢，還是會擴大爲世界性衝突。

斯大林的兩副面孔

最困難的任務莫過於劇本的作者同時又是劇本的演員。當我提筆寫到我國的歷史上命運攸關的一九四八年春天時，寫到不僅是對我國命運攸關的這一時刻時，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即便在二十年以後的今天，我也不能對此冷靜地作出判斷。任何證據由於作者的誤解和偏見都是受限制的。新南斯拉夫和蘇聯之間的這場衝突有令人激動之處，有某種奇異之火，誠如中世紀基

① 約萬諾維奇當時爲南人民軍總參謀長，一九四八年共產黨情報局宣佈開除南共後，逃往國外，在南羅邊境被擊斃。——譯者

督教教派之爭。這種火始終還制馭着我。

再之，衝突的參與者和目擊者不可能馬上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許多人連後來也没有弄清楚。牽涉到的是國家最重大的機密。能够看到的檔案只是爭執中的一方的檔案，另一方的檔案又看不到。

歷史進程本身不是黑白分明地進行的，不是一下子就認識到衝突是勢在難免的，即令身居國家要職的人也是如此。我在日記中曾記下了鐵托同志一九四八年春説的下面這番話：

「只是到了那時，我才全明白了。所有那些過去我認爲是偶然的，並找出成百條理由來加以解釋的事情，現在滙成了一個整體，現在有了意思了……」

同樣如此，對於衝突的原因的認識不是一下子就産生的，而是逐步形成的。這一切都是五光十色的鑲嵌版上的細小部份，只有隨着時間的消逝才能得出明確的圖像，因爲凑足了材料，才能看出來，實際上是怎麽一回事。

我不恥於承認，我是一直到一九四八年春天還覺得在新南斯拉夫和蘇聯之間發生任何衝突都是不可能的。這是我所受的教育的結果，但是也是一種誤解。爲此，有一次我還同最親近的人發生了爭吵。我的岳父拉多·克里日曼是那種所謂的「帶刺的克拉尼人」，他總是有自己的看法，並且公開地説出這種看法。他的一家似乎都是這樣的人。他的父親叫伊萬·克里日曼，是克拉尼的《青年斯洛文尼亞人報》的主編。老爺子有自己的信念，因此曾被流放，全家都遭了殃。

一九四七年左右，拉多·克里日曼對我説：

「嗨，我不知道這些俄國人是否會始終幫助我們……我覺得，保加利亞人也是可疑的……」

我大發雷霆，給老頭子狠狠地上了一課，給他扣上了各種各樣的帽子。我向他解釋，保加利亞不再是在鮑里斯國王統治下的保加利亞了。但是他依然搖頭，儘管他還算是進步的。戰時，拉多·克里日曼同克里米亞支隊有聯系，他通過伊格的某位女同志給縱隊送去了各種物資。他的女兒由於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在盧布爾雅那城内書寫「蘇聯萬歲」的口號而被判處服苦役六年。這就是說，拉多·克里日曼戰時是站在游擊隊和俄國人一邊的，而我現在却在教訓他。只是在後來，他對我愛人韋拉說：

「嗨，我不知道，你的這位丈夫竟是一個笨蛋。同他根本没法談話。」

一九四八年同蘇聯的衝突爆發了，克里日曼老人對我什麼都没有說。他是一位品格高尚的人，不願在勝利時自命不凡。

我一再考慮，爲什麼我一直到一九四八年還是這樣一個人？使我頭腦發熱，心醉神迷的根源何在？我的同志們和我在本世紀三十年代時睜眼看社會現實，我們只有兩個選擇：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及其所製造的種種罪惡，是亞歷山大①的南斯拉夫及其非人的關係，對人民的壓迫，不幸的馬其頓人甚至連本民族的語言都不能使用，斯捷潘·拉迪奇②被打死在議會裏，我的一些最優秀的同志遭到逮捕，在格拉夫尼亞查③遭受毒打；而在另一方面則是列寧歷經種種困難舉行了革命的國家，没

---

① 指亞歷山大·卡拉喬爾杰沃（一八八八—一九三四）。自一九二一—一九三四年爲南國王。一九三四年十月在法國馬賽被刺死。——譯者

② 斯捷潘·拉迪奇（一八八〇—一九二八），舊南斯拉夫時克羅地亞著名政治家、政論家，組織克羅地亞農民黨，一九二八年在議會被人刺死。——譯者

③ 舊南斯拉夫時貝爾格萊德政治犯監獄，有「貝爾格萊德的巴士第獄」之稱，南解放後已拆毁。——譯者

有遭受巴黎公社可悲命運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以某種星界的眼光來看待蘇聯的，把它看成是唯一的希望和指路明燈。我國和世界上最愚昧最落後的社會力量對蘇聯的每次攻擊，都只是使我們確信，我們是正確的。

別的抉擇是沒有的，要活着，要鬥爭，就得有理想，但是不是那種烏托邦式的理想，而是真實的，存在着的，正在發展中的理想。

大戰前我沒有到過蘇聯，但是一九三七年傳來有關斯大林搞的訴訟案的消息時，我感到困惑不解。當時我還不是黨員，儘管鐵托同志和南共其他最高領導人躲藏在我在貝爾格萊德的家裏。我當時認爲，我還不準備當共産黨人，因爲當共産黨人是要有格外的勇氣、力量和頑强不屈的精神的，而我認爲我還不具備這些條件。

所有那些關於訴訟案的消息，關於到昨天爲止還是蘇聯的頭面人物的那些人却是外國間諜的消息，所有這一切對於我們在國內同斯托亞丁諾維奇，同神父科羅舍茨的艱難的鬥爭，對於我們爲援助西班牙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反法西斯鬥爭所作的努力，不啻是一個打擊。

我本能地從自己頭腦裏驅走任何這樣的想法：這是蘇聯社會存在的某種持久的畸形化。我相信這是會得到糾正的。正是在一九三八年左右，英國勞工運動的理論家，費邊社分子西德尼・韋布和比阿特麗斯・韋布再版了自己關於蘇聯的有名著作。第一版時有一個副題《一種新的文明？》，而在莫斯科舉行訴訟案後出的第二版，他們抹去了這個問號。而我自己責備自己說：「瞧你是個疑心多重的知識分子。連這些社會民主黨人，尤其是那些最教條的英國社會民主黨人，都在教訓別人，說不應當懷疑蘇聯的發展前景。」

我的這種知識分子的出身老是以某種方式折磨我。我對自己說：「你參加運動，參加革命，不是因爲你忍飢挨餓。社會處境並沒有迫使你參加，你參加是因爲你有某種理想，你想在這裏實現這種理想，但是你難道能像真正的無產者，像工人或者貧農那樣持久嗎？」

有一次我同洛拉·里巴爾①就此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洛拉把莫斯科寄來的共產國際的郵件交給我，要我帶回我在澤蒙的家裏，鐵托同志在那裏等我。洛拉闡述的想法是，在我們知識分子身上，問題不只是實現理想，我們自己的社會地位，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在南斯拉夫是受到威脅的。我們得不到就業，年輕的馬其頓人如果不違背本民族的利益，同當局妥協，就不可能被録用。在我們還沒有真正長大成人，戰爭和死亡就威脅着我們大家。最後，純理性的理由也把我們引向共產主義。這是一條社會規律：擺脱我們現在所處的混亂局面的唯一合理地解決社會發展的辦法是，建立不會有任何形式的剥削和戰爭的新社會……而知識分子的力量正是在於他能夠最深刻地洞察這樣一種前景的歷史必然性。

然而，在我身上感情的因素要比在洛拉·里巴爾身上來得强烈。在我一九三九年終於入黨之前，我曾就這個問題同黨內的好幾個人進行過長時間的討論。使我感到傷心的是同韋薩·馬斯萊沙②的一次討論，他説，在新聞行業中只有體力工人，也就是説只有排字工人、鑄字工人以及摺報

① 伊沃·洛拉·里巴爾（一九一六—一九四三），南人民英雄。一九三六年入黨，一九三七年任南共青團中央書記，一九四〇年十月當選爲南共中央委員，曾爲南人民解放鬥爭最高統帥部成員，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犧牲。——譯者

② 韋塞林·馬斯萊沙（一九〇六—一九四三），南著名政論家，一九四一年參加人民解放鬥爭，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四日在蘇捷斯卡犧牲。韋薩爲韋塞林的昵稱。——譯者

紙的裝訂工才創造剩餘價值，而我們，寫文章的記者，什麽都不創造，我們是一般的寄生蟲。

因此，知識分子的這種嚴重缺陷，使我覺得在黨內被認爲幾乎是匹害羣之馬，我的地位遠比我的無産階級出身的同志們低下。這經常出現在我的身上，反映在我的每一個行動上，我的日常工作上，甚至在戰時也是如此。

我簡直在清晨一睜開眼，就會想：「你今天必須證明自己是忠於黨的，自己是忠於同志們的」，而在傍晚時我又捫心自問，宛如做某種晚間禱告：「該做的一切我是否都做了，我没有出賣什麽原則吧？」我記得有一次我内心經歷了極大的痛苦，那是在黑山的皮瓦山上，在奈達伊諾村，時間是一九四二年五月，當時要我寫一份自傳。我誠心誠意地不加美化地寫了，正如我現在寫這幾行時一樣，我並不想隱瞞什麽。但是當我交了手稿，有人却對我説：「喂，你是否完全老實，是否全都寫上了，你難道不想再重寫一遍嗎？」我又重寫了一遍，並爲生平第一次有人不相信我而哭了一場。

但是戰爭的大事變使所有這一切都退居第二位。凡是經歷了這四年可怕的戰爭的，都必然承認，紅軍是我們最終制服希特勒的主要希望。蘇聯承担了戰爭的最沉重的担子，希特勒的主力師團是在東綫被消滅的。

戰後，我留心地收集了有關各國的損失的材料：

蘇聯——犧牲了七百萬軍人，一千三百萬至一千八百萬公民被打死；

波蘭——六百萬公民和軍人；

中國——兩百萬；

南斯拉夫——幾乎兩百萬；

美國——二十九萬五千九百零四人，

英國——二十六萬五千七百七十人。

死人的數目不是衡量各個盟國在上次大戰中在戰爭方面所作的努力的唯一標準，但是是最令人痛心的一個標準。工廠也好，房屋也好，還有其他的物質財富，都又重新建設起來，生產出來了，但是誰都不再能讓死人復活。

大規模的强迫死亡這個因素，在歷史的天平上强有力地把人們聯系在一起，這是不會一夜之間就忘掉的。

尤其是我們蒙受的損失，按國家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而論，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損失最慘重的國家之列。再之，我們在一九四一年，當希特勒進攻蘇聯時，展開了最廣泛的抵抗。希特勒的師團已打到莫斯科城下，而南斯拉夫相當大的地區却得到了解放，生活在游擊隊的旗幟下。

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一種勇於犧牲和大公無私的道德觀念，這種道德觀念只有在作出偉大的羣衆性的努力的日子裏和在生命攸關的轉折點才能從人民中產生。一九四三年三月九日，游擊隊的主力部隊，包括四千名傷員，在奈雷特瓦河谷被包圍了。那天，我在日記中記載道：

「飛機最兇惡。轟炸從拂曉起就開始了，一直到天黑都沒有停過。轟炸機緊貼地面飛行，用機槍向每一塊岩石掃射，又有一批重磅炸彈落在普羅佐爾。哪一天的轟炸也不像今天這樣厲害。

杜格村裏住有四百多名傷員，也挨炸了。村莊遭到很大的破壞，但是只有一位同志受傷。德國人特別注意普羅佐爾到亞布蘭尼察這條公路。他們整天都在轟擊格拉查尼察的拉馬河上的黑大橋，但是並沒有使它不能通行。他們轟擊迴旋曲折的公路，大塊大塊的山岩掉落到公路上，但是儘管如

此，我們的司機還是在載運傷員……我們的通訊員米喬說得好：

『在我們頭上多掉一顆炸彈，在俄國就少掉一顆。勝利將很快到來。要是我們向希特勒投降了，不論是把我們派到束綫，不論是把我們五十萬人弄到德國工廠裏去，他們都會殘酷無情地掠奪我們……我們就會成爲永無出頭之日的奴隸……而我們的鐵托也就無法創造這樣的奇蹟了……』」

米喬是桑扎克的農民，而這樣的米喬，對生命和鬥爭抱這樣的史詩般的看法，在南斯拉夫全國，從特里格拉夫一直到杰夫杰利亞①，有成千上萬個。

一九四三年秋，在蘇捷斯卡戰役之後，我從黑山一直步行到斯洛文尼亞解放區。有一天晚上在羅格，愛德華·科茨貝克在篝火旁向約扎·魯斯、約西普·耶拉斯、杜尚·舍爾奈茨和我敘述了多倫斯科地方的一位農民的故事。因爲這個農民幫助受傷的游擊隊員，德國人把他抓了起來。當把他帶到由德國士兵組成的一個步兵排前面時，這位斯洛文尼亞佃農高喊道：

「德國人，你們聽着，我也是爲了你們的利益而死的……」

恰好是在前幾天，我會見了一位斯洛文尼亞劇作家，一位富有才華的青年，又使我想起了米喬和那位多倫斯科的佃農。對於這位劇作家來說，斯大林只是對知識分子實行的恐怖和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可怖的訴訟案的化身，僅此而已。

對我來說，斯大林是這樣，但是還意味着別的。斯大林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的戰爭中領導

---

① 特里格拉夫爲南最高峯，高二千八百六十三公尺，在斯洛文尼亞境內；杰夫杰利亞在南最南部，馬其頓希臘邊界上。——譯者

蘇聯，不僅對於蘇聯人，而且對於遠離蘇聯國界的其他國家的戰士，他都是抵抗希特勒的象徵。我記得，就在我們這裏，又有多少游擊隊員最後高呼着斯大林的名字而死去。那位年輕的劇作家對於我內心的活動，對於我在戰爭中經歷的一切，根本沒有想到。他尖銳地作出了自己的判決：「不應該向人民撒謊」，「必須把全部真相說出來」。

我用我腦海裏閃現的牛頭不對馬嘴的，毫無關聯的幾句話，回答了他的話。我趕緊回家，拿出我戰時的日記，再一次——或許是第一千次了——讀了讀我一九四三年六月九日寫的東西。那天在蘇捷斯卡同一顆炸彈炸死了我的第一位愛人奧爾加·波波維奇—德迪耶爾博士，炸傷了約瑟夫·布羅茲·鐵托和其他許多同志：

「我剛合眼，炸彈就炸開了。在我們的路對面，五十米遠處偵察機在向活的目標，第四旅的一個營扔炸彈。彈片炸斷了我們頭上的樹枝，但是黑山人的隊伍沒有中斷，只是加快了步伐。沒有一個人受傷。後來飛來了九架『斯圖卡』①，襲擊米林克拉德和赫爾查夫卡河谷。十點鐘出現了轟炸機。在森林裏遭到轟炸是令人不愉快的。炸彈落在樹幹上爆炸，四面八方飛來榴霰彈。我們躺在一個潮濕的峽谷裏，小溪把我們的脚都弄濕了——我們只是看着錶，看這可怕的一天什麼時候才能結束。落下的炸彈把我們的藥房炸燬了。十二點以後，通訊員跑來，送來了馬爾科同志給揚科大叔②的一封信：『老大③受傷了，英國人犧牲了。德國人在進攻。派警衛營來。』」

---

① 爲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軍的一種小型俯衝戰鬥轟炸機。——譯者

② 「馬爾科」指亞歷山大·蘭科維奇；「揚科大叔」指莫沙·皮雅杰。——譯者

③ 原文爲Stari，「老年人」、「年長者」之意，爲南游擊隊及黨內對鐵托的尊稱，相當於中文中的「某老」之意。——譯者

警衛營前往米林克拉德，又遇到了一批轟炸機。突然我聽到有誰在遠處叫我：

「弗拉多同志，德迪耶爾……」

奧爾加的外科手術隊裏的護士魯什卡披頭散髮，滿臉通紅，下氣不接上氣地跑着：

「弗拉多同志，奧爾加叫你把她抬走。她受了重傷。」

揚科大叔對我說，我可以走。魯什卡這才清醒過來：

「炸彈落在外科手術隊中間。奧爾加的肩膀被炸斷了。我們的女大夫真是好樣的。她對我們說：『你們走吧，把我留下，不要因爲我而讓德國人把你們捉住……』她感到難過的是全部醫療器材都完了……」

我們迅速地沿着米林克拉德往上爬。傷員成羣結隊地下來了。魯什卡對我說，今天早晨第四旅的一百多名同志在山頂上被打死打傷，飛機在一個空曠處發現了他們。

轟炸機又飛來了。傷員三五成羣地沿着米林克拉德往下走。「斯圖卡」一直降到樹頂上投炸彈。在它們之後又飛來了小型偵察機，向活的目標投炸彈。突然，發動機的轟鳴聲使我們雙耳欲聾，魯什卡和我倒在地上。我們周圍落下七、八顆炸彈。火藥的臭味使我們喘不過氣來。天一片漆黑。烟霧消散了一些，我看到，在我們旁邊躺着波斯尼亞第六旅的一位同志，是一個長着大大的黑眼睛的年輕人。他的兩條腿都被炸斷了。血流如注，把爆炸震落下來的山毛櫸的嫩葉冲着走。我們愛莫能助。他快死了。他向我揮了揮手，悄聲說：

「斯大林萬歲！」

這個年輕人名字叫做科佐馬拉，薩拉熱窩人，是個工人，一九四一年參加游擊隊。同一天，他

就去世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數以百萬計的人呼喊着斯大林的名字死去。不論這是否是一種誤會，事實是，對於數以百萬計的這些人來說，斯大林是抵抗希特勒的象徵。

現在我得承認，對我來說也是這樣，儘管我還必須向我的朋友，那位青年劇作家承認一些事實。這些事實將使他更加堅定自己的立場，或許還會使他認爲，我是一個非斯大林化很差的斯大林主義者。

奧爾加整整折磨了十一天。右肩有個大傷口，她同游擊隊員們一起，從蘇捷斯卡一直趕到羅曼尼亞山，有時步行，有時騎馬，沒有飯吃，風吹雨淋。六月二十日她去世了，而前一天，我頭部受了傷。我們把她埋葬的那個晚上，我發着高燒。安葬她的情况，我在日記中是這麽寫的：

「我站在羅曼尼亞山的邊緣上，站在從斯托伊諾—梅達科維奇到莫克羅的公路邊的岩石上。夜幕已經降臨，風呼呼地吹着，吹得高大的杜松彎下了腰。我們用手、刀給奧爾加挖個墓，因爲我們沒有鐵鍬。我們縱隊的一個護衛排跟着我。別的人都往前走了。到村裏要兩小時，那裏很可能已經有德國人。

奧爾加躺着，裹着白毯子。她的黑色的頭髮幾乎把整個臉龐都蓋上了。風把杜松吹得越來越彎，出生在舍科維奇的礦工拉扎——一九四一年參軍的塞爾維亞戰士用雙手挖着土：

『弗拉多，下面是石頭了……』

最後幾抔土是由奧爾加做過手術的一位同志刨出來的：

『她救了我的命。我們都熱愛她……』

我們把她放進淺淺的墓穴中，上面放了一些樹枝草皮和石頭，堆成一個墳，這裏離羅曼尼亞山

上的小道八米遠，就在東南方向的一塊峭壁的邊上。薩沙·博若維奇、斯坦諾伊卡·久里奇以及另外三位同志和我摘下了帽子。

『光榮歸於奧爾加同志！』——拉扎呼喊着，我們大家都跟着。

我們走進了漆黑的森林，追趕上了無產者第二旅的一個營。在黑暗中，我們一聲不響，穿過濃密的、潮濕的森林。奧爾加是爲人民而死的。她是作爲我們黨的一員而死的。我手裏攥着她的錶，我準備把它給米利察。眼淚湧了上來，一滴、兩滴——如潮水般湧來。」

這一可怕的夜晚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我頭上受了傷。一九四四年春天我的癲癇病第一次發作。在這以前我夢見了這個夜晚，夢見了奧爾加的安葬，頭上傷口滴下的血把我的雙手都弄濕了，而血又混雜着我從奧爾加的墓中挖出的土。

一九四七年三月在莫斯科，在討論對奧條約和科魯什卡①問題的四國外長會議期間，我的病又發作了。我當時陪同愛德華·卡德爾。我進了克里姆林宮的醫院，在那裏給我會診。此外，一位精神病學家問到我的精神狀態，我就告訴他，這一可怖的夢如何折磨着我，我睡不着覺，因爲每當出現這一墳墓，我就從夢中驚醒。

後來，到了一九四八年，同情報局發生了衝突。鑒於我所担任的職務，我得在新聞局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在文章中，在自己的書中，在聯合國的發言中，對於蘇聯對我們的政策公開表態，莫斯科就開始攻擊我。我冷靜沉着處之。我搞了一本集子，我把它叫做《對弗拉迪米爾·德迪耶爾的

---

① 南人指奧地利東南與南國斯洛文尼亞接壤的一個地區，爲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亞族在奧聚居區。——譯者

誹謗污衊大全》，我把每一句駡人的話確切地記下日子登記下來。

但是，他們突然開始攻擊起已故的奧爾加來了。這使我完全呆然自失。是否我在克里姆林宮醫院裏的病歷被找出來了，是否蘇聯搞宣傳的人中有人發現了我個人的這一創傷，因此現在想在我最敏感的地方從精神上置我於死地？

蘇聯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奧列斯特·馬利采夫的《南斯拉夫的悲劇》一書，對死去的奧爾加的誹謗達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這本書的扉頁背面記載着蘇聯部長會議決定，奧列斯特·米哈伊洛維奇·馬列采夫因寫小說《南斯拉夫的悲劇》一書而獲一九五一年二等斯大林獎。

在這本書裏，我們全都成了蓋世太保的、美國的和英國的間諜，而已故的奧爾加則被說成是在德迪涅豪華的別墅裏在蓋世太保的官員的圈子裏度過戰爭的，她担負過反對人民解放戰爭戰士的各種間諜任務！

這不只是我個人的一次創傷而已。這只是一個直接的原因，使我在一九四八年春天公開衝突的第一天起就考慮斯大林在反對南斯拉夫的鬥爭中所採用的策略。

在斯大林一九四八年四月和五月致南共中央的信件中，他特別着力於貶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南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貢獻，否定存在任何革命。這種攻擊後來變成了誹謗，說我們這裏的起義的領導權掌握在蓋世太保的手裏。

對於絕大多數南斯拉夫人來說，這是促使他們在一九四八年春天和夏天反對斯大林，反對他的鬥爭方法，而維護歷史事件的真相的關鍵性原因。

斯大林在這件事情上也是奉行只要目的正當，任何手段皆無傷這樣一條準則的。這樣，他就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他是不承認在各國共產黨內的革命運動之間的關係中，在各國人民和各國之間的關係中，有必要存在任何道德觀念。

因爲沒有不講道德原則的革命。斯大林自己的行動暴露了蘇聯的社會存在本身的危機。歷史向我們表明，任何進步的運動，忽視道德的話，就播下了蛻變的禍種。這還是車爾尼雪夫斯基說的，斯韋托扎爾·馬爾科維奇①又從他那裏創造了一句名言：「對於小國人民來說，思想的價值就看人民貫徹執行的程度」。倉卡爾②也有過類似的想法。

但是，如果正是要按照這一革命的道德來生活的話，不能只是根據他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間對老布爾什維克的訴訟案或者在一九四八年攻擊南斯拉夫時他的作爲來評價他。必須考慮他在歷史上的整個形象，他各個時期的活動。

我一直試圖不採用斯大林主義的準則來評價斯大林。當我看到，死去的奧爾加這位善良正直的知識分子被指控爲蓋世太保的間諜時，個人的這一極大的苦楚也沒有使我抓住一點不及其餘，因爲斯大林而詛咒共產主義思想。

---

① 斯韋托扎爾·馬爾科維奇（一八四六——一八七五）南十九世紀下半葉著名政治家、文學家。爲塞爾維亞社會主義運動奠基人，塞爾維亞文學第一位現實主義理論家。生前與卡爾·馬克思有過交往。——譯者

② 伊萬·倉卡爾（一八七六——一九一八），斯洛文尼亞最傑出的文學家。——譯者

我努力從時間和空間的角度來認識自己。當蘇聯幾年前把斯大林格勒改名爲伏爾加格勒時，我聞訊後百感交集。我爲蘇聯的非斯大林化而高興，但是我覺得未必要把斯大林格勒的名稱改掉。我再次瀏覽了自己的日記，讀了我一九四三年二月寫下的東西，備受艱辛的我國人民在第四次攻勢期間是如何看待斯大林格勒的勝利的，對我們來說，這意味着希特勒的暴政開始完蛋。

一九六六年，我在給《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寫的一篇談蘇聯的史科學問題的文章中，曾經公開表達過我對斯大林格勒的這種感情，那時我指責當時的蘇聯領導人爲什麽要採用斯大林主義的方法來對付死去的斯大林，對於他的錯誤，對於戰前的大規模殺人等等是應予譴責的，但是對於他的功績，例如在戰爭中的功績，對自己的祖國蘇聯以及對人類的進步的功績，則必須予以承認。

同斯大林的最初的一些誤會

莫斯科和南斯拉夫共產黨人的關係，幾乎是按照某種命中注定的行程，每十年爆發一場危機。

一九三八年，關於解散南共的決議在共產國際裏幾乎佔了上風。對於在蘇聯的南斯拉夫共產黨人來說，這是一段艱難的日子。斯大林進行了大清洗，這也牽涉到南斯拉夫的革命者。這是一段未經探究的歷史。他們有多少人被弄死了，確切的情況現在還不知道。數字高達幾百人。在蘇聯的所有南斯拉夫共產黨人都面臨危險。他們中的許多人僅僅以毫厘之

差，簡直是偶然的原因，才得以逃避死亡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和堪察加的集中營，而從那裏是很少有人生還的。

當時，黨的新領導回到了國內，走上了不平坦的道路。年青人進入了黨的行列。一九四一年，戰爭爆發了，人民解放戰爭開始了。蘇南兩國人民從來没有如此彼此接近過，但是一俟南斯拉夫的革命開始壯大，就同共產國際，也即同斯大林發生衝突。

戰時，儘管我是接近最高統帥部的，關於同莫斯科的任何誤會，我一無所知。誠然，我們一直在指望蘇聯派來傘兵，在武器方面提供軍事援助，但是我們也知道，紅軍離我們還很遠，幾乎有兩千公里的被希特勒分子佔領的土地把我們隔開，蘇聯飛機要降落到我們解放區或者用降落傘投擲藥品和彈藥，在技術上有很大的困難。

只是在衝突發生以後，我才有機會同莫沙·皮雅杰一起仔細地閱讀鐵托同志保存在身邊的全部無綫電報。只是在那時，有些事情對我來說才變得比較清楚。我看到，從起義的最初幾天起，就有分歧了，首先是由於以下幾點產生的：南斯拉夫的革命應當是一場什麼樣的革命？兩個革命之間的關係應當是怎麼樣的？怎麼樣走向社會主義？

這些文件向我證實了這樣一個論點：由於蘇聯的社會存在遭到曲解，從而加强了蘇聯的霸權主義，這種霸權主義追求的是叫南斯拉夫的革命表示順從。斯大林從「理論上」爲自己的觀點辯護，提出的口號是「只需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只有通過擴大蘇聯的國界，而不是通過革命已經勝利的國家的平等合作，社會主義才能實現」。

任何革命都是羣衆的自發性同意識形態的結合；要是不明確地確定羣衆所追求的目標，暴動往

往失敗。因此早在南共中央一九四一年在薩格勒布舉行的五月會議上，鐵托同志在談到準備武裝抵抗佔領者時就强調，從起義的第一天起就應建立新的政權，人民的政權。

鬥爭要成功，沒有別的道路。怎麼能夠號召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舉行起義，來反對德國、意大利、保加利亞和匈牙利的佔領者，而又不明確地告訴他們，他們同時也在爲建立新政權，爲建立共和國，而不是爲君主政體，而是爲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享有平等，爲國家完全獨立，不受外國資本擺佈，爲經濟落後的國家實現工業化，爲消滅人對人的剝削，爲婦女充分參與新社會，爲青年人有權對國家的關鍵問題發表意見而鬥爭呢？

五月全會的決定通過秘密無綫電台送到莫斯科去了，但是答覆只是在蘇德爆發戰爭之後於一九四一年七月四日才送達，當時共產國際通知：「現階段的問題是從法西斯的奴役下解放出來，而不是搞社會主義革命。」

儘管在這份電報上簽名的是季米特洛夫，實際上，這是斯大林的決定。後來，我從保加利亞革命家伊萬·卡拉伊萬諾夫（卡拉伊萬諾夫一九四五年以後定居我國，而在這以前曾在莫斯科和其他國家呆過）那裏了解到，對於共產國際的任務，季米特洛夫早在一九三六年在共產國際裏就失去了決定性的影響。他只是個門面，一切決定都由斯大林作出，馬努伊爾斯基和共產國際的其他官員就嚴格貫徹執行。

但是，我們的起義的發展有自己的要求。應當告訴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他們將有新的政權，鐵托同志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一日報告共產國際說：「很可能要建立某種人民的中央政府」。

一九四一年底和一九四二年頭幾周，最高統帥部和共產國際之間的無綫電聯系並不定期進行。

起義正在全力發展。到了三月份，共產國際才對從南斯拉夫得到的材料作答，作了批評性的評價，說什麼「鬥爭具有過多的革命性質，實質上應當具有反法西斯性質。」

蘇聯政府同共產國際這種立場相適應，承認了倫敦的南斯拉夫王國流亡政府及其軍事大臣德拉扎·米哈伊洛維奇，後者公開同游擊隊作戰。例如莫斯科電台一九四一年秋天把德拉扎·米哈伊洛維奇說成是南斯拉夫抵抗運動的領袖，在他對塞爾維亞西部解放區發動進攻後，也不願譴責他，對於他同德國人勾結，反對人民解放軍，同樣不願予以譴責。

從蘇聯向南斯拉夫廣播的自由南斯拉夫電台（消息由最高統帥部提供），只是到了春末才第一次報道德拉扎·米哈伊洛維奇的賣國行徑。

莫斯科强調的是，不應讓南斯拉夫的革命的發展妨礙三大同盟國的合作。然而，在整個戰爭期間，盟國一次也沒有因爲南斯拉夫而發生嚴重的衝突。蘇聯政府的這個論據只是具有次要的意義。斯大林害怕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自己搞起來的，不受他的控制，違背他的願望的一場革命。

一九四二年秋天，建立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員會（南人解委員會），即建立新南斯拉夫的臨時政府的條件成熟了。爲此目的，來自南斯拉夫各地的代表十一月二十六日在比哈奇開會。鐵托同志於十一月十二日打了一份無綫電報給莫斯科，先報告了建立人民解放軍師的建制事宜，接着報告了在南人解委員會會議上宣佈成立南斯拉夫全國解放委員會的打算。

然而，共產國際很快就作了回答。不同意建立臨時政府，廢除君主政體和宣告成立共和國，而規定全國委員會只應成爲反法西斯性質的一般政治機構。共產國際在這項指示中明確地說：

「在現階段，你們不要提出廢除君主政體的問題。不要提出建立共和國的口號。你們所理解的

南斯拉夫政體問題，將在粉碎意德聯盟之後和國家從佔領者手中獲得解放之後再予解決。」

這項指示貫徹執行了。莫斯科的干涉使得君主政體未予廢除，臨時革命政府未予宣佈成立。但是鐵托同志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另一份長達三頁紙的長篇無綫電報裏，對共產國際所持的這樣的立場提出了意見。他提供了有關南人解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經過和各項決議的全部必要的材料，他說：

「我必須向你們報告的是，正是資產階級的活動家們，同樣還有全體人民，把倫敦的南斯拉夫政府斥爲賣國政府。儘管我們不把南人解委員會執行委員會看成是某種政府，它還是要處置國家生活的一切問題並照料前綫的事，解放區和新解放區幾乎各地都建立的人民解放委員會將在這方面協助它工作。我們這裏除了這些人民解放委員會和軍事當局之外，不存在別的政權……」

斯大林不能够理解，也不想理解，在存在着嚴重的社會剥削的多民族的南斯拉夫，不可能把鬥爭只局限於反佔領者的綱領，因爲只有在解決國內矛盾的更加廣泛的前景基礎上才能把羣衆動員起來。

斯大林由於南人解委員會的決議而大發雷霆

我同莫沙·皮雅杰一起閱讀了鐵托同志在戰時同共產國際交換的無綫電報後，我們得出結論：同斯大林的最嚴重的衝突發生在一九四三年年底，當時南人解委員會召開了第二次會議，爲新的南

斯拉夫國家打下了基礎。

斯大林始終貫徹執行不是以南斯拉夫的解放鬥爭和革命的利益爲出發點的政策，而總是把蘇聯直接的國家利益和策略上的利益放在首位，想把南斯拉夫革命納入自己的這個框框。

一九四三年內，人民解放軍在南斯拉夫各地都取得了勝利。希特勒想在第四次和第五次攻勢中挫敗游擊隊主力的嘗試全都失敗了。德拉扎·米哈伊洛維奇終於在亞布蘭尼察被粉碎了。朋友也好，敵人也好，都明白，必須把游擊隊看成是國內主要的和唯一的力量。

同時，建立最高人民政權，按照民主的聯邦的原則把南斯拉夫建成爲各平等民族的大家庭的條件已告成熟。應當剥奪王國流亡政府的南斯拉夫合法政府的一切權利，禁止彼得二世國王回國。

南人解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本着這一意思草擬了決議案。但是這一次，南共中央政治局不想讓任何方面來干涉，像一年前在南人解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那樣。

一九四三年秋天，在亞伊策會議前夕，從蘇聯一架飛機上向解放區空投了一批傘兵，其中有什特里尤·阿塔納索夫—維克托，原係保加利亞人。

這個使團要去保加利亞，它的性質是從事情報活動。在亞伊策曾告訴維克托，要舉行南人解委員會會議，但是沒有把有關將向南人解委員會提出的建議的全部材料告訴他。他於十一月二十八日通過我們的無綫電聯系向共產國際發了一份報告，署名爲格奥爾基耶夫，鐵托同志副署了這份無綫電報。

關於南人解委員會的所有決議，是通過十一月三十日的一份無綫電報報告莫斯科的。電文是由

莫沙・皮雅杰親手用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文、拉丁字體、埃卡夫方言①寫就的，而鐵托同志加上了「譯成俄文」幾個字。鐵托同志還副署了三頁電文中的每一頁，並親自加上了莫沙・皮雅杰忘加的日期——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莫沙・皮雅杰還於十二月一日寫了一份報告，滙報有關南人解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的情況，長達四頁，電報提供了會議主席團的組成。

弗拉特科・維萊比特那幾天動身去當我們駐中東盟軍的軍事使團團長，他隨身帶走了一份南人解委員會全部決議，同樣也報告了駐我們這裏的盟國軍事使團。

關於莫斯科對於南人解委員會的決議的反應，我曾同維爾科・弗拉霍維奇②和久羅・薩拉伊③談過。他們當時在莫斯科，維爾科是我們的代表和自由南斯拉夫電台的領導人，而薩拉伊是電台編

---

① 南官方語言有兩種稱謂：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或克羅地亞塞爾維亞語，視地區而不同；有兩種綴字法：拉丁化字母和基里爾字母（俄文同爲此種字母），有同等效力；有三種方言：埃卡夫方言、耶卡夫方言和伊卡夫方言，源出於古斯拉夫語同一詞，經幾世紀演變，在南不同地區形成不同方言。其中埃卡夫方言和耶卡夫方言被認爲官方語言，伊卡夫方言被認爲是地方方言。——譯者

② 維爾科・弗拉霍維奇（一九一四—一九七五），莫斯科大學畢業，一九三三年參加南共青團，一九三五年加入南共，參加過西班牙內戰。一九三九年任南共青團中央駐共青國際代表，一九四二年起任共青國際書記，直至一九四三年共青國際解散。一九四一—一九四三年爲南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兼設在蘇聯的自由南斯拉夫電台負責人。戰後曾任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副外長、《戰鬥報》主編。南盟七大被選爲南盟中央執委，八大選爲南盟中央書記，九大被選爲南盟主席團成員，後爲南盟主席團執行局成員。——譯者

③ 久羅・薩拉伊（一八八九—一九五七），一九一九年加入南共，從事工會運動。三十年代任南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死前任南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南盟中央執委。——譯者

輯部成員和電台的播音員。

同弗拉霍維奇的談話情況，我在日記中是這樣記的：

「關於南人解委員會各項決議，特別是關於剝奪王國流亡政府的合法性和禁止彼得國王回國的決議，莫斯科是在決議通過之後，也即是從南共中央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三十日的電報中獲悉的。莫斯科最初的反應是激烈的。自由南斯拉夫電台奉命不發表關於不讓彼得國王返回南斯拉夫的決議，甚至南斯拉夫駐莫斯科的代表維爾科·弗拉霍維奇還受到警告，他爲自由南斯拉夫電台和莫斯科電台編排的全部節目都受到檢查。馬努伊爾斯基向他轉達了斯大林的口信：

『哈齊亞英（在莫斯科，內部把斯大林叫做哈齊亞英，主人、老闆之意）非常生氣。他認爲，這是對蘇聯和德黑蘭決定背後捅了一刀。』」

同久羅·薩拉伊的談話，我是這麼記載的：

「當我們收到了南人解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決議消息時，我們編輯部裏的所有的人都興高采烈。我們的革命取得了最重大的勝利。我們懷着十分激動的心情準備節目，因爲儘管我們遠離祖國，我們還是意識到這些事件的歷史性意義。

維爾科·弗拉霍維奇同志向我和編輯部其他成員宣讀各項決議的情況，我還清楚地記得……他的臉上發出異采。我們南斯拉夫共產黨人許多年來在莫斯科倍受艱辛，而現在，對我國各族人民大加讚揚的時刻來到了。

然而，晴天一聲霹靂，我們接到通知說，蘇聯外交部下令，禁止發表南人解委員會的各項決議。我們通過交涉，想改變這項命令，但是全無結果。

我們唯一能做的是，向蘇方人士指出，倫敦電台發表了南人解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的決議，而我們却只能沉默。

後來對我們作了些讓步。對我們說，我們可以發表會議在亞伊策舉行的消息，但是關於決議，一個字都不能提。只允許我們重播南人解委員會一九四二年第一次會議的決議！

我們一再申明我們的意見是正確的，不發表南人解委員會的決議會損害我國各族人民的鬥爭，但是蘇聯的官僚們不讓步。

我們以爲所有的困難都克服了，但我們再次大失所望。莫洛托夫親自下令：你們可以發表各項決議，但關於剝奪逃亡的彼得國王回國權利的決議除外。

這使我們義憤填膺。難道自由南斯拉夫電台要維護君主政體？只是在倫敦電台發表了南人解委員會這些決議之後，莫洛托夫才作了讓步。

請看，俄國領導層就是這樣看待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解放戰爭中取得的最大的勝利——南人解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各項決議的。

這一事件表明，蘇聯政府很少考慮我國各族人民的意願。蘇聯政府奉爲指南的完全是自己對外政策的利益。」

莫沙·皮雅杰和我在我們和莫斯科交換的電報中找到了一些文件，完全證實弗拉霍維奇和薩拉伊所講的話。我後來還查閱了自由南斯拉夫電台的廣播節目。

儘管莫斯科早在十一月三十日就獲悉南人解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的各項決議，自由南斯拉夫電台十二月十五日才予發表！

對此，莫沙·皮雅杰對我說：

「斯大林是一個過時的革命家。他成了政治家了，再也聽不進革命了。他操心的是大國的邊界和有關利益範圍的協議……」

劃分利益範圍的最初消息

斯大林對於南人解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各項決議大發雷霆，不是偶然的。他把南斯拉夫的革命看成是自己的政策的對象，而不是獨立的主體。

一九四三年年底，希特勒將敗北已經清楚了，反希特勒聯盟的幾個最強大的國家開始認真地討論戰後的政策，討論新的邊界以及在它們之間劃分利益範圍。

當然，關於這一點，我們在戰時毫無所知，我還要承認：由於我們接受的教育是對蘇聯無限信任，我覺得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根本不會同別的大國搞這樣的安排。

但是文件和這些歷史性事件參與者的作證向我們揭示——誠然是後來——早在戰時，當我們除了同共產國際的無綫電聯絡而同外界還毫無聯系的時候，當最高統帥部還在東波斯尼亞山區時，我們南斯拉夫游擊隊員，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整個鬥爭，所有這一切都成了大國之間討價還價的對象。

儘管我們在南斯拉夫大部份領土上建立了人民政權，並有强大的軍事力量，我們一直到一九四

三年秋天意大利投降，我們首批使團前往意大利和中東，莫斯科接待了我們第一個政治軍事代表機構爲止，我們同外界，同西方以及東方，可以說没有真正的接觸。我們没有外交機構，也没有領事機構，我們不掌握通訊手段，一切都剛開始。

我於一九四三年年底在開羅動了手術，一九四四年年初我又在那不勒斯動了手術。我前往巴里，那裏設有我們游擊隊的基地，負責供應我們的軍隊，接受傷員以及提供有關南斯拉夫的鬥爭的消息。我幫助同志們做所有這些工作。

有一次，一九四四年夏天，我在意大利遇到了一位美國進步記者。他自認爲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很親近。他懷着最大的信任對我說，蘇聯和英國已就在巴爾幹劃分利益範圍，特別是就南斯拉夫達成了秘密協定，英國在意大利的宣傳組織已經從這一意義上對工作作了必要的變動。

我斷然駁斥了這種說法。我對他說，蘇聯不是帝國主義國家，它決不會做出這種事情來。我們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那幾天我剛讀了一本斯大林戰時言論集，我把斯大林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的講話拿給他看，這篇講話我們在烏日策的《戰鬥報》上發表過。

斯大林在那篇講話中明確地說：

「我們進行戰爭的目的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把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制度强加給期待我們幫助的斯拉夫人民和歐洲其他國家的人民。

我們的目的是幫助這些國家的人民，進行反對希特勒暴政的解放鬥爭，然後讓他們充分自由地在本國的領土上任意安排。我們絕對不干涉別國人民的內政」。

美國人回答說，情況在變化，斯大林不再是原來的斯大林了，而我則堅持自己的看法。幾天之後，我又到那不勒斯請醫生檢查身體，我們就同一個題目進行了交談。

同我們在一起的還有一位自由派美國人。他同我年齡一樣大，他很熟悉歐洲和巴爾幹的歷史，戰前曾參加國際進步青年運動。

他向我證實，關於這類談判他也有所風聞，美國人也插手了。他說，他很清楚，我們南斯拉夫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由於秘密外交和關於利益範圍的秘密條約而受到多大的損害。英國、法國和俄國一九一五年四月同意大利簽訂了倫敦密約，密約規定把斯文洛尼亞沿海地區、伊斯特拉、達爾馬提亞的一半、阿爾巴尼亞的一半，甚至把土耳其人和希臘人所在的小亞細亞的一部份劃給羅馬。

我聽後跳了起來，我指出，正是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下令，在十月革命成功一個月之後公佈沙俄政府的這項密約，並發表官方公報，宣佈蘇維埃新政府廢除這項可恥的條約，因爲不想參加帝國主義掠奪性的「劃分利益範圍」的政策。

但是，我的美國朋友很熟悉歷史。他對我說，馬克思早就呼籲過全世界工人階級，要警惕地注意本國政府的活動，特別是要注意資產階級外交官在損害人民羣衆，不讓人民羣衆知曉和違背人民羣衆根本利益的情况下搞秘密交易。馬克思是最先指出這一點的人之一。

他還向我引述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列寧的和平法令：蘇維埃政府反對秘密外交，蘇維埃政府將在全體人民面前公開從事活動。

「但是」，他對我說，「在斯大林領導下，全都改變了。」

我要求向我舉出哪怕是一個具體證據來說明蘇聯曾經簽訂過某種秘密條約，他舉出了一九三九年八月的蘇德條約爲例。

我聽了，大動肝火：

「希特勒和西方國家簽訂的慕尼黑條約，這才是典型的劃分利益範圍的條約。歐洲資產階級慫湧希特勒進攻蘇聯和所有東歐國家。正是這些資產階級一九一八年在一面旗幟下，在反共主義的旗幟下組織了九國遠征軍，去窒息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他們在一九一八年沒有得逞……而蘇德條約只是對西方的這種卑劣伎倆的回答而已。斯大林得自衛。他當時正同日本軍國主義者進行明槍實戰。他需要喘息時間，需要確保西部邊界，以便在東部能自由行動……你們想想，要是希特勒是從蘇聯原來的邊界，而不是從蘇聯新的邊界出發的話，要是他動手時，近了幾百公里的話，現在這場戰爭會是怎樣一副局面呢？莫斯科肯定早在一九四一年就淪陷了……」

我幾乎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差一點揚長而去。我變得咄咄逼人：我不再討論我們的分歧點，而轉而去說明，爲什麼這兩個年輕的美國人有這樣的想法，爲什麼他們不能够理解共產主義的實質，他們中了本國資產階級提出的口號的毒。

他們沉默不語。他們感到難過，他們知道我是游擊隊的中校，受過三次傷，是經歷了革命的風暴的。

他們中間的第一位，那位記者，對待蘇聯的態度開始動搖，但是另一位，那位歷史學家，毫不讓步：

「我們不談這個了。我很希望這些消息是不確鑿的。我知道，這些消息對於你對蘇聯的那種理

想主義的看法是個沉重的打擊。」

他講完後，我站起來，不打招呼就走開了。

當然，時間作出了自己的判斷。後來，通過自身的經驗和我們南斯拉夫的經驗，通過親身的感受，我學會比較現實地來評價斯大林的行動，當然，還包括看待一九三九年德蘇條約的真正的實質性的動機。關於這項條約的最終的判斷將由歷史來作出，我確信，這樣的判斷肯定是會對採取斯大林主義的方式奉行政策提出批判的，儘管斯大林錯誤的估計和謬誤的主要受害者實際上是蘇聯人，因爲文件後來表明，斯大林幾乎盲目地信任希特勒，爲此而削弱了蘇聯的防禦，因爲斯大林根本不相信希特勒德國會背信棄義發動進攻。

但是，當時，在我們的解放戰爭期間，限於當時的認識和覺悟，我爲這項條約辯護，好像是我自己簽訂了這項條約似的！

倫道夫·邱吉爾泄露天機

一九四四年六月，我回到了設在維斯島的最高統帥部。我沒有在非游擊隊的環境中生活過。以前，我們總是處於運動之中，總是馬上鞍刀出鞘，我們的周圍幾乎每天都有槍炮聲，而現在却來到了海邊。沒有飲用的水，只能喝葡萄酒，因爲全靠雨水，不够用。休息時我們就去游泳。我們喜歡一種海上戰鬥遊戲，彼此使對方淹沒於水中，我作爲薩瓦河上過去的水球運動員，在這上面是個能

手。有一次，四個黑山人向我襲來：米塔爾·巴基奇，佩科·達普切維奇①和另外兩名將軍。我可倒霉了。在最激烈的時刻，我開口駡起黑山各個種族來了（佩科·達普切維奇是卡頓人，是黑山的「貴族」，而巴基奇是斯卡達爾平原的人，是「癟三」），他們彼此吵開了，我才僥倖脫身。

平時，我們這個海灘成了國際性的海灘。伊萬·舒巴希奇先生，在英國駐王國政府大使史蒂文森的陪同下也來這裏，還有艾森豪威爾將軍的特別政治顧問羅伯特·墨菲。這裏差一點爆發了嚴重的外交事件——我們同美國政府的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件中的第一件。鑒於我被公認是「使人淹没的海上之王」，我一下水，別的游泳的人全都聰明地呆在岸上，避免向我挑戰。然而有一天一個火紅色頭髮的人自由自在地向我游來，把我的水弄渾了。這是粗暴的挑戰，我向他游去，對他這種傲慢態度予以懲戒，這時鐵托同志從岸上吆喝：

「停住，那是客人！」

這樣一來，艾森豪威爾將軍的特使羅伯特·墨菲才免受被淹没在藍色的亞得里亞海深處的懲罰。

恰好在那一天，有幾個同志從克羅地亞來到最高統帥部，他們除了別的事外，還談到了同英國首相邱吉爾的兒子倫道夫·邱吉爾的一次談話，後者作爲傘兵降到了我們解放區，是英國軍事使團的成員。

倫道夫·邱吉爾跟他父親一樣，很勇敢，但是脾氣暴躁，有一次他大發脾氣，因爲在某個地方

①佩科·達普切維奇（一九一三—　），南議會副主席，一九三三年參加南共，曾參加西班牙內戰，一九四一年參加人民解放鬥爭，歷任師長、軍長等職，戰後歷任集團軍司令，總參謀長、政府部長等職。預備役上將。一九七四年曾率議會代表團訪華。——譯者

指揮部裏沒有馬上得到馬。我們的一位軍官，達爾馬提亞人，懂英語，也在那裏，他設法平息邱吉爾的怒氣。但是，邱吉爾沒有平靜下來。他突然說：

「我父親來信說，他同喬大叔（英國人在戰時和同蘇聯關係好時對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斯大林的愛稱）達成了在南斯拉夫劃分範圍的協議，瞧我們來收拾你們游擊隊……」

我立即把這些話同我在意大利從我的兩位美國朋友那裏聽來的消息聯系起來，但是我還是覺得這一切是不可能的，這是斯大林的某種巧妙的圈套，是同老邱吉爾開開玩笑而已。

自一九四四年夏天起，過了五、六年，參與了戰時決定命運的事件的政治家才發表回憶録，大國的某些檔案才公諸於世，因而對於三大盟國在上次大戰期間的真實意圖，特別是蘇聯對南斯拉夫的真實意圖，才得到一幅比較清楚的畫面。

在評價把南斯拉夫劃分爲利益範圍的這些協議時，需要確定，這是劃分領土呢，還是劃分勢力？還需要確定，南斯拉夫國內有哪些勢力在這些計劃上幫助了各個大國？

衆所周知，希特勒於一九四一年四月通過關於劃分南斯拉夫的指令，把南斯拉夫作爲國家整體已予消滅，已在德國、意大利、保加利亞、匈牙利和阿爾巴尼亞之間把它瓜分掉了，同時安插了所謂的帕韋利奇①的「克羅地亞獨立國」和奈迪奇②的「塞爾維亞」。

① 安特·帕韋利奇（一八八九——一九五九），二次大戰期間組織反動武裝烏斯塔希，在德意佔領者卵翼下組織「克羅地亞獨立國」，殘害大批游擊隊和平民，被南列爲除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以外的最大戰犯。戰後潛往南美，後死於馬德里。——譯者

② 米蘭·奈迪奇（一八七八——一九四五），二次大戰前曾任南軍隊總參謀長、陸海軍大臣，一九四一年南被德意法西斯佔領時，率南軍投降，籌組「塞爾維亞政府」，自任主席。被列爲戰犯。——譯者

蘇聯政府承認了對南斯拉夫的這一征服，因爲在希特勒入侵之後，它中斷了同南斯拉夫政府的外交關係，就如它在德國侵略挪威之後所做的一樣，但是，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進攻蘇聯之後，蘇聯政府撤回了自己的這項不幸的決定。

迄今所知道的文件表明，蘇聯政府和大不列顛政府戰爭期間基本上是維護南斯拉夫的完整這項原則的，至於美國政府，則不是始終如此的。

我看過已故羅斯福總統在海德公園裏的個人檔案，看了他戰時的部份通信，我在那裏找到了有關他一九四三年三月底同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的談話記錄。在記錄裏，羅斯福的觀點是，「驅使克羅地亞人和塞爾維亞人繼續生活在一個國家裏，是荒唐的。艾登的看法不同，即認爲他們可以而且應當生活在一起」。在舍爾武德關於羅斯福和哈里·霍普金斯的關係的書裏，對於羅斯福在未來的南斯拉夫國家的問題上的看法，公佈了一種更爲廣泛的說法：

「塞爾維亞。總統重申了自己原來的觀點，即認爲克羅地亞人和塞爾維亞人沒有什麼共同之點，要想驅使這兩個友好的人民在一個政府治理下共同生活是可笑的。總統認爲，應當重建塞爾維亞，而把克羅地亞人置於監護之下……」

路易·亞當米奇和薩維察·科薩諾維奇①在戰時曾多次公開反對羅斯福總統這樣的立場，因爲

---

① 薩瓦·科薩諾維奇（一八九四——一九五六），二次大戰前爲南獨立民主黨總書記，議會議員，一九四一年一度入閣，任供應大臣，一九四四年參加鐵托——舒巴希奇政府，一九四五年任新聞部長，一九五三年南政府改組，任聯邦執行委員會委員。薩維察爲薩瓦的昵稱。——譯者

總統並不掩飾他這樣的立場。他作了某種奇怪的解釋，說「小時候收集過塞爾維亞的郵票，習慣於把南斯拉夫叫做塞爾維亞！」

我曾同羅斯福夫人交談過羅斯福總統採取這樣的態度的原因，從而對整個事情有了較深的了解。看來，他受了當年的南斯拉夫駐華盛頓大使康斯坦丁·福蒂奇的很大影響。而福蒂奇所持的觀點，是戰時流亡在外的最保守的塞爾維亞政治家中根深蒂固的一種看法，即認爲應當建立一個大塞爾維亞，應當同克羅地亞人完全分離，這是兩個世界、兩種信仰和兩種語言！

同時，羅斯福總統受以奥東·哈潑斯布爾斯基爲首的右翼天主教徒的影響，他們希望建立一個中歐天主教聯邦，斯洛文尼亞，或許還有克羅地亞，都參加進去。

這樣一來，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和斯洛文尼亞人中間沙文主義情緒最濃的一些人找到了共同點，即認爲應當拆散南斯拉夫，儘管他們彼此仇視，連彼此企求的邊界都不能夠取得一致意見。

然而，隨着人民解放戰爭的加强，隨着在南斯拉夫範圍內的各國和各國人民中起義的均衡發展，建立在各族人民平等和聯邦基礎上的新南斯拉夫也在成長。

這使得分裂南斯拉夫的計劃全告破產，儘管在一九四三年年底大國之間曾提出在游擊隊和切特尼克①之間劃分勢力範圍。曾經有一種流傳甚廣的看法，認爲游擊隊運動是「克羅地亞的」，而切

---

① 「切特尼克」原爲「參加隊伍的人」，最初出現於十九世紀後半葉，係非正規志願武裝人員，爲擺脫土耳其奴役而鬥爭，後爲南王室利用，變成了反動組織，二次世界大戰時站在德意佔領者一邊，反對南共領導的武裝鬥爭，其首領爲德拉扎·米哈伊洛維奇。——譯者

特尼克運動是「塞爾維亞的」。蘇聯的某些人士也接受了這種觀點。當我一九四四年初在開羅住院治療時，蘇聯的一個軍事使團前往當時在德爾瓦爾的最高統帥部，探望了受傷的游擊隊軍官。使我驚愕不已的是，一位蘇聯將軍竟問我們，游擊隊裏有沒有塞爾維亞人。

這裏還有一件無法解釋清楚的事。利卡的切特尼克早在一九四二年秋天就曾散發傳單，說游擊隊是托派，斯大林不承認游擊隊是真正的共產黨！這些消息是德拉扎·米哈伊洛維奇負責南斯拉夫西部的副手伊利亞·比爾恰寧將軍散佈的，他同倫敦的流亡政府保持聯系。而在倫敦，接近蘇聯外交官的人士對南斯拉夫王國政府成員說，游擊隊運動是托派！

塔斯社一九四四年二月一日的第三十二號《參考新聞》上登載了發自倫敦的一條消息，說那裏有一批「南斯拉夫的托洛茨基分子」、「警察密探」，其中明確地提到佩科·達普切維奇、布拉戈耶·奈什科維奇①和科斯塔·納吉②。

維爾科·弗拉霍維奇看到了這條消息，他作爲我們黨的代表，於一九四四年二月八日，給了莫洛托夫一封抗議信。信裏說：

「記者所提到的這三位同志，是南共著名的黨員，他們中沒有哪一個現在倫敦。到目前爲止，

---

① 布拉戈耶·奈什科維奇（一九〇七— ），醫學博士，一九二六年加入南共青團，一九三五年加入南共，參加過西班牙內戰，戰時任南共塞爾維亞地區書記，塞爾維亞共產黨成立後任塞共書記，一九四五—一九四八年任塞爾維亞政府主席。一九四八—一九五二年任南政府副總理。在南共七大上當選爲南共政治局委員。一九五二年後脫離政界，轉而研究學術，在醫學方面有一系列著作。——譯者

② 科斯塔·納吉（一九一一— ），南人民軍現役大將，一九三七年加入南共，參加過西班牙內戰，一九四一年參加人民解放鬥爭，曾任軍長等職，戰後歷任集團軍司令、軍區司令。一九七六年曾率南退伍軍人代表團訪華。——譯者

他們全都是正直的戰士和共產黨人。

衆所周知，佩科·達普切維奇是人民解放軍第二軍軍長，布拉戈耶·奈什科維奇是南人解委員會主席團成員，而科斯塔·納吉則是人民解放軍第三軍軍長。

我提請您注意在倫敦製造的這件蠢事，請您干與，以糾正這一不確切的斷言」。

歷史還沒有解釋清楚莫斯科同流亡政府周圍的某些人士以及德拉扎·米哈伊洛維奇之間的關係，這只是出於謀取情報的考慮呢還是攏絡「斯拉夫民族的老關係，塞爾維亞人民和俄羅斯人民的神聖關係」，或者斯大林只是想脚踏幾隻船，以便在戰爭結束時，不管怎麼樣都有所得。就目前而論，這只能猜測。

然而，自一九四三年年底起，把南斯拉夫劃分爲游擊隊地區和切特尼克地區的這個想法，已表明是站不住脚的。游擊隊遍佈南斯拉夫各地。在那種情況下，三大國就常常談判在南斯拉夫劃分勢力的問題。

其結果是鐵托—舒巴希奇協議，這是試圖讓君主政體通過邊門返回南斯拉夫，推翻南人解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的決議。

温斯頓·邱吉爾證實一半對一半的協議

斯大林和邱吉爾是否就在南斯拉夫劃分利益範圍達成了協議，關於一半對一半的說法是否是以

歷史材料爲根據的——關於這一點，我曾有幸聽取溫斯頓·邱吉爾本人的意見。

會見是完全意外的。

密洛凡·吉拉斯一九五一年一月，負有國務使命前往英國，而我陪同他前往。一月三十一日，我們在唐寧街十號拜會了克萊門特·艾德禮，當時他是英國首相。

第二天一早，邱吉爾的秘書打電話給我們，說邱吉爾邀請我們當天吃午飯。我們表示歉意，因爲當天已約定同英國政府的代表進午餐。秘書就建議我們十一點去，我們接受了。

這是一九四五年在的里雅斯特問題上發生衝突後，南斯拉夫游擊隊員同邱吉爾的首次會晤，當時他說了許多難聽的話來反對我們，特別是反對鐵托同志。

在邱吉爾在倫敦白金漢大門街住家的大門口，邱吉爾夫人迎接了吉拉斯、約熱·布里萊伊①和我。使我感到驚詫的是房子很簡樸。我悄聲對吉拉斯說：

「你在德迪涅的別墅要比這來得豪華，儘管你不能誇口說什麼八代以前有某個馬爾博羅伯爵②……」

我那天怏怏不樂。從大清早起，就同吉拉斯吵架。我在舊書店裏購買英國談南斯拉夫的古書，我找到了一本一八七五年的《不列顛年鑒》，裏面寫道，反對土耳其當局的黑塞哥維那起義不是從

---

① 約熱·布里萊伊（一九一〇— ），一九三二年加入南共，戰時曾任軍政委，戰後任外長助理、駐英大使、駐聯合國使團團長，現爲塞爾維亞議會副主席。——譯者

② 指約翰·邱吉爾，曾爲馬爾博羅伯爵。——譯者

奈韋西涅開始的，而是從離我的祖先的家不遠處——比萊恰地區切佩利察村的大橋開始的。

吉拉斯嘲笑我這種地方愛國主義，他開玩笑說，要是没有黑山的將領來領導黑塞哥維那的起義，起義就會失敗。那天早晨我們前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當我們走到英國一八七五年時的首相迪兹雷利墓前時（他當年站在（土耳其）蘇丹一邊，反對黑塞哥維那起義），吉拉斯對我說：

「你該朝着他的墓吐唾沫！」

「我倒是有理由這麼做，因爲正是在一八七五年，我祖父在切佩利察的家被燒了，而地主哈伊德霍季奇一家（我們是他們的佃户）躲進了特雷比涅的清真寺，祈求迪兹雷利健康……。」

我被刺激得像條瘋狗，咬了人一次還不够，回過頭來又咬了受害者一口，因此我在進入邱吉爾的住房時，談到了關於馬爾博羅伯爵的那番話。

吉拉斯開始笑了起來，但是他的笑容被打斷了，邱吉爾太太漫不經心地對我們說：

「邱吉爾先生每天在床上工作到兩點鐘，因此他將在寢室裏接見你們……」

這是一間寬敞的房間，有一張大床，有幾張桌子，放滿了書和手稿。儘管是大白天，燭台上點着一枝綠色的蠟燭，邱吉爾正湊過手去點燃雪茄。

當我看到他穿着寬鬆的、鑲有紅邊的白睡衣，處於這樣的氣氛中，我想起了孩提時代的一個畫面。狼吃了紅帽兒的祖母，穿上了她的衣裳，躺在床上，假裝是祖母，等待新的受害者。我想像中的惡狼就是這副模樣，只是他還缺少一頂白色的睡帽。

我剛想悄聲地把我的想法告訴吉拉斯和布里萊伊，但是吉拉斯知道我的脾氣，在桌子下面用脚踢了踢我，讓我閉嘴。

談話開始時客套了一番。邱吉爾請我們喝酒，我想，喝的是波爾多酒。他自己往一隻隻中等大小的酒杯裏倒酒。他的手很穩。輪到給我倒時，我說：

「請原諒，我不喝酒……我是運動員……」

邱吉爾用銳利的目光盯着我，手裏仍然拿着遞給我的酒杯。在我的一生中，被人懷着極大的鄙視的神情望着，莫過於這一次了：

「你不喝酒！真奇怪?!」

我感到窘困，眼睛在牆上來回看，牆上掛着邱吉爾的一些畫。主人注意到了，他說：

「看來，不僅我的酒你不喜歡，連我的畫你也不喜歡……」

說真的，他的畫我確實不喜歡。這些畫裏有點自然主義的情調，我想說，這些畫像是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大師杰伊涅卡①和格拉西莫夫②的畫。但是我及時克制住了，沒有把這樣的有罪的想法說出來，因爲邱吉爾對於自己的畫是很引以爲自豪的。

邱吉爾自己挽救了這種局面，他開始談到他還記得同鐵托的會晤。吉拉斯打斷他的話說：

「一九四五年左右，您曾說過，鐵托同志把您騙了。我們南斯拉夫游擊隊員認爲這是很高的讚揚。」

邱吉爾喜歡進行這樣一種性質的談話。他眯着一隻眼睛，笑着說：

---

① 亞歷山大·亞歷山大羅維奇·杰伊涅卡（一八九九—一九六九），蘇著名畫家，多次榮獲斯大林獎金。——譯者

② 亞歷山大·米哈伊洛維奇·格拉西莫夫（一八八一—一九六三），蘇著名畫家，蘇美術學院院長。——譯者

「我記不得我用了這些字眼，但是我對你們大家十分惱火，甚至可能說些更兇的話……」

他開始笑了起來，接着又說：

「我犯了錯誤，講了這樣的話，今後我決不會再幹這樣的事……」

我目不轉睛地看着桌上放着的校對用的清樣。我睜大了眼睛，想看到些什麽。這是邱吉爾的回憶録，恰好是他談一九四四年秋天他同斯大林會晤的那一卷，據許多情報說，當時最終締結了在東歐劃分利益範圍的條約，因爲從一九四三年年底起，在這個問題上就存在一致意見。

在我們來之前，我就對吉拉斯說過，我忍不住，我要問問邱吉爾，那些消息是否確鑿。

關於國家問題的談話臨近結束，吉拉斯注意到我的迫不及待的目光，因此他把談話轉到邱吉爾同斯大林的關係上。

邱吉爾說：

「我認爲，不會發生戰爭。斯大林攫取的東西太多了，他現在不會冒風險，而且他還怕原子彈。我不相信他會進攻南斯拉夫，因爲他並不是瘋子，不會去捅馬蜂窩。他首先會向西方進軍，因爲在他看來，那裏的道路暢通無阻……」

邱吉爾强調，他不想同俄國人打仗，但是，如果是他，而不是艾德禮當政的話，他會同斯大林達成協議，因爲他是不會把武器從手中放下的。

他說，他一度曾同斯大林達成協議，這是有關希臘、羅馬尼亞、保加利亞……

吉拉斯插了一句話：

「關於南斯拉夫呢？」

邱吉爾平靜地說：

「一半對一半……當然，這不是指領土，而是指影響。」

當邱吉爾談一九四四年十月同斯大林的會晤的那一卷回憶録問世時，我們在裏面白紙黑字找到了他一九五一年對吉拉斯、布里萊伊和我所說的話。

然而，蘇聯長期來一直對關於劃分利益範圍的這些協議保持沉默，近年來開始尖銳地否認斯大林做過這樣一類交易。

但是，種種事實說明，曾經達成這樣的協議。

莫沙·皮雅杰在一九四四年的那些日子裏——邱吉爾談的正是那些日子——正在莫斯科。他在一九五二年給我的一封信（没有注明日期）裏談到了自己的印象：

「親愛的弗拉多，

令人遺憾的事情：我肯定在我的某次講話中描述過我同莫洛托夫打交道的場面，而且是印刷好了的，但是我找不到了。簡單說來就是：

一九四四年十月，邱吉爾和艾登在莫斯科，當他們商定一半對一半劃分南斯拉夫時，我和斯塔諾耶·西米奇應邀出席莫洛托夫爲他們兩人舉行的招待會。他們是貴賓，立即被引到單獨的會客廳裏，因此我本人同他們没有接觸。但是，莫洛托夫在把他們送走後，走過我的身邊，拍了拍我的肩，友好地笑着對我說，一切都會對南斯拉夫有利。我當然感到高興，我根本想不到，事關劃分範圍……」

雅爾塔、南斯拉夫和中國

南斯拉夫不是蘇聯的劃分集團和利益範圍的政策的唯一受害者。斯大林不僅僅把南斯拉夫當作他同世界上强大的西方政治家結賬時的零錢。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這已成了斯大林的對外政策司空見慣的方法和手段，從中國、朝鮮，一直到歐洲，都是如此。這一類交易中的第一筆，斯大林是同邱吉爾進行的。英國的外交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就在這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把一些領土提供給兩個或者三個伙伴。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帝國迅速衰敗，在大賭桌邊上，在決定各國人民和各國的命運的大賭桌邊上，只剩下了兩個名副其實的對手——一九四五年成了世界領導力量的蘇美這兩個超級强國的政治家。

患病體衰的羅斯福在戰爭臨近結束時，越來越喪失了對事態進程和世界政治的影響。據羅斯福夫人告我，他非難霸權和利益範圍的政策，認爲這樣的政策已經過時，同世界的現實發生衝突。個人，不論多麼强大有力，給自己的時代打上烙印，然而，他們自己任何時候並不創造歷史；他們受制於社會力量。羅斯福也不得不屈從於這一規律。這一定律也適用於斯大林。

斯大林借助於秘密外交，締結劃分利益範圍的協議，從而證明，他已喪失革命家的形象。一九一七年的和平法令是蘇維埃國家整個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列寧通過這項法令呼籲各國人民和一切國家在不割地、不賠款的情況下締結公正的和平。當沙皇俄國的全部秘密條約宣佈廢除時，當這些

條約的滙編公開發表時，水手馬爾金一九一七年在滙編的前言中寫道：

「全世界的勞動人民都應當知道，外交官們呆在豪華的辦公室裏是如何背着他們在用他們的生命做交易……外交官們是如何締結可恥的條約的……每一個人都必須知道，帝國主義分子是如何大筆一揮就霸佔整個整個地區的，人類的血又是如何染紅戰場的。每一份發表的文件都是反對資產階級的武器……」

斯大林一九二五年也表示過反對利益範圍政策，在他的統治下，一九三〇年的《蘇聯小百科全書》說：「勢力範圍是半殖民地國家的這樣一些地區：相競爭的國家圍繞這些地區就彼此在這些地區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優勢締結協議。勢力範圍是帝國主義國家殖民主義政策的產物，例如，沙皇俄國和英國就在波斯劃分勢力範圍所達成的協議。」

但是，這是過去的事，是革命的蘇聯的久遠的往事。當斯大林熱衷於搞秘密外交，熱衷於奉行商定範圍的政策時，他的宣傳家們對他作了如下的讚揚。在莫斯科一九四五年發表的《外交史》中有這麼一段話：

「各國除了開誠佈公的、公開的和公諸於世的條約外，彼此間還締結秘密的和機密的條約。」

實際上，斯大林是想以此來爲自己同西方大國的政治家圍繞整個東歐和南歐達成的協議辯解。在南斯拉夫是劃分了勢力，而在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和這個地區的其他國家裏，斯大林得到了完全的優勢，而例如在希臘則又讓西方大國得到了全部權利。

同西方著名政治家達成的這種秘密協議，是完全按照韋氏大字典裏對利益範圍所下的定義的精神達成的：一國的政治影響或者政治利益爲其他國家所承認，而且多少是排他性的。典型的是，對

這樣的領土不要求表面上成爲保護國或者廢除受害國的主權。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利益範圍條約的簽訂者之間存在所謂的「君子協定」，也即大人先生們保證將在彼此之間公平地分贓。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斯大林和邱吉爾就有機會來考驗考驗自己的秘密交易的價值。希臘游擊隊從德國人手裏解放了大部份國土，當時邱吉爾决定要在自己的利益範圍内恢復自己的權力，把君主政體和舊的社會制度强加於希臘人民。英國的坦克佔領了雅典。對於反對希臘革命的這一干涉，斯大林連動一下手指，表示一下反對都没有做。

邱吉爾在下院公開地感謝斯大林，説英國政府很感謝斯大林元帥對於希臘的事情没有興趣，而且表示不打算批評英國在希臘的行動，也根本不打算插手這個國家的事務。據邱吉爾説，斯大林説過，他對於英國在希臘奉行的政策，有充分的信心。

而當一九四七年在老游擊隊員的領導下，希臘爆發了人民起義時，斯大林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在季米特洛夫和其他保加利亞人在場的情况下對卡德爾、吉拉斯和巴卡里奇説：

「例如，我們不同意你們提出的應當援助希臘游擊隊的意見。我們認爲，我們是正確的，而不是你們南斯拉夫人……誠然，我們也可能犯錯誤……例如，戰後，我們把一些中國同志叫到這裏，叫到莫斯科來，我們對他們説，我們認爲，中國没有發展起義的條件，中國同志應當同蔣介石達成維持正常關係的暫定條款並解散自己的軍隊。中國同志在這裏，在我們面前，在口頭上同意了蘇聯同志的意見，而當他們回到中國，他們做的却是另一回事。他們聚集了力量，改組了軍隊，現在在痛擊蔣介石。請看，在中國這個例子上，我們犯了錯誤。情况表明，正確的是中國同志，而不是蘇

聯同志，但是在你們巴爾幹，不是這麼回事，對於希臘游擊隊也不是這麼回事……」

斯大林在中國、遠東、越南問題上，同大國締結過好幾個秘密協議，這樣的秘密條約之一就是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在雅爾塔作出的決定。羅斯福和邱吉爾在那裏同意了斯大林的要求：把所有的土地①歸還蘇聯，也就是把中國的部份地區、沙皇俄國在一九〇四年同日本的戰爭中丢掉的全部租借地以及日本的某些領土歸還蘇聯。而斯大林則承担義務：蘇聯將向日本開戰，將就向蔣介石提供武裝援助締結條約，「以從日本桎梏下解放出來」，儘管當時蔣介石正發動公開的戰爭，反對毛澤東指揮下的中國軍隊。

至於朝鮮，三位政治家一致同意，三八綫把這個國家劃分爲兩個勢力範圍。這裏是從領土上劃分國家，而不是像對待南斯拉夫那樣劃分勢力。耐人尋味的是俄國沙皇政府一九〇三年曾向日本政府表明，這個國家三十九度以北的領土是它在朝鮮的勢力範圍。

斯大林和馬林科夫在戰勝日本之後所發表的講話最清楚地表明了蘇聯對世界這一地區的霸權主義達到了什麼樣的地步。斯大林本人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說：

「俄國軍隊一九〇四年在俄日戰爭中的失敗在我國人民的意識中留下了沉痛的回憶。這是我國的奇恥大辱。我國人民相信並期待着有朝一日粉碎日本，洗刷掉這一奇恥大辱。我們老一代等待這一天等了四十年……」

而馬林科夫一九四六年二月七日走得更遠：

① 原文如此，疑有脫漏。——譯者

「在東方，蘇聯收回了沙皇所失去的東西。這樣一來，俄國軍隊一九〇四年的失敗這一可恥的污點現在抹掉了……簡言之，我們由於斯大林的英明領導而戰勝了，蘇聯把注定在它邊界之内的所有人民置於自己强大的卵翼之下。」

雅爾塔會議和斯大林、羅斯福、邱吉爾在那裏作出的決定，使人民解放鬥爭的全部成果都成了問題。這些決議稱：

「我們一致同意建議鐵托元帥和舒巴希奇博士把他們的協議立即付諸實現，並在這一協議的基礎上建立新政府。

我們建議，新政府一俟成立，即宣佈如下：

（1）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員會（南人解委員會）應予擴大，吸收未因同佔領者合作而信譽掃地的南斯拉夫最後一屆議會議員參加，如此建立的機構應當成爲臨時議會；

（2）南人解委員會通過的立法必須交制憲議會批准。」

鐵托同志一九五二年有一次在談到南人解委員會的這些決議時向我說了如下一番話（據《書中之書》同年六月二十五日中的一段記録）：

「關於雅爾塔的決定，俄國人一點都没有告訴我們，儘管這些決議是對南斯拉夫的名副其實的犯罪。他們硬要我們把以前斯托亞丁諾維奇議會中的議員吸收進南人解委員會。」

人類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對於人民的自決權，國與國之間的平等的意識增强了。帝國

主義在世界一些地區之間製造的那可怕的鴻溝被填平了。

我在翻閱戰爭臨近結束時的信件時，找到了我一九四四年春天和夏初我在意大利時同愛德華·卡德爾的來往信件。他在一九四四年五月七日的一封信裏對我談到：

「我們在國外的活動對前景考慮得太少。僅僅宣傳我們的鬥爭成果和揭露流亡分子是不够的。現在就應當致力於使我國成爲對明天調整國際關係起作用的有影響的因素。儘管大家都說，這個問題是未來的事，毫無疑問的是，各國都在作準備，以便在將來的和談中一開始就提出以現實的、現在業已存在的事實和關係爲依據的建議。我們今天就必須準備好這樣的現實的關係，以便明天使我們的話變得更有影響。

我這裏首先指的是，有必要顯示出某種比較明確的對外政策方針，特別是有必要同我們今後將與之保持比較緊密的接觸的那些運動和國家建立聯系。

這裏不僅涉及蘇聯和其他盟國，而且還涉及例如捷克斯洛伐克、法國（當然，同時應當告訴法國人，舊法國用來對待原小協約國的那種方法永遠不能採取了），還有希臘、意大利和我們的鄰國的愛好自由的力量。

同這樣一些力量聯系在一起無疑將大大方便我們以後的地位，因爲在這樣的情況下，南斯拉夫將不是單槍匹馬地面臨和談，而是作爲一支有牢固的國際關係的力量……

……我們這裏沒有什麽你不知道的新聞。再說，常有人去你們那裏。

---

① 卽愛德華·卡德爾。——譯者

向你致以同志般的問候

貝夫茨①

又及：信，老大也看了，他表示同意。

他向你問好！

附上的信件請予分發。

請來信！」

第三章 衝突的核心：經濟關係

一九四五年的南斯拉夫是一個遭到破壞的國家；需要恢復被戰爭毁壞了的一切。我們屬於這樣一個國家：在那裏，革命取得了勝利，開始考慮使國家現代化的最迅速的途徑，即如何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過渡到先進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化社會。尤其是因爲南斯拉夫擁有大量未被利用的自然財富。

一九四一年前，外國資本使南斯拉夫處於經濟上完全依附的地位。一九四五年，我們懷着巨大的希望和信任轉向蘇聯，要求在實現我們的經濟計劃方面提供意見和合作。然而，剛邁出第一步，就發生了深刻的分歧，就令人失望。

當時，我除了在日常工作中必須了解我們同外國的一般財政和經濟關係的一些具體事實外，我並不搞經濟問題。

只是在一九五二年，我才向自己提出了一項任務：搞清楚蘇南一九四五——一九四八年間經濟關係的過程。我們的檔案當時未經整理。由於蘇聯極有可能發動侵略，許多檔案運到了國家的西部地區去了，許多檔案還被銷毁。

一九五二年夏天，我曾同鮑里斯·基德里奇就這些問題進行過一次長談。他概略地向我談了這些關係的範圍，談到他同斯大林和蘇聯其他領導人的會晤。他還要與他共事的玆馮科·莫里奇①和基羅·格利戈羅夫②給我整理一份備忘録，附上他們能得到的資料。我還同弗拉特科·維萊比特通過信，他早在一九四五年就同蘇聯代表進行過最初的談判。我還曾同鐵托同志、卡德爾、蘭科維奇、弗拉多·波波維奇同志③就決定兩國之間重大經濟問題時同斯大林的會晤問題談過話。

我研究了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以及南斯拉夫和這些國家的經濟關係，因此我現在在這裏是以這一切爲依據談我的看法的。

一九五二年六月的一天，我去見鮑里斯·基德里奇，見他神態疲憊。他的胃病又犯了，但是他仍然按他的一個好習慣行事：同熟人聊聊，回憶回憶往事。

我們彼此在戰前就認識了。一九四〇年初秋，我從貝爾格萊德到盧布爾雅那科門斯基大街他父親家裏，把鐵托同志的信和口信帶交給他。當時我在薩格勒布出版《三十天》這本雜誌，我要基德里奇寫篇文章，我還說，稿酬爲三百第納爾，我可以預付。鮑里斯答應了，但是過了一個月、兩個

---

① 玆馮尼米爾·莫里奇（一九一六— ），一九四一年參加人民解放鬥爭，曾任聯邦經濟委員會主席助理，人民銀行副行長，聯邦工業聯合會秘書。玆馮科爲玆馮尼米爾的昵稱。——譯者

② 基羅·格利戈羅夫（一九一七— ），一九四四年加入南共，曾任財長助理，聯邦經濟計劃局副局長，一般經濟事務部長、財長，一九六七—一九六九年任副總理，南共主席團執行局成員。現任聯邦議會議長。——譯者

③ 弗拉迪米爾·波波維奇（一九一四—一九七二），一九三〇年加入南共青團，一九三二年加入南共，參加過西班牙內戰。二次大戰時爲克羅地亞起義組織者，歷任軍政委、軍長，解放後歷任駐蘇、美、華大使、副外長等職。弗拉多爲弗拉迪米爾的昵稱——譯者

月，稿子連個影子都没有。鮑里斯當時轉入了地下，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操心。

當我們下一次在一九四三年在多倫斯科解放區相會時，鮑里斯已担任斯洛文尼亞總司令部政委，成了起義的靈魂，但是他並沒有忘記自己承担的義務和所欠下的債：

「對於我欠你的那三百第納爾，你可以挑選任何東西來抵償。你想不想要整個道座索戴斯卡城堡？」

「戰爭離開結束還遠着呢，你給我一樣我可用來逃跑的東西吧，你給我一雙克拉尼產的靴子吧。」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我從斯洛文尼亞經由亞伊策前往埃及，進醫院動手術，就是穿的非常出色的靴子，約翰·菲利普在開羅給照了相，因此多倫斯科皮靴工人的這一產品的照片就傳遍了全世界。

一九五二年見面時，鮑里斯記起了那雙皮靴，他笑着說：

「要是我們現在懂得這樣來替我們的商品做廣告的話，我們就會很容易打破蘇聯的封鎖。」

談話就這樣逐步轉到嚴肅的話題上來了。關於我國政府和蘇聯政府對待相互經濟合作的態度上的分歧，他說了如下一番話：

斯大林不是把我們作爲社會主義國家看待，而是看成是，他們所認爲的，屬於他們的利益範圍，也即處於他們具有經濟剥削一切特點的霸權之下的任何別的國家一樣。

他們的目的是使我們繼續成爲農業國和原料基地，充當尾巴，因此反對我們通過建立基礎工業實現工業化而達到自立。

他們反對我們的經濟計劃，反對工業化，使我們很傷心。而我們本來恰好指望他們對我們第一

個五年計劃的一些基本工程進行投資。

鐵托同志一九四六年訪問了斯大林，他們對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在莫斯科簽訂的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經濟合作協定原則上取得了一致意見，此後他們立即開始建議建立合營公司。我們接受了建議，指望建立起有投資的合營公司，我們可以通過這些公司來發展我們的工業，系統地開採南斯拉夫巨大的自然財富。

這裏馬上就發生了分歧。他們說我們是誇大狂，說我們的工業化是烏托邦。我們同意先建立兩個合營公司，一個是航空運輸方面的尤斯塔公司，一個是負責河運的尤斯帕德公司，指望俄國人會讓步，會通過其他的合營公司幫助我國實現工業化。

這些就是鮑里斯·基德里奇的總的估價，而一九五二年的一封信表明了關於建立空運和河運合營公司的最初的談判是多麼艱巨，這封信是弗拉特科·維萊比特寫給我的，是有關這次談判的。他當時在羅馬，手頭的文件不全。他在信中說：

「……早在一九四五年夏天就開始談論建立（蘇南）合營公司的好處，目的在於發展我們的經濟。一九四六年年初，我接到通知說，蘇聯要派一個代表團來，任務是同我們締結有關建立多瑙河航運和民航合營公司的條約。我被指定同該代表團談判。爲了對談判有所準備，我要求我們駐布達佩斯和布加勒斯特的代表機構向我提供俄國人同這兩個國家締結的條約的副本。

幸運的是，我在俄國代表團抵達之前就得到了條約文本，這樣我就有足够的時間加以研究。當我看完了之後，我感到震驚。不平等是如此明顯，毫不掩飾，俄國人的霸權是如此橫暴，我簡直不知道開動腦子了。在我看來，這樣的條約從政治上來說是愚蠢的，從法律上來說，是完全荒唐的。

我振作起精神，試圖把俄國人這樣的態度看成是必要的，因爲匈牙利的納吉政權和羅馬尼亞的米哈伊爾國王的政權是殊堪置疑的。不過，我還是要對你說，這一切在我看來，完全不符合社會主義的精神，我感到十分不安。

我做夢也沒有想到，俄國代表團會向我們，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提議締結類似的條約。在一個晴朗的日子，俄國代表團到達了，代表團團長，某個別列津（如果我沒有記錯他的名字的話）將軍向我作了自我介紹，商定開始談判的日子……

……我本來以爲在第一次會議上我們要商定作爲未來的合營公司建立的基礎的總原則。没想到，別列津將軍在第一次會議上立即（也即在第一分鐘）就把一份條約草案交給我，草案是從莫斯科帶來的。

我要求推遲會議，以便研究這些文件。當我會後在自己的辦公室裏看了條約草案後，我非常驚愕。這幾份條約草案本質上同俄國人已經在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簽訂的條約一模一樣，區別只在於有些條款比羅馬尼亞或者匈牙利的條約還要來得苛刻。這很可能是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談判代表設法使之放寬了的那些條款。我明白了，俄國外交部的某位法律專家給屬於俄國利益範圍的國家擬定了一份條約樣本，然後加以運用，不管對方是米哈伊爾國王還是鐵托。

我覺得，不論如何，我們决不能接受這樣的條約，這樣的條約是所謂的『吃虧有份、沾光無緣』的典型樣本。（即只有一方獲利，另一方一無所得）。

我向老大作了滙報，他命令我設法改善條約內所包含的條件。在兩國代表團下一次會議上，我很委婉地告訴俄國人，這樣一種形式的條約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最好是把條約置於另外的基礎之

上，我没敢用政治上的論據來闡明我的論點，我只是援引了國際法上的十分無力的論據。我竭力把這個政治性很强的問題轉到法律領域內。我認爲，在這方面我没有成功，但是我又有什麼辦法，我不敢對他們説，這些條約是製造不平等關係的工具，這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

我知道，這是將要簽訂的一系列更爲重要的同類條約中的頭兩個條約，我們的經濟委員會指望通過這些條約，也即通過這些合營公司來解决我們的經濟建設計劃問題，這就使我的處境更爲爲難。

別列津對於國際法的知識比我還少，因此他不懂得巧妙地來批駁我的無力的論據，但是他堅决拒絶同我就建立合營公司的另外某個新基礎進行談判。他向我表明，我們要麼接受條約，要麼就中斷談判。

此後，我再也没有召集過兩國代表團開會，三星期後，我被告知，別列津走了。整個這件事搞得我很傷心，弄得我垂頭喪氣……我覺得俄國人向中央告了我的狀，但是關於這一點從來没有告訴過我。我只知道，過了幾個月別列津又回到了貝爾格萊德，我們的人接受了條約草案……什麼都没有告訴我，我完全被撇在一邊（上帝保佑）……」

這兩個條約是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初簽訂的，據鮑里斯·基德里奇告我，儘管條款很苛刻，我們還是簽訂了，因爲我們指望將按照我們的建議簽訂有關建立其他合營公司的條約，也即指望這些合營公司幫助我們使國家實現工業化。我們首先寄希望於建立石油企業、煉鋁企業和鋼鐵企業。

尤斯塔航空公司和尤斯帕德多瑙河航運企業的經營情况表明，這不是什麼蘇聯對南斯拉夫的經濟發展提供援助，而是對我們的純粹損害。蘇聯想在南斯拉夫獲得控制和壟斷，想通過這種方式剥

奪我們經濟上的獨立和主權。

例如，尤斯塔公司佔有南斯拉夫和國外的全部航綫，從而使我們本國的南斯拉夫空運公司一條國外航綫都沒有。尤斯塔公司還飛國內贏利最多的航綫。從而使我們本國的公司處於從屬地位，靠尤斯塔公司讓出來的一點業務勉强支撑着。這樣一來，通過合營公司就實現了完全的壟斷。

這家公司的全部盈利是按投入的資本平分的，不納任何税，這樣俄國人從這一方面也獲利頗多。對於投入的實物資本的估價辦法，使得俄國人能够攫取大量超額利潤。俄國人把他們投入的實物股份估得很高，而把南斯拉夫的估得很低。南斯拉夫的財産是按照貨幣比較堅挺、穩定的一九三八年的價格估的，而他們的財産是按照物價騰貴的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間的價格估的。蘇維埃國家在這裏實際上使南斯拉夫蒙受了巨大損失，使它自己得以按照股份獲取收益。這樣一來，俄國人靠少得多的股份——借助於價格而不合理地抬高了的股份——就能獲取比南斯拉夫還多，比他們的股份的實際價值所允許的還多的收益。

例如，南斯拉夫在貝爾格萊德近郊爲尤斯塔公司興建了一座機場，被估價爲三億一千五百萬第納爾，而預先計算的興建費用爲此數的二十倍。又如，在對機場估價時，只向南斯拉夫人承認普通地皮的價格，而不承認機場的價格，也即不承認南斯拉夫方面在這塊地皮上所興建的設施。

事情還不僅僅到此爲止。尤斯塔公司的總經理，一位蘇聯公民，開始隨心所欲地解釋條約，竟然把直接屬於南斯拉夫政權機關的職能攫爲己任。他違反協議，把機場上的幾乎所有設施，把全部聯絡和導航設備佔爲尤斯塔公司所有，這樣一來，他就攫取了南斯拉夫全部航空事業的控制權。然而，根據協議，尤斯塔公司只享有從商業的角度使用機場的權利。由此而使它有可能對南斯拉夫的

民航事業完全發號施令，甚至攫取了完全屬於南斯拉夫當局的權利。它甚至停止向東道國當局報告外國飛機起降情況，因此，尤斯塔公司就成了某種太上皇。

蘇聯的駕駛員甚至確定他們運載哪些旅客，哪些不運載，甚至在旅客預訂了機票和買了機票時，他們也這樣幹。秋天就發生了一起同蘇聯駕駛員這樣的行徑有關的公開的醜聞，不得不由蘇聯政府和南斯拉夫政府加以處置。

關於這件事，報紙上當然隻字未提。我在自己的日記裏記載了如下這些話：

「一九四七年夏末，斯韋托扎爾·伏克曼諾維奇—泰波（當時爲南斯拉夫人民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結束在黑山的休假，經由鐵托格勒機場返回貝爾格萊德。機票全賣完了，但是在上飛機時發生了爭吵。買了機票的旅客未能都上飛機，因爲駕駛員——一個俄國人——讓一些沒有買機票的人上了飛機。

旅客們提出了異議，伏克曼諾維奇也牽連進去了。泰波問道，怎麼能有些人不買票就乘飛機，飛機駕駛員——按軍銜是蘇聯的一位大尉，對此回答說：

『是我叫這麼辦的！』

泰波再次開始說服他，這麼做不對，而這個俄國人衝着穿着南斯拉夫人民軍將軍制服的泰波的臉嚷道：

『你是反動分子，你是酒鬼……』

泰波動怒了，據他後來對我說，他想對準這個俄國人的臉給他一拳，但是他克制住了。他叫來了國家保安處的人，命令他們，只要駕駛員的那些沒有機票的朋友不下飛機，就不讓飛機起飛。

國家保安處的一位工作人員問泰波是否把那個俄國駕駛員逮起來，但是泰波没有同意。旅客們注意地聽着這番討論，因爲大家都担心泰波不放過這個駕駛員。

過了一個小時，俄國人讓了步，飛機飛向貝爾格萊德。

一到貝爾格萊德，泰波就召見蘇聯武官，向他談了整個事件。他表示要撤回這個駕駛員，但是結果没有撤。

泰波把這件事告訴了鐵托和馬爾科。鐵托勃然大怒，要泰波立即要求把這個駕駛員撤回去，而馬爾科說：

『你没有揍那個駕駛員是對的，但是你本應聽國家保安處那位工作人員的話，把駕駛員逮起來，有時是應聽聽國家保安處的意見的。』」

尤斯帕德多瑙河航運合營公司也是在類似的基礎上經營的。蘇聯實際上通過這個公司剝奪了南斯拉夫航運業以往在多瑙河上一貫佔有的位置和重要性。在多瑙河流經的各國中，南斯拉夫航運業的噸位最高。

根據建立尤斯帕德公司的條約的第五條，蘇聯作爲締約一方，承担義務，以支付屬於它的股份資本的名義向尤斯帕德提供：

(一)建設阿達—齊甘利亞造船廠的設備和材料，多瑙河碼頭的設備以及建造阿達—齊甘利亞造船廠的費用，總額爲一億二千五百萬第納爾。

(二)自協定簽署之日起五年內，提供價值六千七百五十萬第納爾的造船修船用的裝備和材料。

(三)公司的營業所必需的現金七百五十萬第納爾。

而第六條規定，南斯拉夫以支付屬於它的股份資本的名義交給公司：

(一)價值一億六千四百七十五萬第納爾的船隻。

(二)諾維薩德的修造廠以及對阿達—齊甘利亞造船廠的投資，價值二千七百七十五萬第納爾。

蘇聯通過這一方式獲得了我們在多瑙河上的最好的船隻，而它自己連一艘船都沒有拿出來。

根據南斯拉夫多瑙河河運公司和尤斯帕德公司一九四七年簽訂的合作協定，雙方規定合理地利用雙方的船隊，南斯拉夫多瑙河河運公司和尤斯帕德公司彼此順便牽引空載和滿載的貨輪，每一千公里噸支付七十第納爾的運費，而尤斯帕德公司同蘇聯國營輪船公司簽訂的價格則爲五十第納爾，也即每一千公里噸低二十第納爾。尤斯帕德公司在同南斯拉夫多瑙河河運公司簽訂協定時隱瞞了這一情節。

一九四七年年內，南斯拉夫多瑙河河運公司把貨輪交尤斯帕德公司牽引，而尤斯帕德則把自己的貨輪交給蘇聯國營輪船公司牽引，甚至有的時候尤斯帕德公司的貨輪得等上好幾個星期才等到蘇聯國營輪船公司的船，來把它們拖進南斯拉夫碼頭。鑒於這樣的做法，南斯拉夫多瑙河河運公司一九四七年僅牽引貨輪一項就向尤斯帕德公司支付了一百二十萬第納爾。

一九四八年年初，尤斯帕德公司的貨輪在運載我們的商品前往蘇聯時，都得在列尼伊和伊茲馬伊拉等很長的時間才能卸貨，這已成慣例。俄國人舉出的不予卸貨的理由是卸貨場地不足；儘管與此同時，蘇聯國營輪船公司的貨輪卻總是予以卸貨的。有時，有些這樣的貨輪得花三個月時間來等待卸貨和返回南斯拉夫。

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的冬天多瑙河及其支流没有封凍，也没有妨礙航運的其他情況。我們的南斯拉夫多瑙河河運公司擁有的船隻全部出動，然而，尤斯帕德公司却把船隻拖進了越冬港灣，致使我們少出口了四萬噸左右商品，少進口了三萬噸左右貨物。

關於建立尤斯帕德公司的條約對於蘇聯方面是極其有利的，儘管如此，他們還是没有信守自己承担的義務。例如，到一九四七年年底，南斯拉夫向尤斯帕德公司投放的實物和現金佔總額的百分之七十六點二，達三百零五股（船隻、造船廠和現金）！

而蘇聯在同一時間内提供的實物和現金只佔自己的投資的百分之九點八三，只有三十九股！

我們在上面已看到，關於尤斯帕德公司的條約第五條第二款規定，蘇聯應當在五年内提供六千七百五十萬第納爾的造船修船用裝備和材料，而在公司存在的兩年内，蘇聯總共提供了三百四十萬第納爾。

由於没有投入必要的材料，公司不得不利用南斯拉夫在多瑙河上獲得的資金——總額爲一千五百萬第納爾的外滙，鑒於南斯拉夫得到外滙有困難，這對於南斯拉夫來説，不啻是沉重的負担，巨大的損失。

協議規定，蘇聯將提供興建一座造船廠的各種機器設備，以發展南斯拉夫的造船業。俄國人根本就没有提供，相反，却提供了卡車、布匹、玻璃之類的東西。這就給南斯拉夫造成了多方面的損失，因爲進口了南斯拉夫並不需要的物資，而更爲重要的是，這個重要的工業部門的建設狀況使南斯拉夫經濟在好多年内都蒙受損失。

尤斯帕德公司和尤斯塔公司的組織結構表面上看來是十分民主的，是建立在雙方平等的基礎之

上的。例如，在尤斯帕德公司裏，每一國的投資爲二億第納爾，分成每一股爲五十萬第納爾的股份。每一股在股東大會上構成一票，股東大會應是公司的主要機構。大會從每一方各選四人組成公司管理委員會，主持公司的領導工作。管理委員會任命總經理，根據協議，每一個公司的總經理都只能由蘇聯公民担任！

他的副手是南斯拉夫國民，而根據尤斯帕德公司的章程第二十節，他完全從屬於總經理，因爲他只能處理經理交辦的事。總經理獨立地履行公司管理委員會的全部執行職能，這就使他得以爲所欲爲地執行政策，而不受管理委員會和大會的任何監督。

蘇聯政府和蘇聯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經常通過政治手段來支持總經理事實上的獨立和對公司機構的不負責任，在總經理的身上體現了蘇聯實行壟斷的指揮者的角色，體現了蘇聯機構在南斯拉夫經濟中不受阻礙地主宰一切的局面。

尤斯塔公司在自己的兩年存在期間，沒有舉行過一次年會，根本沒有得到批准的收支結算表，這就證明了上面的説法是正確的。尤斯帕德公司只召開過一次大會，是一九四七年的大會。他們根本不做經營結算表，因此很難檢查經理的工作。這意味着，總經理不尊重我國最起碼的法律，而按照協議他是有義務這麼做的，因爲公司必須遵照南斯拉夫的法律從事經營。

這樣一來，公司，也即公司的總經理就把自己置於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的法律之上，並自認爲是享有治外法權的。這種爲所欲爲的情况只能意味着，經理只是在爲蘇聯的利益工作，他也有這樣做的可能性，好處基本上都轉向蘇聯經濟了。

請看實踐中的一個事例。尤斯帕德公司的蘇聯經理通過確定各國貨物的運費，對南斯拉夫大加

歧視。這位經理規定，蘇聯的貨物，每一個淨噸公里收〇點一九第納爾，多瑙河流域其他國家的貨物，收〇點二八第納爾，而南斯拉夫的貨物則收〇點四第納爾。這就是說，南斯拉夫對於運貨必須多支付百分之五十二的運費，而這是用它自己交給尤斯帕德公司的船隻運的！南斯拉夫僅這一項一九四八年就損失三千八百萬第納爾。儘管建立這些合營公司的目的，誠如條約所說的，在於幫助南斯拉夫的建設和發展，而事實上，這些公司却成了阻礙我國經濟發展的絆脚石。例如，尤斯帕德公司一九四八年只有百分之四十的業務是為南斯拉夫經濟服務的，百分之六十的業務是為蘇聯和其他國家的經濟效勞的，儘管公司所擁有的船隻全部是南斯拉夫的，規定是要用來滿足南斯拉夫的需要的。

因此，尤斯塔公司和尤斯帕德公司的存在表明，這根本談不上是什麼幫助南斯拉夫發展經濟。蘇聯想的是在南斯拉夫獲得控制和壟斷，通過這種方式剥奪我們經濟上的獨立和主權。

我們的人，對於尤斯塔公司和尤斯帕德公司這樣的工作狀況感到苦惱。提出了一系列的抗議。而蘇聯代表的答覆是簡短的：這是資產階級分子、反動分子和外國間諜在肇事。

例如，在就建立尤斯塔公司和尤斯帕德公司進行第一輪談判之後不久，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副外長弗拉特科•維萊比特就向蘇聯談判代表表明，儘管是以委婉的方式表明，條約草案是不公正的，正如我們在上面看到的那樣。

蘇聯代表向我們中央告了維萊比特的狀，說第一次談判没有取得任何結果一事，要由他個人負責。但是他們並没有就到此為止，而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七日在貝爾格萊德「俄羅斯之家」蘇聯國慶慶祝會上公開指責南斯拉夫的幾位首席談判代表是外國間諜。

關於這件事，經濟委員會主席鮑里斯·基德里奇的助手茲馮科·莫里奇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曾寫信告訴過我。莫里奇一九四六年曾是南斯拉夫同蘇聯代表團進行談判的一個代表團團長，談判目的是就建立蘇南開採石油、煤、黑色冶金、鉛、鋁礬土、鋁的合營公司、聯合銀行、共同的河運和空運以及這些事業的經營達成協議。他寫道：

「……寄上有關建立蘇南航空公司的談判的文件，談判是由維萊比特一九四六年年中同俄國將軍別列津進行的。

如你所知，會談不歡而散。我曾收到材料，要我們同別列津繼續會談。材料十分耐人尋味，特別是由於維萊比特當時就對我說過，別列津曾指責他個人要對沒有達成協議一事負責。

關於我同亞特羅夫的會談，還有一個細節。蘇聯駐南斯拉夫商務代表列別捷夫曾被任命為亞特羅夫的代表團的成員。談判是在八月底開始的，到了十一月初，我知道我們不會讓步。十一月七日在『俄羅斯之家』曾舉行招待會，我們全體領導人都出席了。

在一圈人中間（據我現在所記得的，有帕夫萊·亞克希奇少將、薩拉伊、弗拉奈什、我、別列津將軍、列別捷夫、赫布蘭），有人問道，關於建立公司的談判為什麼卡住了，列別捷夫回答說：

『因為進行談判的是英國間諜。』

我想揍他，但是我看見元帥同志在大廳裏，我克制住了，我提出了抗議並馬上報告了基德里奇，據鮑里斯後來告訴我，他向老大同志滙報了此事。幾天之後，基德里奇告訴我，列別捷夫辯解說，他在招待會上喝醉了……」

爭奪南斯拉夫的原料

建立蘇南合營生產公司的談判是曠日持久而激烈的，最後不了了之。

在一開始工作時，在各個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裏就產生了一些原則性問題，因此談判雙方一致同意，在建立合營生產公司時遵循以下原則：

（一）公司不具有壟斷性質。

（二）南斯拉夫方面可將有條件發展，但生產資料的配備差或者甚至根本沒有的那些企業、工人①投入公司。再之，公司的規模要大，公司作的安排要使南斯拉夫的一些落後的經濟部門得以發展。

（三）在投資的估價問題上，兩國代表團達成協議：南斯拉夫現有的投資根據這些投資在世界市場上的價值（用美元計算）來估價，扣除折舊。蘇聯方面的投資以及南斯拉夫的新的投資則根據這些投資一九三八年在世界市場上的價值（用美元計算）來估價，加上更新費用。

此後，南斯拉夫代表團建議，南斯拉夫方面給所有這些公司提出一項任務：要在五年內達到一定的生產能力，並在此基礎上要求蘇聯方面提供相應的（百分之五十）設備。

---

① 此處「工人」（RADNIK）疑爲「礦場」（RUDNIK）之誤。——譯者

但是一開始討論南斯拉夫的投資，蘇聯代表團就明顯地顯示出一種傾向：在談判過程中來破壞業已確定的上述原則。

蘇聯談判代表亞特羅夫明確表示，他得到本國政府指示，要在南斯拉夫建立開採性質的合營生產公司。蘇聯談判代表越來越暴露他們的目的不是使新南斯拉夫的一些落後的經濟部門得到發展，並在這種發展的基礎上公正地分配投資贏利，而是要在籌組公司過程中就從公司謀取利潤。這樣的工作只能是在下面這樣的意思上使南斯拉夫的自然財富得到開採：南斯拉夫主要是輸出原料，也即我們繼續充當發達國家的原料基地，我們不可能自己來發展我們的工業。而不發展我們的工業，要在南斯拉夫建設一個現代化的社會就沒有基礎。

蘇聯談判代表亞特羅夫在談判中赤裸裸地說：

「你們要重工業幹什麼。你們要的一切，我們在烏拉爾都有。」

然而，南斯拉夫代表堅持南斯拉夫的自然財富必須加以利用，這在經濟上是辦得到的，我們並不追求什麼自給自足，因爲在各國的經濟已經變成一個整體的當代世界，自給自足是不可能的，也是十分危險的。

新南斯拉夫是主張同蘇聯和其他東方國家在經濟上進行最緊密的合作的，但是要以發展我們的自然條件爲條件，因爲這在經濟上是辦得到的，對於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利益來說，也是必要的。

蘇聯談判代表還想辦到一件事：

他們竭力想使這些合營公司在南斯拉夫市場上佔據壟斷地位，通過這種地位，蘇聯政府實際上

將控制住南斯拉夫經濟的主要部門。

在討論建立蘇南石油開採合營公司時，蘇聯談判代表的這種意圖明顯地表露出來了。蘇聯代表最初一口咬定沒有必要建立這樣的合營公司，因爲據他認爲，根據已經探明的儲藏量，在五年內年產量不可能達到四十五萬噸。爲此，他們建議減少提供鑽探設備。但是南斯拉夫專家提出了證據，表明南斯拉夫有足夠的石油可供大規模開採。甚至鮑里斯·基德里奇在議會上都談到當時在南斯拉夫的一些油田進行的勘探所取得的良好結果。

此後，蘇聯代表同意討論建立合營公司問題，但是，却提出了簡直辦不到的條件。

南斯拉夫提議投入的有：（一）戈伊洛地區，亞尼亞利帕地區，下倫達瓦地區；（二）在這些地區的勘探權和開採權以及找到石油的新地區的開採，這些新地區以後將具體地逐一規定；（三）進行石油勘探的地區的地質圖；（四）里耶卡煉油廠。

蘇聯代表只同意戈伊洛地區的收益，那裏的生產已經開始，而對於其他地區，他們提出要納入的話，只能作爲新地區納入（作爲普通地皮納入），儘管當時下倫達瓦和亞尼亞利帕已經鑽成的井的價值達四千二百萬第納爾，並已開始生產石油和天然氣。

按照蘇聯的這種觀點，南斯拉夫的油田的價值沒有被認爲是南斯拉夫方面的投資，他們援引馬克思的話，說什麽這是沒有什麽社會價值的自然財富！

南斯拉夫談判代表拿出了文件——蘇聯同伊朗和匈牙利簽訂的條約的複製本。根據條約，蘇聯政府承認油田的價值爲伊朗對合營公司的投資，等於基本資本的百分之五十，而對匈牙利人則承認

油田爲基本資本的百分之十五。再之，合營公司的產品，如果出口，首先應滿足蘇聯的需要，而且是按照最有利的條件滿足蘇聯的需要，財務上沒有任何負担，在頭五年不上任何出口稅。五年期滿後，南斯拉夫政府只有權徵收所得稅，無權徵收其他任何稅或關稅；如果還有餘，則南斯拉夫可用於滿足自己的出口需要。

除此以外，蘇聯的方案還要求，南斯拉夫國內石油的全部分配，也即出售汽油和其他石油產品的全部商業網，均由這一合營公司掌管。

事實上，蘇聯向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提出的這一建議所包含的條件，要比蘇聯向像伊朗這樣一個半封建國家提出的條件苛刻得多。

還有其他的分歧。他們硬說，當時一口井每天平均產五噸油是很低的，同投入的投資是極不相稱的。在一九四六年同期，蘇聯《石油經濟》雜誌却報道過一個材料，說蘇聯一九四六年每口井每天平均產量爲二點六噸。

蘇聯代表進而還斷言，我們向公司投入的現場物理地質圖沒有任何價值。而蘇聯駐匈牙利佔領當局却扣留了爲我國所擁有的一部份地質圖。佔領時期，匈牙利人在德國人領導下在倫達瓦油田進行了勘探。俄國人佔領了倫達瓦油田的匈牙利部份並經管這一部份油田。一九四五年六月，我們就曾要過有關倫達瓦油田我國部份的資料，以便我們能繼續勘探。然而他們却不給我們，儘管我們向他們一再證明，他們是有這樣的資料的。（他們是在維也納和佩斯繳獲這些資料的）。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我們在莫斯科一再提出要求，但是沒有結果，儘管這些地質圖的所有權是屬於我們的，因爲這是德國在我國領土上的財產。

事情很明白，蘇聯代表在討論建立石油公司時竭力想壓低我方投資的價值，想靠自己投入少量投資而獲取大量利潤。

第二個合營公司

蘇聯代表在談判建立蘇南煤炭合營公司時顯示了同樣的進行剥削和實行壟斷的意圖。

南斯拉夫建議，把對供應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的重工業有重要意義的産地（波斯尼亞中部煤田，包括澤尼察、卡卡尼和布雷扎煤礦）、對供應海輪有重要意義的産地（西韋里奇、利夫諾和莫斯塔爾）以及對供應發電站和發展落後地區（科索沃）有重要意義的産地，作爲南斯拉夫的投資納入煤炭開採公司。

所有這些煤田的蘊藏量都已探明，能保證達到五年計劃所要求達到的發展，對於我方探明的蘊藏量，俄國人不承認是投資，他們不願同意，把科索沃、布雷扎、西韋里奇、利夫諾、莫斯塔爾等礦作爲投資，而同意把業已建成的卡卡尼和澤尼察兩礦作爲投資納入公司。他們要求把我們歷盡千辛萬苦，幾乎是白手起家開辦的鐵托巴諾維奇煤礦以及煤炭已經外露的扎戈爾耶和韋萊涅兩個煤礦納入公司。

由此可見，他們要的並不是發展煤炭生産，而是在不投入多少投資的情況下從我們當時最有利可圖的巴諾維奇、扎戈爾耶和韋萊涅等煤礦迅速謀取利潤。

南斯拉夫代表團對於這種要求當然堅決予以拒絕。

此外，根據共同確定的估價，在給南斯拉夫對煤礦的投資估價時，南斯拉夫的投資價值被確定爲八億六千五百萬第納爾，而蘇方事後却要求把這一投資的價值估爲總共四億五千二百萬第納爾！蘇聯代表爲自己的這一要求提出的辯解理由是，他們的專家在煤礦的帳本中找到了舊的物價變動情況。

在鉛鋅公司裏，我們建議把梅日策鉛鋅企業和產地，還有兹萊托沃礦考慮進去，以及恢復科帕奥尼克礦（戰前，那裏生產六萬噸鉛鋅礦），還有萊策鉛、鋅、金礦，建議開辦戰前已經勘探過的阿伊瓦利亞和諾沃布爾多鉛鋅礦區，使電解鋅達到年產一萬二千噸。我們還要求使這些礦生產三萬噸鉛。俄國人說，這些礦是貧礦，要求把業已建成，生產贏利很大的特雷普查礦和冶煉廠納入公司。蘇聯的目的又是很清楚：靠少量投資，直接地、迅速地進行剥削。

在煉鋁公司方面，南斯拉夫人建議把莫斯塔爾、克魯帕的鋁礬土礦和伊斯塔爾的幾個礦，當時正在興建的斯特爾尼什切企業以及盧布爾雅那的一座小型礬土廠納入公司，條件是建成斯特爾尼什切企業。我們希望每年生產五萬噸礬土和一萬二千噸鋁，並在莫斯塔爾興建年產三萬噸（電解）鋁的新冶煉廠。我們的鋁礬土的蘊藏量表明這些要求是完全有道理的，此外，在這些冶煉廠投產前以及投產後，都還會有一定數量的鋁礬土多餘，可供出口。這意味着合營公司在作了投資（我們投入百分之五十）之後，可以立即生產並有收益。

俄國代表們感到緊張，他們說，對我們來說，生產那麽些鋁太多了，他們要求把洛佐瓦茨煉鋁

廠納入公司，遭到南斯拉夫代表的拒絕。

又可以得出具體的結論：蘇聯代表團表明了顯而易見的意圖——謀取盡可能多的好處，用南斯拉夫的資源進行新的投資。

雙方就黑色冶金問題進行了各不相讓的討論。南斯拉夫代表團準備了一項建議：把澤尼察、瓦雷什礦、切夫良諾維奇錳礦以及希貝尼克的生產（加工鋼所必需的）鐵合金和（生產電工鋼和生產鋁所必需的）電極企業納入蘇南黑色冶金合營公司。

同時，南斯拉夫的建議還包括，黑色冶金合營公司把瓦雷什礦的能力擴大到生產一百萬噸礦石，以及擴大幾個錳礦，以滿足南斯拉夫工業的需要。另外還制訂了澤尼察鋼鐵廠合理化方案，還有擴大希貝尼克的企業以及興建一座生產五十萬噸鋼的新廠。這一新企業還要建一座使用國產煤的煉焦廠，因爲在當時，在一九四六年，實驗室的試驗已表明，這麼做是辦得到的。

這些計劃顯然並不過分。而南斯拉夫今後的整個工業化以及它從一個農業——原料國過渡到現代化的工業國，都取决於這些計劃。

但是，蘇聯代表只作疾首蹙額狀。他們到處散佈流言，說我們是誇大狂。

而從他們自己這方面，則竭力設法多撈點。他們看上了耶塞尼察鋼鐵廠，一再要求把它納入合營公司。當然，南斯拉夫人平靜地拒絕了這一要求。

對於波斯尼亞北部的柳比亞鐵礦，他們更是垂涎三尺。這一業已建成的鐵礦提供供出口的高質量的礦石，給南斯拉夫賺來外滙。而俄國人是知道他們要的是什麼。要是柳比亞鐵礦進入了蘇南黑

色冶金合營公司，他們通過這一方式就可以馬上開始靠南斯拉夫獲取外滙。這樣一來，這個生產質量最高的礦石的鐵礦就可以爲蘇聯專家隨心所欲地利用，而不顧它是南斯拉夫經濟最大的戰略後備力量之一。

蘇聯代表固執地把我們的所有建議相繼都予拒絕。他們一再證明，要提高瓦雷什的礦石產量是十分困難的，説那裏没有礦等等，儘管一九四六年就已斷定那裏的蘊藏量達到一億八千萬噸，並已制訂了興建最大能力爲年產一百七十五萬噸礦石的礦場的計劃。

南斯拉夫就澤尼察提出的建議也未被採納。俄國人説，只要擴大澤尼察就行了，不可能再建新企業，因爲投資太大。

他們還認爲，决不可能用南斯拉夫的煤來煉焦，因此他們也反對興建煉焦廠的計劃。

對我國經濟的全面壟斷

讀者或許要問，我爲什麼如此詳盡地叙述我對新南斯拉夫和蘇聯的代表就建立合營經濟公司所進行的惱人的、不成功的談判的看法。

我認爲，這麼做之所以必要，還由於從這些談判的經過可以最清楚地看出蘇聯公開宣佈的政策原則和它的大國利益的實況之間的實質性區別。一方面是滿嘴的好聽的話，國際主義啦，社會主義團結精神範圍内的無私援助啦，另一方面則是可怕的深淵，他們對年輕的南斯拉夫革命强行提出不

平等的，純粹是剝削者的要求。

在蘇聯提出的建立石油、有色金屬、煤炭、黑色冶金等合營公司的建議中，明確地提出兩個要求，這兩個要求是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之間的關係所特有的，而且是在資本輸出的第一階段所特有的。

首先是蘇聯要求在南斯拉夫實行壟斷，儘管它接受了不這麼做的原則；其次是它要求「治外法權」，也即要求實行這樣一種制度，根據這種制度，這些合營企業不受南斯拉夫本國的管轄。

關於建立石油開採和加工合營公司的條約草案，在第八條裏突出了公司的壟斷性質，那一條的條文稱「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授權公司在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全部領土上勘探和開採油田」。

再看另一個例子。第十條規定，公司享有特殊的權利，在從事自己的活動時可以享有同純粹是南斯拉夫資本建立的公司一樣的全部權利。

同時，沒有規定公司有任何義務使自己的活動同現有一切法律相符合，沒有規定公司同南斯拉夫其他公司一樣對現有一切法律是負有義務的。使公司只是享受南斯拉夫法律中所規定的某些權利的那些法律條文，就使它在自己的活動中不去完全實施現有的法律，這就包含有「治外法權」制的某些成份，因爲總是可以提出意見說我國法律規定的義務不適用於合營公司，任何這樣的義務都得由兩國政府來商議，這是對新南斯拉夫的主權的侵犯。

俄國人爲了使這些公司不受南斯拉夫政府的法律和措施的制約，在討論中竭力設法不規定任何義務，使這些公司不必執行新南斯拉夫的經濟計劃。這實際上意味着，南斯拉夫政府未經合營公司中的蘇聯代表的同意，不能提出自己的年度計劃，而這歸根結蒂意味着不能自主地規劃自己的經濟

發展。

蘇聯代表甚至提出了這樣的條件：公司不按照南斯拉夫的條例向工人支付社會保險費，而是「公司按照自己的估算盡可能支付」，也即少於按照我們的條例所規定的費用。這個問題，他們也想按照某個「世界平均數」，而不是按照我們的社會主義法律來解決，我們的法律保障工人享有充分的、高度的社會保險和保健。顯然，在那種情況下，我們又得來彌補這一差別。

關於建立蘇南合營銀行的建議表明蘇聯政府對南斯拉夫懷有奴役性意圖達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

這家合營銀行事實上不會是合營的，而會純粹是蘇聯的分行。蘇聯代表試圖通過這家合營銀行打入南斯拉夫經濟的心臟，也即蘇聯機關把南斯拉夫的中央財政信貸機關控制在自己手中。鑒於南斯拉夫實行了國有化和通過銀行的統一的財政制度，他們經由這家銀行就可以從一個中心完全主宰南斯拉夫的經濟並按照自己的意志使南斯拉夫的經濟屈從於他們的需要。

按照蘇聯的建議，南蘇銀行應當辦理以下業務：

（一）爲所有南蘇合股公司辦理信貸、結算和現金業務；

（二）蘇南間商品流通中的全部結算業務；

（三）辦理本國銀行辦理的其他各種銀行業務。

銀行的資金來源應爲：

（一）爲數二億第納爾的股份資本；

（二）合營企業存入銀行的資金；

（三）向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人民銀行提取的信貸。

我們的談判代表立即覺察到這樣一個銀行可能對我們的經濟造成多麽有害的後果。各個合營公司遍佈最重要的經濟部門，而這意味着涉及幾乎整個經濟，這樣合營銀行通過信貸和財務就完全可以對南斯拉夫經濟發號施令。再之，南斯拉夫在財政和外滙方面的主權也會受到嚴重侵犯，因爲進行國際上的結算被認爲是享有主權的政權的特權，而這是由專門的、受權從事這項工作的合營機構來做的，在這樣的機構裏俄國人有主要發言權。

南斯拉夫的經濟就會慢慢地越來越依賴這家銀行，因爲俄國人在這家銀行裏可以迅速地達到主宰一切的地位，因爲正如原先預料的那樣，在一段時間內，南斯拉夫同蘇聯的商品流通將是負債的和交易額很大的，這樣銀行在清算上將有較大量的債務，這意味着增加它可動用的資本和加强俄國的地位。

此外，在這個負債額的範圍內，這還會加强它的信貸活動，通過它作爲南斯拉夫第二個自動的信貸來源的業務，南斯拉夫本國的貨幣發行局的信貸政策的獨立性有可能因此而喪失。根據第三項授權，這家銀行可以在南斯拉夫同任何一方辦理任何銀行業務，因爲擬議中的協議對此沒有任何的限制。這樣一來，它就可以掌握更多的資金，這使它能够在南斯拉夫經濟中參與一切活動。它得到的是同南斯拉夫銀行一樣的權利，但是鑒於它的特殊的財力，它就有可能在一切銀行業務方面成爲國內最强有力的競爭者和發號施令者。

這一切由於是通過組織結構規定下來的，再借助於銀行總經理——他是蘇聯公民——享受特權

的地位，不受阻礙地付諸實現。

不僅蘇聯提出的建立合營生產公司的建議，特別是還有成立合營銀行的建議，向我們的談判代表們揭示，俄國人實際上向我們提出的是一項使人完全陷於包圍的計劃，根據這項計劃，我國將喪失經濟上的一切獨立性，也就是說，不能自由地發展本身的潛力。

這樣，我們年輕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充分獨立和自由也就會被永遠束之高閣。

了解真相令人痛心

上面談到了蘇南兩國代表團在嘗試建立生產合營公司時進行談判的一些事實。今天的青年讀者可能有點迷惑不解，可能會提出問題，爲什麼在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當蘇聯代表提出這樣的歧視性要求的時候，不作出更爲堅決的反應。

原因是多方面的。應當考慮到我們當時總的國際處境。同美國和英國這兩個西方大國的關係十分緊張。一九四五年圍繞的里雅斯特發生的衝突，然後是擊落不顧南斯拉夫方面多次抗議照會，未經我方允許，蓄意飛經我國領土的美國飛機，一九四六年巴黎和會上美國代表團對南斯拉夫的要求的不諒解，對南斯拉夫政治流亡者的公開支持，這一切都使南斯拉夫同華盛頓的關係惡化。同倫敦的關係也一樣不好。

其他的國際問題也没有得到解決。使斯洛文尼亞人統一成一個國家這個久遠而深重的創傷遠没

有彌合，這個美好的夢想和希望遠沒有實現。同意大利和奧地利在進行爭奪邊界的頑强鬥爭。馬其頓人的局面更爲艱難。他們被分成三個國家，有的根本不承認他們是馬其頓人。

在這樣的情況下，根本不可能指望同西方進行任何合作，來解決南斯拉夫的工業化、向南斯拉夫人民軍供應現代化武器以及建設我們自己的軍事工業等問題。

因此，對於我們來說，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就成了抵禦來自西方的壓力的唯一希望；我們把那裏看成是進行投資以發展我們自身經濟可能性時得到援助的唯一可能的地方。

而我們還生活在游擊隊田園詩般的氣氛中。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中間，在他們的歷史上，第一次開始實現平等和兄弟般合作的關係，因此我們同時也把蘇聯看成是世界上維護各國人民之間的這一真理的主要捍衛者。

這是一種特殊的心理狀態，高於普通的信仰的心理狀態，幾乎是某種失神銷魂的狀態，絕大多數老游擊隊員都不允許觸動它。我本人也經歷過這樣的情緒的不同階段。我有一個親戚，叫帕夫萊，是貝爾格萊德大學已故的教授米蘭·基切韋茨的兒子。帕夫萊，作爲一個十來歲的孩子，記得一九四〇年，記得莫沙·皮雅杰（後者一九四〇年曾到他父親的住處起草黨的報告），記得愛德華·卡德爾（後者是在他們家裏迎來一九四一年四月六日對貝爾格萊德的轟炸的），一句話，帕夫萊從小就熱愛革命者和游擊隊員。

一九四六年，蘇聯足球隊首次來我國訪問，我想是軍隊球隊，是紅軍中央俱樂部球隊。我把帕夫萊帶去看比賽。帕夫萊爲我們的球隊加油，我爲蘇聯隊加油。散場後，帕夫萊回到家裏，開始對姐妹們敘述：

「嘿，你們看看俄國人踢得有多低級，他們跳起來，衝着我們的運動員的肚子踢，發邊綫球時，他們偷偷地走近兩三公尺，裁判不管他們……簡直是無賴……好的運動員是不幹這種事的……」

我簡直氣得發瘋，惡聲惡氣地責備帕夫萊。儘管孩子說的是真情實況，但是這刺痛了我，我認爲這只是一個例外，這一例外令人痛心地粉碎了我的田園詩，打破了革命和戰爭最艱難的日子裏這些年來支撐着我的那神聖的東西。我簡直是衝着可憐的孩子大吼大叫，他怯生生地望着我。

一個人生活在這樣的精神氣氛中，是很難合乎理性地作出判斷的。斯大林本人，作爲一個老練的心理學家，他是了解南斯拉夫革命者和全世界的革命者的這種精神狀態的，他們把蘇聯看得非常崇高。他對於這樣一類人還有一個專門的字眼，叫做「正直的傻瓜」，有一個晚上，他在自己的別墅裏就是這麼對我們的一個游擊隊代表團說的。

再有就是斯大林的陰險的手法。這正是促使我們誤以爲有可能同蘇聯進行平等的經濟合作的重大原因。儘管現在有許多歷史事實使人得出結論，斯大林不僅是對南斯拉夫，而且也是對其他東歐國家提出的所有這些合營公司計劃的思想上的制訂者。戰後頭幾年，游擊隊員中間有一種看法認爲，「在莫斯科，源頭的水是清純的」，也即認爲斯大林是正直的，只是蘇聯龐大的官僚機構向南斯拉夫人提出了顯然不符合社會主義精神的合營公司建議。

一九四六年春天，在鐵托訪問莫斯科時，斯大林曾詳盡地問及經濟上的聯系和談判，問及合營公司。當時他說：

「我們的人向我們報告說，你們搞經濟問題的同志認爲，你們不同意組織合營公司。」

鐵托回答他說：

「不是，這不是我的意見，也不是南斯拉夫其他領導人的意見。我們認爲，有可能建立公司，當然，是指有助於我國實現工業化的那種公司……」

莫洛托夫再次證實了斯大林的話，說應當在對你們和對我們都是最有利的那些部門裏建立合營公司！

但是，在一九四七年三月，情況表明，關於合營公司的談判進行不下去時，斯大林在同卡德爾同志會晤時親自表示，合營公司適合於衛星國。

卡德爾事先向他談了談判的經過，並明確地表示：

「……從政治的原因，以及從物質的原因，我們不能夠接受你們代表團的建議……」

對此，斯大林說，這樣的公司不適合於南斯拉夫，適合於站在希特勒一邊的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其他國家，他建議向南斯拉夫提供信貸投資：

「要是我們根本不組織合營公司，而是援助你們，給你們一座煉鋁廠，幫助你們開採和加工石油，怎麼樣？同南斯拉夫這樣的盟國和友好國家，通過合營公司來合作顯然不是一種好的方式。這麼做，總會有爭吵，總會有分歧，在某種程度上，國家的獨立也會有損害，友好關係會遭到破壞。這樣的公司適合於衛星國。」

斯大林的態度使我們感到鼓舞，使我們陶陶然滿懷希望，使我們確信，他是公正的，蘇聯的官僚在自行其是。斯大林有了兩個合營公司，這使他獲得了民用航空和河運方面的壟斷權，因爲他看到，南斯拉夫人不會同意建立他們所建議的那樣一種性質的公司。因此他慷慨地提供了一億三千五百萬美元的信貸投資。其中，向南斯拉夫總共只提供了價值八十萬美元的設備，在爆發了公開的衝

突之後，就正式廢除了這項投資協議。

事實上，斯大林耍了一大花招。他欺騙了我們。他看到，通過合營公司來征服南斯拉夫是不會得手的，因此他立即制訂了另一個、更爲危險的方案——公開攻擊南斯拉夫。同時，爲了爭取時間，他一再説些花言巧語。

願上天寬恕我有瀆神的想法，但是現在，當我從這一角度，以這一番經驗來看待這些事件時，我得出結論：他算不上有多少別出心裁。本世紀初的美國總統、那位令人起敬的西奧多·羅斯福，當美國的海軍陸戰隊替這家或那家美國公司征服中美一些國家時，就曾説過：

「任何時候都不要用語言來威脅，總是輕輕地説話，但是在背後準備好棍子！」

斯大林和我國革命

一九四五年當新南斯拉夫戰勝敵人（説真的，還有朋友）製造的種種困難成立共和國時，細心的觀察家可能會斷言，蘇聯方面在竭力通過特洛伊木馬計來掌握住新的國家組織。

這首先表現在試圖施加影響，使新的國家盡可能仿效斯大林時期的蘇聯的樣本。他們竭力想在國家和黨的關鍵性職位上找到「自己的人」，不論是通過政治上拉攏人也好，還是通過蘇聯在南斯拉夫的情報機構招募也好。

有些東歐國家戰時没有强大的抵抗運動，也没有革命的變革，隨同蘇軍一起從莫斯科來的是完

整的傀儡政權。它們有固定的工作計劃，是按照一個模子給一切國家準備的，沒有區別，它們還有固定的工作方法。

然而，在南斯拉夫，革命形成了特殊類型的人民政權。這一新政權的特點之一是，它是建立在羣衆廣泛的首創精神基礎上的。

這也是革命成功的基本條件。羣衆的這種首創精神產生了衆所周知的特殊性，各族人民在聯邦制基礎上的平等，開創了過去分裂成幾個國家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實現民族綱領的前景，使生產資料實現了社會化，婦女享受平等，青年充分參與社會的生活。例如，在絕大部份游擊隊裏，十八歲以下的青年男女佔全體戰士的百分之八十。我們的革命完全可以說是青年的革命，無所畏懼，懂得去實現到昨天看來還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同蘇維埃制度的代表的最初的一些直接會晤却使人產生了奇怪的情緒。一方面，對於我們終於會晤了感到高興，隨後，又由於一些在我們看來是格格不入的，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做不出來的行徑而突然感到震驚。

在一九四四年十月的貝爾格萊德戰役中，我欽佩蘇聯的軍人，欽佩他們的勇敢。同時，有一件事却使我愕然。有一輛坦克開進了阿瓦拉山下的一座村莊，一個蘇聯軍人跳了出來，要農民給他一桶白酒，而他將守信用，給農民一桶汽油。農民給了酒，這個俄國人也守信用地從坦克上取下一桶汽油。我們的一位同志，看到這一場面，跳到坦克上，用俄語對這個俄國軍人說：

「你這位偉大的解放者紅軍的兒子，怎麼做出這樣的事情來，這是同紅旗不相稱的……」

俄國人平靜地看着他，在鑽進坦克前平靜地回答他說：

「嗨，你的腔調像一九四一年的那些政委，他們要是管用的話，斯大林同志是不會把他們打發走的……」

一九四四年二月抵達最高統帥部的蘇聯第一個軍事代表團也帶來了類似的失望。本來指望它首先會提出戰爭的戰略和策略的問題或諸如此類的事情，而他們却慢條斯理地詢問我們是否有政治警察，建議我們取消他們所謂的我們的人民游擊隊裏的「平均主義」，建議實行更加嚴酷的紀律，最後建議一切實行集中，一切集中於一個中心。一句話，他們對於不是按照蘇聯的公式辦的一切都感到討厭。

解放後，建立了正常的外交關係，來了蘇聯顧問，這時，新南斯拉夫的國家結構必須是蘇聯的翻版這種傾向就表現得更爲突出。

我決不是想說，唯有斯大林要對我們解放以後所犯的一切中央集權的、非民主的偏差負責。在我們的羣衆發揮自我首創精神這一深刻的過程中，還在戰鬥最激烈的歲月裏，就出現了各種不健康的傾向的苗頭。我們的新社會也不能免於出現新的矛盾。看一看人民解放戰爭文件集，看一看最高統帥部的各種命令，一些中央委員的報告和信件，就可看到，對不民主、官僚主義的專橫霸道、利己主義以及其他類似現象提出了批評。

當戰爭臨近結束時，當我們「從黨變成了國家」時，當數十萬懷有各色偏見的農民、市民加入了游擊隊時，事情就變得更爲複雜。但是，羣衆的自我首創精神這一革命和推動革命前進的前提，是抵禦這些現象的最好的防綫。

一九四四年底和一九四五年大量來到我們這裏的蘇聯專家，施加了自己的影響，其中很大一部

份施加的是反面的影響。他們堅持要對羣衆發號施令。

特別使他們刺痛的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享有平等權利。在他們看來，這簡直是眼中釘，肉中刺。而這却是一九四五年的南斯拉夫在本質上不同於蘇聯的事實之一。蘇聯代表，從最高級到最基層，開始展開活動，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中間製造不信任和分裂，他們硬是說什麼塞爾維亞人作爲南斯拉夫最大的一個民族應當像俄羅斯人在蘇聯一樣起領導作用。

莫斯科要求，新南斯拉夫國完全按照蘇聯的模子來建立。關於此事，我們的檔案裏有不少文件。這裏我謹援引一個文件，很能說明問題。例如，蘇聯大使薩契科夫給我們領導帶來口信說：「不必建立單獨的塞爾維亞共產黨，因爲塞爾維亞人在人數上在南斯拉夫共產黨內也是佔據壓倒地位的。」

蘇聯官僚宛如害怕瘟疫似地害怕南斯拉夫的各族人民享有平等權利的榜樣。如果這一原則在新南斯拉夫牢固地確立下來了，對於蘇聯和多民族的東歐國家來說，都將是一個有感染力的榜樣。

這也使斯大林傷腦筋。例如，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一次晚宴上，鐵托、蘭科維奇、基德里奇、科查•波波維奇、奈什科維奇和弗拉多•波波維奇都參加了，午夜過後羣情歡融，斯大林開始就誰是哪個民族的人挖苦人，特別針對基德里奇。據基德里奇後來告訴我，斯大林對他說：

「斯洛文尼亞人，我是一個純粹的塞爾維亞人！」

基德里奇舉起自己的酒杯說：

「而我是一個純粹的斯洛文尼亞人！」

斯大林接着說：

「斯洛文尼亞人，你打死了多少個斯洛文尼亞資產階級？」

「只打死了最必須打死的，一個不多，一個不少！」

主人喝醉時的想法，清醒的奴僕就予執行。蘇聯大使拉夫倫季耶夫在塞爾維亞族的一些同志面前，向他們灌輸這樣一種「理論」：基里爾字母不在整個南斯拉夫推行，簡直是醜聞。

一九四五——一九四八年間，蘇聯在我們這裏的影響無疑是强大的，甚至在我們第一部憲法裏都留下了痕跡，特別是就形式而言，在基本範疇、政府和議會的關係、選舉等方面留下了痕跡。中央集權的成份超過游擊隊時期以及其他類似的官僚主義傾向，無疑同蘇聯的影響有關。然而，就憲法的內容而論，尤其是就政治生活這部不見諸文字的憲法的實踐而論，仍然感覺得到革命的精神：不能撇開羣衆的意志和願望來治理。

蘇聯和新南斯拉夫之間的衝突的一大原因也就在於這裏。

經濟封鎖開始實行

上幾節，我們概述了南蘇衝突的原因。從上幾節可以看到，斯大林一直在奉行要使南斯拉夫順從的政策，最終意圖是把南斯拉夫納入自己的體系，就如他把其他所有東歐國家納入了自己的體系那樣。

一九四八年二月初，他認爲條件成熟了，可把南斯拉夫作爲實際上獨立的國家消滅了。

這就是所謂的「悄悄地扼殺」的回合了，當時斯大林以最後通牒式的口吻通知南斯拉夫代表卡德爾、吉拉斯和巴卡里奇，要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立即組成聯邦。鐵托和季米特洛夫早在戰時就曾希望兩國彼此靠攏，甚至建立一個南部斯拉夫人聯邦，但是我們的代表感覺到，在斯大林這一突然提出的要求的背後隱藏着別的東西。因此他們拒絕了這一要求，藉口說，這些問題只能由南共中央來解決。南共中央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開會，批准了南斯拉夫代表們的態度，拒絕了同保加利亞組成聯邦的要求。這樣，斯大林的第一次攻勢就以失敗告終。

稍後才獲悉斯大林提出同保加利亞組成聯邦這一要求的真正意圖，一位可靠人士——我作爲歷史學家是相信他的——向我證實，克里姆林宮在那個二月的晚上到底在幹什麼。

當時，斯大林想的是，把包括南斯拉夫在內的所有東歐國家都劃到蘇聯境內來。準備分兩個階段來實現。在第一個階段，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應組成一個聯邦，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組成另一個聯邦，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組成第三個聯邦。在下一個階段，這三個新的國家單位同蘇聯合在一起。

斯大林出於什麼樣的動機打算這麼做，國際和國內有哪些因素對他施加了影響，對此，只有歷史才能作出答覆，只有蘇聯的檔案也公諸於世，才能作出答覆。

但是，可以肯定地斷定的一點是，南斯拉夫一九四八年二月的堅決態度使斯大林的這些計劃全都受到挫折。但是他立即開始策劃進一步的措施，以制服叛逆的南斯拉夫人。他決定，在新的形勢下採取兩個行動。他認爲，這兩個行動將成爲足够强大的壓力，足以實現他的目的。這就是大國在制服不聽話的國家時喜歡使用的手段：經濟封鎖。

關於蘇聯一九四八年初首批經濟封鎖措施，外貿部部長助理博格丹·茨爾諾布爾尼亞①給我寫了一份備忘録，這裏我從中引述主要的材料。

一九四五年以後，蘇聯和南斯拉夫之間商品的交換有了大發展。俄國人堅持商品的交換根據所謂的世界價格來進行。我們的一些同志對此感到憤慨。他們認爲，在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中按照世界價格來進行貿易是不對的，因爲這樣的話，不發達國家，具體説就是南斯拉夫，處於不平等的地位，因爲由於勞動生產率低，不得不向比較發達的國家，具體説就是向蘇聯，提供超額利潤。

在交換的結構方面，也有一些意見。俄國人特別堅持要我們向他們提供我國没有多大困難就可在國際市場上推銷出去的主要產品。這裏首先是指有色金屬、各種礦石、大麻、酒花。例如，在一九四八年我們對蘇聯的出口中，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是礦石和金屬，儘管這佔我們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

在一九四八年以前，我們由於對蘇聯無限信任，我們忘記了那古老而英明的格言：不要把所有的蛋全都放在一隻籃子裏。一九四七年，南斯拉夫從東方集團各國的進口佔全部進口的百分之五十六，同時對它們的出口佔南斯拉夫出口的百分之五十三。

我們没有料想到斯大林在給我們預備什麽，十一月份末還得出結論，認爲同蘇聯的交換還應擴

---

① 博格丹·茨爾諾布爾尼亞（一九一六— ），一九四一年加入南共，一九四一年參加人民解放鬥爭，歷任旅長、副軍長等職。戰後任外貿部長助理、外交部長助理、副外長、共和國總統秘書長等職，現爲南駐美大使。——譯者

大，爲此目的，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初，茨爾諾布爾尼亞被派往莫斯科。

他一直等到一月二十日，蘇聯外貿部長米高揚才接見吉拉斯、弗拉多•波波維奇和他。吉拉斯說，南斯拉夫打算擴大同蘇聯的貿易。米高揚在會見結束時說，蘇聯政府同意着手談判，同意簽訂一九四八年全年的議定書以及同意大大擴大交換。

然而，斯大林在二月十日向卡德爾、吉拉斯和巴卡里奇提出了關於同保加利亞合併的最後通牒，爲我們所拒絶。隨之而來的是以經濟封鎖相威脅的第一步。二月二十二日，蘇聯外貿部向茨爾諾布爾尼亞表明，他們不願談簽訂新議定書，説南斯拉夫不能指望擴大金屬、石油和棉花的交換。而在二月二十六日，則以蘇聯政府的名義向他宣佈了此事。

在作此宣佈後，他只好回國。一場大賭博就開始了。經濟上的壓力變成了封鎖。蘇聯政府以這一談判把我們整整蒙騙了三個月，從十二月一直到二月底。而我們什麼措施都没有採取，完全没有採取措施來向另一方面購買最重要的原料，因爲我們本來以爲可以從蘇聯得到這些原料。

我們這裏出現了可怕的危機。莊稼行將收割，石油的儲備只够十來天。棉花的儲備也差不多。

解放後不久，我們就接受了蘇聯的一些民用和軍事專家。從頭幾天起，在他們和我們的人之間就出現了分歧。蘇聯專家想盲目地照搬蘇聯的經驗，不考慮我們的特殊情況。蘇聯專家曾向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檢察長建議，在一九四五年在南斯拉夫設立秘密法庭，專事審判共産黨員。對於認爲不能在南斯拉夫設置這樣的法庭，人民會對此表示憤慨，黨員會羣起而攻之這樣的看法，蘇聯專家却援引斯大林的話來説服！

飽里斯·基德里奇那裏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他對自己的工作人員說，到蘇聯專家那裏去，聽他怎麽說，把他說的一切都記下來，而回來以後，則按照自己的健全的頭腦行事。

在文化和科學部門，蘇聯專家的行徑往往顯得南斯拉夫似乎是一個文化上完全不發達的國家，是按照蘇聯意識形態和文化生活的頭子安德烈·日丹諾夫的精神行事的，他有一次在克里姆林宮同我們的一些領導人談話時表示詫異，問道，南斯拉夫有沒有歌劇？

軍事專家本可以對軍隊有很大幫助，但是他們在那裏也照搬蘇聯的公式。我們的人說，紅軍的確有大量經驗，但是决不應當低估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學到的東西，拋棄我們的經驗，盲目模仿紅軍只會有損於我軍的發展。

早在一九四六年鐵托同志就曾通知蘇聯政府，我們出於財政上的原因不得不減少蘇聯軍事專家的數目。蘇聯軍事專家的薪金比我們的集團軍司令的餉金高三倍，比我們的聯邦部長的工資高兩倍。

關於專家問題，斯大林一直在等待。斯大林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接到通知說，我黨中央拒絕了他提出的同保加利亞合併的最後通牒，他就下令布爾加寧通知我國政府，定於三月十八日撤退全部蘇聯軍事專家，而一天以後，斯大林的撤退全部民用專家的命令也送達了。

一九六二年某個時候，在中國和蘇聯聯系都很廣的英國工黨左派科尼·齊利亞庫斯對我說，蘇聯政府通過在經濟聯系上進行打擊，一夜之間揭開了同中國的衝突。蘇聯專家全部撤走，停止了對中國工業項目的投資。打擊是嚇人聽聞的，中國的整個工業化陷於危險之中。

從另外幾方面也向我證實了齊利亞庫斯的這番話。這使我回想起一九四八年，回想起那艱難的歲月，當時我們没有汽油，没有石油，没有棉花，完全孤立無援，四面受敵。

第四章　衝突公開化

在那命運攸關的一九四八年春天，爭端的雙方——蘇聯和南斯拉夫在許多方面處於不平等的地位。尤其是雙方的精神狀態是不一樣的。

在今天看來，這是一清二楚的，好比二加二等於四，但是在那些艱難的日子裏，事情看來並非如此。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這場衝突使得全體南斯拉夫人，特別是共產黨人，陷於名副其實的混亂之中。大家都在問，這怎麼可能呢？是否發生了什麼誤會？或者有某種嚴重的陰謀。人們的情緒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都有，有人作最暗淡的預料，有人還在發瘋似的指望爭端總會得到平息。

而在另一方面，在克里姆林宮裏，是斯大林，他完全知道，他希望達到的是什麼，他通過自己龐大的機器冷靜地採取行動，以使一個小國盡快屈膝臣服。

一九四八年三月中，他給予了新的打擊。他決定把衝突公諸於世，也就是讓南斯拉夫的黨員知道他對南斯拉夫國家和黨的領導的指責，並同樣把這些指責擴散到世界各國共產黨裏去，以便讓各國共產黨從自己方面向南斯拉夫人施加壓力，讓南斯拉夫人對自己的罪過表示懺悔。

斯大林決定，在三月二十七日把他的第一封信交給我們。在選擇向南斯拉夫人提出各項最後通牒式要求的日期上，斯大林玩弄了某種奇怪的手法。他在整個衝突中犯了一個大錯誤，就是在許多方面低估了對方，硬把一些並非是對方的特點歸之於對方。例如，他相信我們迷信，認爲我們的人過分束縛於農村，過分固守農村的保守傳統。因此，他爲第一封信選擇了三月二十七日這個在南斯拉夫歷史上重要的日期，因爲在那一天發生了反對親希特勒的茨韋特科維奇——馬切克政府的暴動。斯大林是不是也指望這個新的三月二十七日會引起南斯拉夫人反對鐵托政府的騷亂？他在自己的信裏甚至懷疑鐵托政府曾同佔領者勾結。

斯大林還選擇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作爲發表向全世界宣判南斯拉夫爲叛徒的共產黨情報局決議的日子，這正好是「塞爾維亞王國垮台」的科索沃之戰紀念日。對共產黨情報局第二個決議，他決定發表日期爲十一月二十九日——新南斯拉夫國慶日、南人解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紀念日。

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七日的信中，斯大林粗暴地先回答了同專家、專家的撤走有關的一些具體問題，隨後就提出了一些比較重大的問題：

（一）「我們知道，南斯拉夫領導同志中間流傳着反蘇言論，例如說『聯共（布）黨在蛻化變質』，『在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盛行』，『蘇聯想從經濟上把南斯拉夫佔爲己有』，『共產黨情報局是聯共（布）黨制服其他黨的工具』，等等。這些反蘇言論通常還用左的詞句加以掩飾，說什麼『社會主義在蘇聯已不再是革命的了』，『只有南斯拉夫是革命的社會主義真正的體現者』。當然，從吉拉斯、伏克曼諾維奇、基德里奇、蘭科維奇及其他一些面目可疑的馬克思主義者那裏聽到關於聯共（布）黨的類似故事，是令人發笑的。」

信件就這一點斷言，托洛茨基用的就是這樣的方法，緊接着就威脅說：

「我們認爲，托洛茨基的政治命運是頗有教益的。」

（二）在作了這番防禦後，斯大林轉入進攻，他硬說什麽：

1. 南共還沒有合法化，還處在半合法狀態。

2.「在南共的生活中感覺不到黨內民主。黨的中央委員會大部份不是選舉產生，而是遴選的。黨內不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或者幾乎不展開。富有特徵的是，黨的負責幹部問題的書記是國家安全部長，換言之，黨的幹部被置於國家安全部長的監視之下。」

3.「在南斯拉夫共產黨內感覺不到階級鬥爭政策的精神。農村以及城市裏的資本主義成份正在全力增長，而黨的領導沒有採取措施來限制資本主義成份。南斯拉夫共產黨醉心於從伯恩斯坦、福爾馬①、布哈林那裏借用來的資本主義成份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腐朽的機會主義理論。」

（四）②斯大林十分討厭南斯拉夫革命的廣泛性，因此他全力打擊人民陣綫：

「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黨被認爲是國家基本的領導力量，黨有自己的特殊綱領，黨不是消失在非黨羣衆中。在南斯拉夫恰好相反，人民陣綫被認爲是基本領導力量，並竭力使黨融化於人民陣綫。」

（五）在信的最後，斯大林使用了他在對蘇聯的老布爾什維克的審訊案中屢試不爽的方法，污

---

① 指喬治·福爾馬（一八五〇——一九二二），德國社會民主黨機會主義派首領，改良主義思想家。——譯者

② 原文如此，此處缺（三）。——譯者

蔑他們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對於南斯拉夫全體居領導地位的共產黨人，他都如此污蔑，在這封信裏他首先拿弗拉特科·維萊比特開刀。維萊比特是第一個對他提出意見的人，因爲維萊比特早在一九四六年就指出蘇聯關於建立合營公司的建議具有剝削性質。

在這封信的第二十一行中，斯大林罵維萊比特是「英國間諜」。顯然，弗拉特科·維萊比特一九四六年的態度擊中了他的要害。

關於蘇聯大使拉夫倫季耶夫如何把第一封信交給了鐵托同志一事，我曾在《約瑟夫·布羅茲·鐵托傳略》中描述過。這裏我謹提供我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五日在布里俄尼島同鐵托同志就此事進行的一次談話，我曾把這次談話記在《書中之書》內。這次談話對歷史來說之所以重要，是因爲它包含有迄今尚不爲人所知的一些事實。鐵托同志說：

「第一封信是在薩格勒布的圖什卡納茨，拉夫倫季耶夫在大使館參贊——一個內務人民委員會工作人員，後來成了代辦——的陪同下交給我的。他們兩個人走進房間，我從外表看出，他們準備對付某種重大的事情。他們把信交給了我，我們都站着，因爲我没有請他們坐下。我自己也站着，我看着信，一隻手撑在桌子上。我看了頭幾行，就覺得我遭了雷擊似的。而拉夫倫季耶夫和另外那個人只是盯着我，看我作出什麽樣的反應。而我連眼睛都不眨一下。我盡我所能，盡量克制住自己。而他們一直直盯着我的眼睛。當我匆匆把幾頁都看完了，拉夫倫季耶夫克制不住了，問道：

『我們什麽時候得到答覆？』

『我們要研究這封信。』

我揮了一下手，表示會見結束。他們走出去了。

我立即坐下來打電話，把卡德爾、吉拉斯、蘭科維奇和基德里奇叫來。我立即開始草擬我們的答覆，兩小時後，我已草擬好了。

我特別感到遺憾的是，這個答稿的最後一部份在中央的會議上（會議是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二日舉行的）未被採納。我在這部份裏明確地寫道，他們想要的是我們的國家，他們侈談意識形態問題是爲了替對我們施加壓力辯白。我在這部份裏明確地談到到底是怎麼回事，談到我們不應該去討論理論問題，而應在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問題上接受鬥爭。俄國人只想同南共，不想同全體人民打交道。

在中央全會上，在俄國人的壓力下，許多同志都不知情。

俄國人在第一封信交來的前夕，常常在我周圍試探，看看我們將作出什麼樣的反應。尤金在第一封信交來前七天來過，要求爲他的報紙寫文章。實際上，他是想從我身上撈點東西，看看我是怎麼對待一些事情的。

拉夫倫季耶夫來過，甚至還威脅說：

『我們有更大的傢伙』。」

斯大林以爲，憑藉三月二十七日信件以及後來致南共中央的其他信件中提出的指責，他能吸引住大部份南共黨員並推翻南斯拉夫的政權。

儘管這些信上寫有「機密」字樣，蘇聯代表却在南斯拉夫，以及如我們以後所看到的，還在國外開始大量散發。

他依靠的是南斯拉夫的哪些「健康力量」？從他的方面來說，有多方面的盤算：首先，他試圖破壞南共中央的團結。鑒於吉拉斯發表過談斯大林的文章，早在一九四四年，他們在莫斯科會見時，他就很注意吉拉斯。但是，這一行動沒有產生結果。接着，在三月二十七日的信件中，他竭力想把四個「可疑的馬克思主義者」——吉拉斯、蘭科維奇、基德里奇和伏克曼諾維奇——同鐵托和卡德爾分開。但是，這也沒有得逞。後來，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四日的信中，他試圖在鐵托和卡德爾之間打入一個楔子。還在以前，在鐵托一九四六年訪問莫斯科時，貝利亞裝做喝醉了，表示信任地悄聲對鐵托說，不要相信周圍的任何人。

其次，據斯大林有一次對鐵托同志說，他認爲南斯拉夫共產黨人是一些正直的傻瓜。這是他用來形容不僅是南斯拉夫的，而且是所有其他國家的革命者所用的字眼，而他們却是用某種神秘的眼光看待蘇聯，從心底裏把他看成是一個主持正義的人和一切被壓迫者的領袖的。

斯大林對南斯拉夫領導的攻擊和誹謗，使得南斯拉夫許多共產黨員陷入嚴重的內心矛盾狀態中。還沒有人描寫過這種精神上的痛楚。這裏還含有希臘悲劇的成份——兩種責任感的衝突：一方面是對莫斯科這個第一個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首都的責任感，另一方面是對本國社會主義革命的責任感。

斯大林在利用人們的弱點。南斯拉夫有一些共產黨人由於這個或那個原因而心懷不滿。蘇聯情報機關注意地注視着這一切，一有機會就接近這些人，以便在爭奪南斯拉夫的大門爭中加以利用。

對於別的一些人，則是提出別的口號來接近。例如，在南斯拉夫有許多俄國僑民，他們是在弗蘭格爾一九二二年垮台以後避到我國的。他們中大多數人受到我國人民的良好接待，這些人也以自

己的文化和知識促進了東道國的進步。誠然，他們中間有少數人未能放棄自己的反共立場，因此在戰時站在德國人一邊，甚至組織了專門的隊伍，參與對游擊隊發動的攻勢。弗拉達·澤切維奇神父有一次敘述說，在那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可怕的冬季攻勢中，塞爾維亞西部的游擊隊都被打散了，敵人方面最頑强的正是那些「白俄」——他就這麼叫他們。

「全都是老傢伙了，向我們進攻時一拐一拐地走，但是一直打到最後一顆子彈！」

當蘇聯代表來到我們這裏時，他們就相繼開始招募所有的俄國僑民。他們抓住有些人過去的罪行，脅迫他們說，要向我們的當局告發。而對於有些人，則乾脆提出一般的愛國主義口號，說他們是俄國人，不論他們在哪裏，他們的職責是聽從俄羅斯國家。

總的來說，蘇聯情報機關在戰後的頭幾年的工作是十分刻板的，也可以說是不聰明的。看來，有些情報人員送回去的不是他們所聽到的或者所看到的情況，而是他們認爲上司要他們送回的情況。使用這樣的方法，不可能有嚴肅的工作，斯大林對南斯拉夫局勢的錯誤估計，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在南斯拉夫的情報機關這樣的工作的結果。

而這種方法本身就是怪誕荒唐的。我在一個地方曾記下這樣一個情節：

一九四三年秋天，從蘇聯空降了一批人，他們來到了當時設在亞伊策的我們的最高統帥部，他們中間包括保加利亞人什特里尤·阿塔納索夫—維克托，他的任務是經由我們解放區進入保加利亞。這樣，他在一九四四年初就隨同我們一個師的司令部到達了桑賈克。

他們在桑賈克一個落後的小村的一位年老的穆斯林家裏過夜。大清早，司令部的成員聽見這個保加利亞人正同那位老農民在下面，在牲口厩裏吵架。他們明白了是怎麼回事。保加利亞人壓低了

嗓門，但是嚴厲地衝着那位老農民嚷道：

「簽字，簽字……」

後來，那位年老的穆斯林向我們的人訴說：

「你們那個軍官硬要我在一張紙上簽字，我不想簽。我担心是什麼票據……」

事實上是，那個保加利亞人是蘇聯的情報人員，他想在桑賈克這個荒僻的村莊裏招募這個年老的穆斯林，讓他在替（蘇）內務人民委員會工作的保證書上簽字。

蘇聯各種代表團一抵達，不僅在桑賈克，而且在南斯拉夫全國都這麼做。斯洛文尼亞人對這類事十分警惕。

解放以後，拉人替蘇聯情報機關效勞搞得更兇。蘇聯情報人員像黃蜂似地飛向軍隊、經濟部門、中央機關，湧向對他們有重要意義的一切地方，他們甚至想把中央委員會的一位主要密電譯電員拉下水。

一九四八年春天，來自莫斯科的這些死魂靈獵取者幾乎對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做了工作，想分裂我們，想輕易地制服我們。

有一天，蘇聯新聞局的代表基爾薩諾夫來到中央鼓動宣傳部我的辦公室。他是一個身材矮小的人，穿着莫斯科的那種短外套和寬褲腿褲子。他腋下夾着一張地圖和一捆供我們報紙用的文章。這些文章是在莫斯科寫成，供我們的報紙用的，談的是蘇聯、集體農莊和形形色色的俄羅斯作家的生辰和忌日紀念日。基爾薩諾夫首先拿出一張這些文章的清單。總共有兩百多篇文章。

「請你把這些文章在南斯拉夫報紙上發表。有些報紙不大願意發表蘇聯的文章。例如……」

基爾薩諾夫又拿出另一張紙，上面有精確的統計，哪家報紙發表了幾篇這種在莫斯科寫成的文章。他把這張紙放在桌子上，放在我面前，眯着眼睛望着我，等我回答。

我看了一眼長長的文章清單，對基爾薩諾夫說：

「好呀，但是我們要是把這些文章都發表的話，我們的報紙就没有什麽別的東西可以寫的了。我們畢竟是南斯拉夫的報紙。我們談南斯拉夫的社會主義，也就是談蘇聯。」

基爾薩諾夫明白了，在我的身上没有油水可撈。從此以後，他再也不來了。

我黨中央對莫斯科來信的回答是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三日，在南共中央四月十二日和十三日舉行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議之後作出的。在會上，蘇聯的所有指責都遭到駁斥，唯有聯邦政府財政部長斯雷滕·茹約維奇試圖爲莫斯科的來信辯護。

在同一次會議上，組成了一個三人委員會來審查斯雷滕·茹約維奇的態度和計劃委員會主席安德烈·赫布蘭的態度。他也表示擁護斯大林。有證據表明，斯雷滕·菇約維奇把他自己所作的南共中央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會議記錄交給了蘇聯大使拉夫倫季耶夫，在那次會上，卡德爾、吉拉斯和巴卡里奇報告了他們二月十日在莫斯科同斯大林的會見以及斯大林提出的要(南斯拉夫)立即同保加利亞組成聯邦的最後通牒式的要求。

由鐵托和卡德爾代表南共中央簽署的四月十三日對莫斯科的覆信，逐點反駁了蘇聯提出的指責。

這意味着接受斯大林提出的挑戰。

整整過了二十一天，斯大林才作答覆。在此期間，尤金的報紙——本來是共產黨情報局的正式機關報——《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在四月十五日一期上第一次公開批評南斯拉夫共產黨。的確，沒有用全稱，但是誰都明白，指的是誰。

在我們的邊界上，也不平靜。美國飛機再次示威性地飛越我們的領土。四月二十四日，蘇聯政府通知我們廢除關於我們兩國間進行磋商的協定，這項協定是卡德爾同志一九四八年二月在莫斯科簽訂的。

在莫斯科，我們的代表一再設法同以前通常是合作的蘇聯政治家和領導人接觸。但是，所有這些人，似乎是遵照命令，一概拒絕進行任何談話。我們的論點，他們根本不感興趣。只是聽說，聯共（布）黨中央正從各方面研究我們四月十三日覆信中論述的立場。到過南斯拉夫的蘇聯所有的專家和公民在提供有關我們的覆信中所談的一切，關於人民陣綫，關於黨的作用，關於農村的形勢等等的材料。

在那些日子裏，在緊張地期待明天早晨會給我們帶來什麼的時候，還發生了一些出人意料的情況。顯然，蘇聯的「黑色宣傳」起了作用。同我們保持接觸的一位蘇聯官員有一次告訴我們說，蘇聯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來信，是片面的情報的產物。

我們的一些同志認爲，對於蘇聯的批評，有些東西我們也該接受，倒霉的是各種旅店飯館、蔬菜攤水果店、小百貨店、小酒店咖啡館。一夜之間，全都被沒收國有！我的一位游擊隊時的摯友，還是一位高級領導人，在自己的家鄉舒馬迪亞講話時威脅農民說：

「是你們這些富農使我們同斯大林發生衝突……」

我後來對他說：

「不要挖自己的牆脚……在戰爭期間，在你的舒馬迪亞，是誰養活了我們？是誰給我們提供了游擊隊員？又是誰在你做地下工作時整整掩護了你兩年時間？」

但是，他連聽都不想聽，而是援引聯共（布）黨史上有關富農和加速實現集體化的必要性的話來回答我。

但是，在五月一日前夕，莫斯科傳來的消息，預示着情況不妙。（蘇聯）外國書籍出版社本來在準備出版鐵托同志言論集。開始這項工作時曾經說過，要盡快出版這本書。而現在，一個月過去了，這本書還毫無動靜。

別的出版社也完全停止翻譯南斯拉夫作者的作品或者蘇聯作者談南斯拉夫的某些書。中央報刊上關於南斯拉夫的消息僅限於最簡短的消息。《莫斯科布爾什維克》就蘇南條約簽訂三周年準備了一篇文章。文章已經得到了「簽證」，也就是說，已經獲准可以發表，但是在最後關頭，下達了命令，不讓發表這篇文章。

向蘇聯所有電台提供消息的全蘇電台委員會停止提供有關南斯拉夫的任何消息。

文學家菲利普·納謝特尼克在第二次訪問南斯拉夫回國後，在那些日子裏說，南斯拉夫人不再是一九四五年的南斯拉夫人了：

「一九四五年，南斯拉夫人十分讚賞和熱愛蘇聯，現在不再是這樣了。現在這些南斯拉夫人獨立行動，大叫大嚷，說他們現在也在建設社會主義，因此，他們認爲，他們現在同蘇聯平起平坐。」

蘇聯的答覆是在五月四日送達貝爾格萊德的。這確實是一次雷殛。誰也沒有料到，斯大林在提出指責上會走得這麼遠。

最使南斯拉夫感到驚愕和傷心的是，斯大林肆無忌憚地攻擊我們的人民解放鬥爭：

「我們認爲，南共中央政治局不準備體面地承認自己的錯誤並自覺地改正錯誤的基礎，在於南斯拉夫領導人的過分驕傲自大。他們在取得成績之後，頭腦發昏，他們自高自大，顯得什麼都不在話下。他們不僅變得驕傲自大，而且還宣揚驕傲自大，不懂得驕傲自大可能斷送南斯拉夫領導人。

列寧說：

『從前所有一切革命黨之所以陷於滅亡，就是因爲他們自高自大，而看不見自己力量之所在，害怕說出自己的弱點。而我們是不會滅亡的，因爲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弱點，並且能學會克服弱點。』

不幸的是，我們不得不指出，並非謙虛的和仍然被並不很大的成就冲昏了頭腦的南斯拉夫領導人，已經忘記了列寧的這個教導。

鐵托和卡德爾同志在來信中談到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功績和成就，談到聯共（布）黨以前承認這些功績和成就，而現在却對此保持沉默。當然，情況不是這樣。誰都不能否認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功績和成就。這是無可爭辯的。但是應當說，例如，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等國共產黨的功績和成就決不比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功績和成就小。但是，這些國家共產黨的領導人却表現得謙虛，對於自己的成就沒有大吹大擂，而不同於南斯拉夫的領導人，後者的過分的自吹自擂刺破了每個人的耳膜。

還應當指出，法國共產黨和意大利共產黨對革命所作的功績不是少於而是多於南斯拉夫共產黨。法國共產黨和意大利共產黨目前取得的成就不如南斯拉夫共產黨，這不能用南斯拉夫共產黨具有某些特殊的品質來解釋，而主要是因爲南斯拉夫游擊隊司令部被德國傘兵擊垮之後，正當南斯拉夫的人民解放運動經歷嚴重危機的時候，蘇聯軍隊援救了南斯拉夫人民，粉碎了德國佔領者，解放了貝爾格萊德，從而爲共產黨掌握政權創造了必要的條件。令人遺憾的是，蘇聯軍隊沒有，也不可能向法國共產黨和意大利共產黨提供這樣的援助。要是鐵托同志和卡德爾同志認爲這一點是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的話，對於自己的功績，他們就會少吹噓一點，就會表現得適當一些，謙虛一些……」

南共中央曾作出決定，向黨員宣讀我們的全部信件和蘇聯的全部信件。五月的一個上午，克爾斯托·波比沃達向一批黨員宣讀這些信件，我也在場。他的嗓音激動。他的激動也感染了我們大家。

最使我痛心的莫過於五月四日來信中的一段話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那段話裏以貶低的口吻談到人民解放戰爭，他們硬說什麼，在（德軍）襲擊德爾瓦爾之後，南斯拉夫的人民解放運動陷於深重的危機之中。

情況正好相反。人民解放運動當時正處於最高潮。德軍在波斯尼亞西部的攻勢很快就被粉碎了，游擊隊取得了新的大勝利。莫斯科《真理報》自己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四日——照這封信正好是人民解放運動陷於最深重的危機的時候——寫下了下面這番話：

「……盟軍的軍事行動正在意大利順利展開，對此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同希特勒侵略者及其卑劣的同伙的英勇鬥爭是作出了特殊的貢獻的。在南斯拉夫戰場的各個地區進行的戰爭日益臨近結

束……德國人爲了取勝正進行新的冒險。衆所周知，德國人試圖俘獲鐵托元帥的司令部成員而未能得逞。鐵托元帥的英勇的軍隊的抵抗粉碎了德國人的進攻……南斯拉夫的戰場吸引住了大批德國軍隊，使他們在目前遭到慘敗的情況下不可能去援救凱塞林①。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竭力想在南斯拉夫取得任何勝利的特殊意義就在這裏……

……人民解放軍的部隊以勇敢頑强著稱，但是他們缺少武器。爲了解放南斯拉夫人民，爲了盟國的總的事業，必須在武器方面援助鐵托元帥，使他不僅有可能對付德國人而且有可能消滅敵人。」

當我聽了斯大林五月四日來信中的那一段話之後，我頭腦中閃過一個想法：斯大林在撒謊。從此以後，我自己是百分之百地搞清楚了。信中的謊言一清二楚而且是帶有極大的侮辱性的，因此頭腦裏立即出現一個想法：蘇聯領導不再是我們本來以爲的那樣。他們求助於謊言，用這樣的方法，在國際工人運動中以及總的來說，在各國人民和各國的關係中，是不可能取勝的。

我的頭腦裏開始回想起他們同我們的關係中以前我不大重視的各種細節來了，因爲我過去認爲這些是偶然的事，俄國曾是一個十分落後的國家，不可能很快就克服若干世紀以來的落後狀態。

我立即向自己提出了另一個問題：當對我們來說，迄今的這座燈塔熄滅時，世界的社會主義的命運又會如何？爲了工人階級團結的利益，現在低頭屈服，現在暫且忍受不公正的遭遇，是否要好一些……我們要這樣的充滿不義的「社會主義」幹什麽？不要，一百個不要！

---

① 阿爾貝特·凱塞林（一八八五—一九六〇），希特勒德國將領，一九四〇年與隆美爾一起負責北非、意大利的作戰，後升任德軍西綫總司令。——譯者

坐在離我不遠處的我的一位同志開始抽泣。我頭腦裏閃過一個新的問題：對於茨爾尼，對於斯雷滕·茹約維奇，你又能說些什麼？一陣可怕的痙攣，向我的心口襲來。我十分愛戴茨爾尼。戰爭的大部份，我們是在一起度過的。他曾經是我參加革命後所遇到的最正派的人之一。他謙遜得少有。當他在第一次攻勢時受了傷，當我們後來都忍飢挨餓時，他把他作爲重傷員得到的一點麵包，分成了同樣的一小塊一小塊，分給我們大家。他還是我結婚時的男儐相。

他怎麼會上俄國人的當？難道是他受的教育，他在蘇聯長期逗留的結果？我試圖替他辯白，試圖理解他，但是當我想起了信中對人民解放鬥爭所說的所有那些不公正的話，說什麼我們的黨溶化了，說什麼我們讓資本主義分子爲所欲爲，說什麼富農在我們這裏迅速發展，說什麼弗拉特科·維萊比特是間諜，就是戰前在薩格勒布守衛共產國際的秘密無綫電台的那位善良的弗拉特科——我的感情就轉向了真理一邊。

五月的這一天晚上，我早了一點回家，習慣地翻閱我戰時的日記，特別去找在相同日期的日子裏我們做了些什麼。我正好翻到一九四三年五月份，上面談到開始了第五次攻勢的大戰役，而我則不斷地想着斯大林的信。怎麼使我們的這一事實真相同信中的謊言相協調？我先是由於傷心，眼淚奪眶而出，掉在日記上，爾後，我感到義憤填膺。

那幾天，我因有事，又去鐵托同志那裏。他消瘦多了。他的胆初次犯病。他對我說：

「事情是不公正的，我們不能讓步！他們所一口咬定的，是些彌天大謊，任何進步運動乞靈於謊言，就不再是進步的了。俄國人如果以爲用這樣的辦法就會使我們折服，那他們就錯了……如果我們同意，如果我們承認，對於俄國人對我們提出的一切指責，責任在於我們，他們肯定會讚揚我

們嚴守紀律，甚至會給我們嘉獎，但是，不行。首先要的是真理。」

衝突國際化

南共中央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會議上決定召開南斯拉夫共產黨代表大會。這意味着接受斯大林向我們提出的挑戰。

在《書中之書》中，我記下了鐵托關於採取這一步的想法：

「召開代表大會確實是一件大胆的事情。這或許是我們歷史上最爲生命攸關的時期。在決定性的關頭，必須行動迅速。任何動搖，即便是最小的動搖都會意味着垮台。」

只有在羣衆的自我首創精神得到加强，把全部事實披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首先是由人民自己來就此作出決定，革命才能繼續生存並創造新生事物。

真理在弱者一邊，真理是弱者的最强有力的和唯一的盟友。

在一九四八年春天的那些日子裏，我看到了一些新的文件，談波蘭政治家亞當·查爾托里伊斯基上世紀中如何避難巴黎，而向加拉沙寧和塞爾維亞其他政治家提供忠告，建議他們如何爲解放自己的人民而鬥爭。他說，不要犯這樣的錯誤：把這僅僅看成是小小的塞爾維亞同强大的土耳其和哈

布斯堡王國的鬥爭，而應把這看成是一個小國人民的原則性的防禦，這是整個歐洲的問題。

不幸的是，在查爾托里伊斯基時代，各國享有平等的原則，每一個國家的人民有權享有自由和自決，還只是詩人和有見識的革命家的夢想。

但是，在一九四八年，巴黎的一位憂傷的波蘭流亡者的這些烏托邦思想，遠離他的被奴役的波蘭，成了不僅是歐洲的，而且還有其他大陸的廣大羣衆的政治鬥爭的事業。

就這樣，蘇南之間的衝突在一九四八年春天國際化了。這反映在三個領域內：

第一，在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中，特別是在大國和小國之間的關係中。

第二，在把創建社會主義社會作爲自己的目標的國家之間的關係中。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只存在一個這樣的國家，而在戰後的頭十年中，已經有十來個這樣的國家。

第三，在世界各大洲的國際工人運動内的關係中。

而斯大林却不顧這一切，試圖把衝突首先説成是意識形態性的，也就是説，南斯拉夫出現了革命偏差，富農、資產階級分子取得了勝利，一句話，反革命取得了勝利，而他則以社會主義的拯救者的面目出現。

一九四三年春天，斯大林出於純粹的對外政策的原因把共產國際解散了，戰爭離開結束還很遠，他認爲，如果使人感覺到各國共產黨有了較大的獨立性，就會更好地使各國的羣衆動員起來，反對希特勒德國。此外，解散共產國際這一舉動也在華盛頓和倫敦給他帶來一定的好處。

但是，在一九四七年，當他覺得自己比較强大，他就設法在波蘭，在九國共產黨代表會議上成立共產黨情報局。誠然，建立這樣一個機構也曾是南斯拉夫强烈地倡導的。但是斯大林對情報局所

抱的目的同南斯拉夫人所抱的目的是不同的。斯大林想通過情報局來控制世界所有的共產黨，想回到共產國際時代，而貝爾格萊德則認爲，國際工人運動實際上只需要建立一個協商機構，來交換意見，來交流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在戰時和戰後不久所取得的豐富的經驗。

情報局的建立，使得南斯拉夫的這一設想只是表面上被採納。關於這個新組織的組織原則的決議談到交流經驗和自願協調的必要性。第二條再次强調了這項原則，這一條說，「情報局的任務是交流經驗，必要時在相互一致同意的基礎上協調各國共產黨的活動。」

但是，從存在的第一天起，情報局就成了斯大林推行他的霸權主義政策的盲目工具。他首先讓南斯拉夫代表在一九四七年在波蘭舉行的成立大會上對法共和意共這兩個歐洲最大的共產黨提出尖銳的批評。這一批評中有許多情况是真的，但是蘇聯的目的顯然在於分而治之。

情報局的總部設在貝爾格萊德，在貝爾格萊德出版《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這張報紙，但是，莫斯科通過帕維爾·尤金，把一切，甚至是最細微的事情都控制在自己手中。

我保存着一份一九四八年的報告，談情報局的工作方法：

「……有關報紙的整個工作都由蘇聯人——尤金、他的兩名助手和編輯部主任帕什科夫負責。其他黨的代表只是執行命令……隨同尤金的，還有許多俄國『記者』，他們完全沒有理由出席編輯部的會議……

在編輯部和蘇聯『記者』的會議上，商定每期報紙寫些什麼，但是文章往往同原先的文本相比在以後又作許多改動，而不爲作者和編輯部知曉和批准。

對於拉科西·馬加斯的一篇講話的處理十分耐人尋味。編輯部主任秘書舒米洛夫在通知匈牙利

代表比羅・佐爾坦修改講話時是這麼說：『請告訴比羅，如果他不來編輯部的話，我將按照我的意思修改拉科西的講話。』」

文章的作者常常抱怨，在他們的文章裏寫進了他們根本沒有說過，也沒有寫過的事情。在抱怨的人中有法共代表安熱，而同波共代表芬克爾施坦更是發生了更大的爭執。芬克爾施坦對任意更改波蘭某位領導人的文章的做法提出了抗議，而俄國人事後給他製造了種種不愉快的事。他們不給他收音機，禁止他使用汽車，等等。

報紙第一期才印了一百份，就停止印刷，從機器上取下了鉛版，報紙收起來了，車間鎖了起來，印刷推遲好幾天。原來是必須把幾份清樣送往莫斯科，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批准。只是在這兩個人同意之後，才又繼續印刷……

……有一次發生了這樣的事：莫斯科已表示同意開印，報紙也印好了，事後却又補充通知停印。鑒於這一干涉來晚了，報紙已經印好了，於是就下令把全部報紙——法文的、英文的、俄文的——統統燒掉。報紙全部運到了編輯部，在情報局大樓鍋爐房在俄國人在場的情況下整整燒了一天一夜。還曾調查，工作人員中是否有人拿走報紙。這次銷毀報紙的原因是季米特洛夫的一篇講話。」

報告接着談到，編輯部裏的蘇聯代表佔據了最好的房間和傢具，把差的留給「兄弟黨」的代表：「展開了一場搶傢具的名副其實的競賽，人人都在設法多弄點，而不管是否相稱，是否好看。桌子、地毯、電話，都拿走了，而『兄弟黨』代表的房間却一無所有。俄國工作人員相互之間還出了些事，他們彼此從房間裏拿傢具……

對俄國人作了比較舒適的安置，從一開始就可看出，俄國的每一個最低級的工作人員也都認爲

自己『高於』其他黨的代表……

下面這件事可以作爲一個例子，來說明俄國人對於一切『非俄羅斯的』事物的態度。有一次俄國人出席觀看了我們劇院裏的一次首次演出，後來又觀看了布達佩斯歌劇院首席女演員的訪問演出。在演出期間，他們一個接一個地離開了劇場，第二天就在比誰先離開劇場。他們害怕說，他們喜歡上演的節目，因爲國外的東西一概不該受到讚揚。誰都害怕拜倒在國外的事物面前這樣的指責。間或有人大着胆對一齣戲說點好話，其他的人就作出尖銳的反應，說這齣戲和演員的演技遠遠低於俄國的劇院，最後指責這個人是世界主義者。」

這看起來是些零星瑣事，但是俗話說，思想的價值要看人們貫徹執行的程度。

日丹諾夫：爭執很快就會消除

斯大林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反對南共中央的第一封信，表明了他是怎樣看待情報局的基本組織原則的（即這是一個一些共產黨在相互活動的基礎上交流經驗和協調行動的機構）。

斯大林把這封信不僅給了南共中央，而且給了情報局全體成員。

他要求這八個黨的領導人只是根據蘇聯的這封信，而不是也根據南斯拉夫的覆信，對蘇南之間的衝突表態。

通過尤金，他下令所有的答覆直接寄給聯共（布）黨中央。

這樣，斯大林對國際工人運動中的民主作風的理解，宛如土耳其統治時代人民創造的一句智慧的成語所說的那樣：「法官告了你的狀，法官又審你的案！」

克里姆林宮滿以爲在採取了這個施加壓力的新措施之後，南斯拉夫的「異端分子」就必定會讓步了。蘇聯意識形態部門的頭目日丹諾夫在蘇聯一批研究南斯拉夫各種問題的學者面前，對於迅速取勝表示充滿了極大的自信心。他們問他，是否要繼續寫自己的有關南斯拉夫的著作，日丹諾夫笑着說：

「我認爲爭執很快就會消除。」

匈牙利領導人拉科西·馬加斯首先響應斯大林發出的同南斯拉夫鬥爭的號召。他早在四月八日就代表匈牙利黨政治局接受了斯大林對南共中央提出的全部指責。日丹諾夫把他的信送給鐵托同志。信是由尤金於四月十五日親自轉交的，以便盡量强調，這只是一系列類似的回答中的第一個回答。

南共中央對拉科西作了迅速和十分尖銳的回答，這是他應該得到的。特別使鐵托同志痛心的是拉科西的兩面派手法。在以前的每一次會見時，他幾乎總是向我們的同志們抱怨，紅軍掠奪了匈牙利，俄國人使匈牙利人處於從屬地位，而現在他竟認爲自己有權來教訓南斯拉夫人，爲什麼不熱愛蘇聯。

對聯共(布)黨也作了回答，指出他們已把情報局變成了執行自己的霸權主義政策的普通工具。

在匈牙利人之後，情報局其他黨的回答也來了，全都是按照一個樣本寫就的。

有一天，從布拉格來了一位年輕的中國人。維爾科·弗拉霍維奇和我接見了他。他問道，爭執是怎麽回事？我們持什麽樣的態度？我們向他提供了我們的全部回答，仔細地解釋，我們是怎樣看待爭執的實質的。他仔細地聽了這一切，用中國字記了滿滿一個本子，點了點頭，走了。維爾科和我都感到高興，以爲既然中共關心起這場爭執來了，總會有些什麽，以爲中共或許會出來調解，不使

衝突進一步發展，甚至找到某種解決辦法。

在此期間，斯大林也在戲弄我們，搞得我們坐也不是，躺也不是。莫斯科電台已經有好幾個星期幾乎什麼消息都沒有，甚至連南斯拉夫的歌曲也停播了。突然有一天，蘇聯電台從早到晚一直在播送我們的民間音樂。在貝爾格萊德的中央委員會大樓裏立即出現了一股高興的情緒。我們覺得這是一綫希望，並作了種種可能的設想。

後來，五月初，拉科西又來了一封信，說匈牙利共產黨將於六月十二日舉行代表大會，請南共中央派一個代表團參加，「以便維護工人階級國際團結」。

我們最初的反應是積極的。我們暫時忘掉了拉科西所做的一切，因此確定了以莫沙・皮雅杰和亞科夫・布拉熱維奇爲首的代表團。

但是，蘇聯、匈牙利和其他東歐國家繼續在展開反南運動。匈牙利的一名中央委員在給布達佩斯大學生作報告時說，南斯拉夫黨是改良主義黨，鐵托是改良主義者。聽衆表示激憤，報告人就以給予嚴懲來威脅大學生們。

還發生了幾起類似的事件，因此南共中央改變了早先的決定，決定不派代表參加匈牙利共產黨代表大會。致匈牙利人的信在末尾說：

「這些事實證明你黨中央對南共和南共中央採取毫無道理的立場和態度。南共中央沒有得到任何保證，可確保我們的代表團在這樣的氣氛中不致遭受侮辱和不應有的貶抑。

爲此，南共中央不得不撤銷早先作出的派代表團出席你們代表大會的決定，因爲對南共，對新南斯拉夫的領導人的攻擊，同時也就是對我國和在戰時爲了消滅法西斯作出了無數的犧牲，今天正

在建設社會主義，正對鞏固和平和世界民主力量的勝利作出巨大貢獻的我國各族人民的攻擊。」

南共中央同時採取了一切措施來維護國家的獨立和自由，以免受到赫布蘭和茹約維奇可能採取的行動的危害。在南共中央五月九日的會議上，赫布蘭和茹約維奇事件調查委員會的報告被通過了。決議建議把他們兩人開除出中央委員會，開除出黨。這一決議被一致通過。決定把這一事件告訴全體黨員，並對茹約維奇和赫布蘭圖謀幹的事進行解釋。政府也決定由國家安全機關對他們兩人提出訴訟，因為他們犯了反對國家和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茹約維奇曾把自己在南共中央三月一日會議上作的筆記交給蘇聯大使拉夫倫季耶夫，從而泄露了國家和黨的重大機密。檢察長斷定，存在構成危及國家安全的刑事罪的成份，因此兩人都被捕了。

斯大林當時氣得暴跳如雷。他授權自己的一位使者威脅南共中央，提出名副其實的最後通牒。他的要求不多不少，恰好是要求讓蘇聯代表參與對茹約維奇和赫布蘭的審查。

很快就向莫斯科作了有力的回答，我在《書中之書》中保存了回答的內容：

「聯共（布）黨中央

對於聯共（布）黨中央就赫布蘭和茹約維奇的問題的口頭詢問，南共中央謹作如下聲明：

（一）南共中央從來不打算『殺害』任何人，也不打算『殺害』赫布蘭和茹約維奇。他們正受正常的權力機關的審查。

（二）南共中央認為，聯共（布）黨中央方面這樣地提出問題是不正確的，並憤怒地拒絕把我黨領導說成是『殺人犯』這樣的想法。

(三)據此，南共中央認爲，聯共（布）黨中央的代表參與對赫布蘭和茹約維奇的審查一事，不予考慮。」

在斯大林提出了這一要求後，莫沙·皮雅杰曾對我說：

「哼，俄國人忘記了，奧匈帝國在一九一四年七月的最後通牒中向小小的塞爾維亞提出的正好是類似的要求，就是讓奧匈帝國的機構參與對被控合謀在薩拉熱窩殺害弗朗茨·斐迪南的塞爾維亞公民的審查。小小的塞爾維亞不得不拒絕這一要求，因爲這意味着從根本上侵犯一個國家的主權。」

在我們作了回答後，過了一段時間有消息傳到貝爾格萊德說，俄國在貝爾格萊德的情報人員在籌劃强行打進監獄，帶走茹約維奇和赫布蘭。

就這樣，衝突變得越來越嚴重。斯大林更加頑固了，要一不幹二不休。而在貝爾格萊德，則發表了召開南共五大的日期。代表大會定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召開。確定了各位報告人。並已着手制訂黨章。

鐵托爲什麼沒有去布加勒斯特

有一個問題始終折磨着我：爲什麼斯大林，爲什麼作爲一種體制的斯大林主義，對於異端分子，要求的不只是死亡，而是想不惜一切代價在他肉體上死亡之前迫使他作所謂的自我批評，或者

更確切地說，要求他的良知陷於死亡？

我這個問題是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九日產生的，那天，聯共（布）黨中央機關的一位名叫麥謝托夫的面貌年輕的人來到了貝爾格萊德，他帶來了一封由蘇斯洛夫簽署的聯共（布）黨的信。來信要求南共中央代表團務必前往參加情報局的會議。要求約瑟夫·布羅茲·鐵托親自與會，而尤金甚至放風說，會議將在烏克蘭舉行，斯大林本人將參加。

南共中央開始討論，是應當去，還是不去。大多數人的意見是不去。事先就知道，在那裏不會進行任何討論，而是會要求投降、無條件投降、自行懺悔、承認錯誤。也可聽到一種意見，認爲「對我們提出的種種嚴重的沒有根據的指責，甚至那些最離奇、最駭人聽聞的指責，並不能證明我們不去參加『情報局』的會議是有道理的」，認爲「事關從我們的角度未必能完全看得清楚的計劃」。但是，這樣的意見未能佔上風。老同志中有人回想起，正是這位帶來莫斯科的邀請書的面貌年輕的麥謝托夫，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間在莫斯科參與了從肉體上消滅南斯拉夫共產黨人的活動，這爲情報局會議揭示的前景不是十分吉祥的。因此，南共中央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日會議上一致決定不去參加。

我在《書中之書》中記下了鐵托的這麼一番話：

「如果我們同意，如果我們承認，對於俄國人對我們提出的一切指責，責任在於我們，他們肯定會讚揚我們嚴守紀律，甚至會給我們嘉獎，但是，不行，首先要的是真理！」

在拉科維察①舉行的黨的一次會議上，一個年輕的共產黨員把這一點說得更爲簡單：

---

① 貝爾格萊德近郊一工人區。——譯者

「這就是說，如果你公開把它說出來，就犯了更大的錯誤的話，按照俄國人的標準，你就是個更好的共產黨員了。」

我承認，在一九四八年春天，我當時回答不了這樣一個問題：爲什麼斯大林首先要求異端分子在良知上陷於死亡，爾後再從肉體上予以消滅？只是後來，在一九四九年，匈牙利發生了對拉伊克・拉斯洛及其同志們的訴訟案，其他東歐國家繼續出現了一系列訴訟案，這些訴訟案到處都是按照同一個模子處置的，這時我才明白。他們像蘇聯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間的一些訴訟案中的老布爾什維克一樣，被控告，他們承認自己的「錯誤」，自我譴責到這種程度，甚至承認自己是外國間諜，而之後却又得到被處死的判決，在自己糟蹋了自己之後死去。

斯大林是否從神學中學來了這一套，反對官方教會的異見邪說是犯罪，至於異端分子，在他拋棄自己的狗靈魂之前，必須迫使他正式地、公開地撤回以前的褻瀆神明的想法，還是這不過是一直保留到當代的拜占庭文明的某種沉重的遺風？在拜占庭文明中，皇帝既是權力的體現者，又是唯一的法律解說者和信仰維護者。

且不管是怎麼回事，事實仍然是，斯大林竭盡一切努力，要讓約瑟夫・布羅茲・鐵托和南斯拉夫其他領導人出席情報局會議。當他們得到了南共中央明確的、毫不含糊的回答，說不同意出席這場審判鬧劇時，俄國人於五月二十二日又發了一封信。他們在信中說，應所謂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同志們」的要求，推遲一個月舉行情報局會議，也即推遲到六月下半月。他們只是想贏得時間。在此期間，哥穆爾卡通過自己的一個人，給了南共中央一封信，他在信中呼籲南斯拉夫人出

席情報局會議，他建議，他同波蘭黨的一位領導人貝爾曼一起到貝爾格萊德來，同南斯拉夫人討論這一切問題。

在此期間，在尤金的《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的編輯部裏所發生的情況，最終使那些本來認爲應當去參加情報局會議的人相信絕對不應當去參加了。原來南共中央於六月七日給了尤金一封信，問他，爲什麼他有計劃地拒絕在情報局的機關報上發表有關南斯拉夫的社會主義發展的消息和文章？南共中央最後要求尤金在下一期上發表：

關於南斯拉夫羣衆廣泛響應召開南共五大的決定的報道；

根據《戰鬥報》六月五日社論的精神寫成的一篇談這次代表大會的意義的文章。

尤金召集編輯部開會，宣讀了我們的信，發表了簡短的評論，他說南共中央應當感謝情報局機關報，因爲到目前爲止只限於進行間接的批評。南斯拉夫的論點是，情報局機關報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信來攻擊我們黨，他把這種看法斥爲「令人不能允許地要求編輯部拋棄斯大林」。他把南斯拉夫的信說成是十分缺乏黨性和非馬克思主義的。

除南斯拉夫的編輯外，其他所有編輯都衆口一詞地支持尤金。這不是討論，而是點名查對。唯一的例外是意共代表。他在講話的開頭甚至還强調意大利共產黨要感謝南斯拉夫共產黨，兩黨協商一致地解決了許多十分困難的問題，但是最後他還是跟着尤金走。

尤金再次發了言，最後提高了嗓門說：

「我們在這裏宣誓忠於斯大林！」

幾天之後，尤金同整個編輯部一起離開了貝爾格萊德。關於他們的離開，有一份報告送給南共

中央，我逐字援引如下：

「俄國工作人員在離開南斯拉夫時，到外交商店裏去可以說是搶購了一番。他們見什麼買什麼。他們還開始把不屬於編輯部的東西（地毯、電話機等等）打成包裹。甚至還彼此偷盜，你拿我的手錶，我拿你的掛鐘……」

〔在歐洲共產黨領導人中，鐵托的知交首先是季米特洛夫，其次是威廉·皮克。一九三八年，在南斯拉夫黨差一點被莫斯科查禁的時候，是季米特洛夫和皮克提出反對這麼做，皮克還保護了鐵托，使鐵托在俄國首都免受直接的迫害。一九四五年以後，鐵托同皮克保持着親密的關係。一九四八年初，鐵托把他的四卷選集用紅皮革做封面送給了皮克，上面還用俄文題了詞：「贈給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的傑出研究家威廉·皮克——鐵托」。這幾卷書是在南斯拉夫駐東柏林軍事使團舉行的一次儀式上贈給皮克的，出席這次儀式的還有東德其他共產黨人，其中包括瓦爾特·烏布利希。

隨後就來了斯大林的幾封信。有一天，皮克通過我們軍事使團捎來一個緊急口信，說他希望立即同鐵托會晤。（他曾親自告訴南斯拉夫駐東柏林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他在共產國際裏負責巴爾幹，是應他的提議，鐵托才於一九三七年作爲南共總書記被派回南斯拉夫。）他認爲，索非亞是會晤的最合適的地點；季米特洛夫是不會反對這次會晤的，因爲他也是鐵托的好朋友。

鐵托同一天作了回答，說工作繁忙使他不能離開貝爾格萊德。但是皮克繼續要求會晤。貝爾格萊德收到了另一個口信：皮克知道鐵托很忙，但是他們見一下面，至少在保南兩國邊界上見一下面是絕對必要的。皮克願意親自到貝爾格萊德來，但是由於他的黨在同社會民主黨人搞聯合而使他自

身的處境複雜化了：有人可能指責他到貝爾格萊德接受指示，因為貝爾格萊德是共產黨情報局所在地。南斯拉夫的回答解釋說，鐵托並不拒絕會見皮克，但是強調皮克得到貝爾格萊德來。皮克則又堅持自己的主張，說由於上述理由他來不了。就這樣，皮克的倡議告吹了。只有柏林和莫斯科把有關文件公佈之後，才能知曉這到底是不是他的倡議。」①

而斯大林還在希望南斯拉夫人會出席情報局會議。六月十九日，來了一份內容如下的電報：

「南共中央

情報局為討論南斯拉夫共產黨問題而開會，邀請（南共）中央代表參加情報局的工作。如果你們同意參加，情報局將在布加勒斯特等候你們的代表，最遲到六月二十一日，他們在布加勒斯特應去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找喬治烏—德治同志，並將得到前往情報局工作所在地的指示。

我們期待通過莫斯科的菲利波夫得到緊急答覆。

情報局」

對上面這份電報的答覆，莫斯科指定於六月十九日二十三時進行專門的無綫電聯系。聯系又推遲到六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時，那時發去了南斯拉夫的答覆，答覆裏再次提出了南斯拉夫人不參加布加勒斯特會議的全部理由，特別指出，自聯共（布）黨第一封信以來的迄今的所有行動都表明，在布加勒斯特不可能進行平等基礎上的討論，這樣的行動是同情報局賴於建立的諒解和自願原則的精神背道而馳的。

① 方括號中的三段係據紐約維金出版社一九七一年本書英文版補譯的。——譯者

兩天以後，莫沙・皮雅杰和我去鐵托同志那裏。莫沙談到以科西耶爾爲首的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政治局的厄運，他們在一九三七年被召到莫斯科去進行「同志式的協商」，全都被關進了盧邊卡①，在那裏全都在後腦勺挨了槍。

鐵托同志問我，我認爲是否應該去布加勒斯特。我回答他說：

「尤拉伊・德拉什科維奇主教、總督②準備好了火刑和鐵冠，不過，這一次馬蒂亞・古貝茨③不會露面……」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公開革出教門

情報局布加勒斯特會議於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通過了把南共中央和南斯拉夫公開革出教門的決議，會議參加者的命運表明，同斯大林是開不得玩笑的。儘管這些人應當成爲法官，而不是被告，在蘇聯軍事佔領和控制之下的東歐國家的十四名代表中，有六個人在斯大林生前，在一九五三年以前上了絞刑架或者被趕下了台（保加利亞人科斯托夫，捷克斯洛伐克人斯蘭斯基、蓋明德、巴雷什，羅馬尼亞人盧卡和安娜・波克）。

---

① 莫斯科著名監獄，本爲蘇保安機關總部所在地。——譯者

② 尤拉伊・德拉什科維奇（一五二五—一五八七），薩格勒布主教、克羅地亞總督。——譯者

③ 馬蒂亞・古貝茨（？—一五七三），克羅地亞農民起義領袖，起義失敗後，被用燒紅的鐵冠套在頭上弄死。——譯者

會議是在布加勒斯特附近當年的一座王宮裏，在地下的一座並不大的會議廳裏舉行的。一九五五年以後，我們的一些同志曾有機會到那裏去看過，會議廳的陳設不成什麼格調，密不透風。

在討論通過反對南斯拉夫的決議時，日丹諾夫採用了以前對老布爾什維克的訴訟案中樂於採用的斯大林主義的方法：

「我們有材料表明鐵托是帝國主義的間諜！」

據可靠地獲悉，羅馬尼亞人喬治烏—德治曾提出過幾個令人不愉快的問題，但是俄國的機器起了作用，決議被通過了。

六月二十八日那一天，我在參加南斯拉夫體育協會會議。我們的幾百名青年體操運動員和水兵正在前往布拉格的途中，那裏正在舉行盛大的各國鷹社①大會。我們還籌組了參加倫敦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足球隊。當時，在我們這裏在足球方面也是完全實行中央集權制，我作爲南斯拉夫體協主席，有最後的決定權來決定由誰在國家隊裏踢左鋒。

我們正在爭論，誰的左脚踢得好，誰的右脚踢得好，中央委員會打來的一個電話打斷了我們就足球問題進行的這場討論。吉拉斯告訴我：

「從三點鐘起，布拉格電台就在廣播情報局反對我們的決議。你馬上到南通社去，並請你帶上

---

① 爲捷克人米羅斯拉夫・蒂爾什於一八六二年所創，本爲一體育組織，後傳至斯洛文尼亞、美國、俄國、克羅地亞、德國、塞爾維亞、法國和英國，均爲斯拉夫人所參加，帶有民族主義色彩。——譯者

決議全文到我這裏來。」

中央很快提醒我，南通社裏有人在怠工，這是得不到決議文本的原因。無需對我講兩遍，我就立即趕去，在南通社裏發動了名副其實的政變。我當時想，「現在同一九四一年一樣，是戰爭時期，沒有什麼好多考慮的。誰戰勝誰，繫於分秒。」

合衆社在播發決議，抄收情況很糟。我安排好了通信員的工作，不在南通社翻譯和重新打印這項決議，而是從收報機上一張一張地立即送往中央。

我的女秘書，伊斯塔爾的共產黨員斯拉維察·弗蘭在參加工會的某個會議。我把她從會上拉來，我還把吉拉斯的女秘書德拉吉察·法英伯格找來，我要她們兩個把這一切用打字機重打一遍，並注意補上脫漏的字母。同時，我對她們說，要用腦袋保證不向任何人說，她們在幹什麼。後來，我笑自己多麼愚蠢。決議是向全世界播發的，而我却還在要弄計謀。吉拉斯也來了，斯拉維察打完了第一頁，她平靜地說：

「嗨，這不過是美國人司空見慣的詭計……」

吉拉斯揮了揮手說：

「不幸的是，這是真的。不過，你別跟任何人說起你打的東西。」

重新打印花了很長時間，每一頁都送給了政治局委員們。革出教門是徹底的：斯大林驅使六個東歐國家的代表，其中有幾位政府副總理和外長，讓他們參與呼籲南斯拉夫公民迫使自己的政府向蘇聯屈服，如果南斯拉夫政府拒絕這麼做，就讓人民撤換南斯拉夫政府，建立

聽從蘇聯指揮的新政府：

「……情報局確認，由於這一切，南共中央就使自己和南共處於兄弟的共產黨大家庭之外，處於統一的共產主義陣綫之外，因而，也處於情報局的隊伍之外……

南斯拉夫領導人很可能是不了解，或者是裝做不了解，類似的民族主義主張只會使南斯拉夫蛻化爲一般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使南斯拉夫喪失獨立，變南斯拉夫爲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

情報局並不懷疑南共內部是有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忠於南共國際主義傳統，忠於社會主義陣綫的足够的健康力量的。

南共這些健康的黨員的任務是，迫使現在的領導人公開地正直地承認自己的錯誤，改正錯誤，脫離民族主義，回到國際主義上來，並竭盡全力鞏固統一的反帝社會主義陣綫，或者，如果南共現在的領導人表現得沒有這種能力，那就撤換他們，推選南共新的國際主義的領導。

情報局不懷疑南斯拉夫共產黨是能够完成這一光榮的任務的。」

而我們的滔天大罪是：我們是富農、狠毒的托洛茨基分子、孟什維克、取消派、冒險分子……

南共中央六月二十九日舉行了全體會議。吉拉斯工作了一個通宵，草擬了答覆草稿。這一草稿基本上被採納了。我保存着一份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文件。文件長達八頁。全體會議提出的修改，大部份是由愛德華·卡德爾改動的，吉拉斯也改動了一些地方。

南共中央在答覆中逐點談到了情報局的每一項重要指責，指出這些指責是以不確切的、沒有根據的斷言爲依據的，是試圖在國內外詆毀南共的威信，在國內和國際工人運動中在羣衆中引起混

亂，是試圖削弱南共的團結和它的領導作用。

當天晚上，《戰鬥報》上就刊登了我們的回答，在同一期上還刊登了情報局決議的全文。這是南共中央全會的決定：把事實擺在羣衆面前，由羣衆最後作出判斷。

我在日記中寫道：

「只有我們南斯拉夫人把決議和我們的回答這兩個文件都發表了。蘇聯也好，有代表參加情報局布加勒斯特會議的其他任何國家也好，都沒有發表我們對決議的回答，而是只發表了情報局的決議。我們還發表了斯大林的幾封信以及我們的覆信。我們把這一切印了四十五萬份，自由出售，由我們的人民用自己的頭腦來評價誰是誰非。

然而，在蘇聯，十月革命三十三年之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却被剝奪了用自己的頭腦思考的權利，沒有給他們機會來讀到我們的回答。

僅僅這一事實就給了我多大的力量，就使我產生了多强的信心，相信我們經得住，相信我們會勝利，因爲我們不害怕眞理。」

那天拂曉，我的母親米利察來我這裏詢問「到底是怎麼回事」？當我告訴了她是怎麼回事，她回答我說：

「我們是奇怪的人民。我們從來不害怕面對最蠻橫的暴君。我還記得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記得加弗里爾·普林齊普①，宛如今天。看看你們這一代做了些什麼：當希特勒勢强力盛的時候，

---

① 南青年愛國志士，一九一四年在波斯尼亞首府薩拉熱窩刺死奧地利王子斐迪南，成爲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綫。普林齊普後被奥當局關押在捷克，死於獄中。——譯者

發生了三月二十七日事件，當杜魯門不可一世的時候，你們打下了他的飛機，而現在，你們又同斯大林幹上了……」

在布拉格的全民投票

二千三百名青年人和七百名水兵參加布拉格的各國鷹社大會一事，在情報局決議發表後，爲我們的人民公開進行全民投票提供了第一個機會，而且這不是在南斯拉夫的土地上進行的，是在遠離我們的邊界，在我們當局管轄範圍之外進行的。

捷克斯洛伐克人在組織這一類體操活動上是有悠久的傳統的。但是，這一次的準備工作超過了以往歷屆大會。他們興建了一次能够容納二十五萬觀衆的體育場，也就是説興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體育場，而訓練場地長達五百公尺，寬三百公尺。

我們體協爲我們的體操運動員的表演準備了好幾個月。有一個專門委員會在工作，其中有青年組織的代表、陸海軍的代表、體育委員會的代表以及一大批專家。運動員在盧布爾雅那訓練。

訓練計劃恰好是在斯大林頭幾封反對南共的信送達時制訂的，因此我們就有一個想法，想通過運動員的表演來强調共產黨在組織人民解放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我們没有預料到這樣一個設想會産生什麽樣的後果。

情報局決議發表的時候，載着三千名運動員的專車正經過匈牙利。我的一位親戚帕夫萊，也是

運動員之一，他後來寫信告訴我：「在車廂裏，經過匈牙利的時候，我們注意到，匈牙利的軍隊不讓我們下火車。在每一站，迎接我們這一列車的是衛兵、軍人。他們勉强同意讓我們的值日同志用水桶給我們打水喝，給我們分發在專門的一節車廂上準備的飯菜。我們搞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看管着我們，好像我們是一列車的野獸。看管的人一聲不吭，不作任何解釋。他們很是威嚴（全副武裝），好像過境的是侵略軍，而不是南斯拉夫的運動員。」

我們在貝爾格萊德體協裏的人——體協設在無産者旅大街上一座低矮的房子裏——安排了同南通社的通信員聯絡工作，以便盡快得到來自布拉格的消息。

第一條消息說，載着體操運動員的我們的列車一進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內，如同在匈牙利一樣，立即被憲兵和警察包圍起來。顯然，他們害怕南斯拉夫人同捷克斯洛伐克人接觸，因爲這是六月二十八日决議發表後，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羣衆第一次有機會對我們表態。

儘管捷克斯洛伐克官方的宣傳已經在大力傳播情報局决議和首批尖銳的攻擊，來自布拉格的第二條消息說，我們的體操運動員唱着游擊隊的歌曲，列隊行進在布拉格的街道上，而大批羣衆對他們表示熱烈的歡迎。交通爲之阻塞，布拉格人擁抱我們的水兵和青年。

我拿着南通社的這一消息，發了瘋似的，在貝爾格萊德街頭跑着，一直跑到中央委員會大樓，跑得喘不過氣來，我把消息放在吉拉斯的桌子上：

「你看看吧，同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以後發生的情况一樣，當時我們的共青團員率先在貝爾格萊德焚燒德國人的卡車，而現在青年又首先做出了榜樣……」

而在布拉格，大會在繼續進行。各家通訊社報道說：「七月三日，開始了大會的主要日程。在捷克斯洛伐克體操運動員表演之後，七百名南斯拉夫水兵上了場，他們晒得黝黑，坦露着胸脯，穿着白色長褲，戴着水兵帽。在表演的第一部份，他們演出了南斯拉夫水兵在戰時的鬥爭，而在第二部份，演出了水兵在船上勞動。表演結束時，他們組成了南斯拉夫海軍軍徽、五角星和鐵托的名字。」

二十五萬布拉格人以巨大的熱誠對這一演出表示歡迎。

繼水兵之後上場的是二千三百名南斯拉夫運動員。整齊的演出象徵性地反映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鬥爭。觀衆們很喜歡這一演出，演出時就有人鼓掌。最後，我們所有的運動員在場地中央圍成一大圈，跳起了科扎拉柯羅舞。

人們十分喜歡這一演出，捷克斯洛伐克鷹社的成員請我們的水兵和運動員在第二天，六月四日，星期天，在下午再表演一次。但是，這却製造了一場外交上的醜聞。蘇聯大使親自對此提出抗議。南斯拉夫當時駐布拉格大使馬里揚·斯蒂利諾維奇是這樣描述這一場面的：

「……體育場上的播音員宣佈由俄國體操隊表演，接着是應觀衆要求重演的南斯拉夫隊。聽了這一消息後，在隔壁的蘇聯的廂座中，引起了混亂，有人在走動，有的你看我，我看你，有的在悄聲耳語。

……在鷹社幹部的廂座裏，談話是簡短的。幹事們向蘇聯大使館代辦先生出示了節目單，上面清楚地印着各國體操隊表演的次序，由於南斯拉夫人插進來了，他們當然在俄國體操運動員之後表演。

同時，在中間的政府廂座中也可覺察到有某種不安。捷克政府的部長們側着頭，彼此悄聲耳語，內務部長諾塞克緊張地望着哥特瓦爾德，後者像隻刺猬，縮着身子，眯着眼睛，像個怏怏不樂的孩子，左顧右盼，望着自己周圍的人，最後臉都紅了。

由於過了半小時，俄國隊還沒有表演。觀衆不安寧了，有人吹口哨。

後來，幹事們都走了，誰都不理會蘇聯代辦，好像沒有他似的。體育場的播音員宣佈，應全體觀衆的要求，下一個節目是南斯拉夫隊演出。

……完全出乎人們意料，我們的青年男女，突然出現在體育場上，幾千名男女體操運動員按照輕快的、舞蹈的節律波動起伏，十分整齊、自然、柔和地演出各種圖案，連一個錯誤都沒有，在此以前一直吵吵嚷嚷的整個體育場變得鴉雀無聲。我全神貫注地望着我們這些孩子，人羣中發出的歡呼聲和鼓掌聲把我從這種激動的心境中驚醒。整個體育場都動起來了。歡呼聲還沒有平靜下來，曬得黝黑的我們的七百名水兵，邁着輕快的步子，列隊走進了體育場。觀衆繼續鼓掌，廂座裏的全體外交團，除俄國人以外，都站了起來。在蘇聯大使西林的廂座裏，唯有他的十歲的兒子在鼓掌。」

應蘇聯政府的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第二天通過我們的大使馬里揚·斯蒂利諾維奇提了抗議，「鑒於你們的體操運動員的行爲和利用我們傳統的好客精神……你們的體操運動員來布拉格後，在街頭不斷挑起混亂和游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將不再能容忍。」而斯蒂利諾維奇立即回答說：

「……我們的體操運動員，同其他所有運動員一樣——俄國運動員除外，他們的負責人把他們關在屋裏——在布拉格散步。布拉格人向我們的青年男女鼓掌，布拉格人熱烈地向他們祝賀，在街頭同他們一起跳舞，這一切，我們的運動員是沒有責任的……」

二十天以後，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捷克斯洛伐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以弗拉迪米爾・克萊門蒂斯的名義發表了正式的聲明，對於南斯拉夫體操運動員在布拉格大會上取得成功表示感謝。毋庸懷疑，四年以後，勇敢的弗拉迪米爾・克萊門蒂斯在布拉格被絞死時，殺害他的劊子手是沒有忘記他對於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兩國人民的兄弟情誼以及他們在情報局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以後的公開全民投票所表示的這次祝賀的。

誰都不相信我們會得救

南斯拉夫境外，很少有人相信在斯大林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發表最後通牒之後，鐵托的政府能保住。我在日記中記下了西方一些大報所寫的南斯拉夫人的前途。

倫敦《泰晤士報》六月二十九日寫道：

「……很難設想，現在治理着南斯拉夫的那些人還能繼續掌權……」

據法新社報道，曼徹斯特《衛報》六月二十九日寫道：

「曼徹斯特《衛報》今天上午發表社論，認爲南斯拉夫政府很可能已經轉入别人的手中。該報評論情報局公報說，已公開號召南斯拉夫人民拋棄自己的領導人，改組政府。很可能這已經做了。據悉，托爾布欣元帥（這位紅軍元帥在關鍵時刻幾次出現在布拉格和貝爾格萊德！）現在南斯拉

夫，正在那裏設法控制住局勢。據認爲，如果托爾布欣沒有抵達貝爾格萊德的話，這樣的公報是不會發表的。或許我們明天會聽到，公報中所提到的鐵托和南斯拉夫其他領導人已經被捕，他們已經因背叛人民的事業而受到審判。最後，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跳窗口。」

從華盛頓也傳來類似的預言。路透社六月二十九日晚報道說，「《紐約時報》駐華盛頓的一位記者說，華盛頓的消息靈通人士認爲莫斯科和貝爾格萊德之間不會決裂，鐵托元帥要麼滿足克里姆林宮的要求，要麼被撤換。」

通過我們的外交部打來了一份電報，說大使館參贊斯洛博丹·拉萊·伊萬諾維奇表示擁護情報局決議，並帶走了幾名青年官員。他是在戰爭臨近結束時入黨的，曾經是德拉戈柳布·約萬諾維奇的農民黨的主要人物之一。據華盛頓現在報告說，伊萬諾維奇的論據之一是：他拿起了鉛筆，算了一番賬。一方面是南斯拉夫，一千六百萬人。而在另一方面是蘇聯，二億人，波蘭二千四百萬人，羅馬尼亞一千六百萬人，捷克斯洛伐克一千萬人，等等。總共，南斯拉夫是一千六百萬人，而另一邊是二億八千萬人。他算完了之後，就對一位官員說（他想說服這位官員表示擁護情報局決議）：

「別當傻瓜了。算術是很清楚的。我們的中央頂住不可能超過三個星期，隨後我們就不得不讓步。因此，每一個聰明人都應及時地脫身。」

國王彼得二世和他以前駐華盛頓的大使康斯坦丁·福蒂奇滿心歡喜。合衆社六月二十九日早晨報道，彼得國王的秘書布拉納·波波維奇說：「陛下感到高興。不過，他認爲目前他還不能發表進一步的談話，因爲他還不了解這一事件的事實。」而福蒂奇也在芝加哥對合衆社記者說：「鐵托最

後得到了他所要的東西。鐵幕可能緊閉得更爲嚴密，我們或許再也不知道鐵托的命運。」

西方大部份是這樣的評論。東方也是這樣想。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這場衝突中指靠的是自己的力量，是這樣一個事實：我們是一個小國，武裝很差，落後，經濟上是孤立的。他們充分利用這一點。情報局頭目尤金在離開貝爾格萊德時說：

「你們連三個星期都堅持不了。你們不讓步的話，西方帝國主義會把你們吞掉……」

而在情報局決議發表後，又是拉科西首先預言南斯拉夫將迅速垮台。他在七月二日說：

「小市民的民族主義一九四一年使南斯拉夫陷入災難，如果南共領導人繼續沿着目前的道路走下去的話，將再一次使南斯拉夫陷入災難……但是，他們不可能長期地抗拒下去……」

安娜•波克也預言（南斯拉夫）將迅速垮台。她先是談到「驕傲的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接着她又說，「消滅這一體制，對於南共來說是一個生死問題。」

那時我還見到過一份內部報道，談特拉伊喬•科斯托夫向上朱馬亞的積極分子作的報告：

「……鐵托和卡德爾給斯大林寫信說：『我們熱愛蘇聯，但是我們更熱愛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這不是國際主義的態度。這表明，在南斯拉夫，如同在德國一樣，社會主義變成狹隘民族主義了……

……南共現領導人的功績不能掩蓋他們使黨和國家所面臨的危險。相反，功績並應使他們可以不糾正所犯的錯誤，但是他們却竭力掩飾錯誤，把自己同人民等同起來。我覺得，他們墮落到路易十四的立場上去了，路易十四曾說過：『朕即國家』。」

科斯托夫已經知道我們的青年在布拉格表現得多麼英勇，因此他在朱馬亞的講話中也有反應：

「南斯拉夫目前的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最終是在給誰效勞？整個民主世界都在譴責鐵托，而反動派得意揚揚。不幸的是，南斯拉夫還有人，特別是青年，相信鐵托，但是，如果向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要鐵托還是要斯大林，是同蘇聯和其他民主國家結盟還是同帝國主義結盟，要社會主義還是要資產階級共和國，那麼這些人就會認清楚該走哪一條路」。

據這份報道說，報告作完後開始了討論，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

「南共領導人這樣的態度在羣衆中是否有深刻的基礎？」

科斯托夫回答說：

「當然有，特別是在青年人中間。糾正他們的錯誤之所以困難原因就在於此。目前的領導人有多少人能够保住，我不知道，但是無論如何，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威望將有助於澄清南斯拉夫目前的狀況……」

第十二個問題是：「如果南共目前的局面扭轉不過來，怎麼辦？」

科斯托夫回答說：

「那就很糟糕，不過，必須把局面扭轉過來。」

聽衆大多數是比林馬其頓人，他們問科斯托夫，南斯拉夫是否發表了情報局的決議：

「情報局決議在羣衆中產生什麼樣的反響？」

據這份報道說，他回答說：

「報上用四版版面發表了決議。他們試圖用空話來駁斥決議中的一切論點。人民如何反應，我們還不清楚。」

有人大着胆子問他，爲什麽保加利亞不發表南共中央對情報局决議的回答，科斯托夫回答說：「我們爲什麽要發表。爲什麽發表他們的傲慢不遜的解釋，發表他們對我們的謾罵。」

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以後的那些生命攸關的艱難日子裏，只有一回我暗自感到好笑。誰都没有把蘇聯三月二十七日的第一封信，以及第二封信，還有關於衝突猛然爆發告知我們的外交代表。當時，我們還是一個游擊隊國家，還有從波斯尼亞的山裏帶來的種種粗枝大葉漫不經心的作風。六月二十八日，發表了情報局决議，世界各家通訊社開始轉播，我們的許多不知情的代表還堅决予以駁斥。這樣，在南通社六月二十九日十一點的《參考新聞》上就出現了下面一條合衆社消息：

「南斯拉夫駐聯合國代表星期一晚上說，他不相信情報局在布拉格發表聲明指責南斯拉夫反馬克思主義。

「合衆社記者向他宣讀了布拉格的聲明，他說『必定是發生了某種混亂，實際上聲明不可能是真的。』

南斯拉夫代表認爲這一事件是反南宣傳。」

回到游擊隊的道德風尙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情報局决議發表後，在莫斯科馬上就聽說，南斯拉夫人不可能堅持

三個星期以上，那時就必然會投降。據認爲，斯大林的威望之高，使南斯拉夫共產黨人會自己起來推翻自己的領導。也就是說，指望黨員發生分裂。

還提到七月二十一日是推翻鐵托和他的領導的日子，那一天本應在托普契德爾召開南斯拉夫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

儘管赫布蘭和茹約維奇已經被關在監牢裏，蘇聯的宣傳機構却散佈說，他們在七月底將在南斯拉夫掌權。據說，赫布蘭將當政府總理，而茹約維奇當黨的書記。至於鐵托同志，他們又說，最初他可當國防部長！

情報局決議發表後的第二天，即六月二十九日，南共駐莫斯科代表普尼沙·佩羅維奇就接到必須離開蘇聯的通知，儘管如此，同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的社會團體和政治組織的接觸並未完全中斷。例如，在布拉格舉行了斯拉夫總委員會會議，南斯拉夫斯拉夫委員會的代表也參加了會議。

在七月份的那些日子裏，還有過幾次類似的會晤，莫斯科則利用每一次機會來强調自己的立場，有時候還麻醉我們或者把我們引上歧路。

例如，七月七日那一天，保加利亞科學院院士哲學家托多爾·帕夫洛夫在前往布拉格參加斯拉夫總委員會會議途中經過貝爾格萊德。衆所周知，他是南斯拉夫人的老朋友。一九四〇年，共產國際致南共中央的最後一批郵件自莫斯科運抵貝爾格萊德時，帕夫洛夫是在索非亞的主要接頭人，遵照鐵托同志的命令，我從貝爾格萊德派了記者德揚·拉普切維奇去找他。拉普切維奇後來帶回貝爾格萊德一隻皮箱，皮箱的隔層裏藏着共產國際的郵件。

七月七日，迎接帕夫洛夫的有保加利亞的外交官以及我們的斯拉夫委員會裏的負責人。帕夫洛

夫一下飛機就問南斯拉夫人，局勢怎麽樣。我們的人客氣地回答說：「没有什麽特别的，一切如常」，叫大家吃驚的是，一個保加利亞女人說：

「他們在勞動，還唱歌！」

原來，建設新貝爾格萊德的青年人那時常常列隊行進在貝爾格萊德的街頭，在德拉齊亞①跳科扎拉柯羅舞。

但是保加利亞的外交官的看法不是這樣。他們批評鐵托和南斯拉夫領導。托多爾·帕夫洛夫的態度從表面上來看，是不偏不倚的，隨後他說了一番話，從中可以看出情報局的真正的戰略：南斯拉夫人在斯大林的聲望面前，還是得屈服。

帕夫洛夫打斷了保加利亞一位外交官的話，這位外交官硬說南斯拉夫在出現反保沙文主義，帕夫洛夫又說：

「這是次要的，僅僅是個插曲，應當談主要的事。我研究過斯大林這個人，早在許多年之前，我就了解他對事情作出反應的方式。他在作出結論之前，有成千種方式向他報告。他站得比我們大家都高。他是在喜馬拉雅山上，而我們是在山脚下。鐵托是南斯拉夫人民的化身，而斯大林不僅是蘇聯人民的化身，而且是斯拉夫各國人民和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化身。他熱愛我們大家，他站得高，望得遠，他是不犯錯誤的。」

---

① 貝爾格萊德市中心鬧市區。——譯者

這樣，托多爾·帕夫洛夫就明確地向我們轉達了這樣的信息：斯大林是不犯錯誤的，你們屈服吧。南共五大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中籌備的。世界上所有的報刊只是在議論，南斯拉夫人是否會向斯大林這個最高和唯一的權威以及莫斯科屈服？絕大多數報刊認爲，南斯拉夫共產黨人除投降外別無出路。

安德烈·維辛斯基也向我們表示了同樣的意思。他在六月底七月初參加了一次所有東歐國家的外交代表會議。這次會議討論了在這一年夏天行將在貝爾格萊德舉行的多瑙河會議上應採取什麼樣的態度。我們的代表是阿萊什·貝勃勒，他六月二十六日，也即在情報局決議通過之前報告說，他同維辛斯基就制訂多瑙河新的國際航運規章建議的基礎進行了交談，接着又問他是否願意就兩國之間的一般關係進行交談。維辛斯基拒絕了，但是一個小時以後（大概是同莫洛托夫進行了磋商），在討論多瑙河問題的首次會議之前向貝勃勒走來，十分親切地問他：「我們什麼時候談談一般關係？」

在討論多瑙河航運規程時，南蘇兩國代表團之間産生了不同的看法，誠然，都是在一些次要問題上，因此維辛斯基到七月二日才約貝勃勒晤談，當時他告訴貝勃勒，蘇聯政府準備改變自己在有爭議的問題上的立場，並接受南斯拉夫的建議：

「這是真正的斯大林式的解決辦法，我相信，在這一基礎上在行將在貝爾格萊德舉行的會議上我們將共同地取得成功，現在讓我聽聽您對情報局決議的看法……」

根據電報，貝勃勒說，「我們將以行動來駁斥指責」，對此，維辛斯基又說「除此以外，我們還需糾正真正的錯誤，接着他發揮了一個論點，說我們不是充分地承認蘇聯對我們的解放所建樹的

功績。」貝勃勒加以否認，但是維辛斯基打斷了他的話，說就他個人而言，「在進行了最近幾天的討論和發生了黨的分歧之後，我們的個人關係不應變化。」

蘇聯外交官，斯大林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間搞老布爾什維克的訴訟案中的檢察長維辛斯基就是這麼說的。

但是，在一九四八年七月的那些日子裏，在五大召開的時候，並不是對我們大家事情都是那麼清楚。五大的決議確實是生命攸關的：

「南共一致抵制情報局決議，特別表現在南共五大上(貝爾格萊德，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二十七日)以及在各民族共產黨組織的代表大會上。

五大分析了南共的歷史發展，南共在革命前時期所作的努力和活動，它在組織領導解放戰爭和革命以及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通過這些分析，情報局決議中所列舉的斷言遭到了駁斥，並被斥爲誹謗。選舉了中央委員會，鐵托再次當選爲南共總書記。南共當時有四十六萬八千一百七十五名黨員。」

《南斯拉夫百科全書》就是這樣明確而簡要地談到在五大所發生的事情。然而，這只是這一歷史事件的一個畫面。事件本身從政治上，從感情上來說，都遠爲複雜。

這裏還涉及普遍的、人類的悲劇。斯大林由於攻擊了南斯拉夫，由於提出了不正當的指責，而使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鬥爭成了問題。我想着托普契德爾的道座大廳：在我幾個月前去過的遙遠的

印度，這一切事件會產生怎樣的反響？那些不幸的人們，那些數以百萬計忍飢挨餓的人，會如何看待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這場衝突？這會使他們感到困惑不解，或許還會削弱他們的隊伍，使他們推遲擺脫現在所處的極端貧困的境遇。

一瞬間，我覺得正是爲了加爾各答的那些不幸的人，應當竭盡一切制止這場衝突，而這樣的加爾各答，世界上到處都有。但是如何來制止衝突？還有可能制止嗎？是否陷得太深了？是否再没有退路了？

斯大林憑着他作爲國際無產階級的領袖的無可爭辯的威望，同時還在對我們的鬥爭，甚至對代表大會的進程和工作散佈最爲司空見慣的謊言。《真理報》由該報報道代表大會的記者巴爾任克署名報道說，在我們中間有作爲來賓前來的瑞士一個托洛茨基集團的代表。斯大林是想通過這種辦法，在全世界面前，在加爾各答和其他各大陸的無産者面前，硬把我們說成是托洛茨基分子。然而，没有任何來自瑞士的代表出席我們的代表大會，大會兩千名與會者全都可以看到這一點。

這一誹謗之所以尤爲可悲是因爲在《真理報》發表這條消息的前一天，對於所提出的是否有瑞士的托洛茨基分子來參加代表大會這個問題，向以《真理報》特派記者巴爾任克爲首的蘇聯報界代表作了回答：這是愚蠢的，是謊言。他們自己也可以確信這一點。

我建議鐵托同志在代表大會上公開駁斥這條消息，他採納了我的建議。宣讀了消息全文，主席團號召代表大會「譴責這一新的謊言和誹謗，這是再次試圖破壞我黨和代表大會的聲望。」全體代表一躍而起，同意這一譴責。正是莫斯科的那些人的這種不講道德的做法最使代表們憤怒。這時我走到巴爾任克那裏，問他，他的報紙怎麽會發表這樣的假消息，這是《真理報》，是布

爾什維克黨的機關報，**ПРАВДА**在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中的意思是真理，而他狼狽地回答我説，他沒有從貝爾格萊德發出這條消息！他再也沒有在代表大會上露面。

隨後我和大多數代表產生了另一種感情：不能屈服，對撒謊不能同意。我們站在巴爾幹這座歐亞之橋上，正處在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風口浪尖上，一方面遭受在全世界伸出了觸角的龐大的情報局機構的打擊，同時我們又面臨同樣强大的西方宣傳機構的攻擊，西方部份人是不知情，而大部份人則是對這個國家懷有敵對的情緒。而站在中間作爲這種宣傳的對象的是我的國家，總共只有一千六百萬人的一個小國，在戰爭中打得血跡斑斑，遭到破壞劫掠，正在努力站起來，但是沒有資金，沒有使人了解自己的實際情況的經驗。

因此鐵托別無出路，只能依靠他唯一可以依靠的羣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因此他決定通過電台轉播代表大會的整個情況，直到最後一句話，因爲這不是某些搞陰謀的人的秘密會議，而是自由發言的公開論壇，讓人民自己來決定誰爲正確的。

自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以來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到這次代表大會，在羣衆的浪潮中煥發出來的那種强有力的自我首創精神開始減弱。原因是多方面的。產生了我們自己的官僚。我們的社會也不是沒有矛盾的。此外，在這一時期，我們還從蘇聯的國家模式中接受了許多東西。我孩提時代的一位同伴，一位共產黨員，他還在一九四七年底就對我說：

「我們共產黨人在戰前地下鬥爭時期以及在游擊隊時期贏得的那份巨額道義資本，我們現在開始丢失。我們贏得了這一聲望，因爲我們的言和行是一致的，也就是說是由於我們游擊隊的道德風尚。而我們的人民並不傻。我們的人民現在注視着我們在幹些什麼……」

而這次五大恰好在這一點上意味着是一個大轉折點。我們又得到了可能，可首先依靠最廣泛的人民羣衆。沒有別的出路。

要是拉科西或者哥特瓦爾德同斯大林發生了什麽衝突，他們確實會一夜之間就滾蛋。他們是靠着蘇聯的刺刀上台的，不像我們在一九四一年做出榜樣，我們共產黨人必須衝鋒在前，吃苦在先，而他們只是說了些要同佔領者作鬥爭的空話。在一九四一年時有一萬二千名共產黨員，都是些品德高尚的人，到戰爭結束時只有三千人還活着。其餘的人都證明了，他們的言和行是毫無二致的。這是些熱心腸的人，戰士、城鄉人民，凡是同他們有過接觸的，又對他們作出了多高的評價！塞爾維亞有個農民，叫做德拉戈伊洛·杜迪奇，戰前就是革命者，曾担任瓦列沃支隊的政委，後來担任塞爾維亞人民解放委員會首任主席。他每天記日記，直到在第五次攻勢時犧牲爲止，當時烏日策上面的玆拉蒂博爾公路上的一輛德國坦克的槍彈打中了他。杜迪奇的日記保存下來了，他在日記中有一處寫到他的支隊行軍了一整天，游擊隊員們飢腸轆轆，最後到了傍晚他們做了一頓熱飯，但是這頓飯到底是什麽樣的質量，他說不上來，因爲當他和司令走到鍋前時，已經沒有什麽可吃的了。杜迪奇寫道，「在我們支隊裏有一條原則，領導人在享受權利上在後，而在履行職責上在先，也就是說，剛相反。」

我們靠着這一道德風尚取得了勝利。我記得一九四一年秋天，當時我是克拉古耶瓦茨支隊的政委，當時我們的支隊有三百多人，在一座長滿成熟的葡萄的葡萄園裏過夜。沒有一個人動過一顆葡萄。清晨，舒馬蒂亞的一位老農，高高的個子，瘦削的臉龐，留着長長的白鬍子，走來了，他劃着十字，大聲嚷道：

「我這一輩子見過多少軍隊，但是像游擊隊這樣的軍隊，没有見過。你們這樣正直，就憑這一點，你們就會取得勝利……」

因此一九四八年，當情報局開始詆譭革命時，羣衆是站在鐵托一邊的。遭到詆譭的實際情況是南斯拉夫數以百萬計的人所經歷過的，他們是主要的證人，可資證明誰說真話，誰說假話。一九四八年，人民陣綫的基礎甚至還擴大了。站到鐵托一邊的還有非黨人士，不是反共的，而是老百姓，他們出於這種或那種原因不搞政治，但却明白事關國家的存亡，事關前途和生存。

而切特尼克和烏斯塔希却有自己的盤算。他們認爲，鐵托的政權將完蛋，他們的時候到了。彼得國王與高采烈，安特·帕韋利奇的副手博日達爾·卡夫蘭七月三日從奥地利非法地進入南斯拉夫，立即就被捕了。在審訊時他說，他進入國内是因爲他認爲鐵托的下台只是一個短時間的問題。這樣就從根本上使得極右派要使南斯拉夫的事態回復到戰前或者佔領時期的樣子的任何企圖都不可能得逞。

「我擁護的不是作爲政權的鐵托，而是作爲革命的鐵托，我擁護使革命進一步深化。革命是我們的鬥爭的意義所在，而鐵托今天是革命的體現者和抵抗的象徵，如同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間一樣。」我的一位朋友，一個知識分子，在五大休息期間用上面這番話解釋了他爲什麼站在南共中央一邊。

只是這一認識過程既不是簡單的，也不是黑白分明的。我望着五大的代表們。他們站在鐵托一邊，但是意識形態上沉重的過去使他們感到壓抑，黨過去教育他們熱愛斯大林，熱愛蘇聯。鐵托同

志自己一九四八年以後對我說：

「毫無疑問，整個這場衝突，特別是（情報局）決議使我們的人受到極大的打擊，儘管有許多懷疑，我們南斯拉夫人總的來說，對蘇聯，對斯大林是信任的……我親眼目睹游擊隊員們口裏呼喊着斯大林的名字在戰爭中死去……我們年復一年地一再向我們的人民談到蘇聯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是徒勞的……不必掩飾，現在也不必感到害臊，我們在一九四八年以前是懷着極大的信任和愛戴的心情看待蘇聯的。我們並不因爲這些幻想而感到害臊，相反，我們爲此而感到自豪。這些幻想是積極的，表明我們是深信進步和社會主義的。而在一九四八年七月，當斯大林如此無情，如此殘暴地踐踏這些幻想，我們是極其痛苦的，但是我們沒有喪失對社會主義的信心，而是我們開始喪失對斯大林的信心，是斯大林出賣了社會主義事業……」

但是，對歷史真相的發現對所有的人來說，並不是以同樣的方式，以同樣的速度展現的。甚至在五大期間也存在過幻想，以爲所牽涉的只是某種誤會，某種爭執，而不是衝突。蘇聯玩弄的種種手法，例如經由帕夫洛夫或者維辛斯基玩弄的手法，使我們的人產生了虛假的希望，以爲總會求得某種妥協，找到某種折衷的辦法，以利於國際無產階級的團結，以利於反帝鬥爭。

蘇聯人把我們推向意識形態爭論，讓我們證明我們沒有錯，讓我們把我們的發展同他們的模式相比，讓我們盡可能接近這一模式。鐵托同志在《傳記》中自己也說過，他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二日全會上曾提醒不要陷入就教條主義，就神學進行爭論的圈套：

「同志們，請注意，這裏的問題不是什麼理論性討論，這裏的問題不是南共犯了錯誤，不是所謂我們意識形態上出了偏差。我們不要被推到就此進行的討論上去……同志們，這裏的問題首先是國

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我覺得，他們在利用意識形態問題來爲向我們，向我國施加壓力辯解……」

而我們大家都受了這種教條主義病菌的感染，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治療並不是到處都是同樣迅速同樣有效的。首先，我自己得承認這一點。當我今天再看看我在五大上的發言，我發現混雜着這一教條主義。我在發言中談到南共始終不渝地從事反帝鬥爭，談到黨始終不渝地對羣衆進行反帝教育。我在那次發言中還談到：

「……由於南共採取了這樣的始終不渝的反帝態度，由於我們使帝國主義遭受了那麽些麻煩，他們的宣傳向我國，向鐵托同志傾注了那麽許多怨恨、謊言和欺騙，唯有在十月革命之後不久的日子裏對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的無恥圍攻才能與之相比。使得帝國主義者格外惱怒的是這樣一個事實：除了反帝陣綫中的主力蘇聯外，南斯拉夫最爲始終不渝地捍衛正義的和平的利益。因此我們得到了『蘇聯第一號衛星國』的綽號。我們對我們的國際主義的政策感到自豪，因爲我們深信，只有這樣的政策才符合我國的利益，從而也符合整個反帝陣綫的利益，我們的對外政策的領導人同蘇聯對外政策的領導人一樣，是以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鬥爭中的同樣的意識形態基礎爲出發點的……」

一九五〇年某個時候，鐵托同志把密洛凡·吉拉斯一九四八年二月訪問莫斯科後向南共中央提出的報告給了我，一九四八年二月，斯大林曾向我們提出了名副其實的最後通牒，要求我們立即同保加利亞建立聯邦。由卡德爾、吉拉斯和巴卡里奇組成的我們的代表團經過討論後拒絕了斯大林的這一要求，但是吉拉斯在自己的報告的末尾寫了這麽一番話：「然而，一刻也不應懷疑斯大林同志對我黨全黨、整個中央，特別是對鐵托同志的極大的愛護」。

儘管吉拉斯後來在反對情報局的鬥爭中是對蘇聯的社會存在和斯大林本人的最尖銳的批評者之

一，他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却寫下了這樣的報告，因爲他還是滿腦子的教條，甚至是滿腦子的對「俄國人民和黑山人民傳統聯系」的迷信。

憑良心說，對於斯大林，誰都有過這種極其錯誤的看法。情報局決議發表後，爲慶祝南共五大召開，在貝爾格萊德曾舉行了第五區一萬五千名人民陣綫成員的羣衆大會。我想這次大會是在七月二日舉行的，會上通過了致斯大林的致敬電，《戰鬥報》七月三日發表了這封電報：

「我們親愛的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斯大林同志，

我們從第五區人民陣綫盛會上向你並通過你向蘇聯全國致以熱烈的問候。

斯大林同志，我們深信，你將竭盡一切努力排除對我們全國，對我們黨和我們中央委員會所提出的沒有根據的指責。

我們對你，對蘇聯全國，對你們爲全人類所做的一切的愛戴是無限的，誠如我們相信你將竭盡一切使真相不久就大白一樣。

蘇聯和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誼萬歲！

教導我們熱愛蘇聯的鐵托同志萬歲！

我們的偉大友人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斯大林萬歲！」

出席五大的多數代表也是這樣的感情。當事關駁斥對我們的革命的指責時，當事關站在鐵托一邊還是反對他時，當事關捍衛革命的成果和我們的獨立時，大多數代表在無記名投票中投了鐵托的票，正是在這時產生了那首光榮的歌曲：

「鐵托同志，我們向你宣誓，

我們決不離開你的道路，
鐵托同志，共產黨員的領袖，
黨像太陽般純潔無瑕。」

但是，關於斯大林的神話，對斯大林的錯誤看法，在同一些代表的心中依然存在。鐵托同志在結束五大時，呼喊道：「斯大林同志萬歲！」這決不是偶然的。

我在寫《約·布·鐵托傳略》時，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我們交談了逐步向南斯拉夫羣衆解釋同蘇聯的衝突的原因的問題。我曾問他，是哪些動機促使他在結束五大時歡呼蘇聯和斯大林。在《書中之書》第六十二頁上，我記下了他的回答的如下大意：

「不得不這麼做。這不是曲意逢迎。這是爲了我們的羣衆。不得不十分謹慎。斯大林的威信是不用懷疑的。如果我們走得過分快，我們就會脫離羣衆。而我們走得慢了，俄國人就會踐踏我們……我們不敢發脾氣。只能隨着時間的推移讓蘇聯以其行動使得羣衆自己喊出來：『打倒斯大林』。」

如果在南共五大這些歷史性事件發生了二十年之後的今天要問在南斯拉夫領導人中間，是誰從一開始起就最堅決地抵制蘇聯的霸權主義，歷史學家的良知使得我得出結論，最堅決的是鐵托。的確，他當時担負責任最爲重大的職務。他的身上有一種我們國土上被壓迫的反叛者的本能，一種他從家鄉帶來的本能。我不是指這是一種種族的或者民族的本性，而是說這是某些偉人的特點、天賦，它使你感覺到本國人民的一部壓縮了的歷史。我國這個列强衝突的舞台多少世紀以來體驗到了壓迫者的武力，人民大規模地被迫盛年夭折。因此，人民中間就產生了關於真理和正義的信念，覺得我們有權享有同其他國家的平等地位，我們能够，也必須擺脫我們幾個世紀來所經受的這些苦

難。

我並不是說，這些和這樣一些人物自己在創造歷史。他們在關鍵性的、生命攸關的日子裏，當許多人認爲沒有出路了，沒有救了，他們却懂得指明解放的道路，懂得幫助實現看來是辦不到的事情。這些人物給自己所處的時代打下了烙印，而相應的社會力量又支持他們。鐵托同志自己在一九四八年感到了這一點，誠如他在一九四一年感到了這一點一樣。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在一九五二年進行了交談，我在《書中之書》中記下了我向他提出的問題：

「到底是怎麼回事？斯大林不能說不聰明，不能說不狡猾，他怎麼會犯這樣嚴重的錯誤？怎麼會對形勢估計不足？怎麼會他的第一個行動就沒有立即取得成功？」

鐵托回答我說：

「俄國人按照死板的公式看待南斯拉夫。他們的根本弱點在於他們不想看到南斯拉夫正在創建某種新的事業，因此他們從這種先驗的立場出發，不理解我們的革命的性質的實質，特別是不理解我們的革命的基本事實之一——通過鬥爭，南斯拉夫最廣大的羣衆關於我們必須保持獨立，關於領導聯系羣衆的認識大爲提高……由於估計不足，由於按照死板的公式對待南斯拉夫，由於被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冲昏了頭腦，由於他們派在南斯拉夫的人幹的蠢事，這些人不敢正視南斯拉夫所創造的新生事物，而給克里姆林宮打了一些他們認爲最符合斯大林和其他一些人的心意、情緒和胃口的報告，他們給克里姆林宮幫了倒忙……由此斯大林制服南斯拉夫的戰略也犯了錯誤。對形勢的估計總是錯誤，因此爲使形勢轉而對他們有利而建議採用的手段總是遲緩。不僅對我們是這樣，到

處都是如此。這是他們的根本弱點。」

如果站在今天的立場瀏覽一下那個時期保存的全部文件，並就五大得出一個結論的話，那麽應當說，五大的歷史意義是巨大的。

南斯拉夫領導僅僅指靠羣衆就能支撑住，這一事實本身就使羣衆的自我首創精神經歷革命後有可能以更强大的力量迸發出來。在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內，擴大民主的傾向加强了，儘管在同强大的斯大林主義的機器作艱巨的鬥爭。出現了對官僚主義的最初的一些批評，出現了建立完全的社會主義的願望，在完全的社會主義條件下，重要的不僅是建設工業，提高生活水平，而且首先是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創建新的人道主義。

但是，這一過程也不是直綫進行的。我們是一個有其特殊矛盾的社會。五大並没有使我們擺脱所有的謬見和教條主義。「我們將用行動來駁斥指責」這一口號被採納了，而且實踐又超過了言詞，因此特别是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以及一九四九年大部份時間，我們是以這樣的方式來證明這一點的：我們恰恰採用了蘇聯的某些模式，特别是在經濟中，例如，我們加速强行實行土地集體化，以及採取類似的措施。這就是説，我們没有完全擺脱意識形態上的教條主義，至少是没有全部擺脱。許多人想「向情報局證明，我們將通過實踐來回答他們的批評」，而這樣的實踐只是使我們遠離羣衆。

但是，這只是一時的現象。東方威脅我們，西方訛詐我們，特别是在擴大經濟聯系上。國内的形勢是嚴重的，在農村，我們面臨尖鋭的衝突。農業停滯，我們不得不向國營農場和許多合作社保

障供給。城市裏存在負責分配供給的龐大機構，企業被我們弄窮了，我們把最優秀的幹部投入這些臃腫的機構。

就這樣，生活本身迫使我們依靠我們唯一所能依靠的人民羣衆。不喚起直接生產者更大的關心，經濟不可能有進展，不打破官僚主義的刻板模式，社會不可能活躍起來。

從這一意義上說，五大不僅是人民維護國家的獨立的一次公民投票，而且是主張走社會主義的新的道路的一次公民投票。代表大會上提出的第一句話是，革命者只是革命的僕人，而不是羣衆的主人。這同時也是號召返回游擊隊的講平等、真理和正義這樣一種道德風尚。

短暫的假停戰

南共五大閉幕的第二天，在貝爾格萊德開始舉行多瑙河會議，參加的有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的代表以及美國、英國和法國的代表。根據一九四六年巴黎和會的決定，這次國際會議的任務是通過關於從烏爾姆到黑海的多瑙河航運制度條約。條約在八月十八日通過了。條約宣佈的原則是，多瑙河上的航運不受限制，向懸掛一切旗幟的一切商船和商品開放，在航運條件和上稅方面一律平等。由沿岸國家的代表組成多瑙河委員會，負責整個通航河道，負責貫徹執行條約的條款。

作爲蘇聯代表團團長前來貝爾格萊德的是安德烈·維辛斯基，羅馬尼亞是安娜·波克，捷克斯洛伐克是弗拉迪米爾·克萊門蒂斯。會議是在貝爾格萊德科拉爾切夫人民大學的會議廳裏舉行的。

西方國家和東方國家在會上發生了公開的衝突。西方國家援引自己所謂「既得權利」，援引列强還在上世紀中葉克里米亞戰爭和巴黎條約時期爲自己所爭到的地位，而東方國家則維護沿岸國家的原則，即多瑙河流經它們的領土，儘管承認一切國家可在多瑙河自由航行的原則。

我們南斯拉夫代表團維護沿岸國家的立場，同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的態度完全一致。但是，本着「我們將用行動證明情報局的指責是沒有根據的」這樣一種精神，我們走到了另一個極端。我們對於蘇聯的建議一概毫無保留地表示贊成，甚至對關於會議的官方語言只用俄語和法語，而不包括英語這樣的建議，也不例外。

在科拉爾切夫基金會的這種氣氛使得我們的一些外交官處於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境地。因此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三日巴黎的《世界報》上出現了據說是我們的一位外交官說的一番話：「在五大以後，南斯拉夫和蘇聯的關係變得十分親近。」

當時我是新聞局局長，我知道，這番樂觀的話在我們中間引起一片嘩然。鐵托同志在五大後馬上就去布萊德休養，但是給我捎來了話，要我查一查，這番話是真的還是假的。

不幸的是，在蘇聯對我們施加壓力這件事上沒有任何的停戰。尤金的《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已從貝爾格萊德遷往布加勒斯特，恰恰在多瑙河會議期間，這家報紙寫道「鐵托很快將走下政治舞台」。尤金大肆歪曲關於我們的人民解放鬥爭的歷史事實，硬說南斯拉夫是紅軍解放的，他甚至進而對鐵托同志進行人身攻擊：「鐵托可笑地想把自己說成是軍事天才和偉大的政治家。」

尤金在文章最後叫嚷，「南斯拉夫有足够的健康力量，能防止實現對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的背叛」。

使我感到寬慰的是，莫斯科報刊在八月初對於代表大會什麼都沒有報道，但是這種高興爲時不長。首先，聯共（布）黨中央理論刊物《布爾什維克》發表了彼·費多謝耶夫的文章《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和階級鬥爭》，文章把南斯拉夫作爲「背離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事例，幾乎逐字逐句地重複了情報局決議提出的指責。

接着就發生了更爲嚴重的事情。羅馬七月份發生了行刺意共領袖帕爾米羅·陶里亞蒂事件。我們的報紙譴責了這一事件，支持意大利工人階級反對恐怖活動的要求。而八月初在布達佩斯發生了一個南斯拉夫人遭殺害的事件，南斯拉夫的一位外交官——新聞專員被控與此事有關。《真理報》把對陶里亞蒂的行刺和布達佩斯發生的這一事件聯系在一起。《真理報》記者在發自布達佩斯的一則報道中說，南斯拉夫新聞專員的工作同試圖行刺陶里亞蒂是一碼事。

我們駐莫斯科的代辦對《真理報》的這條消息補充了如下這番話：

「記者是這麼說的，這裏的政界也是這麼想的，因爲如果他們不這麼看，也就不會允許發表記者的看法了。」

但是，莫斯科的報紙經常報道多瑙河會議的情況。貝爾格萊德還舉行了幾次外交招待會，東方和西方的所有代表都參加。只要有可能，我就盡量逃避這種場合，但是有一次在薩瓦河上游泳時我却未能躲開同羅馬尼亞外長安娜·波克會面。

在阿達·齊甘利亞的「什比察」上游有一隻供在薩瓦河上游泳用的木筏，我想是屬於塞爾維亞政府的，但是在會議期間供與會者使用。維爾科·米丘諾維奇和我只要有空閑，常常去那裏，輕鬆

輕鬆，晒晒太陽。

我第一次遇到安娜·波克是一九四七年二月在布加勒斯特火車站上，當時她來迎接愛德華·卡德爾，卡德爾當時去莫斯科參加討論奧地利國家條約的外長會議。

這一次我向她打了一下招呼，不想打擾她，因爲我已經看到報告說，在羅馬尼亞，她反我們反得最厲害。正好那天晚上我遇到了保加利亞革命家伊萬·卡拉伊萬諾夫，他在一九四五年以後一直住在我國。他對於東歐國家的所有老革命家特別熟悉，因爲他曾長期住在莫斯科，在共產國際工作。

我偶然向他談到，我遇到了那位圓胖的年邁的女革命家，穿着並不那麽可愛的衣裝在薩瓦河游泳，他就開始向我敘述起她的不平靜的生活來了。安娜·波克是摩爾達維亞的一個很富有的拉比的女兒。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她就開始學醫，後來當了女教師，因爲她認爲這樣可以更好地幫助羅馬尼亞貧窮的人民。很早她就成了共產黨人，作爲羅馬尼亞黨的代表參加過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羅馬尼亞一九二三年開始實行恐怖統治，她就同丈夫馬塞爾·波克一起去蘇聯，一度去過美國，後來又回到羅馬尼亞從事地下工作。

卡拉伊萬諾夫告訴了我一件有趣的事。羅馬尼亞最富有的一個猶太人的女兒，紅頭髮的盧佩斯庫太太是安娜·波克童年時代的女友，多年來一直是羅馬尼亞國王的情婦。安娜不時到莫斯科滙報自己的地下工作，她談到自己同盧佩斯庫太太的老關係。有一次她甚至誇耀說，她在布加勒斯特甚至能够乘羅馬尼亞國王的汽車，同羅馬尼亞黨的一些中央委員去出席一次秘密會議。

但是，同漂亮的盧佩斯庫太太的這種關係也幫不了多大的忙。安娜·波克於一九三六年被捕，被判服苦役。而她的丈夫當時在莫斯科，在共產國際工作。內務人民委員會揭發他是季諾維也夫和

加米涅夫的同伙。在對這兩個老布爾什維克進行了審判後，安娜·波克的丈夫被帶走，未經審判就被殺害了。

安娜·波克出獄後回到了莫斯科，了解到不僅她的丈夫被殺害，而且斯大林把住在蘇聯的羅馬尼亞幾乎全部主要共產黨人全都幹掉了。

一九四五年，安娜·波克隨同蘇軍一起重返羅馬尼亞。卡拉伊萬諾夫斷言，維辛斯基在安娜·波克的幫助下同羅馬尼亞米哈伊國王取得了聯系，在東歐國家人民抵抗運動領導人獲得蘇聯勝利勳章之前，斯大林就把蘇聯這一最高勳章賞給了羅馬尼亞國王。

卡拉伊萬諾夫斷言，安娜·波克是最主要的人物，是斯大林在羅馬尼亞最忠誠的代理人，儘管在表面上喬治烏—德治是中央委員會書記。

安娜·波克指使阿爾索·約萬諾維奇

我從來沒有能够想到相鄰的羅馬尼亞的外長安娜·波克，我在薩瓦河的游泳場上看到的在那個午後如此溫柔地梳理頭髮的那位老革命家，竟會冷酷地蓄意推翻南斯拉夫政府，而正是在南斯拉夫她受到了殷勤接待。

我們在多瑙河會議上竭力要證明我們對蘇聯和東歐鄰國是忠誠的，此時斯大林却在策劃新的打擊，以便最終制服南斯拉夫的反叛者。

莫斯科發來的一份電報向我們作了預報：接近蘇聯政府和中央委員會的人士中佔上風的看法認爲，「鑒於『健康力量』將覺醒，同南斯拉夫的分歧很快將予消除。」

青年對於必須維護國家，維護我們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那些在意識形態上揹上了教條主義包袱的人，就不是這樣了。在這方面，斯大林給我們造成了最大的損害。他憑着自己的威望，使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都經受巨大的考驗。有的人早一點抗過來，有的人晚一點。同時，蘇聯情報機構全力以赴收買我們當時所謂的「死魂靈」。有些人從個人來說是正直的，但是當時茫然失措。有些人被嚇破了胆，害怕强大的武力，認爲我們頂不住强大的蘇維埃國家的這一駭人聽聞的壓力。但是，也有些是野心家，出於這樣的或那樣的原因而心懷不滿，現在蘇聯情報機構向他們提供了可能性，可以站到勝利者一邊，迅速地實現自己的野心。

自一九四四年起，蘇聯情報機構就在收集有關所有這些在特定時候可能很有用的心懷不滿分子的材料。他們特別注意這些人在哪裏工作，担任黨和國家的什麼樣的職務。如果某人是在軍隊裏，在國家保安處，在主管經濟的各個部，在中央委員會機關裏工作，他就成了蘇聯情報人員特別感興趣的對象。

就這樣，招募了一批所謂的「健康力量」，斯大林確信，在這些「健康力量」的幫助下能够奪得南斯拉夫的政權。在茹約維奇和赫布蘭不能充當暴亂頭目後，莫斯科在八月下半月制訂了一個新計劃。據某些消息說，本應甚至在一個鄰國建立某種「南斯拉夫流亡政府」。

參加這個「健康力量政府」的有好幾個候選人。《真理報》早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七日就發表了南斯拉夫前駐布加勒斯特大使拉多萬·戈盧博維奇致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國民議會主席團的一

封信，通過這封信他辭去在布加勒斯特所担任的職務。

這封信是完全根據情報局決議的精神寫的，《真理報》作了大量宣傳。這是五大後《真理報》第一次攻擊我國。

對於熟悉蘇聯的方法的人來說，這證明已經發出了發動新的攻勢的信號。「健康力量」開始集合。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一日至十二日之間的那個夜晚，阿爾索・約萬諾維奇上將在布蘭科・佩特里切維奇少將和弗拉多・達普切維奇上校的伴隨下試圖越過南斯拉夫羅馬尼亞邊界，越境時被打死。

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內務部八月十八日就此事發表了如下公報：

「今年八月十一日至十二日晚，凌晨一點，有三個人在弗爾沙茨縣境內試圖越過南斯拉夫羅馬尼亞邊界。隱蔽在邊界這一地段的一位民警邊防哨兵發現有四個人加速步伐走向邊界。當哨兵想提醒崗哨指揮員注意這一情況時，想越境的三人中的一個抽出手槍向哨兵打了一槍。哨兵出於自衛開了火，當場打死兩人，另兩人朝羅馬尼亞邊界逃去，但是一人在越境前被逮住。

驗明身份時發現，被擊斃的兩人中有一人是阿爾索・約萬諾維奇上將，另一人爲索契策國營農場的管理員斯韋托利克・阿拉布亞茨，據斷定，後者完全不了解上述三人打算越境逃跑。很可能已經越境逃跑的第三個人是弗拉多・達普切維奇上校，而被逮住的第四個人是布蘭科・佩特里切維奇少將。

據事後斷定，阿爾索・約萬諾維奇上將、布蘭科・佩特里切維奇少將和弗拉多・達普切維奇上校在打野猪的藉口下於八月十一日二十二點左右抵達索契策農場。然而，據被逮住的布蘭科・佩特里切維奇少將供認，他們計劃越境逃往羅馬尼亞，把農場管理員當作嚮導帶往邊界，向他作的解釋

是，首先要視察一下邊界的安全情況。」

弗拉多·達普切維奇上校於一九四八年九月二日被抓到，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內務部於一九四八年九月六日就此發表公報：

「誠如公衆所知，曾經宣佈，在阿爾索·約萬諾維奇將軍和布蘭科·佩特里切維奇將軍逃往羅馬尼亞未遂事件中，在一起的弗拉多·達普切維奇上校很可能已越境逃跑。

在此期間公安機關一直在搜尋弗拉多·達普切維奇。由於邊防部門的警惕，他未能從國內逃離。今年九月二日二十三點左右，弗拉多·達普切維奇和他的嚮導德米特里·武克米羅維奇一起在南斯拉夫匈牙利邊界被邊防部門逮住，他是在未能逃往羅馬尼亞之後跑到那裏的。

布蘭科·佩特里切維奇和弗拉多·達普切維奇承認有罪，在供詞中說明了促使這個孤立的集團做出衆所周知的叛國行徑的全部情況。」

在南斯拉夫報紙發表關於阿爾索·約萬諾維奇被打死的公報的同一天上午，在科拉爾切夫大學的大廳裏，安娜·波克代表羅馬尼亞簽署了新的多瑙河條約。關於她以蘇聯情報機構特務的身份在南斯拉夫幹的秘密勾當，我在《書中之書》中在談到同鐵托同志的一次談話時，記載了如下幾段話：

「安娜·波克在貝爾格萊德參加多瑙河會議期間發表了這樣的話：

『現在一切都會立即結束。一切都會安排停當。南斯拉夫人不可能再作抵抗。』

實際上，安娜·波克是在轉達給阿爾索·約萬諾維奇的指示。

俄國人對於我們進行抵抗的可能性估計不足。」

我在《約·布·鐵托傳略》完整本中對於安娜·波克所起的這一作用寫過幾句話。

蘇聯情報機構的這一大失敗破壞了斯大林迅速消除南斯拉夫的抵抗的計劃。他在盛怒之下下令加緊實行經濟封鎖，開始發生首批邊界事件。而鐵托同志下令於八月二十五日向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發一個抗議照會。照會的第一點，首先譴責羅馬尼亞外長安娜·波克：

「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爲有必要提請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政府注意對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和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之間關係的以下粗暴侵犯：

第一，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負責的國家領導人在講話中和在報刊的文章中號召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公民舉行叛亂和推翻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合法政府。例如，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外長安娜·波克女士公開號召消滅南斯拉夫現國家領導……」

足球上的俄國處方

在斯大林看來，兩國之間的體育關係也是他玩弄計謀的領域。在國與國之間的、社會的、政治的、文化和其他的所有聯系方面，按照他的命令，第一個完全抵制的事件恰好發生在體育方面。首先遭到禁止的是本應於一九四八年十月在貝爾格萊德舉行的巴爾幹中歐運動會。

爲了籌辦中歐和巴爾幹的運動員的這次盛會，以前的貝爾格萊德體育俱樂部運動場，現在的南斯拉夫人民軍運動場進行了擴建。我作爲南斯拉夫體育協會主席，常常在鮑里斯·基德里奇那裏，要求多分給我們幾車皮水泥。儘管鮑里斯不是很愛好體育，他還是樂意那麼做。

除競技運動之外，還有足球。布拉格的斯巴達隊本應同貝爾格萊德的游擊隊員隊比賽，但是布拉格的這個球隊不得不拒絕比賽。布拉格這個俱樂部的管理委員會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給了游擊隊員隊如下一封信：

「我們不得不遺憾地通知你們，我國有關部不允許斯巴達隊前往南斯拉夫，因此今年我們不能去你們那裏。我們很願意同游擊隊員隊比賽，我們堅信，今後我們在體育上的關係仍會正常化。請原諒我們拒絕比賽，因爲這是照上級命令辦的，謹致以運動員的問候。」

這種體育方面的關係，我之所以比較了解是因爲我同斯韋托扎爾·伏克曼諾維奇—泰波這位我的好同志、好朋友發生了一次激烈的爭吵之後，當上了南斯拉夫體育協會主席。

有一天拉伊科·米蒂奇來找我，他向我訴說，他被叫到南斯拉夫人民軍總司令部政治部，那裏命令他從紅星隊轉到游擊隊員隊裏去。米蒂奇解釋說，他回答說，他不能出賣自己的球迷和自己的俱樂部，除非動員他服役。

我專門打了個電話給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泰波同志，而他就向我開了火：說什麼我不懂得游擊隊員隊應當成爲歐洲最優秀的球隊，最優秀的球員都必須在這個球隊裏，這不光是他的願望，而是提出來的政治任務。

我在電話綫的另一頭也大發脾氣：

「得了，泰波，足球不是五年計劃，也不是蘇捷斯卡戰役，足球是娛樂。人們爲這個球隊捧場，爲那個球隊叫好，完全沒有多少道理。這裏往往是感情用事。」

泰波對我大叫大嚷，我就對他說：

「泰波，你聽着，你從三年級起就讀過《資本論》，而我是在足球場附近出生的。如果米蒂奇被迫從紅星隊轉到游擊隊員隊，那就會出現真的政治問題……人民不會諒解這一點的……」

於是我們大吵了一場，一輩子都沒有這麽吵過。但是，米蒂奇沒有轉入游擊隊員隊。泰波還是考慮了我向他提出的那些論據。中鋒耶澤爾基奇代替米蒂奇從紅星隊轉入了游擊隊員隊。在耶澤爾基奇轉過去後，在紅星隊和游擊隊員隊之間的第一次比賽時，出現了名副其實的示威，發出了對游擊隊員隊的噓聲，真是無奇不有。

幾天之後，鐵托同志把我叫去，問到我爲了什麽事同泰波吵了架。我向他説明了游擊隊員隊的情况，同别的球隊相比，這是一個享有特權的球隊，它的隊員立即成了軍官，領工資，該工作的也不工作，我舉球門員紹什塔里奇爲例：

「他的唯一的工作是給軍隊之家上上鐘。」

鐵托同志開始敞懷大笑，接着他問我，是否願意當南斯拉夫體育協會主席，以及問我有没有意思承担這件工作？

「有没有意思，我説不上來。當我在貝爾格萊德東弗拉查爾小學讀書時，我曾被定爲代表隊右鋒，但是在半場時把我換下來了，因爲我不靈敏……自那時起，我暗中有一個願望，想在這方面顯示一番，那怕是作爲領導人……」

我們又笑了一陣，我呢，托上帝的福，就成了體協主席。鐵托同志對我説，所有的俱樂部一律享受同樣的待遇。

當泰波和我和解之後，他誠懇地承認，游擊隊員隊是完全按照蘇聯莫斯科軍隊球隊紅軍中央俱樂部隊建立的。在體育領域內也清楚地反映出蘇聯模式的有害影響。實踐本身表明了，蘇聯的模式是多麼没有道理，帶來什麼樣的政治後果！

但是，當我比較深入地了解了南斯拉夫體育協會的工作之後，我看到，游擊隊員隊不是唯一有過錯的一個隊。儘管它比其他足球俱樂部享有較多的特權，其他許多足球俱樂部也都是按照蘇聯球隊建立的。例如，在莫斯科，紅軍中央俱樂部隊的主要對手是迪納莫隊，據説支持後者的是蘇聯内務部，甚至是貝利亞本人！

我們這裏戰後不久，按照這一樣本，内務部的個别領導人也開始建立「自己的」足球隊。在某些「不發達的」共和國裏，乾脆就派内務部的低級官員，有的還穿着制服，乘着吉普車到各個較小的城鎮去，把最優秀的運動員集合在一起，帶回共和國首府。有些通過這種方式新成立的足球俱樂部，從老百姓中間得到了一個外號——「官辦俱樂部」，直到今天還因這種不光彩的產生途徑而叫苦不迭。

甚至在情報局决議發表的那一天——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在我出席的南斯拉夫體育協會執行委員會會議上，議程之一就是奧西耶克的無產者隊對於同薩格勒布的民警隊的一場比賽提出控告。民警隊在薩格勒布的最高體育機構裏有自己的人，通過了損害無產者隊的某些决定，而對民警隊有利。我們廢除了這些决定，按排了兩場新的比賽。引起了軒然大波。有人進行了干涉。當我拒絶改變决定，因爲真理在無產者隊一邊，聯邦内務部的某些最高領導人甚至都出來過問，我們爲什

麼通過了這樣的決定。但是南斯拉夫體育協會執行委員會沒有讓步。

足球方面的這種放肆行爲不僅軍隊和民警中存在。其他一些共和國機構也想有「自己的」球隊。例如，在貝爾格萊德，在紅星隊周圍開始聚集起一些國家領導人，他們甚至鬧不清紅星是指克拉古耶瓦茨的果醬工廠呢還是指足球俱樂部，主要的是這是「我們的隊」。

游擊隊員隊剛整頓好，紅星隊又開始出問題了。說實在的，我是紅星隊的大球迷，但是當南共中央政治局發佈一項指示，規定不得從國家基金中向足球俱樂部提供任何資金時，我打了一份報告，說我聽說紅星隊從塞爾維亞政府得到大筆錢。但是，兩名好同志怎麼也不承認給了錢，搞得我似乎是撒了謊。一年以後，我聽說紅星隊寫信給球迷們，請予捐款，因爲「沒有全部得到向它表示需要給的」錢。我設法得到了這些信中的一封，我老老實實地向紅星隊管理委員會送去了我的捐款（爲數還不小，我剛得到了我寫的關於阿爾巴尼亞的一本書的稿費），我把信寄給了南共中央政治局，看看誰說了老實話，誰沒有。

從那時起，我心中肯定了一個想法，就是我應當脫離體育機構，體育應當交給運動員們來管，就像我們把工廠交給了工人來管一樣。我依然是所有運動員的好朋友。拉伊科·米蒂奇把自己參加一九四八年倫敦奧林匹克比賽的證件送給我留作紀念，但是國家領導人和其他領導人的干預沒有停止。

有一次，國家足球隊隊長亞歷山大·蒂爾納尼奇向我抱怨：

「外交部的一位高級官員把我叫去，說我們代表隊行將舉行的比賽對國家來說具有巨大的意

義，在組成我們代表隊時，我應聽他的。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他。」

我給蒂爾納尼奇—蒂爾克特出了一個簡短的主意：

「你對他說，當他下次挑選駐國外大使時，讓他聽聽你的意見。他對足球的了解，跟你對我們外交部的幹部政策的了解差不多。」

維辛斯基和一杯辣椒酒

一九四八年秋天，我作為南斯拉夫代表團團員出席了在巴黎夏樂宮舉行的聯合國大會會議。同蘇聯代表們以及其他東歐國家代表的見面造成了令人難堪的局面。在聯合國這次會議的議程上的所有重大問題上——柏林、裁軍、人權宣言，我們都同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代表一起投票，我們以前在國際問題上所持的立場，我們對帝國主義以及帝國主義在世界上的不義行徑的看法，我們一絲一毫也沒有改變，但是以維辛斯基為首的蘇聯代表對我們這種態度却不予承認。

在我們遇到他們的時候，他們乾脆不理我們，或者轉過頭去，以示蔑視。而一九四五年在舊金山，一九四六年在巴黎和會上，一九四七年二月和三月在奧地利的外長會議上，都不是這樣。維辛斯基已經忘記了他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在貝爾格萊德舉行的多瑙河會議前夕對我們的外交官說的話：圍繞情報局決議的政治觀點上的分歧不會妨礙他個人同我們的一些同志的關係。他當時有什麼樣的算計是清楚的。多瑙河會議完全按照蘇聯的願望結束了，而當時本以為南斯拉夫很快會投降。然

而，已經過去三個月了，而南斯拉夫没有發生莫斯科指望的並十分强烈地希望發生的變化。

因此維辛斯基現在選擇了另一種策略——不予理會。我不大注意這個人。在一九四六年夏天巴黎和會期間，我們同代表團團長愛德華·卡德爾以及對巴黎進行短時間訪問的恩維爾·霍查一起拜會了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他們招待我們喝酒，我對於我不喝酒表示歉意，說我是運動員，同時由於戰爭中腦部受過傷，大夫不准我喝酒。維辛斯基不想聽我的，他拿了一隻喝水的大杯子，倒上了辣椒酒（最兇的伏特加，裏面還有一隻小而辣的辣椒），他把杯子遞給我，自己準備了一隻比較小的杯子，並說：

「爲斯大林乾杯！」

我當時爲斯大林連命都可以獻出，更不用説喝一杯伏特加了。我喝完了這一杯辣椒酒，一飲而盡，過了一會兒就倒在沙發上。後來，酒使我頭痛了好幾天。

因此在一九四八年我對維辛斯基採取的態度是以蔑視對蔑視。我只是憐憫馬努伊爾斯基這個烏克蘭老頭，前幾年他跟我説過，他在基輔——他在那裏任烏克蘭外長——在自己的辦公桌上放着我戰時的《日記》。一九四七年，我同愛德華·卡德爾一起訪問了基輔。這是我所經歷的最令人悲傷的一次旅行。從我們在亞希伊踏進蘇聯領土起，經過基輔、勃良斯克，一直到莫斯科，我們看到的只是德國人在撤出蘇聯時所造成的破壞。那時我才明白了蘇聯人民遭受多大的損失。當我望着頭髮斑白的馬努伊爾斯基，我現在這種悲傷感就更爲强烈。情報局到底幹了些什麽，它在上次大戰中共同受苦受難的兩個國家、兩國人民之間又造成了多大的惡感。

這些回憶使我的心情不平靜，促使我在研究人道主義和社會問題的第三委員會的討論中表現得

格外尖銳。一九四八年九月的最後一天，我們討論了將合成麻醉劑置於國際監督之下的議定書。這個議定書早在一九三一年就通過了，其中有一個第八條，規定議定書的條款不擴大到某些列强統治下的殖民地。這就意味着，在居住着二億多人的領土上可以自由地買賣毒品。蘇聯代表帕夫洛夫提了一項修正案，要求改變這條所謂的殖民地條款。

美利堅合衆國、法國和英國的代表反對這一提案。在這一委員會代表美國的是已故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的遺孀埃莉諾·羅斯福，代表法國的是南斯拉夫之友協會會長著名法學家雷納·卡森，代表英國的是工黨議員克里斯托弗·梅休。

在我們的代表團裏，愛德華·卡德爾讓參加各個委員會的代表們有充分的自由和主動性。各個問題在代表團全體會議上原則性地討論一下，代表自己準備自己的發言，如果有必要，同法律和技術專家們進行磋商。

九月三十日那一天，當我聽到美國、法國和英國的代表爲殖民地條款辯護時，我在他們中間進行了一番酣鬥。年邁的卡森捋着鬍鬚，不時舉起兩手。英國人梅休甚至離開了會議廳，而唯有羅斯福夫人平靜地聽取我的攻擊。

過了幾天，輪到討論人權宣言，那時我同自己的對手進行了較量。我指責宣言草案忽視經濟和社會權利，忽視少數民族的權利。我在十月十六日的第二次發言中，在談到宣言第三條時（這一條談到人人享有生活、自由和維護自己的人格的權利），作爲侵犯這些權利的具體例子，我提到黑人在美國的處境，特別是美國發生的虐殺黑人的事件。於是展開了一場討論。

羅斯福夫人很仔細地聽了我的發言，會議結束時她要我真誠地告訴她，我爲什麼不喜歡她當天

的回答？

「當坐在您後面的國務院的那位專家把寫好了的發言稿塞給您時，您說的一切，我就都不愛聽，要是您通過自己的頭腦發言，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羅斯福夫人開始大聲笑了起來，並說她很喜歡這條意見。只是她又說：

「俄國代表談論人權，在我聽來是空空洞洞的，但是你們南斯拉夫人是有信念的。我確信，要是有一天討論起蘇聯或者甚至貴國踐踏人權的事，您也會說出真相……我看到，您對我們的黑人的處境是有研究的……」

「早在我十七歲的時候，我就了解這個問題了。當時我同歐洲和亞洲的一批青年人，我們中間還有好幾個印度人，去紐約參加基督教青年會世界大會。我們當時充滿了理想。但是我們的東道主美國人馬上把我們分成兩組，白人送往第三十三條街的基督教青年會，而有色人種送往哈萊姆。我們當場就同美國人吵了起來，我們問他們，基督的所有的孩子不都是平等的嗎？那是在一九三一年，我很感激美國。我的眼睛睜開了。我在那裏看到了許多不公正的情況，我，而且不僅我個人，包括歐洲來的其他許多青年人都得出了不存在上帝這樣一個結論，因爲要是有上帝的話，他怎麼會容忍這樣的不公正的情况呢？我母親總是教我不要撒謊，所以我一回到貝爾格萊德，我在向基督教青年會六百名會員作關於這次世界大會和美國之行的報告時，一開頭就說：『沒有上帝』……」

羅斯福夫人對於我作爲一個少年在她的國家裏的經歷很感興趣，因此邀請我到克里容飯店裏去喝茶。我們談論了有些文明殘殺異端分子這個題目。我談到斯大林的方法最壞，她笑着說：

「盎格魯撒克遜人對付離經叛道者有一種危險的手段。不是把他殺死，而是採用所謂招致死亡

的親吻的辦法，環境從四面八方包圍他，逢迎他，要是他骨頭不硬，對自己的那套離經叛道的主張沒有足够的信心，他就完了……」

自那以後整整十五年，我經常在聯合國的會議上以及在她家裏會見她。她去世時，我在倫敦的《論壇》和巴黎的《快報》上寫了文章，我從她身上遇到了美國最偉大的反叛者之一。她出身於百萬富翁的家庭，她的一位舅舅（西奧多·羅斯福）曾當過美國總統，她的丈夫富蘭克林·羅斯福也當上了美國總統，但是她還是懂得保住自己的叛逆者的良知，來反對她所生活的那個社會，爲改進那個社會而工作。一九六〇年，她還滿懷激情地談到北方的青年大學生到美國南方去爲爭取黑人的權利而鬥爭，許多人還掉了腦袋。美國知識分子反對越南戰爭，這種造反行動是在她撒下的種子上產生的。當羅素法庭一九六七年五月在遥遠的斯德哥爾摩對美帝國主義在越南犯下的戰爭罪行宣佈了第一道判决時，我想起了這個善良而高尚的婦女。直到今天我還保存着這番回憶。在我寫這本書的房間裏，她的照片就掛在牆上。

第五章　孤立無援

一九四八年一個秋天的傍晚，在聯合國會議期間，我在巴黎塞納河畔散步，我得出了一個可怕的結論：在全世界八十幾個共產黨中，在同斯大林的這場衝突中沒有一個黨支持我們。一個接一個，全都拜倒在他的權威面前，接受了他對我們的指控。

憑良心說，這種局面我是怎麼也沒有料到的。例如，我曾以爲印度共產黨總書記蘭那地夫會設法深入了解一下爭端。但是他的回答却使我涼了半截。印共中央接受了情報局的所有指責，而蘭那地夫一九四八年七月七日的講話，更是落井下石：

「在我國，我們黨不斷地使羣衆了解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鬥爭和成就。在我們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南斯拉夫代表在祝詞時受到印度共產黨人的熱烈歡呼；只有在提到蘇聯的名字時才受到更爲響亮的歡呼。」

最後，蘭那地夫又說，他相信，我們的第五次代表大會將選出新的領導，新的領導將奉行以同蘇聯的牢固友誼爲基礎的新路綫，將抛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性質的老路綫，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正確地運用於南斯拉夫的條件。

塞納河畔的那個夜晚，我考慮了促使蘭那地夫這麼做的原因。我知道印度羣衆處於什麼樣的駭人聽聞的境地，我知道，這一場衝突對他們來說意味着什麼，或許蘭那地夫之所以認爲我們有錯只是爲了在印度羣衆面前保留斯大林作爲爭取解放、反對帝國主義的主要戰士這樣一個象徵。我說服自己，對於印度共產黨人來說，斯大林是一場誤會，就如我們在人民解放鬥爭最艱難的日子裏，在蘇捷斯卡戰役時一樣，當時戰士們呼喊着斯大林的名字死去。

我回到我們所住的德雷舍大街一號大使館時，心情比較平靜了。我們的東道主是馬爾科·里斯蒂奇①，我青年時代的一位朋友，當時我作爲一個十八歲的青年進貝爾格萊德的《政治報》工作。馬爾科是《政治報》編輯米莫·德迪納茨和杜尚·蒂莫蒂耶維奇的同學，我通過他們兩人認識了馬爾科和他的夫人舍瓦。在這一羣人中還有哲學家、詩人科查·波波維奇和詩人拉斯特科·佩特羅維奇，我在里斯蒂奇家裏學到了不少東西，我在那裏一生中第一次喝到了真正的英國式的茶。誠然，我没有接受超現實主義，儘管我是明白超現實主義的：這是年輕人對於保守的美學觀點的抗議。在這一羣人中間，我上了一些名副其實的學習班：關於文學史、語言、寫作以及歷史，因爲馬爾科的祖父就是當年的首相、國王的代表、塞爾維亞出席一八七八年柏林大會的代表著名的約萬·里斯蒂奇。

① 馬爾科·里斯蒂奇（一九〇二— ），文學家，曾任南駐法大使、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主席，現爲聯邦會議成員，曾發表過一系列作品，屬現代派。——譯者

當我自己開始寫書時，馬爾科·里斯蒂奇成了我的某種顧問。他給我出主意說我應當發表一九四五年的戰時日記，他還編纂了這些日記。例如，他幫助我取了《約瑟夫·布羅玆·鐵托傳略》這本書的書名，甚至爲這批連載文章在《作品》上刊出時幫助選定了標題。此外，除了我的夫人韋拉之外，馬爾科·里斯蒂奇是在那孤立無援的時代一頁一頁地讀完了《書中之書》這本書的第一個人。

一九四八年那個晚上，我在巴黎向里斯蒂奇談到使我苦惱的事情：爲什麼各國共産黨都表示反對我們，支持斯大林，儘管眞理和正義都在我們這一邊。我向他談到，對於促使印度共産黨這樣做的原因，我或許還可以理解，但是我很難明白像法國共産黨這樣一個西歐大黨的動機了。

里斯蒂奇不僅作爲大使，而且作爲精通法蘭西文化，特別是熟悉法國進步知識分子的一個人，自己也爲這個問題所苦惱。我們關於法國共産黨在情報局一九四八——一九五三年包圍期間對南斯拉夫的態度的談話，後來又進行了好幾次。當我開始寫約·布·鐵托的傳記時，我仔細地記載了同里斯蒂奇的談話，並把這些談話收進了《書中之書》中。在加利馬出版的法文版鐵托傳《鐵托說……》中，有一篇文章扼要地概述了我們所有這幾次談話，文章是里斯蒂奇爲我寫的。他後來又補充了自己對於一九四八和一九四九年在巴黎的這段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的回憶，並在自己的選集裏發表了這些回憶。我在這裏簡要地提供一下里斯蒂奇對於法國共産黨人和情報局决議的回憶：

「一直到一九四八年，我同多列士的關係要比同杜克洛的關係親切得多，我始終有一個明確的印象，就是多列士不僅比杜克洛來得眞誠，而且作爲個人也來得正直。對於杜克洛的最確切的評價是有一次一位老外交家在議會中對我說，他是一個『騙錢的人』（roublard）（碰巧這個詞從語源

學的角度來看，來源於『盧布』這個詞，從狹義上講，是指善於騙取別人的錢因而有很多盧布的奸詐的人，從廣義上講，就是指騙子手）。

多列士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在他的《法蘭西偉人的政治》一書上，給我寫了這麼一段贈言：『贈給我的朋友馬爾科·里斯蒂奇——法南兩國團結的明證——多列士』，這本書裏收集了他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九年以及一九四五年的講話（也就是說，沒有一句話是在戰爭時期講的）。

書名也好，贈言也好，（從政治上說）具有同樣的特點：在首要位置强調的是民族的因素而不是革命的因素。

可以舉出許多證據、材料和文章，我可以再補充上對我自己同多列士交往的回憶，都說明同一點：在多列士身上，這種强調民族因素，這種法蘭西的愛國主義，不只是策略性行動。這是符合他的感情、他的見解和他的性情的政策。我只舉一個例子：

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日的選舉中，法共得票最多(五百四十七萬三千九百三十三票)，法共政治局要求由法共担任政府總理職務，也即提出由多列士作爲政府總理候選人，在十一月十四日的宣言中强調指出，這麼做是『爲了同願意尊重每一個人的信念和信仰，團結和諧地執行一種民主、凡俗和社會的政策的一切共和黨人緊密合作，這樣一種政策是復興法國的保障』。在同一個意義上，多列士本人更是走得遠得多。例如，他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向《泰晤士報》記者發表的談話中說，法國可以『避開』俄國共產黨人不得不經歷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階段』，由於法國的工人黨，可以立即建立一種『新的人民民主制度』。而第二天，十一月十九日，他在向美國通訊社國際社記者發表

的談話中說，法共不仿效俄國，不把自己的黨同十九世紀中葉就在法國存在的共產主義運動聯系在一起，强調他如果當上政府總理，將不立即貫徹執行共產主義的綱領。『在我看來，國家的團結是法國復興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十二月四日在議會投票時，多列士沒有得到必要的三百一十票，他的候選資格就落空了，儘管他是唯一的候選人。）多列士的這些話被資產階級報紙認爲具有純粹的策略性質，目的在於『規勸和平息輿論』。然而，我的看法是，這些話反映了多列士的眞實願望，就是法共要走自己的路，而不是成爲聯共（布）黨的翻版，更談不上成爲聯共（布）黨的工具了。我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七日同多列士進行了一次長時間談話，也使我獲得這一印象。他在總理府（馬蒂讓飯店）接見了我，因爲他當時還是比多政府中的副總理，比多政府已經辭職，但在十二月十六日組成社會黨一黨的布呂姆臨時政府之前，一直在辦公。多列士在這次談話中再次肯定了他在向報界發表的上述談話中的看法，他甚至提到這些講話，問我是否看到了。爲此，我簡要地向他敘述了一九四六年十月《共產主義者》第一期上發表的鐵托的一篇文章的內容，文章題爲《新南斯拉夫的解放鬥爭和革命改造的特殊性何在？》。多列士認爲，他的看法同鐵托的論點有許多共同之處，因此請我一定把鐵托這篇文章的譯文送給他，他沒有看過這篇文章。我把譯文交給了他，而當我此後又去多列士那裏時（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他見了我就對鐵托這篇文章表示贊許和欽佩，甚至還轉述了一些段落（例如：鐵托駁斥了一些荒唐的解釋，說人民解放鬥爭是由於我國有高山森林，是由於我們的宿命論等等才得以成功）。他的淡藍色的眼睛，他的長着短鼻子的圓滾的、始終帶點紅光的孩兒般的臉龐，充滿了笑容，他揮動着肉墩墩的手，稍微作了一點簡化，重複着鐵托的論點，他顯然感到滿意。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底，在貝爾格萊德舉行了南斯拉夫人民陣綫第二次代表大會。鐵托發表了一篇在國外引起巨大反響的講話，他在講話中談到『世界上所有進步力量』有必要『日益聯合起來爲爭取和平而鬥爭』，他又說，他認爲『世界上一切民主力量的代表能够聚首一堂，談談國際合作應當是怎麼樣的，爲了防止新的戰爭災難應當如何工作和鬥爭的時刻將會到來』。鐵托在作人民陣綫的報告之前，强調『內部發展的進程對於每一個國家來說都是有特色的』，不能『把在我們這裏發生的事情千遍一律地照搬到其他國家去，反之亦然』。鐵托在這次講話中還指出，『在某些國家裏，人民陣綫同其戰爭爆發前夕和偉大的解放戰爭期間的任務不相適應』，他解釋說，這是由於在這些國家裏，人民陣綫是通過形形色色的政黨的領導人『自上而下』的協議建立的，而這些領導人有時『不僅動搖不定，而且還是反動的、賣國的』，因此這些人民陣綫更多的是具有宣傳性質，没有能力來『不惜一切代價地』反對『國內反動派和日益增長的法西斯戰爭危險』。『因此，某些國家的共產黨没有完成自己的同佔領者作鬥爭和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權的組織者的任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爲之辯解。換言之，它們没有能够從一開始起就推動廣大羣衆並領導這些羣衆。即便後來在某些國家裏也對佔領者作了一些抵抗，這一鬥爭也是既没有統一的性質，也没有取得符合人民的願望的應有的成績。當然，其結果是反動派又在這些國家裏掌了權』。

法共某些領導人對於鐵托對某些共產黨——很清楚，首先是法共——的錯誤和弱點的這一批評感到憤怒，這是多列士的夫人、法共中央委員讓內·維美徐十月四日公開地向我表示的。那一天，多列士、維美徐和馬賽爾·加香在我們大使館進午餐。多列士像往常一樣地親切，而年邁的加香則

不僅僅是親切，而且十分激動，都快掉下眼淚來了，自從他從貝爾格萊德回來以後（一九四六年他去貝爾格萊德參加了五一節慶祝活動），他在遇見我們南斯拉夫人時總是這樣，總是懷着同樣令人感動的激情重新提到自己同我們的革命、同鐵托的這次會見。似乎貝爾格萊德五一節大檢閱的情景已經作爲永誌難忘的經歷保存在這位老人的心田中了。多列士也好，加香也好，對於鐵托在人民陣綫代表大會上的講話没有作任何的，哪怕是最小的影射，當然，對於同樣在九月底在波蘭舉行的建立情報局的九國共產黨會議，就更談不上了。午餐就這樣，是在友好的氣氛和熱烈的談話中進行的，僅就我所記得，談話没有出現什麽比較重大的問題，只是多列士和加香批評了法共機關報《人道報》的一些差錯，午餐後，我們轉到客廳裏喝咖啡，我同維美徐呆在一起，我們兩人站在壁爐邊，裏面生着火，因爲這一天是初秋天氣比較冷。她問我，有没有看到反動報紙援引鐵托講話中顯然是指法共的那段話，説反動報紙十分滿意地突出了這段話。隨後她開始埋怨，責怪鐵托不考慮他的話在法國可能造成的影響，這些話有損於共產黨人，是往反動派的磨盤上注水，反動報紙别有用心地援引鐵托的話就證明了這一點。我爭辯説，鐵托知道他在幹什麽，不應該僅僅根據脱離上下文單獨抽出來的一段話（因爲她還没有看過講話），更不應該根據反動派憑藉這段話濫加引用來判斷鐵托這篇講話的國際主義意義，但是她不想聽。她對於我提出的論據一個都不同意，繼續明顯地惱怒地談到他們的困難，談到特别是鐵托方面有必要更多地考慮到他們的處境。對於華沙會議，她没有作任何影射。

然而，她首先想到的恰好是這次會議。第二天，十月五日星期日，法共機關報發表了關於這次『情報會議』的文件（公報、宣言、决議）。决議宣佈成立情報局，總部設在貝爾格萊德，而在與

會的各國共產黨的正式名單上，南共名列首位。然而，維美徐在同我談話時必定知道的是，在這次會議上，法國黨常常受到批評，杜克洛和法戎的處境十分難堪。他們親身經受了這一批評，從華沙回來時很可能是滿腔的怨恨，法共的某些人士，首先是他們兩人，從此以後再也不能原諒南斯拉夫人積極參加了對法國黨的過錯和弱點的這次批評。

出於容易理解的理由，他們對於南斯拉夫共產黨人，首先對於鐵托本來就有一種低人一頭的感覺，這就使他們對我們的怨恨更爲强烈。法共一些領導人身上的這種感情的色彩，從政治上和心理上講，是各各不同的。在多列士身上，我的印象是，這種感情所具有的形式與其說是忌妒，不如說是對他未能實現的某些事情的一種憂傷的懷念：鐵托在戰時呆在自己國內，舉行了起義，實現了革命，而他却呆在蘇聯，資產階級在戰後，每天都在報紙上和議會裏當着他的面稱他爲逃兵。戰時任我們駐蘇聯大使的斯塔諾耶·西米奇曾告訴我，多列士在古比雪夫向他訴苦，說俄國人不讓他回法國領導抵抗運動，以免破壞俄國人同盟國的關係。他曾親自向斯大林交涉，但是沒有成功。

在加香身上，可以說，根本不存在這種低人一頭的感覺：他年邁了，甚至有點老態龍鍾了，但是仍然是一位正直的戰士，對於存在一個革命取得了勝利的國家，而又是像鐵托這樣一個人在領導這個國家，他從感情上來說是感到高興的。

在杜克洛身上，這種感情帶有惡毒的色彩。因爲歸根結蒂，在戰時和在佔領下，他是呆在自己國內的，但是他拿不出什麼東西來可以證明，他在組織同佔領者的鬥爭上面起了某種決定性的領導作用，甚至不能證明，他究竟起過什麼作用。

在這方面，維美徐的態度是出於別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個人的原因，或許是接近杜克洛的態度

甚於接近多列士的態度。這位高高的、瘦削的、綫條還相當美但是粗俗的婦女的內心，是軟硬並存的，我從來都搞不大清楚。然而，從後來發生的一些事件來看，我有理由認爲，不僅在對南斯拉夫的態度問題上，她的曖昧的個性起了顯然有害的、實際上是致命的作用。

那一天，我們站在壁爐邊，她用她那壓低了的沉悶的嗓子十分惱怒地講着話，她必定不僅想到波蘭的會議，而且想到法共同南斯拉夫和鐵托相比所處的地位，她的感情是下意識的欽佩混雜着忌妒，因爲局勢使得甚至法共自己也不得不把鐵托的黨的勝利當作一個榜樣，而正是這一點會使人作出有損多列士的黨的某種比較，儘管法共在無產階級面前對於自己的失敗可以找出種種『減輕罪責的情節』。（但是，這些「減輕罪責的情節」之一，他們是怎麼也不能提出來爲自己辯護的，這就是：法共的行動受到蘇聯的國家政策的束縛和制約，俄國人竭盡一切努力，不讓法國共產黨人領導抵抗運動。）

在那些日子裏（一九四七年九月底和十月初），法共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運動，爭取擴大自己的主要報紙《人道報》的發行量，在這一宣傳中突出了鐵托的高大的，對法國羣衆十分有吸引力的形象。巴黎到處都張貼着對《人道報》來說是規格很大的廣告。廣告的中央用大紅字體印着鐵托的名字，宣傳西蒙涅·特里寫的報道。這一報道剛巧是在發表波蘭會議的消息的十月五日星期天這一期上開始登出的，題爲《我見到了鐵托》。這一期的頭版用大紅字體刊登了宣言中的口號：『各國共產黨的基本任務是：維護他們的國家的民族尊嚴、獨立和主權，使之不受帝國主義的計劃、擴張和侵略之害』。恰好在這一口號下面開始登載上面的報道。在同一個頭版還登了鐵托的照片，說明是：『鐵托元帥最近在貝爾格萊德召開的南斯拉夫人民陣綫代表大會上作報告』。在最後一版上，

在宣言的中間登了一張貝爾格萊德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游行的照片。

這種突出南斯拉夫的做法，以及西蒙涅·特里的無疑是真誠的，但是用幼稚的方式表現出來的熱忱，是符合許多法國人，其中包括大多數共產黨人，對南斯拉夫和鐵托不僅表現出來的，而且也是心裏真正懷有的那種真實的欽佩感和好感的。但是斯大林已經早就開始自己卑劣的陰謀，其目的在於通過巧妙地擊中某些痛處，使歐洲兩個最大的共產黨法共和南共發生衝突。情報局的建立本身很可能就是一個預謀的，主要是反南的計謀，目的在於給各國共產黨套上枷鎖，並利用被套上枷鎖的南共作爲給其他黨套上枷鎖的工具，要是不能給南共套上枷鎖，那就使南共在其他黨的心目中，特別是在法國黨的心目中信譽掃地。爲了使這一權謀術兌現，正如我們看到的，俄國人發現，法共領導中的某些人士對南斯拉夫的忌妒情緒是很適合實現這一勾當的。

一九四七年，多列士本應到南斯拉夫來。斯大林不希望兩黨接近，不希望鐵托和多列士接近，巧妙地採取了一個一石兩鳥的行動，阻撓了多列士的南斯拉夫之行。

多列士於是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動身前往莫斯科，而不是前往貝爾格萊德……

情報局決議的發表好比爆炸了一枚炸彈。有一位共產黨的人民議員——他還是中央委員——聽到關於決議的第一個消息時，不僅感到意外，而且完全不相信，他說這是『記者杜撰的謠言』或者是『資產階級的挑釁』。這是另一位人民議員，一個進步黨人，他當時正同這個共產黨人在一起，告訴我的。這樣的情況決不是孤立的。

決議給法國共產黨人和共產黨的支持者所造成的印象確實可以歸結爲極大的困惑和混亂，甚至

某種程度上的意志消沉，好像是在經受了某種意想不到的失敗之後的情況。六月二十九日《人道報》發表決議後的頭幾天，法共領導就傾全力來滿足蘇聯的發號施令者的要求，按照完全贊同決議的精神來動員幹部和羣衆，同時也感覺到決議在羣衆中引起了不理解、不安，往往還有不相信和恐懼。當然，下的指示是在黨的所有的支部、所有的羣衆團體中以及在黨的報刊上對決議本身以及法共領導對決議所持的態度進行解釋。因爲人們對這兩者都不明白：決議的真正的意思以及羣衆不大理解法共領導對法國沒有多大利害關係的一件事如此賣力和熱心，羣衆也很難理解爲什麼要反對一個黨，反對南斯拉夫黨，首先是反對一個人，反對鐵托。鐵托在此以前不僅從來沒有受到共產黨人的公開批評，而且享有最大的聲望。當然，法共領導的反南活動，按照俄國人的心願，必須是直接指向南斯拉夫和鐵托在法國所享有的這種巨大的聲望的。當然，論據是混亂的，往往在本質上是自相矛盾的，致使羣衆不能理解到底是怎麼回事，許多人只是清楚地看到，對南共提出譴責的真正原因不是決議中所列舉的那些理由。共產黨員們可以說不能設想，聯共（布）黨中央會犯這樣大的錯誤，但是他們同樣很難突然不以批判的眼光就接受南共中央和鐵托就是現在告訴他們的那樣，也即同迄今爲止全體進步人士心目中的一切截然相反的形象。法國黨的領導在執行指示上是很熱心的，從最初幾天起，杜克洛和法戎就表現得尤爲突出，當然，法共領導從共產黨情報局反對我們的攻勢一開始起就必然大搞其欺騙活動，大撒其謊。這種有計劃地歪曲事實和粗暴地進行誹謗的做法，像在其他各地一樣，必然會產生一些影響。當然，還需要加上黨的紀律以及致力於不損害黨的團結和不削弱『民主的和平陣綫』這樣一個因素。決議在法國共產黨人的隊伍中造成了令人極其痛苦的印象：要是法共不是法國唯一的工人黨，要是蘇聯的催眠力不是那樣强的話，決議的影響，決議所意

味着的一切所產生的影響，對於法共來說將是災難性的。因此，大多數共產黨人，在決議發表後的頭幾天只是希望『爭端盡早得到平息』。

這一切，我從七月一日同儒爾貝·德桑布蘭（皮埃爾·戈特派的議員）的談話中就可以得出結論了。在這次談話中，儒爾貝·德桑布蘭就像他在議會中一樣認爲，他的職責是以其謙恭的方式維護法共的態度。然而，他表示極其担心整個這一事態產生『對我們大家都是危險的』後果，『這一事態給反動派提供了口實，削弱了世界的，特別是法國的人民力量的地位』。他的唯一的希望是找到某種『妥協的安排』，實際上他沒有明說的是希望我們讓步。對此，我對他說，唯一的解決辦法是承認所做的不公正的事情，犯了錯誤的人必須糾正錯誤，並有人出來承担後果，但是這個人不是鐵托。耐人尋味的是，他最後還是承認法國共產黨人『走得遠了一點』，他又說，他將『提請他們注意，在自己的報上發表這樣的文章只會損害自己和其他進步力量』。真是個天真純樸的人！……

事情很清楚，南斯拉夫事件作爲蘇聯干涉一個友好國家的內政的事例和明證，對於所有那些同情共產黨的人（例如皮埃爾·戈特、伊夫·法奇等，又跟我保持了一年多時間的友好聯系，直到這種聯系對他們來說已變得十分危險爲止）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但是，同儒爾貝·德桑布蘭一樣，例如也是（戈特的）URR派成員的柏蒂將軍也認爲，爲了不削弱法國的民主陣綫的團結，他們決不能同共產黨人鬧分裂，因此這位可憐而善良的將軍也就不同一批進步天主教徒一起訪問南斯拉夫了，儘管他當面說過，他決不同意對我們的攻擊，也不同意法共針對我們搞的陰謀。

在黨的知識分子中間，很少有誰真正相信（對南斯拉夫的）指責是有根據的，他們由於自己的那種往往是機會主義的、嚇破了胆的動搖態度而尋求形形色色的解釋，最後，有的早一點，有的晚

一點，又都屈從於指示。黨內的『托洛茨基化』的分子急忙把自己打扮成黨的路綫的最熱心的捍衛者，儘管他們（當然）不能總是準確地猜中黨的路綫。這種情況是不足爲怪的。例如皮埃爾·艾爾弗在（情報局）決議發表的同一天，在法蘭西電台的麥克風前的一次討論中指責鐵托所持的過激態度阻礙了東西方達成協議，在這一點上同他的朋友古達德的假設是一致的，這是完全自然的事，但是同共產黨情報局官方的論點，即認爲鐵托『已倒向帝國主義陣綫』是絕對不一致的。（再說，這樣措辭或者那樣措辭，反正是一回事，對鐵托的指責實質上有一個相同的意思：應當消滅鐵托，因爲他走自己的路，因爲他首先考慮的是南斯拉夫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俄羅斯國家的擴張主義政策的利益……）

今天，我回想起自己——不光是我個人的——一九四八年的幻想時，感到不奇怪，我們當時認爲，決議將對法共產生嚴重的、但從最終的分析來看是拯救性的後果，或許會引起一場危機，這個工人大黨可能經歷了這場危機後得到新生，變得純潔，加强了自己的獨立性。沒有發生這樣的情況，現在就更使我不感到奇怪了。杜克洛、法戎和法共其他領導人盲目地屈從於莫斯科而置法國的利益於不顧，（情報局）決議所强調的這一新的所謂的『國際主義』方針，決議中所包含的對待農民的態度，所有這一切會造成嚴重的後果，看起來這可能是符合邏輯的，但是莫斯科的『擁抱』過分緊，致使本質上是機會主義的法共不可能擺脫它，不可能對於根據法國人民的真正利益向它提出的政治路綫作出反應。法國黨的弱點就在於在這種情況下使它獲得了可悲的、表面的力量。

幾個月之後（一九四九年二月），我們只同皮埃爾·戈特進行了一次談話，他在談話中，把法國共產黨人對我們的態度稱爲『荒謬絕倫和白痴般的』。（他們後來也設法迫使他採取完全類似的

態度。）然而，戈特解釋說，法共從一開始起就不可能採取別的態度，因爲考慮到它在莫斯科的地位以及黨內的形勢，它不可能不支持決議，而同聯共（布）黨唱反調。更爲重要的是，在法國黨內早在決議發表前幾個月就存在內部的危機，有使黨發生分裂的危險。據戈特說，危機的原因是黨的某些領導人，包括多列士本人在內，不同意克里姆林宮所要求奉行的策略，我們在這次談話中半開玩笑地把這種策略叫做『蘇聯第一』（「首先考慮蘇聯」）。多列士曾（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被叫到莫斯科，據戈特說，他在那裏曾對强加這條路綫作了抵制。在莫斯科的堅持下，多列士屈服了，表示『試試』在法國貫徹這條路綫，但是他自己事先就認爲這樣的政策是不符合法國的實際情況的，他不相信會成功。積極參加反對我們的運動屬於『遵守紀律』貫徹這條路綫之列，儘管據戈特認爲，法共的許多領導人從一開始起就認爲（情報局）決議是沒有根據的。」

帕爾米羅·陶里亞蒂談一九四八年

爲什麼意大利共產黨在一九四八年同南斯拉夫的衝突中站在斯大林一邊？哪些動機促使它這麼做？帕爾米羅·陶里亞蒂在一九六四年夏天在克里米亞去世前六個月爲歷史留下了自己的解釋。

意大利共產黨是西歐最大的共產黨。黨內始終有强大的思潮首先把社會主義理解爲把人的價值提高到更高的水平，而不只是搞工業化和建設物質方面的生活。三十多年來，這個黨的主要人物是帕爾米羅·陶里亞蒂，共產國際的最高領導人之一，而他又在晚年宣佈了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的特

殊性原則，也就是說，申明反對斯大林主義的教條。

而爲什麼他在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沒有這樣做？當時他在情報局第二次會議上甚至作了題爲《工人階級的團結和共產主義運動工人運動的任務》的報告（當時，南共中央領導被宣判爲「殺人犯」和「法西斯分子」）。

關於這一點存在各種各樣的意見，有些人指出，陶里亞蒂是令人難於置信地靈活的，致使他得以在斯大林身邊呆了幾十年，而既沒有丟掉腦袋，也沒有失去地位，却又宣傳，甚至貫徹他自己那一套異端邪說。還在斯大林和我們的中央交換信件時期以及在情報局第一個決議發表後不久，意大利共產黨的某些高級領導人就試圖向我們表示，應當靈活點，到莫斯科去，表示一下懺悔，回國後再照老樣子幹。另一些批評陶里亞蒂的人說，一九四八年對他來說來得正好，因爲意大利的右派一直在批評他，說他在尋找解决的里雅斯特問題的辦法上對南斯拉夫人讓步過多。他在一九四八年表示支持斯大林，反對南斯拉夫，這就同時堵住了意大利沙文主義者的嘴。

而在一九四八年又有一種看法認爲，陶里亞蒂在報復南斯拉夫人，因爲南斯拉夫人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在波蘭舉行的（情報局）第一次會議上批評了意大利共產黨。一九四八年夏天，一位意大利的共產黨人說，「你們想把情報局變成砍其他黨腦袋的法庭，你們在那裏玷污了自己的雙手，現在輪到你們來順從你們自己所倡導的這一原則了」。

但是，另一方面，陶里亞蒂本人除了參加了一九四九年的情報局第二次會議之外，没有對南共中央提出多少批評，這件事更多的是由意大利共產黨其他領導人，特別是的里雅斯特的維達利來幹的。

而一九六四年，陶里亞蒂決定陳述並解釋意共中央對斯大林和南斯拉夫人一九四八年的衝突的態度。他於一九六四年一月曾對貝爾格萊德進行過短時間的訪問，回到意大利後，他於一九六四年二月一日在《再生》周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爲《南斯拉夫之行》，文章用下面這番話分析了一九四八年時的形勢：

「關於一九四八年的決裂的根源和情況已經談論得很多了，但是我並不認爲全都完全弄明白了。對於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人來說，對於團結和紀律的那種深刻的、傳統的獻身精神，無疑是他們的行爲的決定性因素，幾乎三十年來，這種精神一直是我們的運動的特點。共產國際解散後，在同過去極其不同，各國都不相同的形勢和任務面前，研究採取什麼方式團結和紀律才能得到保障和必須得到保障，這一工作沒有完成。

未經討論就把南斯拉夫人開除出情報局。

在西班牙和戰時對南斯拉夫同志有了解的共產黨人不相信那些警察性質的荒唐詆毀，後來據說，這些詆毀是貝利亞捏造的。

但是這種詆毀却散佈和造成一種方針，這種方針注定要在後來表明是極其危險和有害的，對某些黨來說尤其如此。

但是，最糟糕的是，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的決裂和論戰（當然還有別的原因）所引起的我們的運動在許多國家，在大多數國家，在意識形態和政治的發展上停滯不前。

至於說斯大林以及他的爲其他所有人都接受的倡議，對此的評價比較複雜，對此的討論尚未進行到底。

斯大林肯定没有想到南斯拉夫的一批領導人是如此嚴肅，如此堅强，這批人同南斯拉夫人民羣衆保持着如此緊密的聯系。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它表明在判斷使一些國家全體人民的歷史發生深刻變化的事實和情況上的那種官僚主義的膚淺馬虎。但是這一錯誤並不能說明決裂的基本原因。依我個人對事物的觀察方式而論，應當到思考問題的方式，到每一個國家的內部發展和國際局勢，到戰後出現的人民民主國家的現實情況和前景中去尋找這些原因。

可以回想一下，早在一九四八年前，也即戰後不久，就開始在探索這一新形式的社會主義社會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形式方面提供了什麽新東西，在很大程度上這種探索已經實現。但是，這種摸索中斷了，一切都用一個經院式的公式來解決：人民民主制度只是在蘇聯所實現的無産階級專政的『同義詞』。

這樣，當代向工人運動提出的最大的歷史課題，尋求社會主義的新道路，建設新形式的民主政權並在此基礎上用新的方式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的課題——這是主客觀環境要求我們做的——不幸，這一切全都幾乎被歸結爲一個術語問題……

今天，我們不能迴避這些課題的提出和解決，這些課題還是爲人們衆所周知了。但是，失去了許多時間，犯下了本來可以避免的錯誤。

當然不能忘記，一九四八年已經掀起了反對人民民主國家政權和蘇聯的冷戰。國際局勢的前景是混沌的。許多步驟，許多尖銳化的情況，是勢所難免的。但是，這就使人更難解釋，斯大林爲什麽恰恰要在這個時候同南斯拉夫國家和南斯拉夫人民決裂，其全部後果是不可能預料到的。

由此可見，這裏提出的問題實質上是考慮和組織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它們在國際上的必

不可少的團結一致以及同樣必要的獨立和自治的問題。

關於新民主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關於這些國家同蘇聯的關係，在一九四八年以前就曾討論過，但是討論的情況人們了解不够，還不能從中得出結論。

蘇聯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的解放戰爭中在軍事上所取得的偉大勝利使斯大林冲昏了頭腦，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很可能他把這一切全歸功於自己，以爲他現在可以爲所欲爲……」

陶里亞蒂在一九四八年過去了十六年以後寫的分析，無疑從十分廣泛的角度闡明了斯大林同南斯拉夫人的衝突。這裏，他也承認了自己的一部份謬見。從這篇文章中也可以猜測他在一九四八——一九五三年間對我們的態度的原因，但是對歷史來說，重要的是他對歷史進程的評價，即社會主義是以多種多樣的形式在發展的，在一九四八年情報局發表反對南斯拉夫的決議的時候，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問題以及社會主義在每一個國家的自由發展的問題就十分尖銳地提出來了。

令人告慰的是，一九四八年只有南斯拉夫人明白的事(從世界各國共產黨的譴責來看)，今天，在發生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後的一九六八年，已爲全世界大多數共產黨所接受了。

這豈不是證明歷史還是在前進，還是在痛苦地、有時是緩慢地，但却是始終不斷地前進?!

中國共產黨人和情報局決議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完全接受情報局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反對南斯拉夫的決議，從而同

世界其他各國共產黨一起對南斯拉夫人表示譴責，這一消息使我目瞪口呆。

對於東歐各國共產黨的態度，我還能够向自己解釋清楚，在這些國家裏有蘇聯軍隊，甚至某些西歐國家共產黨的態度，我也還能够向自己解釋清楚，它們正在同本國資產階級作殊死的鬥爭，它們極其需要蘇聯的援助；但是毛澤東這樣輕易地放棄了每一個國家有權走各自的道路走向社會主義這項原則，放棄了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平等原則，這一點我怎麼也想不通。

誠然，只是在一九四八年以後，我才充分地理解到，中國革命和我們的革命同斯大林對革命的教條主義的概念有多麼深刻的不同，兩個革命——中國的革命和我們南斯拉夫的革命儘管有各自的特殊性，又具有多少共同點。在中國也好，在南斯拉夫也好，社會主義關係不是像斯大林所設想的那樣是通過擴大蘇聯的國界來創建的，而是通過兩國羣衆的頑强鬥爭和自我首創精神創建的。在游擊戰的戰略和策略上，毛澤東和鐵托也找到了非常相似的解決辦法。主要的基地不應完全放在城市裏，而應放在全國，放在農村，那裏生活着大多數居民。隨着在全國範圍內加强游擊隊的活動，運動在城市裏的影響也就增長。在兩國、兩個運動之間，没有進行任何接觸，没有交流任何經驗，但却確定了這一戰略和策略。

那麽，中國同志又怎麽能屈從於一九四八年的這一可恥的決議呢，這項决議的矛頭不僅是針對我們南斯拉夫人的，而且是針對中國革命本身賴於發展和勝利的那些原則的。

我試圖從一九四八年夏天他們的處境來找到答案。中國人當時正全力對蔣介石發動攻勢，後者得到美國的全力支援。或許他們表態支持我們的話，在他們的革命的關鍵性鬥爭關頭會妨礙同蘇聯的關係。

但是，這裏涉及的是各國共產黨平等的原則，搞社會主義的新道路，而這是中國人不能放棄的。我想起了斯大林一九四八年二月對卡德爾、吉拉斯和巴卡里奇說的話，戰後應斯大林的邀請，中國領導人到了莫斯科，而他對他們說，「中國沒有發展起義的條件，中國同志應當同蔣介石達成維持正常關係的暫定條款並解散自己的軍隊。中國同志在這裏，在我們面前，在口頭上同意了蘇聯同志的意見，而當他們回到中國，他們做的却是另一回事。他們聚集了力量，改組了軍隊，現在在痛擊蔣介石……」

是不是中國同志現在又這樣幹開了。出於策略上的考慮表示順從情報局反對我們的決議，而現在仍走自己的路，按照中國的條件所要求的那樣在進行革命。

但是，這麼做從道義上講對頭嗎？尤其是中國第二號人物劉少奇的一篇文章使我怒不可遏。文章是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初發表在莫斯科《真理報》上的，題目是《國際主義和民族主義》。他在文章中完全支持斯大林反對我們的立場。我自問道，他發表這篇文章是否是想挖中國革命的牆脚？我看過這篇文章後，對密洛凡·吉拉斯說：

「出於策略上的考慮的話，馬馬虎虎可以將就過去，但是有人既要賣身投靠又要權充正經，這就完全該受到譴責了……」

儘管（中國）採取諸如此類的態度，我們對於中國革命還是講原則的。當中國革命終於勝利了，中國第一個人民政府建立起來了，南斯拉夫在第一批承認了它。蘇聯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我們是在十月五日，比北朝鮮、外蒙古、東德、阿爾巴尼亞、北越還要

早。

西方列强向我們施加了壓力，不讓我們承認，但是我們堅持了原則。而當在聯合國提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接納它爲這個世界組織的成員的問題時，我們始終投票贊成，儘管我們同蘇聯是有分歧的。

愛德華·卡德爾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向《紐約時報》記者發表了談話，對於「中國共產黨人和南斯拉夫共產黨人有某些共同的觀點。他們儘管都是共產黨人，但是不承認蘇聯有權對他們的內外政策發號施令」這個問題，他回答說：

「中國共產黨人和蘇聯領導人之間的關係，我們不了解。迄今爲止，中國共產黨人是支持蘇聯政府發動反對南斯拉夫的運動的，雖說他們對南斯拉夫的局勢和我們的態度一無所知。

而中國和南斯拉夫却是經歷了形式類似的發展的：

都是靠自己的力量獲得解放的，在國家建設和其他建設上都有不同於蘇聯的特殊形式，因此這使人認爲中國在內部發展上將走自己的路，將堅持同蘇聯保持平等關係的原則，尤其是它是一個大國，不像南斯拉夫，是一個小國。」

密洛凡·吉拉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五日在紐約發表的一次談話中也說過意思相似的話：

「我認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按照自己特殊的方式發展，而不論它同蘇聯的關係將會如何。」

只是在斯大林死後，在中南兩國代表有了首批直接接觸之後，才有可能比較多地了解到中國人一九四八年對我們的態度的原因。一九五五年五一節，我們有一個工會代表團在北京參加慶祝活

動。代表團在中共中央花了整整十二個小時談一九四八年。對於這場衝突，中國人什麼都想知道，直到最細微的細節。最後他們說，他們仍堅持一九四八年情報局的立場和譴責的立場，「但是同我們談話」。在北京的文化公園裏有一幅世界大地圖，上面標有美國在社會主義國家周圍各國所設的基地。南斯拉夫被說成是帝國主義世界的一部份，有美國的三個基地。我們的人向中共中央提出抗議，第二天這些美國基地從地圖上拿走了。

一年以後，中國議會代表團訪問了南斯拉夫，中國人在同南斯拉夫代表談話時說了老實話。在薩拉熱窩和盧布爾雅那，他們都談到一九四八年：

「……我們罵過你們，現在你們有權責備我們一萬次……我們當時處境困難，陷於封鎖，四面被包圍，最後，說句老實話，整個事情我們也不大了解……」

一俟出現了比較强烈的跡象，表明蘇聯和中國之間存在衝突，就作了更爲公開的承認：

「李立三和王明（中國革命過程中蘇聯方針的代表人物）的教條主義給中國共產黨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在這一教條主義佔統治地位的時期，正是這兩個人在領導中國共產黨，當時毛澤東受過二十次處分，甚至被逐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

我想，我再一次指出南斯拉夫和斯大林一九四八年的衝突的國際化這個事實，我並沒有誇大其事。這裏所涉及的，不僅是一個大國和一個小國之間的衝突，不僅是維護南斯拉夫的獨立，而是同時也是維護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平等原則，也是每個國家按照特殊的道路走向社會主義的權利問題。

南斯拉夫人一九四八年感覺到了這一點，雖説當時他們還有使自己受到束縛的教條主義，還對斯大林和蘇聯有種種錯誤的看法。我們從四面八方遭到唾棄和攻擊，但是我們安然維護這些平等的原則，這些原則在情報局反對南斯拉夫的決議發表二十年之後的今天，正如黑山的老游擊隊員馬爾科·武亞契奇形象地表達的那樣，已成爲「從亞得里亞海直到日本」的活生生的事實。

真正的革命家格奥爾基·季米特洛夫

在南部斯拉夫人的現代史上，自從開始了爭取解放和自决的鬥爭以來，在南部斯拉夫人的各國裏的最進步的人士一直在夢想創建一個南部斯拉夫人聯邦，居住在歐洲這一地區的各個斯拉夫族人民，包括保加利亞人在内，都參加這一聯邦。

竭力反對這一政策的，首先是一切列强，從奥匈帝國起，直到沙皇俄國。它們全力以赴，使南部斯拉夫族人民四分五裂，爲了不建立這樣一個聯邦國家，它們在每一個南部斯拉夫族國家内部往往依靠王朝和其他保守集團。

如果我們看一看巴爾幹的最近的歷史，不幸的是，我們將會看到，在上次世界大戰末期以及戰後不久，斯大林採用的是同樣的方法：分而治之。在南斯拉夫，以及在保加利亞，存在以鐵托和季米特洛夫爲首的强大的力量，希冀有朝一日真正建立一個所有南部斯拉夫族人民的聯邦。

格奥爾基·季米特洛夫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作爲社會黨的議員，就抨擊過保加利亞大兵在

被佔領的塞爾維亞，特別是在托普利察的橫行霸道，一九一六年起義後，在托普利察有數萬男女被殺害。羅奇科·喬拉科維奇叙述說，季米特洛夫一九二三年被迫流亡南斯拉夫，塞爾維亞的共產黨人在尼什迎接他。除他們外，到車站迎接的還有尼什的主教，偕同聖職人員，他們是爲了對季米特洛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對塞爾維亞人民的援助表示感謝。

後來，季米特洛夫作爲共產國際的高級領導人，也竭盡所能，使保南兩國的關係置於盡可能牢固的基礎上。然而，這不符合斯大林的盤算。莫沙·皮雅杰在寫給我的一封談他同斯大林的會見的信中形象地談到這一點：

「我同斯大林只有過兩次個人接觸，這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在三天之內發生的。我當時在莫斯科，率領一個南斯拉夫代表團，代表團的任務是同保加利亞政府代表團一起，在經過以前的籌備之後，制訂出南保聯邦條約的最後文本。關於談判的經過，我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聯邦國民議會辯論預算時的發言中根據官方的文件，已作了充分的陳述，我當時駁斥了在對特拉伊喬·科斯托夫審訊案中就這件事所捏造的謊言。

我在發言中還提到，在兩國代表團到克里姆林宮拜會斯大林時，他贊成保加利亞提出的二重聯邦的論點，也即建立這樣一個聯邦，在這個聯邦裏，保加利亞不是七個南部斯拉夫人共和國中間的一個，而是我們的六個共和國構成一個單位，保加利亞構成一個單位……我當時完全處於斯大林的權威的影響之下，我覺得反對他是很不適宜的，不過我還是立即用不多的話表達了自己的相反的觀點。

當我們兩天以後到斯大林那裏進晚餐時，他自己開始了同一個內容的談話，這時却主張，保加利亞可以只是七個聯邦單位之一。在保加利亞人中間，當時沒有人敢於回到二重聯邦的想法，而我

再也没有理由進行干預。

我們的第一次拜會事實上只是一次禮節性拜會，我注意使拜會不超過二十五分鐘。整個拜會是站着進行的，關於建立聯邦的討論只是在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和我之間講了幾句話。

在兩天以後的晚餐上，招待我們吃一條西伯利亞的很大的凍魚，我們用喝白酒的小酒杯喝葡萄酒。鑒於俄國的習慣是不斷地祝酒，這麼喝是很聰明的。不過，這只是前一天的晚餐的結果，出席前一天的晚餐的有以安德烈·赫布蘭爲首的我們的經濟代表團，晚餐時是用平常的酒杯喝的，後果十分不妙。看來，對於東道主來說，再像昨天那樣大喝一通是過多了。在俄國人方面，在桌旁坐下的還有馬林科夫、布爾加寧、維辛斯基、貝利亞以及其他人。

在晚餐時無所不談，也談到各種食品和酒。突然，斯大林問保加利亞部長于哥夫，保加利亞人是否有好的白酒。當時斯大林從桌旁站起來，說他有保加利亞白酒，這使保加利亞代表們，特別是使于哥夫十分高興。斯大林離開了房間，過了一會兒回來了，緊貼着胸脯拿着幾瓶酒。他拿出一瓶，又拿出一瓶。都不是保加利亞的。他接着讓于哥夫看第三瓶上的商標：這一瓶是保加利亞的白酒。于哥夫滿心歡喜，可是好景不長，因爲斯大林問道：

『這真是保加利亞的，還是你們從南斯拉夫搶來的？』

于哥夫臉上的笑容變得極不自然，而我對於這一令人不愉快的玩笑連笑都没笑。當斯大林後來對季米特洛夫橫加侮辱時，我就更覺得不舒服了。

斯大林把酒瓶放在桌子上，把自己的椅子搬到季米特洛夫身邊。季米特洛夫坐在桌子的左邊，我坐在季米特洛夫的左邊。他開始對季米特洛夫說，在（保加利亞）議會下次選舉時有必要選一點

反對派，如果沒有反對派，那就找二十來個法西斯分子到議會裏充當反對派。我們三個人都坐在桌子的另一邊，我得把身子往前傾，才看見斯大林，季米特洛夫面對着斯大林，不得不轉過身去。

他們兩人之間發生了『短路』：斯大林重複三次談到（保加利亞）議會裏必需要有法西斯反對派，而季米特洛夫對於祖國陣綫行將舉行的代表大會三次作了同樣的回答，很可能他是打算從中得出結論：這樣的反對派沒有必要。我看清了這一誤會，我感到奇怪，季米特洛夫怎麼不改變回答，不把自己的想法同斯大林的想法掛上鈎，因此我嘴邊出現了一個不引人注目的微笑。那時，斯大林尖銳地、粗暴地對季米特洛夫說：

『你什麼都不明白，你看，那邊那個倒明白了！』——他指着我說。

季米特洛夫轉過身來，看見這是指我。他臉紅耳赤，我相信，他當時可以從我的臉上看出，他蒙受的侮辱使我感到多麼不愉快。對於我來說，這麼來對待像季米特洛夫這樣一個重要人物，是一件新聞。

我不知道斯大林爲什麼在那個晚上多次把我叫做梅特涅，後來又幾次把我叫做塔列蘭①。他沒有作任何解釋，我們除了就同保加利亞建立聯邦一事說了幾句話之外，對別的問題一點都沒有談到。令人特別注目的是，他在我們全體來賓中特別突出安德烈·赫布蘭，有一瞬間還走到我身邊，說了一些高度讚揚他的話。

---

① 查理·莫理斯·塔列蘭（一七五四——一八三八），法國政治家、外交家，曾在執政府、拿破侖一世政府和路易十八執政初期任外長。以狡猾、無恥、不講原則聞名。——譯者

過了幾年之後，他對赫布蘭的讚賞才真相大白：他們知道赫布蘭戰時的叛變行徑，正是用這一點招募了他來爲自己效勞。當我們逮捕了這個叛徒，爲了他，他們對我們提出了極其駭人聽聞的指控。但是在把他的叛變行徑公諸於世後，他們沉默了。

斯大林是如何對待各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的，我在那次晚餐上還看到了一個例子。年邁的科拉羅夫多年來一直担任共産國際主席，他在晚餐時表示希望同代表團一起回保加利亞。對此，斯大林以很高的嗓門粗野地對他嚷道：『我們叫你走，你才走，現在就甭想它』。對於季米特洛夫回保加利亞的問題，當時甚至連提都還沒有提出來。

至於貝利亞和馬林科夫，他們整個晚上同哪一個客人都不說話。像個木頭人似的坐着，間或同斯大林或者彼此間說句把話。他們給人留下的印象是，他們在這裏只是作爲自己頭子的私人保鏕而已。」

莫沙·皮雅杰在日期爲一九五三年三月九日的另一封信中，在第一封信所提到的一些人方面，向我補充了第一封信所提到的材料。他同樣叙述了他同斯大林關於下面這樣一個問題的談話：在戰勝希特勒之後，蘇聯和西方國家之間是否會爆發新的世界大戰。

這兩封信都取自我的《書中之書》。

對季米特洛夫的名字表示敬意

在東歐國家的所有政治家中，格奥爾基·季米特洛夫最公開地表明，他是不同意斯大林的不僅

針對南斯拉夫，而且針對他的祖國保加利亞的霸權主義方法的。早在莫斯科和貝爾格萊德之間的公開衝突爆發之前以及爆發之後，直到他去世，他一直明確地表明了這種態度，從而完全受到蘇聯在保加利亞人中間的代理人的孤立。

有許多事例證明這種情況。例如，約西普·杰爾賈作爲安理會巴爾幹調查委員會中的南斯拉夫代表，在委員會抵達索非亞時拜會了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後者十分親切地接見了他。拜會開始不久，當杰爾賈經由翻譯開始講話時，季米特洛夫堅決而友好地嚷道：

「在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之間，我不要任何翻譯，我們之間不應當有翻譯。要是有什麼人沒有翻譯就可以彼此了解，那就是我們。」

當杰爾賈向季米特洛夫申述鐵托希望南斯拉夫代表團和保加利亞代表團在馬其頓問題上向調查委員會採取一致的態度，季米特洛夫毫不猶豫就接受了，通過秘書他把保加利亞代表團的正副團長召來了。當他們來到時，季米特洛夫請杰爾賈向他們重複一下貝爾格萊德同志們的希望。杰爾賈重述了一遍之後，季米特洛夫對他們說：

「在這個馬其頓問題上和其他一切問題上，在委員會面前以及一般來說，保加利亞人必須完全跟上南斯拉夫人的步調，但是必須悄聲些，必須低一個調門，因爲南斯拉夫的聲望和南斯拉夫道義上的權利使它享有這樣的權利，而我們作爲一個戰敗國則處於另一種地位。」

後來，中央委員們特拉伊喬·科斯托夫、明喬·涅伊切夫、達米揚諾夫、契爾文科夫等人都來了。在這樣一個圈子裏進行的談話中，季米特洛夫問當時任教育部長的涅伊切夫，大學法是否搞好了。涅伊切夫回答他說，還沒有搞好，措詞上還有問題，等等。對此，季米特洛夫望着我，帶點憤

慨味道地大聲說：

「請看，我們這裏的事情辦得怎麼樣！我多年來一再對他們說不要走彎路。他們想抄襲蘇聯的法令和成果，但是他們又不能把蘇聯的東西運用到我們這裏，因爲我們之間的差別太大，不可能辦到。而這裏，邁過邊界，我們就有我們朋友的經驗，我們的朋友已經走在我們前面很遠了，但是還沒有遠到我們利用不了他們的經驗的程度，尤其是我們的條件是相似的。但是，不管用，我的這些人不願意。」

季米特洛夫一九四八年二月在莫斯科，在同斯大林會晤後也向卡德爾談了同樣的想法。由於季米特洛夫對建立多瑙河沿岸國家聯邦一事發表了談話，斯大林粗暴地凌辱季米特洛夫，後者對卡德爾說：

「我們和你們要發展要容易得多，因爲我們是從比蘇聯高得多的生產力水平，比蘇聯高的居民文化程度出發的。」

據我在《書中之書》中記載，卡德爾在南共中央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會議上重述了季米特洛夫的話，後來斯雷滕·茹約維奇—茨爾尼把這告訴了蘇聯大使拉夫倫季耶夫，我是這麼記載的。

在莫斯科和貝爾格萊德交換了頭幾封信之後，季米特洛夫仍然支持南共中央。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他途經貝爾格萊德前往布拉格，根據南共中央的指示，密洛凡·吉拉斯在車站迎接他。吉拉斯是這樣描述這次會見的：

「我在貝爾格萊德附近托普契德爾車站上，在列車的貴賓車裏見到了季米特洛夫，當時，在這節車廂裏只有他、我和另外一個保加利亞人在場，後者的名字出於可以理解的理由，我不能說出來。

季米特洛夫對我說，他知道了聯共（布）黨中央的信，信裏有些事是對的。隨後他抓住我的手說：

『堅持下去！』

我回答說，我們南斯拉夫人是很堅定的，並向他提出一個問題：他們怎麼辦？他對我說，主要的是我們要堅定，其他就會隨之而來。

同季米特洛夫的這次談話只進行了幾分鐘時間。他十分熱情，但是當契爾文科夫和其他人進來時，他的語調明顯地改變了。」

當斯大林的第二封信來了，衝突變得十分尖銳的時候，季米特洛夫仍然没有放過機會，示威性地表示他對南斯拉夫人的同情。在五月二十五日鐵托生日的時候，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領導人誰都不向鐵托致通常的祝賀。唯一的例外是季米特洛夫。他給鐵托打了一份電報：「在您生辰之際，致以兄弟般的問候和最美好的祝願。」他還確定了一位保加利亞青年，以保加利亞青年和運動員的名義交給鐵托一根接力棒。

在布加勒斯特的刑場已經準備就緒，發出了緊急通知，要鐵托務必到那裏去的時候，季米特洛夫就是在那時也没有放過機會支持我們。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七日，在他生日的那一天，我們有一個青年代表團在索非亞，代表團是由米羅斯拉夫·克雷阿契奇率領的。我們的一位青年向季米特洛夫表示祝賀，向他轉交了南斯拉夫青年的禮品，他十分激動，走向這位年輕的南斯拉夫人，擁抱了他，並大聲說，使他感到高興的是能够擁抱「鐵托的青年的代表」。

季米特洛夫患有重病，他周圍那些親斯大林主義的人一直在利用這一點。情報局決議發表後，季米特洛夫長期保持沉默，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在保加利亞工人黨（共産黨）第五次代表

大會上作的報告中講了幾句罵南斯拉夫人的話。幾個月之後，他被送往蘇聯治病，儘管保加利亞的醫學是有傳統的。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他去世了。《戰鬥報》和我們其他一些報紙曾暗示，他是被毒死的。關於這一點，要由歷史來作出判斷。維爾科・弗拉霍維奇在《戰鬥報》上爲他寫了一篇熱情的祭文，而察里布羅德市得到了季米特洛夫的名字①。

前不久，我曾有一個機會對季米特洛夫表示敬意。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到侵略以後，伯特蘭・羅素、讓・保羅・薩特、洛朗・施瓦茨和我，就保加利亞國家機構對馬其頓的野心、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遭受的威脅以及蘇軍在保加利亞境內的調動寫了一封公開信。一批保加利亞知識分子，接着還有莫斯科的《文學報》以及保加利亞駐巴黎和倫敦的大使，對這封信作了答覆。來自索非亞的信說，伯特蘭・羅素和讓・保羅・薩特不是自己寫了第一封信的，而是別人强加於他們的。

這使讓・保羅・薩特深爲憤慨。別人替他寫信！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初，我們在巴黎「圓屋頂」飯店進午餐。飯後，就在辦公紙大小的普通紙上，他開始用他那高雅的手跡起草答覆：

「我們獲悉，有一批自認是作家和藝術家的保加利亞人對我們十月九日的聲明表示反駁。我們絲毫不改變我們的立場。不但如此，我們利用這個機會强調指出，我們揭發了保加利亞政府的吞併主義的傾向，我們援引了在這方面絲毫不使人存有懷疑的一個文本。我們至少還可以列舉其他二十個文本，這些文本顯然是在保加利亞的『反駁書』上簽名的人所不能無視的。

---

① 指南現在的季米特洛夫格勒。——譯者

關於所謂的『反駁書』上的簽名者，我們要說，他追求的是支持政府的吞併主義野心，他既不配稱做作家或藝術家，也不配稱做社會主義者和知識分子。我們這麽說是有益的。這是一場宣傳家們的不幸的圍攻，奢望和恐懼迫使他們奴顏婢膝地支持蘇聯的侵略。他們不要以爲自己是政治家：他們不過是由政治家牽綫的傀儡而已。『哲學家』帕納約特・金德夫聲稱『社會主義的唯一樣本就是蘇聯的實踐，社會主義的普遍原則是對一切國家都有束縛力的』，從而復活了神聖同盟。這樣他就以同樣的方式表明，他只是個傻瓜，他徒勞地試圖使一條毫不相干的紀律，來爲無知者的專政服務。」

寫到這裏，薩特停住了，他想了想又說：

「現在讓我們告訴他們，真正的革命者應該是怎樣的態度。」

信的末尾寫上了下面這樣一番話：

「爲了保加利亞人民的榮譽，爲了紀念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他是在決定性關頭懂得使革命的忠誠感同理智的正直感相調和的罕見的那些人中間的一個——我們希望保加利亞還是存在真正的作家的，他們不得不沉默，他們可惜的是，不能呆在別處，只能呆在當局爲正直的人安置的唯一的地方——監獄裏。」

一個範例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情報局決議發表之後，有一次我同鐵托同志談到東歐和世界我們這一

地區建立聯邦的問題。我在《書中之書》中是這樣記載這次談話的：

「在我歷次訪問莫斯科期間，我常常向斯大林和其他人提出一個問題：他們如何看待東歐未來的關係，他們對於一些國家的合併是怎麽看的。

斯大林說，『不應當合併。各國人民有責任自己來就此作出決定。』

但是，在我對東歐國家進行了訪問之後，他們却大爲惱火，決定要讓這些國家的人民最終屈從於自己。

他們在一九四七年底就決定這麽做，這麽說是完全正確的。」

戰後頭幾年，南斯拉夫同東歐鄰國和東歐其他國家締結了一系列友好互助條約。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在華沙同波蘭締結了條約，一九四六年五月九日在貝爾格萊德同捷克斯洛伐克締結了條約，一九四六年七月九日在貝爾格萊德同阿爾巴尼亞締結了條約，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耶夫克西諾格勒同保加利亞締結了條約，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布加勒斯特同羅馬尼亞締結了條約。簽訂這些條約的目的在於加强「兩國人民和所有聯合起來的民族的友誼和緊密合作」並「對戰後和平和安全組織的事業作出貢獻」。條約使締約雙方承担義務，如果締約一方被捲入軍事行動，締約雙方將以所掌握的一切手段彼此提供軍事援助和其他援助。再有，每一方都承担義務，既不加入針對另一方的任何聯盟，也決不參與針對另一方的任何行動。

而當斯大林開始反對南斯拉夫時，他採用了見不得人的策略，確定讓巴爾幹最小的國家阿爾巴尼亞指控南斯拉夫犯有恰好是蘇聯不僅對南斯拉夫，而且對其他所有東歐國家所犯下的那些罪行和所奉行的霸權主義的政策。

斯大林利用了這樣一點：阿爾巴尼亞人，像任何一個小國人民一樣，對於自己的獨立是異常敏感的，尤其是由於不僅像意大利和奧匈帝國這樣的大國的資產階級，而且像塞爾維亞和希臘這樣的小國的資產階級也往往向阿爾巴尼亞的領土投來貪婪的眼光。在阿爾巴尼亞族、馬其頓族、塞爾維亞族混居的領土上，例如在馬其頓西部及科索沃和梅托希亞，常常發生一些民族遭受壓迫的情況。在土耳其統治時期，一直到一九一二年，這些地區的塞爾維亞族和馬其頓族遭受阿爾巴尼亞封建主的前所未聞的迫害。而在一九一二年以後，大塞爾維亞人又以同樣的態度來對待阿爾巴尼亞族和馬其頓族。

阿爾巴尼亞族、馬其頓族和塞爾維亞族在自己的歷史上第一次肩並肩地爲反對佔領者及其幫兇，反對阿爾巴尼亞族封建主、切特尼克和其他黑幫而進行了共同的鬥爭，而蘇聯情報機構却像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奧地利情報機構一樣，竭盡全力使這些衝突激化，往各個民族間互不相容這個尚未愈合的創傷上撒鹽，想盡量消滅人民解放鬥爭所取得的極其巨大的成果。在戰時，這幾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支隊或混合支隊，有本民族的旗幟，旗幟上有新時代戰鬥情誼的象徵——紅星。

不僅低級情報人員，而且斯大林本人就在散佈這種不滿，就在使彼此懷疑。斯大林幾乎每一次會見南斯拉夫領導人時都要挑起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之間的關係問題，「阿爾巴尼亞人多麽落後、原始」，而當我國駐莫斯科大使弗拉迪米爾·波波維奇針對他這種看法說阿爾巴尼亞人「十分勇敢，十分忠實」，斯大林馬上說：

「是的，他們像狗一樣忠實，這是原始人的特點。我們這裏的楚瓦什人就是這麽忠實。俄國沙皇用他們來當私人衛隊……」

後來，一九四八年一月斯大林和吉拉斯見面時，斯大林沒有說什麼開場白就開始談到阿爾巴尼亞：

「蘇聯政府對於阿爾巴尼亞沒有任何野心，南斯拉夫什麼時候願意，就可以把阿爾巴尼亞吞掉。」斯大林邊說，邊用手指往嘴裏送，好像準備吞吃什麼似的。

這使吉拉斯感到震驚，於是他說：

「斯大林同志，這裏談不上什麼吞吃，而是同阿爾巴尼亞保持友好和盟國的關係。」

莫洛托夫對此補充說：

「這是一碼事。」

一九四八年過去了二十年以後的今天，如果對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之間的經濟關係作一番分析的話，比起蘇聯同其他東歐國家的經濟關係來，南阿之間的經濟關係是建立在遠爲講原則的雙方平等的基礎上的。

南斯拉夫和其他東歐國家的許多共產黨人戰後感到極大意外的是，他們看到，他們的國家和蘇聯之間的經濟關係是建立在純粹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的，也就是說，商品交換是按照世界市場上的價格來安排的。這意味着，生產力發展差的國家，換言之，勞動生產率低的國家，在同發達國家進行貿易時受到發達國家的剝削。而另一方面，蘇聯對於像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這樣的工業比蘇聯發達的東歐國家，戰後不久又不願意按照世界價格進行貿易，而是把自己的價格強加於人，剝削這兩個國家，尤其是剝削波蘭。

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的經濟關係又是怎樣的呢？南斯拉夫的經濟儘管本身是不够發達的，但是還是比阿爾巴尼亞的經濟發展程度爲高。在這一基礎上，南斯拉夫如果像蘇聯那樣幹，把世界價格作爲同阿爾巴尼亞進行貿易的基礎，就可能對阿爾巴尼亞進行剝削。但是，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之間的貿易却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進行的：阿爾巴尼亞按照阿爾巴尼亞國內市場的價格向南斯拉夫出售自己的產品，而南斯拉夫的產品又是按照南斯拉夫國內價格進口的。南斯拉夫靠了平價特別基金來彌合這種差價，這一基金是用南斯拉夫爲此而提供的專門的貸款建立的。這一切使南斯拉夫不能獲取從兩國經濟發展的差異中產生的超額利潤。

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之間的關係的另一個説明問題的方式是合營公司。以南斯拉夫爲例，我們已經看到，蘇聯的代表不願建立會發展南斯拉夫的生產力的那樣的合營公司，而是只想建立能够攫取巨額利潤的合營公司，而不考慮在南斯拉夫發展工業的問題。再有，我們還看到，蘇聯不願對這些合營公司投放任何資金。南斯拉夫的例子表明了這一點，而在羅馬尼亞則表現得更爲清楚，蘇聯在羅馬尼亞把以前屬於德國和意大利的財產作爲自己的股份投入這些合營公司。

然而，南斯拉夫根據阿爾巴尼亞人的要求在阿爾巴尼亞建立合營公司，首先致力於發展阿爾巴尼亞的生產力。建立了一家公司，負責在阿爾巴尼亞興辦鐵路，因爲在此以前，這個國家根本没有鐵路；甚至還把一些工廠從南斯拉夫遷到了阿爾巴尼亞。

通過在阿爾巴尼亞建立的一些合營公司建成了都拉斯到佩欽的長達四十三公里的鐵路，並爲都拉斯——地拉那鐵路綫的建設作了準備。從南斯拉夫爲科爾察的製糖廠、愛爾巴桑的水果蔬菜加工廠、羅哥吉納的麻繩加工廠、設在發羅拉的魚罐頭廠以及在地拉那建成的一家現代印刷廠運來了設

備。此外還運來了地拉那自動電話中心的設備和一家紡織廠用的機器。

這些是南斯拉夫自己處於極大的經濟困難的情况下，兩年內在阿爾巴尼亞所做的。而在此期間，蘇聯連一家工廠的設備都没有給，對於南斯拉夫的工廠連一台機器都没有給。南斯拉夫在合營公司裏是向阿爾巴尼亞付地租的，而蘇聯就不是這樣，蘇聯拒絕向南斯拉夫付地租。在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的一些合營公司存在的三年內，南斯拉夫没有取走自己的那部份利潤，而是把這部份利潤投入阿爾巴尼亞的企業。南斯拉夫甚至走得更遠，它在一九四七年同意向阿爾巴尼亞提供四千萬美元左右的貸款，而在一九四八年同意提供六千萬美元的貸款。

事實就是如此。

我爲什麽要寫關於阿爾巴尼亞的書？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克羅地亞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在薩格勒布舉行。當時看來，情報局的攻擊暫時停了，但是阿爾巴尼亞共產黨代表大會却傳來了壞消息，大會正好是在那幾天閉幕的。地拉那對南共中央，對新南斯拉夫提出了最嚴重的指控，說我們還自一九四一年起就試圖給阿爾巴尼亞共產黨人套上枷鎖，說我們戰後剥削阿爾巴尼亞，等等。蘇聯的宣傳機器在全世界散佈這些消息。這是要成爲某種證據，向世界進步輿論證明，南斯拉夫早就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已經跟帝國主義勾結在一起反對獨立的社會主義阿爾巴尼亞。

克羅地亞共產黨代表大會最後一天時從地拉那傳來了首批消息，而代表大會已沒有時間來對這些嚴重的指責作答，當時曾經談論到如何把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之間關係的真相公諸於世。

我在日記中記載，參加議論的有亞歷山大·蘭科維奇、密洛凡·吉拉斯、弗拉迪米爾·巴卡里奇、兹馮科·布爾基奇、斯德沃－伊萬·克拉亞契奇、米塔爾·巴基奇以及另外幾個同志。晚餐後，我們坐在一起，先是談到戰前我們在薩格勒布如何合法地出版了各種各樣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小册子。

黨當時打算開設一家合法的書店，取名爲文化書店，地點設在馬薩里克大街。那裏出售各種書籍，也出售這家書店出版的專門的書籍。我們出版了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爲數三萬册。書是由剛從流放地回來的奥格寧·普里察、弗拉多·巴卡里奇和我三個人翻譯的。書是在印刷廠和郵局的黨組織的協助下才問世的。因爲根據舊南斯拉夫當時的法律，出版人在從印刷廠取走所印的書之前，必須向國家檢察院交六份樣本，由檢察院轉交警方，此後印刷廠才能同意把書取走。

這件事全是在我領導下進行的。我是從斯德沃·加洛加日阿那裏學會這套本領的。他是一位老共產黨員、老作家，同舊南斯拉夫的檢察官和警察打了幾乎二十年的交道，有豐富的經驗。通過一些同情黨的法律工作者，我們首先使檢察院不能有所作爲。由一位同志，我記得他叫米庫利奇，設法把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搞得盡可能無可責難。書的作者被説成是「弗拉基·伊里奇教授」。這是第一步，我們幸運地通過了。接着得使常在印刷廠窺探的警探無所作爲。一個對黨有好感的青年印刷工人得了一個兒子。利用這件事，他帶了幾瓶白酒到印刷廠裏來，大家慶賀了一番。幸福的父親設法使警探的酒杯始終是斟得滿滿的。在此同時，檢察院的差役送來了經過核准的書，説《帝國

主義論》已被通過。印刷廠就把全部三萬册書包裝好。這件事是在薩格勒布的教授弗拉多・維塔索維奇領導下由一批對黨持同情態度的工人幹的。維塔索維奇當時同我一起在編輯《三十天》這份雜誌。一輛小卡車把郵件徑直送往鐵路上的郵局，由那裏的共產黨員郵政人員接收下來。那裏也有警探。事情全是在夜裏辦的，維塔索維奇想把全部書都從印刷廠拿走。我向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留下一千本。讓那個喝醉了的警探帶走一些，不然全部火力都會傾注到他身上。」

弗拉多同意了。那天夜裏，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就隨各次列車從薩格勒布運往全國各地，黨的通訊網又把書分發到支部、工會、學校和企業。

兩天以後，警察終於發現了到底是怎麽回事。密探們衝進印刷廠，拿走了那一千本書。官方發佈了禁書令。而我們的人在全國各地，在一九四一年生命攸關的那些日子的前夕得到了列寧的《帝國主義論》。

我們大家在一起談論戰爭爆發前夕在薩格勒布的那些了不起的日子。我特別激動，我開始敍述，我們如何在貝爾格萊德曾以類似的方式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初出版了馬克斯・維爾納的談紅軍的書。當時貝爾格萊德的警察無人統管，洛拉・里巴爾、博格丹・佩希奇和我簡直就接管了行星印刷廠，那裏有一個共青團小組。在三個星期内就把一本二十印張的書排好印好。印刷廠老闆的兒子佩拉・奥布拉多維奇是同情我們的，是一個好同志，這大大方便了我們。全部書我們都從印刷廠拿走了，在南斯拉夫全國散發，警察後來逮捕了佩拉・奥布拉多維奇，給他戴上手銬押往格拉夫尼亞查……

正當我洋洋得意地敘述這一切經過，敘述奧布拉多維奇的父親不得不向格拉夫尼亞查的負責人行賄，以釋放佩拉時，米塔爾・巴基奇打斷了我的話：

「嘿，弗拉多，你閉上嘴吧。你老是吹牛……」

米塔爾・巴基奇是黑山人，因此我回敬他說：

「米塔爾，我愛吹牛，有什麼辦法呢？我知道這不好。但是我的老家離黑山邊境只有兩公里遠，我身上的許多優點，還有更多的缺點，都是來自黑山的……」

米塔爾是個大好人，他笑了起來。而蘭科維奇一聲不吭，用手指摳麵包心，這是他從流放中得來的習慣。他說：

「弗拉多，寫一本談南共同阿爾巴尼亞的關係的歷史的書，你要多少時間？這些事情你反正都知道，而國有化的印刷廠可以像戰前有我們的同情者在裏面那樣迅速地工作……」

我周圍的別的一些人也都開了腔，米塔爾・巴基奇嚷道：

「把工作全都擱下，寫書吧！」

接着的情況請看《書中之書》第四頁：

「……我點了點頭。我有許多別的工作，但是這是職責，良知驅使我寫，已故的愛妻奧爾加、洛拉・里巴爾和尤里察・里巴爾、韋薩・馬斯萊沙，對他們的緬懷，對革命的緬懷驅使我提供盡可能多的事實，出自肺腑地提供。你怎麼看待、怎麼感覺，就怎麼提供，以使這一代人和下一代看到一代人是如何爲了自己的理想而鬥爭的。

關於阿爾巴尼亞的書，我花了三個星期就寫成了，從馬爾科在飯桌上提出這個主意算起，僅僅

五個星期，書就出版了。我先花了七天時間來構思、看材料、與人商討，擬出了這本書的逐章大綱。吉多和馬爾科看了大綱，表示同意。隨後就開始寫。我把第一章打印了十來份，裝訂後分送給十來個人：馬爾科、吉多、布拉若·約萬諾維奇、韋利亞·斯托伊尼奇、穆戈沙、托多羅維奇將軍、杜多·蒂莫蒂耶維奇及其他一些人。我立即着手寫第二章，而在收到了意見並修改了第一章之後，我就把它付印了。印刷廠裏的同志們日夜工作。因此，頭幾十頁印好了，最後一章還沒有寫好。印刷廠裏有人表示懷疑，而我說我的寫作安排得很好，一切都將按時完成。事實上也是如此。我每天工作十八個小時，甚至二十二個小時。當我拿到了這本書時，我撫摸着書，我哭了起來。我患了失眠，手開始不聽使喚，頭上的傷引起的癲癇又快犯了。我像塊木頭似的躺着。我愛人韋拉在我床邊嚇得一聲不響，而我的眼前出現了前妻奧爾加的形象。對我來說，著書談革命就意味着對於她的死亡使自己的良知得到慰藉。」

請讀者原諒我發表了日記中的這樣一些私事。我相信，讀者是會理解我的，是會理解我們一九四八年所度過的時日的。我在《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的關係（一九三九——一九四八）》一書的跋中寫下了下面這些話：

「調整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問題現在要求得到迅速而切實的解決。今天，億萬人民正在擺脫帝國主義的枷鎖求解放。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唯有在符合社會主義精神的原則上才能獲得解決，也即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原則上通過同志般的真誠合作才能獲得解決，借助誹謗、謊言、挑釁和形形色色的欺騙是解決不了的。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在自己同蘇聯和所有人民民主國家，

特別是同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的關係中，以行動表明是深爲尊重這項原則的。

放棄公正地解決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的原則，不僅是不符合共產主義精神的，不僅意味着對南斯拉夫的革命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沉重打擊，而且對於進步力量今後爲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而進行的順利鬥爭也會產生不可估量的惡果。」

我一九四八年的這本書有許多缺陷。但是我認爲，結論是完全正確的。二十年來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

與鐵托同志一起共度一九四九年新年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我在鐵托同志在貝爾格萊德羅馬尼亞大街家裏迎來了新年。在場的有三十來位同志和他們的夫人。當我和韋拉進去時，氣氛是嚴肅的。談論的是鐵托同志當天晚上要通過電台發表的講話。我無意中打破了這種氣氛。鐵托同志很長時間一直沒有見到我愛人韋拉，我就開始開玩笑說：

「你難道不認識她，這是我的女兒米利察……」

「米利察，我怎麼會不認識你呢。有一次在澤蒙，在你媽奧爾加家裏我還看管過你。你那時還不到一歲，呆在小車裏……時間過得真快……」

我敞懷大笑，我的玩笑開成功了。鐵托也明白了我幹了什麼，開始大聲笑了起來。米塔爾·巴

基奇就開起我的玩笑來了：

「是的，是的，這是他的女兒。昨天，我在街上碰到幾個熟人，見到韋拉和弗拉多就說『瞧，那邊是弗拉多・德迪耶爾和他的女兒』。」

這或許是那天晚上唯一的歡樂的時刻。憂雲愁霧使我們感到壓抑。國內的經濟情況簡直危急萬分。我們已經開始執行五年計劃，許多工廠建了一半，等待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蘇聯送來機器。而現在東方却進行經濟封鎖。基德里奇說，在這些已經開始的工程中，有許多已經完蛋，有的必須毁掉，儘管已經興建了相當一部份了。

同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的貿易迅速衰減。我們本應從東方得到三千一百六十六噸棉花，結果什麼都没有運來。紡紗廠在空轉。不得不火速向西方要棉花，但是在西方，俄國人也給我們製造麻煩。而前景尤爲暗淡。一九四八年底，同蘇聯簽訂了新的貿易協定，但是規模縮小了八分之七。有謠言說，東歐各國正在組建專門的組織，目的是對南斯拉夫實行經濟封鎖。在場的一個同志說，在莫斯科進行貿易談判時，他們要求我們增加鉛和銅的出口額，並讓我們減少棉花和石油的進口。

我們外貿部的一些同志半年多來一直在設法試探同西方國家擴大貿易的可能性以及展開經濟合作的可能性，但是結果甚微，幾乎一無所得。世界這一地區的某些人士簡直是在訛詐。他們說，現在是掐南斯拉夫脖子的時候了，要我們爲我們没收的外國資本的每一筆財產付出大筆款項，他們吸了我們幾十年的血還嫌不够，現在要我們爲那些破破爛爛的機器付出百倍的代價。有人提到，興建裝備着現代化機器的新工廠，也比用這些破爛貨劃得來，但是，你到哪裏去找新機器？買新機器是要黄金的，而我們没有黄金……

我一再指出，西方大多數政治家認爲，我們同蘇聯的衝突是虛假的。例如，華盛頓就是普遍這麼看的，倫敦也是如此。而爲數不多的、認爲衝突是真的那些人又認爲，我們支持不了多久。國務院最重要的專家查爾斯·波倫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九日發表談話說，俄國人用三周時間就會把我們搞垮。法國的專家們也是這麼看的。

「而現在，由於我們堅持了半年時間了，就又回到一種論調，說不存在衝突，是我們同斯大林在一起捏造了這一切，以欺騙西方。在巴黎，我在參加聯合國會議期間遇到過一位美國外交官，他懂俄語，曾陪同羅斯福參加同斯大林的多次會見。這個美國人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十分了解。整個晚上，他一直要我相信，我們同俄國人的衝突是虛構的故事，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不可能發生這種事，說這是不可能的……」

鐵托同志問我：「你怎麼回答那位天才的？」

「我對他說：『但願上帝能聽到你這番話』，這場衝突要是不是真的，那就太好了。」

鐵托同志感到奇怪的是，美國外交官怎麼會在意識形態上如此狹隘、遲鈍，怎麼會成了自己對內宣傳的犧牲品……難道他們忘掉了華盛頓的名言：「同人人做生意，不同任何人結盟……」

蘭科維奇開始談到，有些美國人士在情報局決議發表後立即開始策劃陰謀。有一個駐莫斯科的美國記者在《真理報》發表了情報局決議之後，找到我們的文化參贊帕瓦奥·米約維奇，向他談到南斯拉夫參加馬歇爾計劃的可能性。他說，如果南斯拉夫參加的話，東歐國家就會發生一個轉折，因爲唯有南斯拉夫能够引起這樣一個轉折。我們駐莫斯科的代辦費伊奇立即得到指示，指出這是司空見慣的挑釁，使館全體同志被提醒注意，不要上來自任何人的任何挑釁的當。

蘇聯情報機關在國內大肆活動，盡可能多地收買政府各部、軍隊和其他機關身居要職的我們的人。許多同志對於同蘇聯發生衝突感到不安，蘇聯情報機關利用了這一點，想不惜一切代價把他們拖進羅網。在這麽做時，他們是不擇手段的。斯大林仍然寄希望於，在外界施加相應的壓力的情況下，由南斯拉夫內部的「健康力量」充當主角，來推翻南斯拉夫政府。

例如，一九四八年年底，我們駐布達佩斯使館全體人員以及南通社記者一人，除了在貝爾格萊德的代辦以外，全都宣佈辭職，宣佈擁護情報局決議。在貝爾格萊德外交部內，蘇聯情報機關也大肆活動，收買盡可能多的身居要職，知道密碼和掌握最重要的文件的官員。在東歐國家司裏就發現了好幾個蘇聯特務。逮捕了一批人，換了一批人，俄國人又把後來的一批人收買了，這些人就又被捕了。就這樣，在反情報局的鬥爭的頭兩年，僅這個司就清除了二十一名蘇聯特務。他們中人人都供認了從蘇聯情報機關接受了什麽樣的任務。蘇聯情報機關在軍隊、各主管經濟的部和其他重要機關的活動也決不亞於此。

國內當時物資相當匱乏。糧食實行配給，工業品收票券或者按定量供應。褲帶從來沒有勒得這麽緊過。我們還沒有完全從戰爭的廢墟中喘過氣來，現在又出現了經濟封鎖，而且是來自東方的經濟封鎖，這是誰都沒有想到的事。

莫沙·皮雅杰激憤地說：「我下一次講話時，我得引用海涅的話，引用他的那兩句詩：『我所熱愛的朋友，却給我帶來了最大的災禍』！」

鐵托同志自己在當天晚上經由電台發表的講話中最清楚地勾畫了當時的種種困難：

「我們的處境是困難的。但是，我們什麽時候又輕鬆過呢？我們已經習慣於困難了，困難不可

能使我們動搖，更談不上壓垮我們了。我們過去相信會取得勝利，當整個歐洲籠罩在法西斯的陰影下，當很大一部份人喪失了信心，開始認爲惡勢力的勝利是長久的時候，我們進行了鬥爭。我們今天也不動搖。」

那天晚上的談話又轉到戰爭，轉到對最艱難的那些日子的回憶。我談到，韋薩•馬斯萊沙在黑山受到了黨的處分，因爲他在一九四一年秋天曾寫文章說，戰爭將再持續半年。

有人補充說，斯大林當時也是這麼認爲的。他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的講話中就說，戰爭只會打六個星期，最多打半年，說德國是一座隨時都可能爆發的火山。我們在烏日策的《戰鬥報》上轉載了這篇講話，正好有這幾句話，但是一九四五年以後出版的斯大林戰時的言論，却没有這一段話了。

我想起，我在斯洛文尼亞曾聽弗拉多•科扎克（朋友們中間叫他拉德拉茨，是他把卡德爾和基德里奇引進黨內的）説過，基德里奇每年秋天都向解放陣綫①某些動搖的領導成員保證，戰爭將在春天結束，而到了春天又保證戰爭將在秋天結束，就這樣，年復一年，保證了四年，我們才迎來了勝利……我還説，基德里奇堅决否認弗拉多•科扎克説的這段笑話……

有人問起，我們是否知道，在戰時哪一家游擊隊報紙是被我們的政府查禁的唯一的報紙。大家都默不作聲，望着我，我也好不容易才想起來：

「是《佃農之聲》，就是由那個弗拉多•科扎克編輯的。基德里奇有一天發現科扎克躺在猪圈

---

① 當時基德里奇任斯洛文尼亞解放陣綫執委會政委。——譯者

裏，就問他，在那個鬼地方幹什麼？科扎克回答他說：『我在爲我報上的文章找合適的氣氛，文章是談農民的問題』。當盟國的軍事使團來到了斯洛文尼亞時，科扎克不斷地問他們，什麼時候開闢第二戰場？鑒於第二戰場的開闢一拖再拖，科扎克就在《佃農之聲》上發表了一條短消息，說英國集中了大量盟軍，致使這個島國開始下沉。這件事後來鬧大了。當時最高統帥部發出了一道指令，指示對西方盟國不要採取宗派主義的態度。弗拉多·科扎克就成了這道指令的犧牲品。弗拉達·澤切維奇神父當時在一九四三年在亞伊策選出的民族委員會裏負責內政，他後來誇耀說，由於科扎克的《佃農之聲》對英國人和美國人開了這個玩笑，他下達了禁令……」

談話又轉到我們派到捷克斯洛伐克去的學徒上。戰後不久，派了將近三千名青少年到捷克斯洛伐克去，到各個工廠裏進修。情報局決議發表後，捷克斯洛伐克當局開始對他們施加壓力，要他們表態反對祖國。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當局不大得手，儘管有幾個南斯拉夫籍教員投向了情報局。這幾個教員給這些青少年專門作報告，但是不成功。學徒們要求回家，要求回南斯拉夫，而捷克斯洛伐克當局不想同意。捷克斯洛伐克當局寄希望於這些青少年讓步。九月中，我們的學徒開始罷工，以示抗議。他們停工了。警察插手進來了，逮捕了將近一百八十名青年。各地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對這些年輕的南斯拉夫人表示支持。在我們的年輕人工作所在的幾個捷克斯洛伐克城市裏形成了名副其實的混亂。

投向對方的一個教員對青少年們說，他們一回到南斯拉夫就會被捕。他向他們表示，如果他們拒絕回南斯拉夫的話，他將用飛機把他們帶到莫斯科去。後來，他的耐心到頭了，開始威脅起來了。「誰想去南斯拉夫，我把他的牙齒都打掉」，「去吧，去吧，我一個月以內也要去南斯拉夫。

我要喝那些回去的人的血」。

別的一些教員不是這樣的看法。捷克斯洛伐克當局先把他們逮捕了。學員們就呆在宿舍裏，開始絶食。警察把住有南斯拉夫學徒的宿舍全部包圍，停電、停電話、停水。

布拉格最後看到難於壓服年輕的南斯拉夫人的抵制，就讓他們回南斯拉夫了。在二千八百五十二名學徒裏，二千七百六十二名立即收拾了自己的東西，回南斯拉夫了。這是在這些年輕的南斯拉夫人中間又一次進行的是擁護還是反對鐵托，是維護還是踐踏真理的公民投票。國內，羣衆在馬里博爾、薩拉熱窩、諾維薩德的街頭歡迎他們。

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九十個人，一九四八年九月底也發生了分裂。十二月中又有十二名青年人回來，並給鐵托寫了一封致敬信。

鐵托同志正是在一九四九年新年前夕的那個夜晚向我們宣讀了這封信。這封信使他考慮到我國人民不僅在同斯大林的這次衝突中，而且在以往多少世紀以來爲生存而鬥爭的道義力量的意義。在那天晚上的講話中，他再次表明，他對於我們艱難的過去和民間傳統的道義力量價值的意義是有深刻的了解的：

「寄希望於誹謗和謊言會迫使我們承認真理不是真理的那些人，讓他們知道，他們錯了。對真理和正義的熱愛，在我們身上是一股力量，它不允許我們不講氣節，不講原則。

我們這一本性承繼於我們的祖輩，我們認爲，不僅每一個共產黨人，而且每一個正派人都應認爲這是一種最積極的本性。我們必須這樣來教育我們的黨員和我們年輕的一代。我們相信，真理和正義這一次也將勝利。因爲，不然的話，世界的前途將十分黑暗。爲了使自己的良知得到慰藉而談論

什麼『只要目的正當，任何手段皆無傷』的那些人理應知道，這句話在宗教裁判時期在耶穌會會員方面是特別出名的。憑藉骯髒的手段，採取不誠實的方式是建設不了偉大的事業的。偉大的事業只能採取相應的方式，憑藉相應的手段來建設。我們將永遠記住這一點，因爲不然的話，我們就對不起我們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爲爭取正義事業的勝利所獻出的鮮血。今天用這樣一些不老實的手段來反對我們的那些人，有朝一日必定會停止這樣做的，因爲不然的話，這會對全世界的進步運動產生致命的後果。這是指在各色各樣的報紙上或者以形形色色的方式散佈反對我國的想入非非的謊言並把我們搞臭的那些人。」

半年來同斯大林的鬥爭表明，我們唯一的出路是依靠本國羣衆，是繼續保持和進一步加强人民解放鬥爭的傳統。我們周圍的局勢是嚴峻的。儘管我們同斯大林的衝突已經國際化了，因爲這已經不只是斯大林和我們之間的衝突，而且是斯大林同所有東歐國家的衝突，是斯大林同國際工人運動的衝突，斯大林在國際工人運動中到處利用同南斯拉夫的衝突把自己的徹頭徹尾的霸權强加於人，而我們在鬥爭的這一階段，恰好未能從國際工人運動方面獲得任何援助。所有這些國家，這些國家的所有領導人，各國共產黨的領袖，全都迷信斯大林，全都呼籲國際工人運動在帝國主義越來越强烈的進攻面前必須保持團結；有的人甚至要求我們爲了團結的利益而作出犧牲，儘管我們是正確的。

而南斯拉夫却沒有喪失希望，相信別人也會察覺出斯大林主義霸權的真面貌的，也會理解社會主義發展的各種道路的。爲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平等關係而鬥爭，同時也就是爲一切國家之間的平等關係而鬥爭，因此也就對反帝鬥爭作出貢獻。

因此，我們正是在一九四九年前夕以及此後不久廣泛地討論了爲了衝破這種孤立而應採取的措施。在《書中之書》中，鐵托同志用下面這番話敘述了這一階段同斯大林的鬥爭：

「繼續對南斯拉夫進行經濟封鎖，目的是在南斯拉夫製造經濟混亂，以便更容易貫徹執行征服計劃。同時利用南斯拉夫的孤立來對南斯拉夫國家和南斯拉夫共產黨人施加更大的壓力。中斷同世界上所有工人組織和民主組織的聯系。說什麼我們是托派。使南斯拉夫和鄰國的關係緊張化。」

鐵托在一個地方表示認爲，我們年輕的革命的處境比蘇聯一九一八年的革命還要艱難，一九一八年時八個國家派軍隊到俄國去，想推翻勞動人民的政權，維護沙皇制度：

「布爾什維克們的處境比較好。他們有世界工人運動的支持。」

情況確實如此，英國碼頭工人響應自己的領袖比萬的號召，宣佈罷工，拒絕裝運往俄國給干涉軍增援、糧食和彈藥的船隻，在法國的軍艦上，水兵舉行了起義。我國也發生了大罷工，來援助年輕的蘇維埃國家……

爲了衝破對南斯拉夫的這種孤立，採取了整整一系列政治上的和組織上的措施。接替斯塔諾耶·西米奇任外長的新外長愛德華·卡德爾十二月三十日在議會作報告時，提出了南斯拉夫對外政策的五項原則：

(一)加强聯合國組織。

(二)爲聯合國的民主化而鬥爭，特別要爲反對西方的表決機器而鬥爭。

(三)裁軍和禁止原子武器。

(四)廢除一切經濟歧視。

（五） 各國享有獨立和主權，各大强國不干涉小國內政。

我從建立起就任局長的新聞局得到了新的任務。首先要提供有關南斯拉夫，有關我們爲建設社會主義而作的努力，有關我們爲爭取各國間的平等而作的鬥爭的充分的情報。隨後，要找到最好、最有效的途徑，把這種情報告知世界，告知東方和西方。

我們在新聞局裏爲國內外記者經常舉行記者招待會。我們各個部的各方面的負責人在會上發表談話和回答問題。由我給外國記者舉行記者招待會，外國記者當時來貝爾格萊德的越來越多。這種記者招待會既有記者可以不受限制地引用我的話的，也有提供不供發表的情報的，在後一種情況下，他們得到可供引用但不指明來源的情報。

新聞局出版《新聞公報》和《對外政策文獻》，以使我們的人有機會了解世界上和國內的事態發展。不過，這一切都是緩慢地和謹慎地進行的。我們當時儘管已經鬥了六個月了，仍然還是很嚴重的教條主義者。我自己也有教條主義。有一期《對外政策文獻》登了已故美國副總統亨利・華萊士的下面這番話：

（一） 馬克思是共產黨人的上帝。

（二） 列寧是共產黨人的耶穌・基督。

（三） 斯大林是共產黨人的第一任教皇。

（四） 鐵托是共產黨人第一個馬丁・路德。

儘管是我主動提議發表這番話的，事後我又改變了主意。我不喜歡用大號鉛字登這番話。我身上的官僚主義者的毛病又犯了，我差一點禁止了自己的刊物。然而，我的同事們使我免於鬧笑話。

他們說服我，說他們並不這麼看，說作這樣的比較顯然是庸俗的，但是這是對外政策文獻，應當刊登世界上別的人對我們的想法，不論這些想法在我們的概念看來是多麼不尋常。

我最後總算讓步了。我的同事們說的是正確的。就這樣，《對外政策文獻》沒有被查禁。《文獻》的編輯維利·亞格爾在走出我的辦公室時馬上擦了一把額上的汗。

而我還算是屬於比較進步的官僚。可以設想，覺悟比較緩慢的那些人腦袋裏想的又是什麼。這一年年終，以爲蘇聯還是會讓步，以爲還是會作出妥協這樣一種看法變得根深蒂固。甚至我們的一位外交官向（法國）《世界報》發表了這樣一番意思的談話。但是第二天由於貝爾格萊德進行了干預，他不得不予以否認。

支持蘇聯會讓步這樣一種論點的人的理由是，在交換了頭幾封信之後，斯大林對我們一次也沒有公開地攻擊過。《布爾什維克》、《真理報》、《消息報》大罵我們，蘇聯個別領導人也是如此。莫洛托夫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蘇聯國慶時再一次號召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舉行反鐵托的起義。但是，斯大林保持沉默。例如，他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日向《真理報》發表談話，批評西方國家想進攻蘇聯，但是對我們連提都沒有提到。而在新的一年一九四九年，他於一月三十一日向美國通訊社國際新聞社的代表發表談話，表示願意同美國締結和約，解除對柏林的封鎖，但是對我們又是隻字未提。

這種情況使我們產生了希望。《戰鬥報》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斯大林六十九歲生日那一天發表了長篇社論，題爲《偉大的斯大林的六十九年》，用三欄地位登了斯大林的相片。而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列寧逝世紀念日，則寫道：南共遵循「列寧和斯大林的學說，取得了偉大的勝

利。」《斯大林選集》被納入所有的出版計劃。

似非而是的是，正是在這一時期，在一九四九年初，通過了我們戰後政治生活中斯大林主義氣味最濃的一項措施。一月底，南共中央舉行了第二次全體會議，會上通過了關於黨在對農村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和促進農業生產方面的基本任務的決議，在這一決議的基礎上，我們這裏也就開始完全按照蘇聯的做法加快集體化。

我們大部份人都有一種强烈的願望，「用行動來駁斥情報局的指責」，而指責之一是說我們把農村讓給了富農。

我們當時對於生產中和農村的社會主義形式應當是什麼樣的，既沒有明確的主張，自身也缺少實踐。當時存在的只是蘇聯的榜樣，別的就不存在了。就這樣，我們由於真誠地想盡早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而陷入了斯大林的陷阱。我們唯他的馬首是瞻。

只是在碰了壁，走進了死胡同之後，我們才得出結論，我們要想脫離我們的經濟所處的混亂局面而前進，只有向直接生產者提供更多的權利。就這樣，自治制度是逼出來的。但是，一九四九年全年，我們都不得不同我們頭腦中和我們周圍的這種致命的斯大林主義的影響鬥，儘管我們當時已經同斯大林主義，同斯大林想制服我們，讓我國屈服的活動發生了衝突。

有一個問題是，斯大林是什麼時候下決心在我們邊界上調動軍隊，以此來威脅我們的？我在《約·布·鐵托傳略》中寫道，愛德華·卡德爾在收到俄國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七日第一封信時曾說過：

「不會由此倒退……我很了解俄國人……我知道他們的邏輯……他們爲了在全世界面前製造替他們反對我們辯解的道義和政治上的理由，甚至會宣佈我們是法西斯分子……要能做到的話，他們會用武力把我們消滅掉。我相信，他們不會僅僅出於對外政策的理由決定這麼做……」

我記得，在布萊德籌備第五次代表大會時，吉拉斯、基德里奇和莫沙·皮雅杰之間曾討論過這個問題。我們住在（布萊德）湖一邊的幾幢別墅裏寫報告。莫沙·皮雅杰日夜工作，由於工作過度，他幾乎變得神志不清了。他給住在另一幢別墅裏的基德里奇寫信，送去決議草案，信的台頭寫上了：「親愛的莫沙」，而落款却寫上了「你的鮑里斯」。

莫沙的這封信使我們捧腹大笑，鮑里斯提議我們大家一起去莫沙那裏喝咖啡。鮑里斯當時談到（蘇聯）進犯的可能性，莫沙同意他的看法。

斯韋托扎爾·伏克曼諾維奇—泰波在回憶錄中也證實，曾經就蘇聯施加這一種壓力進行過討論：

「是否會採取其他的措施呢？例如在經濟上或者軍事上施加壓力。我們全都担心施加這樣的壓力，儘管我們知道這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是不相容的。

我們之間關於這個問題的談話一直沒有斷過。例如，在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前的那些日子裏，莫沙·皮雅杰、布拉戈耶·奈什科維奇和我在一起起草將向第五次代表大會提出的黨章草案。由於我們在第一次碰頭時就商定，把蘇聯黨的章程作爲基礎，我們的工作很快就完成了。我們隨後就開始談論起當前的形勢來了，也即談論起蘇聯對我們施加的壓力來了。當然，我們就談起蘇聯是否會向我們動武這個問題來了。我記得，我在談話中說：

『要是進攻我們，我就像打德國人那樣幹。』

布拉戈耶·奈什科維奇很快很敏捷地問道：

『你說什麼？』

『你不是聽見了嗎？』

『但是這是紅軍。』

『如果它進攻我們，在我看來，它就不再是紅軍，它就是侵略者而已。如果他們進攻我們，我們就要自衛。雖說我們是真正熱愛紅軍的，應當明確地表明這一點，以制止那些由於進攻一個在艱難的革命中誕生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使這支光榮的軍隊信譽掃地的人。』

那時莫沙·皮雅杰十分激動地站了起來，並說：

『隨他去，就打吧。但願他們進攻！沒有什麼好含糊的。動搖對於社會主義的命運只會是危險的！』」

而西方也趁火打劫，不斷散佈消息說，蘇軍在我們邊界上集結，儘管當時並不是這樣，例如一九四八年七月底，第五次代表大會剛結束不久，情況並非如此。後來的幾年中蘇軍倒果真來到了我們邊界上。

例如，巴黎的《世界報》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刊登了一則消息，題爲《斯大林是否打算使用武力？》消息是美國通訊社合衆社從君士坦丁堡發出的。據土耳其人士說，强大的蘇軍集中在南斯拉夫邊界上，蘇軍新的增援部隊也正在通過羅馬尼亞……據說，俄國人通過進攻南斯拉夫，將安排由佩科·達普切維奇將軍代替鐵托任國家元首……

我把這條消息拿給莫沙·皮雅杰看。他把眼鏡往額頭上一推，嘆了口氣，照貝爾格萊德的方

式，每說五個字就臭罵一句：

「媽的，俄國佬……這是他們『黑色宣傳』幹的……他們想嚇唬我們……你看，他們硬要把佩科拉進去……正是根據這一點，我才認爲消息來源於他們，儘管這也是符合西方人的心意的。蘇聯的威望就這樣在消失……」

一九四九年一月初，又出現了關於軍隊在我們同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接壤的邊界上集結的類似消息。

三月份也流傳過類似的消息。巴黎《世界報》記者、年輕的讓・雅克・塞爾萬・施拉貝來到貝爾格萊德。他要求進行一次不供公開發表的談話。我同意了，而他却在三月二十三日在該報頭版和第三版發表了這次談話，誠然，沒有提到我的名字，但是是作爲一位官方人士的回答發表的。也就是說，我上了大當。

吉拉斯爲此事而罵了我一通，並感到奇怪，我怎麼會受一位年輕記者的騙。我爲自己辯解說：

「這是上天有眼。當我自己像他那樣是個年輕記者時，我也幹過類似的事。我一九三五年在克羅地亞濱海的諾維格勒裝扮成漁夫同不走運的英國國王愛德華八世談過話，後來《政治報》用整版篇幅發表了這次談話……現在輪到我受報應了……」

吉拉斯臉上嚴峻的表情消失了，轉而笑了起來：

「萬幸的是你在《世界報》發表的這篇談話中沒有對他講多少東西。」

對於南斯拉夫是否預料會對它的領土發動進攻這個問題，我根據以前同卡德爾和吉拉斯商定好的對所有外國記者的統一口徑的回答，我說，我們决不作這樣的預料，沒有看到邊界那一邊有什麼

軍事上的準備活動……全世界都預料會發生類似這樣的事情，只是南斯拉夫並不感到什麼不安……但是，蘇聯方面沒有闢謠。一九四九年四月，全世界的報紙再次盛傳軍隊在我們邊界上集結。我起草了一份闢謠，《戰鬥報》作爲自己的評論發表了。我在那上面寫道，這是西方記者的想像的產物，他們想使蘇聯信譽掃地，把蘇聯說成是侵略者，把蘇聯同帝國主義國家等同起來。

緊接着我又寫道，塔斯社不吭聲，這是令人奇怪的，因爲關於蘇軍在挪威和土耳其邊界集結的類似消息一出現，莫斯科立即闢謠，而現在毫無消息。

最後，我提出了兩個問題：

關於對南斯拉夫實行軍事入侵的這類消息符合誰的心意？

塔斯社一再沉默對誰有利？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我明白了，當時斯大林還寄希望於他在南斯拉夫的第五縱隊，寄希望於我們的「正直的傻瓜」的氣質，認爲我們通過各種各樣斯大林主義式的不得人心的措施，會使人民脫離我們自己，因此，關於軍隊集結的這樣的消息，他至少可以用來嚇唬我們中間的胆小鬼。

只是在後來，當他的這一攻勢不了了之，没有給他造成所希望的結果時，他才真正開始考慮對南斯拉夫發動武裝進攻，採取相應的軍事措施，仔細估量，能不能使這樣一次進攻局部化，還是它會變成一場世界性衝突。

我們慢慢地，但却是可靠地打破了斯大林使我們陷入的孤立狀態，他本以爲在這種狀態下，可以比較容易使我們屈服。

莫斯科出賣科羅什卡①的斯洛文尼亞人來換取美元

斯大林本人不是俄羅斯人，而是格魯吉亞人，也就是說，他自己是小民族的一員。作爲革命家，斯大林研究過民族問題，在這一領域內，他甚至寫過專門的文章，談民族，談歷史上民族產生和發展的根源。

沙皇俄國是「各族人民的監獄」。十月革命給被壓迫的各族人民帶來了自由。列寧始終不渝地實行各族人民自決直到分立的原則。各個民族、各族人民、各個種族集團在蘇聯獲得了充分發展的可能性。但是，當斯大林接掌了對蘇聯的領導，刮起了另一陣風。使人感到大俄羅斯霸權主義又復活了。

列寧在生前就注意到了斯大林身上的這一特點，因此有一次說過，斯大林由於出於大俄羅斯感，像所有改變信仰者一樣，喜歡把事情搞過頭。列寧關於改變信仰者，關於改變自己的民族、信仰、主張和團體的屬性的那些人的這番話是耐人尋味的。約萬·茨維伊奇②注意到了盲目順應社會環境的現象，也即巴爾幹的個別種族集團，在土耳其人來到巴爾幹時，爲了能在新主子的恐怖統治

① 指奧地利東南的卡林西亞地區。——譯者

② 約萬·茨維伊奇（一八六五——一九二七），著名地理學家，曾任塞爾維亞科學院院長。——譯者

下苟且偷生，接受了新來者的服裝、語言、風俗和信仰。心理學斷言，有一種「與侵略者認同」的現象，也即正是從那些改變信仰者的隊伍中吸收了一批新信仰的最冷酷無情的聖徒，他們認爲自己的天職是用火和劍把主子的觀點强加於自己昨天的同胞手足。人民用下面這番話說明這種現象：「最壞的莫過於假洋鬼子」。

在我們的現代史上，也可以看到「與侵略者認同」的現象。在所有南部斯拉夫人民中間，最强烈的民族主義者，頑固的仇外分子，照例多少都是那些改變信仰者，本來屬於別的民族，屬於別的信仰或文化集團的那些人。

而在斯大林身上，鑒於他握有全部權力，握有絕對的權力，「與侵略者認同」的這一現象，也即與大俄羅斯霸權主義認同的這一現象，發展到了荒謬絕倫的地步。任何權力都創造使人變壞的條件，而絕對的權力就尤其如此。

我們自己也體驗到了斯大林無視小國人民的這種態度，特別是在他對科羅什卡的斯洛文尼亞人的態度上，體驗到了他在戰後大國政治家決定各國人民，特別是小國人民命運的賭桌上，是如何卑劣地用科羅什卡的斯洛文尼亞人的命運做交易，來換取德國在奧地利的五千萬美元的財產的。

科羅什卡的斯洛文尼亞人的處境，以及總的來說，斯洛文尼亞人的處境是悲慘的。最西邊的這一南部斯拉夫人民受到四周强鄰的欺侮。它的人種標誌綫，試以北方爲例，由於受制於北方的冰山，由於受到日耳曼化的壓力，而逐步地，但却是不斷地往南退。這發生在本世紀，是這一代人所目睹的。

馬其頓人的處境也有類似的悲慘之處。而作爲稍大一點的南部斯拉夫人民的一員的我們，如果

比較深刻地體察到這一點，我們就能更好地彼此諒解和團結一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久，我還是個兒童，曾同母親一起住在盧布爾雅那。我的小舅舅約萬由於得了肺結核，而在列奥尼什切瀕臨死亡。我們自從離開波斯尼亞山區，來到平原，來到貝爾格萊德，肺結核就開始在我們家庭裏肆虐。約萬舅舅因此而死於盧布爾雅那。一個漆黑的夜晚，我同母親一起從列奥尼什切回來，心裏悼念着親愛的舅舅，而從遠處傳來了歌聲：

斯洛文尼亞人，你們的疆界在哪裏？
斯洛文尼亞人，你們的故居在哪裏？
戈里察①之北，那裏是我們的疆界，
策洛韋茨②之北，那裏是我們的故居。

後來我問母親，這是一首什麼歌，爲什麼那麼凄涼。她和她的兩個女友，我想是叫做洛伊茲卡·什德比和齊里拉·什德比，向我解釋，斯洛文尼亞人是怎麼回事，他們當年居住在遠離目前的邊界的地方，在北方和西方，但是他們的命運是從來沒有統一過，北方的日耳曼化的浪潮很快就把他們吞没了。

我成年以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我翻譯了普雷日霍夫·沃蘭茨③的《大火》。我還注意

---

① 卽意大利東北與的里雅斯特接界的戈里齊亞。——譯者
② 卽奥地利東南卡林西亞地區首府克拉根福。——譯者
③ 普雷日霍夫·沃蘭茨（一八九三——一九五〇），原名洛夫羅·庫哈爾，斯洛文尼亞著名小說家。——譯者

有關的消息：希特勒佔領奧地利之後，對科羅什卡的斯洛文尼亞人實行日耳曼化的工作大大加强了，全部斯洛文尼亞族知識分子被强行遷走，嚴禁使用斯洛文尼亞語言文字，斯洛文尼亞人的所有組織，文化的和經濟的，全遭查禁，這些組織的財產被沒收。

在人民解放戰爭時期，最高統帥部聽到科羅什卡發生了首批游擊隊鬥爭的消息時十分高興。在希特勒帝國戰前邊界範圍內，唯有科羅什卡的斯洛文尼亞人，拿起武器，爲自己的解放而戰鬥。誠然，對於游擊隊來說，科羅什卡的條件困難得駭人聽聞，他們多次被擊潰，但是始終又起來從頭幹起。當第三集團軍和第四戰區的部隊越過舊的南斯拉夫奧地利邊界，進入科羅什卡時，科羅什卡的游擊隊已經把德拉瓦河以南的整個科羅什卡的納粹分子清除乾淨了，而在五月九日同英美軍隊一起開進了策洛韋茨。

然而，大國要的是另一副局面。在安排世界命運的波茨坦，曾作出决定，只由幾大强國的軍隊來佔領奧地利，並命令南斯拉夫的軍隊撤退。一九四五年五月底，南斯拉夫軍隊懷着沉重的心情不得不撤退。

一九四七年一月，南斯拉夫政府給了法英美蘇四國部長理事會一個備忘録，正式要求把斯洛文尼亞人的科羅什卡的領土歸併南斯拉夫。我們的主要論據是種族方面的客觀狀況，以及科羅什卡的斯洛文尼亞人積極參加了人民解放戰爭這樣一個事實。

一九四七年三月，在莫斯科舉行了四大國部長理事會會議，會議討論了締結對奧條約的問題。南斯拉夫代表團由愛德華·卡德爾率領，我陪同他出席。這是我們一起參加的第四次國際會議。我們在空閑時，總是下象棋。第一次較量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和一九四六年一月在倫敦進行的，卡德

爾贏了，比分很懸殊，三十四比二十二。在巴黎和會上，工作特別忙，我們下得比較少，但是這一次也是他贏了，比分是十八比十四。而在乘火車從貝爾格萊德到莫斯科的途中——這要五天時間——下了個平局，九比九，在快接近莫斯科時才開始下的最後一盤之前，都是如此。這一盤我走運了，卡德爾很高興地祝賀我第一次取勝。

他對我說：「幹部在成長，没有什麼！」

我故表謙虛：

「正當我們前來參加這次國際會議的時候，我是不希望我們的代表團團長失利的，哪怕是在象棋上也罷。」

當時已經預感不妙。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通知卡德爾說，南斯拉夫對科羅什卡提出的領土要求完全没有希望被接受。代表團裏氣氛沉悶憂鬱。還了解到其他一些事情。卡德爾給了鐵托一封電報，說蘇聯政府明確表示，如果會議就德國在奧地利的財産問題達成協議的話，蘇聯就不再能够繼續支持（南斯拉夫）對科羅什卡提出的領土要求。

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部長理事會這次會議的蘇聯代表多次强調，對於蘇聯代表團來說，主要問題是蘇聯爲自己提出的德國在奧地利的財産問題。這樣，美國人、英國人和法國人就明白了，蘇聯準備在奧地利邊界問題上讓步，也即準備讓科羅什卡的斯洛文尼亞人聽天由命。

但是，斯大林不願對出賣科羅什卡的斯洛文尼亞人的命運來換取美元一事公開承担責任，正如莫沙·皮雅杰後來寫文章談到的，「用科羅什卡的斯洛文尼亞人的自决權來換取五千萬美元，而西方三國以前只願意給予東方伙伴十萬美元。」

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在莫斯科要求我們的代表提出在斯洛文尼亞人的科羅什卡問題上對奧地利的最高要求和最低要求，「以便於他們同西方政治家們討價還價，並設法盡量爭取」。

我們由於不知道這是一場什麼樣的遊戲，提出了這樣的建議。然而，科羅什卡的斯洛文尼亞人的命運，早就被安排停當了，而且恰好是蘇聯方面做的。斯大林避開科羅什卡的斯洛文尼亞人，避開斯洛文尼亞解放陣綫領導，避開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會議全國委員會，本着同其他大國做交易的精神，於一九四五年五月給奧地利總理、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首領雷納如下一封信：

「尊敬的同志，感謝您四月十五日來函。

請不用懷疑，您對奧地利的獨立、完整和進步的關注，也是我所關注的。

我願根據力量和可能，向您提供奧地利所需要的任何援助。

回信遲誤，請見諒。

約·斯大林。」

而我們，南斯拉夫共產黨人，或者用斯大林的語言來說，「正直的傻瓜」們，對此却一無所知，一有機會，就向他顯露忠誠。

對於每一個願意開動腦筋的人來說，這是一個教訓，一個人只會當一次傻瓜！

蘇聯的最後通牒和普西奇・祖巴托維奇①

一九四九年夏天，南斯拉夫保安機關和蘇聯在南斯拉夫的特務機構之間的鬥爭已告結束。所有那些秘密組織都被破獲了，成員被逮捕了。在被捕的人中間有不少白俄，他們在俄國發生革命後來到南斯拉夫，定居下來。其中有些人在一九四五年以後取得了蘇聯國籍。

在被捕的人中，有不少人在佔領時期曾替蓋世太保效勞，不論是暗中的，還是公開的；克拉古耶瓦茨的彼得・奧蘭斯基甚至參與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對該市居民的大屠殺，當時德國人槍殺了七千名工人、兒童和市民。

蘇聯大使館就逮捕這些人提出了十分尖銳的抗議，同我們外交部交換了幾個照會。但是，逮捕白俄一事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達到了高潮，那一天，莫洛托夫向南斯拉夫政府提出了名副其實的最後通牒。

照會是在凌晨三點送交米洛什大街的外交部大樓的，交給了看門人。東歐司司長伊沃・韋伊沃達七點半左右看到了照會，立即把它交給卡德爾同志。半小時以後，卡德爾打電話給韋伊沃達，問他對照會有什麽想法。

---

① 爲莫沙・皮雅杰的筆名，有詼諧的含意，直譯意爲「利齒小狗」。——譯者

韋伊沃達回答說：「還不是最壞的！」

卡德爾回答說：「不過，是迄今爲止最壞的！」

他立即打電話給吉拉斯、基德里奇和伏克曼諾維奇，要他們到他的辦公室裏來，討論這份照會。鐵托同志當時在布里俄尼，立即把照會的內容告訴了他。

照會除了別的，提到被捕的白匪「同南斯拉夫全體愛國志士一起不贊成南斯拉夫政府衆所周知的不能容許的行徑，南斯拉夫政府已從民主和社會主義的陣營逃跑，加入了國際資本的陣營，南斯拉夫政府現在盡量向蘇聯惡意搗亂，以便得到國際資本的代表人物對自己的讚揚，以此爲自己製造功名。」

接着說，這些白匪是在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政治信念，照會說：「除了法西斯制度的國家外，沒有一個國家認爲，自由地表達民主的觀點是犯罪」。接着把南斯拉夫政府比作希臘的卡爾達里斯政府和西班牙的佛朗哥政府，而且還逐字逐句地說了下面這番話：

「只要看一看正在南斯拉夫發生的一切，就不會再產生懷疑，現在在南斯拉夫已經根本談不上什麼人民的政權，什麼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制度了。

既然國家受制於外國資本，南共領導同全世界的共產黨處於交戰狀態，又怎麼能談論什麼南斯拉夫的社會主義制度呢？」

最後蘇聯政府提出了最後通牒式的要求，這一要求逐字逐句是這麼說的：

「看來，南斯拉夫政府打算繼續非人道地對待蘇聯公民，繼續進行違法的逮捕和毆打，繼續侮辱蘇聯公民。

看來，南斯拉夫政府不打算讓罪犯——法西斯做法的執行者承受罪責。如果這符合事實的話，蘇聯政府認爲有必要聲明，對於這樣的事態，它將不會無動於衷，它將不得不採取爲維護在南斯拉夫的蘇聯公民的權益，爲教訓超越一切界限的法西斯暴徒所必需的其他更爲有效的手段。」

此時傳來了鐵托同志從布里俄尼發來的回答。他認爲局勢十分嚴重。在遞交這份最後通牒式照會之前幾天，就有消息談到蘇軍在一些鄰國集結，情報局建立了目的在於南斯拉夫發起進攻的特別軍隊集羣。

斯韋托扎爾·伏克曼諾維奇—泰波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提到，在卡德爾那裏開了這次會之後，「我們商定，我們中每一個人開始執行以前從中央委員會接受的自己的任務。鑒於我曾被確定爲南斯拉夫游擊隊總司令，我立即採取了一切措施，使整個組織作好準備。關於這一切，我們向鐵托同志作了滙報，他對於我們的各項措施均表同意。同時還下令朝着北方進行軍事演習，我們認爲進攻會來自那裏。」

吉拉斯那一天向我談了照會的內容。他說，已經開始從伏伊伏丁那向內地，特別是向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撤退食品倉庫、檔案和工廠。

等待敵人發動攻勢，是十分難受的。我們在戰爭中就經歷過這種時刻。一旦已經發動，就輕鬆一點了。那時你看到打擊的主要方向，你就可以行動。而現在這樣，好比你緊靠着牆站着，等待他先向你開槍，什麼時候開，在什麼地方，完全聽憑他決定，這是十分難受的。

卡德爾把我叫去，向我提出，要我很好地留意，不要讓我們的報界爲蘇聯發動進攻提供任何藉口。那些天，我好比睜大了四隻眼睛。但是，魔鬼從來不安息。《文學報》九月六日登了一篇文章，題目爲《克雷洛夫或者伊索》，文章逐字逐句是這麽説的：

「外交照會是件鬼玩意兒。你寫了份照會，望着優美的字跡，你會想：有誰像我這樣聰明？誰會勝過一籌？尤其是，如果你以前當過律師的話。

麻煩的是通常得到覆照。請看，請看，這傢伙是怎麽回答的。想的似乎是：瞧我叫他上鈎了！也有享有盛名的，或者起碼是衆所周知的照會。但也有更出名的覆照。例如，奧匈帝國一九一四年七月致塞爾維亞的照會，狡猾的奧地利通過這份照會提出了種種要求：修改塞爾維亞的教科書以及類似的事情，還有讓奧地利法院在塞爾維亞調查薩拉熱窩行刺事件和審訊塞爾維亞的公民。照會是出了名了。之所以出名，其一是奧匈帝國這個强國傲慢地試圖干預塞爾維亞這個小國的内政，其二是照會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但是，如果説奧地利這份照會出了名的話，那麽塞爾維亞政府的覆照就更是享有盛名了。

塞爾維亞政府是一個小國的政府，這個小國的首都在薩瓦河和多瑙河的此岸，而彼岸却在匈牙利手中，從那裏扔塊石頭，就可打到塞爾維亞首都，塞爾維亞政府同意了奧匈帝國提出的一切要求，它若是一個强國是不會同意這些要求的（如果它是個强國的話，或許也不會向它提出如此無恥的要求！），而只拒絶了一項要求：讓奧匈當局在塞爾維亞的領土上進行調查。就這樣，小小的塞爾維亞拒不讓奧匈帝國這個强國踐踏它的主權。克雷洛夫的寓言説，小狗竟敢衝着大象吠叫。大象死去了，而塞爾維亞這隻小狗却得到了一大塊象肉。一個强國從歐洲的地圖上消失了，似乎從來没

有存在過似的。誠然，小小的塞爾維亞也消失了，但是在它的地盤上產生了更大的南斯拉夫。故事的結尾已經不是克雷洛夫寓言裏的結局……

……如果現代的外交官，尤其是像在集市上叫賣似地誇口自己壟斷了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了解，在自己的外交照會中樂於作馬克思主義說教的那些人，沒有別的事情可做，而遵照克雷洛夫寓言辦事的話，那就更爲愚蠢得多了……」

我看了看文章——確實是一篇好文章——是由誰署名的，那裏寫着「普西奇·祖巴托維奇」。我的心都涼了。我打電話給吉拉斯：

「你看看《文學報》就明白，莫沙·皮雅杰寫了些什麽。他署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他在柳巴·丘巴的《皮埃蒙特》①當記者時的年輕時代的筆名：普西奇·祖巴托維奇。」

同一天，檢察院宣佈查禁這一期《文學報》。那天晚上當我和大叔（我們出於敬愛，這麽稱呼莫沙·皮雅杰）在一家電影院裏看一部牛仔片時，我安慰他說：

「大叔，沒有什麽。在我們同情報局的這場較量中，再沒有更出色的文章了，我敢打賭，有朝一日這篇文章是會收進南斯拉夫政論文選第一卷的……」

大叔笑着說：「得了，他媽的斯大林。他想幹什麽，竟威脅到我們頭上來了！」

① 皮埃蒙特爲意大利北方省，曾率先發起統一意大利的運動。——譯者

第六章　東歐的宗教裁判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蘇聯政府交給南斯拉夫政府一份照會，片面撕毁了關於兩國友好、互助和戰後合作的條約。這份照會稱：

「今年九月二十四日在布達佩斯結束的對國家罪犯和間諜拉伊克及其同伙——他們同時也是南斯拉夫政府的代理人——審訊過程中揭露，南斯拉夫政府虛僞地在同蘇聯『友好』的虛假聲明的僞裝下，長期來進行着反對蘇聯的極其敵對的和破壞性的活動。

布達佩斯的審訊還表明，南斯拉夫政府領導人不僅是出於自身主動，而且按照外國帝國主義集團佈置的直接任務進行了並在繼續進行反對蘇聯的敵對的和破壞性的活動。

審訊中揭發的事實進一步表明，南斯拉夫現政府已經完全依附於外國帝國主義集團，變成了他們的侵略政策的工具，這勢必導致，事實上也已經導致南斯拉夫共和國的自主和獨立的喪失。

這一切事實證明，南斯拉夫現政府粗暴地踐踏了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一日締結的蘇聯和南斯拉夫友好、互助和戰後合作條約，並把條約撕成了碎片。

根據以上所述，蘇聯政府聲明，蘇聯從現在起認爲已不受上述條約產生的義務的約束。

根據蘇聯政府命令
副外長　安・葛羅米柯。」

蘇聯政府的這份照會清楚地披露了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的較量中想達到什麼樣的目的。通過這一審訊，要在全世界公衆面前，把南斯拉夫說成是一個危及世界和平的國家，因爲南斯拉夫對鄰國抱有侵略意圖。這樣就會爲蘇聯對南斯拉夫的一切侵略行動找到辯解理由，蘇聯只是反對巴爾幹和中歐的這個「帝國主義基地」而已。

緊接着蘇聯，其他東歐國家也都撕毀了同南斯拉夫簽訂的聯盟條約，波蘭和匈牙利是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是在十月一日，而捷克斯洛伐克在十月四日，這顯然表明，整個行動是莫斯科統一籌劃的。

對於匈牙利外長拉伊克・拉斯洛和別的一些人——匈牙利議員謝尼伊・蒂博爾博士，匈牙利中將帕爾菲伊・杰爾琪以及南斯拉夫駐布達佩斯使館前代辦拉扎爾・布蘭科夫以及另外幾個人——的這次審訊，不是這一類審訊事件中唯一的一起。

第一起這一類比較重大的審訊是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在阿爾巴尼亞進行的。被帶到被告席上的是阿爾巴尼亞政府副總理科奇・佐治。

在索非亞，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保加利亞政府前副總理特拉伊喬・科斯托夫和另外幾個被告被帶到被告席。

這樣一些審訊的浪潮波及所有東歐國家，這樣一類審訊中比較重要的最後一次於一九五二年十

一月發生在布拉格，當時審訊了捷克斯洛伐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魯道夫·斯蘭斯基，捷共中央書記處國際部部長貝德里赫·蓋明德，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長弗拉迪米爾·克萊門蒂斯，《紅色權利報》主編安德烈·西蒙，捷共中央副總書記約瑟夫·弗朗克，國防部副部長貝德里赫·雷欽，內務部副部長卡雷爾·施瓦布，外貿部副部長魯道夫·馬爾戈利尤斯，財政部副部長奧托·費什爾，外交部副部長瓦弗爾·哈伊德以及外貿部副部長阿爾圖爾·倫東。

所有歷史文件都表明，所有這些審訊都是由一個中心，也就是説，由莫斯科組織的。斯大林死後，掀起了一個平反浪潮，發表的材料清楚地表明，同一隻手把所有這些國家裏的大批領導人驅向死亡。

如果把起訴書和被告在法庭上的供詞作一番比較，也可以看出，是由同一個中心導演這齣戲的：目的在於通過誹謗和撒謊，在世人面前把南斯拉夫説成是一個按照美、英、法帝國主義命令辦事，威脅這些國家的獨立和社會制度的國家。

按照拉伊克案件的起訴書的説法，南斯拉夫早在一九四五年就在匈牙利組織了間諜網，目的在於推翻匈牙利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打倒匈牙利政府。據説，貝爾格萊德還給布達佩斯發指示，要求殺害匈牙利最常見的一些領導人。據起訴書説，鐵托同志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對匈牙利的訪問使得這些計劃加速貫徹執行。而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也即在情報局决議通過之後，南斯拉夫內務部長亞歷山大·蘭科維奇曾潛往匈牙利，在波克什附近霍爾蒂分子地主克拉伊納·安塔拉的狩獵場會見了拉伊克·拉斯洛，下達發動政變的最後指示。據説，同蘭科維奇一起去的有南斯拉夫駐布達佩斯大使卡爾洛·姆拉佐維奇以及一位叫做塔里斯納什·杰爾迪的漂亮的匈牙利女人。

起訴書還硬說，拉伊克·拉斯洛早在西班牙時就是外國間諜了，他當時是國際旅的戰士。他在西班牙人民抵抗運動失敗後，就勾結上了南斯拉夫人——在法國，在居瑟、維爾納、聖基普里安集中營的國際旅的戰士。起訴書接着斷言，有一百五十多名南斯拉夫人——西班牙內戰參加者曾是外國情報機構的代理人，後來蓋世太保接收了這批人，一九四一年南斯拉夫爆發起義時把他們派回國。起訴書列舉了這批南斯拉夫人的名字，其中有阿萊什·貝勃勒、伊萬·戈什尼亞克、博日達爾·馬斯拉里奇、科斯塔·納吉、卡爾洛·姆拉佐維奇、斯韋托扎爾·伏克曼諾維奇—泰波、斯韋蒂斯拉夫·斯特凡諾維奇，儘管後兩人從未去過西班牙，而貝勃勒、馬斯拉里奇和姆拉佐維奇沒有在上述集中營裏呆過，因爲馬斯拉里奇從西班牙去北非了，從北非又去蘇聯了，而貝勃勒和姆拉佐維奇作爲重傷員直接從西班牙撤退到巴黎，從巴黎回到了南斯拉夫。

在地拉那、索非亞和布拉格的審訊中提出了類似的指控，也即說南斯拉夫準備吞併阿爾巴尼亞並同君主法西斯的希臘瓜分阿爾巴尼亞，說科斯托夫想通過南部斯拉夫人聯邦把保加利亞並歸南斯拉夫，而南部斯拉夫人聯邦被說成是帝國主義的計劃。科斯托夫被說成是南斯拉夫政府的陰謀活動的傳達者以及南斯拉夫領導人親密的和所信任的同伙，他通過南斯拉夫領導人同帝國主義情報機構掛上了鈎。起訴書把科斯托夫斥爲蘇聯的卑鄙的死敵，「季米特洛夫的保蘇接近政策」的反對者。

起訴書接着還斷言，比林馬其頓①的馬其頓人的政治和文化組織是「國家保安處的代理機構」，比林馬其頓人同馬其頓人民共和國統一的意願是「國家保安處代理人從事活動的結果」。起訴書特別强

① 南斯拉夫指保加利亞的比林地區。——譯者

調指出，比林馬其頓人的解決民族問題的願望是帝國主義的計謀，科斯托夫使得這一計謀得以實現。

在審訊中，所有被告，除科斯托夫外，全都承認了起訴書對他們的指控。我們從下一章可以看到，對他們採用了蘇聯一九三五——一九三八年間審訊老布爾什維克時採用的同樣的方法。

蘇聯的宣傳機構不僅在東歐國家，而且在全世界，展開了一場最激烈的反對南斯拉夫的運動。全世界所有共產黨都投入了這一見不得人的勾當。在世界各地出版了書籍，闡述起訴書裏的各個看法。例如，英國共產黨領導人之一詹姆斯·克魯格曼在倫敦根據拉伊克、佐治和科斯托夫審訊案的材料，專門出了一本書，題爲《從托洛茨基到鐵托》，包含以下各章：（一）情報局決議；（二）審訊揭露了什麼；（三）工人運動中的間諜和代理人；（四）鐵托分子今天的作用和策略；（五）鐵托分子今天的作用和策略（續）；（六）鐵托的南斯拉夫國內的情況；（七）同社會主義國家的對比；（八）若干結論。

克魯格曼特別强調貝爾格萊德和英美情報機構之間的所謂聯系。他所能對英美情報機構的效勞莫過於此了，因爲莫斯科所宣傳的這一些謊言正合英美情報機構的心意。這是在替它們作免費廣告，在整個東歐造成了一種害怕外國情報機構網的恐懼氣氛。

我在戰前就認識克魯格曼。他曾同洛拉·里巴爾一起在國際青年爭取和平組織裏工作。而戰時，克魯格曼曾是英國情報機構駐開羅的軍官，他們同歐洲各國的抵抗運動有聯系。

現在克魯格曼是英國共產黨官方的歷史學家。現在他再也不提起他那本談南斯拉夫的書——《從托洛茨基到鐵托》了，因爲在斯大林死後，東歐各國政府，以蘇聯爲首，都公開摒棄了在這些駭人聽聞的審訊案中提出的指控，關於這一點，下面將談到。

克利門特・伏羅希洛夫元帥的懺悔

一個人只有親自經歷過不幸，才感覺最深切。一九四九年秋天，我們前往參加聯合國會議，在快到瑟堡——「伊麗莎白女王」號在那裏等待我們前往紐約——的法國火車站上，我買了一份報，上面有對拉伊克・拉斯洛的起訴書，當我讀完了，我相信上面這番話是有道理的。

當我們議論開，斯大林怎麼可能墮落到這等地步，怎麼會使用如此卑劣的手段，揑造出這樣一些荒謬絕倫的事情來，當時整個代表團都在火車上：卡德爾、吉拉斯、貝勃勒、維爾科・米丘諾維奇、米蘭・巴爾托什、亞奈玆・斯塔諾夫尼克和其他一些人，都在場。

有人——我記不起是誰了（那一天我没有記日記）——補充說：

「現在我明白了，老布爾什維克們在斯大林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間的那些審訊案中是如何感覺的！」

我想起了那個富有教益的關於神父和瘟疫的民間故事。可怕的疾病傳染到了村裏，每天晚上都死去幾個人。百姓向神父訴說，而神父却說：

「死個把人算什麼，村莊還在……」

而當瘟疫傳染到他家裏，奪去了他老婆的性命時，他就跑到家門口，直着嗓子嚎叫：

「幫幫忙呀，幫幫忙，全村人都要死光了。」

雖說在莫斯科審訊案時期，我還不是一個黨員，但是，正如莫沙·皮雅杰在一篇文章裏所寫的那樣，當斯大林「開始大批出口絞刑架」時，我就不能不把關於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間的斯大林主義的真相同一九四九年的真相聯系起來。

一九六二年，當我在哈佛大學豪頓圖書館查閱列昂·托洛茨基的檔案時，同樣的痛苦感向我襲來。我想看看有什麽材料表明，一九一四年前夕，托洛茨基訪問我國一些地區時，他同青年波斯尼亞人和其他青年秘密組織是有聯系的，儘管如此，我還是被吸引住，看看他以後一些年代的檔案，看看他被逐出蘇聯，特別是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間莫斯科舉行大審訊時的檔案。

托洛茨基收到《真理報》，他保存的談這些審訊，談他是帝國主義的間諜的那些《真理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看得很仔細，幾乎每隔一行、兩行，就用紅鉛筆劃一下。紅鉛筆幾乎常常斷，這表明，指責他是帝國主義的間諜這件事使他甚爲傷心。由於憤怒而使勁用鉛筆劃，鉛筆劃斷了，報紙上留下了很粗的鉛筆印。

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改變我自己對於托洛茨基的學說的看法，我認爲，他的學說是充滿極權精神的。從歷史上，我知道，是他首先在蘇聯建立了有效的國家機器——後來的官僚主義化的架子。但是，在豪頓圖書館的那個夏天的日子，我明白了斯大林對老布爾什維克們，對托洛茨基本人所犯下的深重罪孽，他不讓托洛茨基安寧，甚至在一九四〇年在墨西哥找到了托洛茨基，殺人兇手冷酷地用登山用的錘子打碎了托洛茨基的腦門。

蘇聯的這些「清洗」是以老布爾什維克、列寧格勒州委書記、聯共(布)黨中央政治局委員謝爾

蓋・米羅諾維奇・基洛夫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被殺害爲發端的。我越來越把蘇聯的這些「清洗」同一九四九年東歐各國的「清洗」聯系起來。(有人猜測，是斯大林本人下令殺害基洛夫的，以便造成一種大屠殺的氣氛，對於斯大林來說，要在蘇聯執行大規模殺害革命家的計劃，這種氣氛是必不可少的)。

維辛斯基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間所寫的起訴書成了一九四九——一九五二年間在布達佩斯、索非亞和布拉格進行的審訊的樣板。提審被告的方法，預審時使他們準備好參加主審的方法以及被告對於偵查人員要求於他們的一切均表「承認」，完全一模一樣。

一九六九年新年，我是在閱讀拉伊克、科斯托夫、斯蘭斯基和克萊門蒂斯受審材料的情况下度過的。我完全埋頭於這些材料，由於驚訝和憤慨，我的腦袋都快炸了，恰好在那時，羅多柳布・喬拉科維奇給我送來了他寫的《一代人的故事》之二。喬拉科維奇的這本書涉及的時期，從一九三三年初，至一九三六年底。其中的大部份時間，喬拉科維奇是在蘇聯度過的。在那裏，他正好遇到基洛夫被害，他多處提到隨後很快接着而來的屠殺，爲了躲避國內的恐怖而前往蘇聯的南斯拉夫一些最傑出的革命家在這場屠殺中也丢掉了性命。

我好久沒有像看喬拉科維奇的書那樣一口氣就看完了。他在自己的又一部作品中表明自己是富於真理感和正義感的。閱讀他對於同俄國人民的會晤的記載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他是多麼熱愛他們，他對於俄羅斯大地是多麼讚賞，俄羅斯的老百姓爲了擺脫落後，使國家實現工業化，使人與人的關係提高到更高的程度，作出了多麼巨大的努力。但是，喬拉科維奇以正直的、開誠佈公的方式痛斥了斯大林主義及其殘害人們心靈、虐殺人們的肉體的方法，在第二百五十頁上，喬拉科維奇在一個地方由於爲我們優秀的革命家拉德・武約維奇的喪生感到痛心而呼喊出這樣一句話：

「斯大林所殺害的著名的共產黨人比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合在一起所殺害的還要多！」

歷史還沒有計算清楚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三年期間，東歐的清洗殺害了多少人，有多少人被送去服苦役，被送進集中營。只是在斯大林死後，開始爲被殺害被逮捕的人進行所謂的平反時，才對這個駭人聽聞的時期有較多的了解。在捷克斯洛伐克，被捕的人數高達幾萬人。

特拉伊喬•科斯托夫於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一日被平反。那一天，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托多爾•日夫科夫在索非亞積極分子會議上說，在審訊科斯托夫等人時對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領導人提出的指控，是揑造的，沒有根據的。

而拉科西則在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聲稱，最高法院的調查斷定，對拉伊克的指控「是揑造的」。一九五六年十月七日進行了隆重的公開的平反，那一天對受害者進行了隆重的葬禮，匈牙利全體顯貴都出席葬禮。匈牙利政府副總理奧普羅•安托爾說：「……决没有比我們現在爲死去的同志平反更爲令人悲痛的職責了，我們無法使他們復活。我們深感悲戚的是，我們過去相信了使這些同志遭受迫害的惡毒的誹謗。我們已經追究了，將來仍將追究對他們的命運負有責任的那些人的責任。這樣一種駭人聽聞的事情今後再也不可能發生了。」

在捷克斯洛伐克，等待平反的時間最長。諾沃提尼只同意廢除說斯蘭斯基和克萊門蒂斯是南斯拉夫代理人的指控。在他下台之後，一九六八年一月才開始平反，而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又妨礙了平反的進行。

誰都無法使死去的人復活。但是斯大林在東歐進行的這些清洗更多的是損害了人的性格。維爾科・溫特哈特在他的《約瑟夫・布羅茲的一生》一書中描繪了蘇聯的一些高級官員對於自己在一九四八——一九五三年期間按照斯大林的命令所作的反對南斯拉夫的言行，是如何表示懺悔的。這裏，我只想談一談伏羅希洛夫元帥。

在南斯拉夫的游擊隊員中間，他享有很高的威望。他是一九一七——一九二一年期間俄國革命和內戰的英雄，一九四一年，當東綫正展開生命攸關的戰鬥時，我們這裏的歌曲歌頌了他。在黑山，人們歌頌他說：

「在三條戰綫上，

三位元帥

在爲反對資本而戰，

伏羅希洛夫從北方

把希特勒匪幫驅趕……」

但是，當斯大林開始反對南斯拉夫時，伏羅希洛夫受命從一個東歐國家首都走到另一個東歐國家首都，說些關於我們的極其駭人聽聞的事情。例如，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他在布達佩斯說：「從社會主義和民主陣營逃往資本主義和反動陣營的南斯拉夫現在的統治者的命運是可悲的。社會主義的這些叛徒在自己的國家裏復辟了資本主義制度，取消了南斯拉夫人民的民主成果，在國內實行了血腥的法西斯恐怖統治。」

斯大林一九五三年死了，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一九五五年夏天來到貝爾格萊德，在蘇爾欽機場

表示賠禮道歉，而鐵托同志一九五六年前往莫斯科。伏羅希洛夫受命在第一批人中間對他表示歡迎：

「鐵托同志，蘇聯人民把您個人當作友好的南斯拉夫和貴國人民來歡迎，牢固的、强烈的友誼把蘇聯勞動人民同貴國人民聯系在一起……」

而在晚會上，這位老元帥哭了起來：

「我是傻瓜……我按照斯大林的命令說了些多麼愚蠢的話……我感到羞愧……請你們原諒我……」

斯大林主義竟然能使伏羅希洛夫元帥這樣一位戰場上的傳奇式英雄折服，這是令人多麼痛心的事……

而我們的老百姓在那艱難的一九四八年，在四面八方都大肆反對我們的時候，對於真理和正義終將勝利没有喪失信心。早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五日，《戰鬥報》就發表了貝爾格萊德「斯拉維亞」建築企業的工人就情報局的誹謗和攻擊所通過的一項决議：

「我們企業最堅决地摒棄謊言和誹謗，我們確信，真理終將勝利，有朝一日各國人民起來質問誹謗者爲什麼不說真話時，他們是會臉紅的。」

科斯托夫、克萊門蒂斯和安德烈·西蒙

在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間莫斯科對老布爾什維克的訴訟過程中，以及在一九四八——一九

五三年間東歐的訴訟過程中，幾乎所有被告都承認了起訴書對他們提出的指控。怎麼能解釋這一怪現象？幾十年來提着腦袋幹革命，連死都不怕的這些老革命家、勇士却同意自認有罪，把歷史證明是完全揑造的一些事情承認了下來，這怎麼來解釋呢？

這個問題一直在折磨我，時至今日我仍然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我自己還認識一九四八——一九五三年間訴訟案中的某些被告。在審訊斯蘭斯基和克萊門蒂斯時，在被告中間坐着的還有《紅色權利報》主編安德烈·西蒙。我本人認識他。一九四六年巴黎和會期間，我們幾乎每隔一、兩天就見面，而在一九四七年，他曾同戰前就聞名的記者埃貢·埃爾温·基什一起到貝爾格萊德來拜訪我。

基什曾是中歐坐第一把交椅的記者，遐邇聞名。在我的一生中，在遇到我們的米拉·拉多伊契奇之前，我沒有見過更有才華的記者，遺憾的只是拉多伊契奇不發表按題材歸類的報道文集。

西蒙對我說過，埃貢·埃爾温·基什喜歡吃野鴨，因此我在他們抵達之前，前往斯雷姆的奥波夫修道院附近的沼澤地，同密洛凡·吉拉斯一起打幾隻野鴨。我是一個蹩脚的獵人。我不喜歡殺戮，但是我喜歡看看風景和野禽。有一次我同吉拉斯和布拉什科·奈什科維奇一起去打獵（地點是在巴切卡帕蘭卡對面的多瑙河上的一個小島上），我們手拿卡賓槍，埋伏着等待野猪。那是一個涼爽的早晨，前一晚我睡得不多，因此我昏昏欲睡。而在我躲在那裏睡覺的那棵樹上，好像惡意搗亂似的，恰好有一隻大野猪。吉拉斯叫了起來：「弗拉多，別讓它跑了，開槍」，我從睡夢中驚醒，而野猪完好無缺地幾乎是越過我的身子逃跑了。後來，爲此而大吵大嚷了一番。

這一次打野鴨，我的運氣也不佳。吉拉斯打了十幾隻，而我一隻也沒有打到，儘管我拚命放槍。我們回家時，吉拉斯對我說：

「我知道你的兒子博羅要你給他帶回真的野鴨的翎毛，你拿兩、三隻去，免得孩子失望。你還有客人……」

招待埃貢・埃爾温・基什和安德烈・西蒙的那頓晚餐，一直吃到深夜，吃到凌晨。西蒙使我加深了對他的最初的印象，就是説這是一個聰明而勇敢的正直的革命家。

當我聽説，他在一九五二年秋天在布拉格舉行的審訊中果真説過，對於指控他的一切，他是有罪的，並請求由於他的罪行而把他絞死，這時我震驚不已。

我自己問自己，他們怎麽使這個人屈服的，是什麽東西使他自己指控自己犯下了最駭人聽聞的罪行，而實際上没有犯，尤其是安德烈・西蒙可説完全是一個歐洲文明教養出來的人。

對於弗拉基米爾・克萊門蒂斯，也有一個同樣的問題折磨着我。我對他不大了解。我們在巴黎和會期間見過幾次面。一次通常的、不長的談話，突然使我們親近起來。他問我，在戰前是否認識什麽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者。我説，大概在戰爭爆發前夕，我作爲我們中央委員會的交通，曾參加過幫助揚・什維爾馬出走，他當時正路過貝爾格萊德。據我記得，整個行動是由尼古拉・佩特羅維奇和已故音樂家巴奈・武奇科維奇負責的。克萊門蒂斯感到高興，臉上露出了某種苦笑。什維爾馬是一九四四年斯洛伐克起義中的英雄。他在那裏犧牲了。

在情報局决議發表之後，克萊門蒂斯也没有中斷同我個人的關係。一九四九年秋天，我們從法國乘了同一艘船，我想是乘了「瑪麗皇后號」，前往紐約參加聯合國會議。當時斯大林對南斯拉夫提出了最激烈的指控。拉伊克案件已開始，情報局在準備第二個决議。

我在船上仍然從事運動。我作爲貝爾格萊德前乒乓球冠軍（一九三〇年，我曾得到瑪麗亞皇后

的獎品——自來水筆一枝），參加了船上組織的各次錦標賽，奪得了一些獎杯。一天早晨，我正同一個年輕的美國人打乒乓球打得不可開交，工黨議員紅頭髮的巴巴拉·卡斯爾向我走來。這位漂亮的婦女，才思敏捷，她也去參加聯合國會議。她徑直對我說：

「弗拉迪米爾，到晒太陽的甲板上去吧，我們在那裏打板球，我們需要第四個人，好打雙打。」

板球像是某種排球，打的不是乒乓球，而是一個小的橡皮球。我撂下了美國人，跟着這位漂亮的英國女人走了，以滿足她的要求，但是我一走上晒太陽的甲板上，我發覺，巴巴拉·卡斯爾並不像她那保養得很好的、克制的長着雀斑的臉蛋乍一看所表明的那樣幼稚。其他兩位伙伴是英國外交部政務次官赫克托·麥克尼爾和弗拉迪米爾·克萊門蒂斯。蘇聯代表團也同我們一起前往參加聯合國會議，我剛想向卡斯爾、麥克尼爾和克萊門蒂斯表示歉意，替克萊門蒂斯着想，我們在一起玩是不合適的。克萊門蒂斯自己却對我說：

「讓我們兩個斯拉夫人來揍這兩個英個佬。」

我們打得很好，打敗了這一對英國人。巴巴拉·卡斯爾對於我老是把球低低地送過網去十分惱火，我表示歉意說：

「您要曉得，我是懂得紳士風度的，但是我身上有某種令人討厭的巴爾幹人氣質，不允許我打輸來討人歡心。」

自那時以來，我沒有見到過克萊門蒂斯。但是，當我讀了他承認了些什麼時，我簡直發呆了。這怎麼可能呢？他們用什麼辦法迫使他承認的？

在最後上了斯大林的絞刑架，而我本人又認識的那些人中，特拉伊喬·科斯托夫是唯一使我感

到意外的一個人。解放後不久，他曾訪問貝爾格萊德。當時還有幾個保加利亞人，我陪同他們訪問了阿瓦拉，在那裏，我向他們解釋了一九四四年十月解放貝爾格萊德一仗是怎麽打的。科斯托夫仔細地聽着我講。蘭科維奇那天晚上只是談到，科斯托夫不想在平等的基礎上同南斯拉夫建立聯邦，科斯托夫對一位南斯拉夫女同志説：「我們保加利亞人是聰明的，你們南斯拉夫人是富裕的，就讓每一方把自己所擁有的東西帶進聯邦。」

南共中央對於特拉伊喬・科斯托夫没有好印象。一九四五年以後就在我們這裏定居的保加利亞老革命家伊凡・卡拉伊凡諾夫，也認爲科斯托夫這個人不怎麽樣。卡拉伊凡諾夫説，在佔領期間，科斯托夫在法西斯警察關押下表現惡劣，他甚至説，科斯托夫充當代理人，因爲被警察兜捕的許多中央委員都被槍斃了，而科斯托夫却得以幸免。

情報局决議發表後，科斯托夫同契爾文科夫一起，是首批攻擊我們的保加利亞人中間的兩個人。一九四九年四月，科斯托夫被捕時，鐵托同志在一次講話中曾説，南斯拉夫人早就知道，他是警察的暗探。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索非亞開始審判，我作爲新聞局局長當時舉行了記者招待會，談莫斯科的訴訟案。我當時確信，這次審判會像布達佩斯對拉伊克的審判一樣，也就是説，會對南斯拉夫提出一系列的指控，科斯托夫的表現也會恰如拉伊克。

但是我完全搞錯了。我向科斯托夫開了火，説他是鮑里斯國王的暗探以及諸如此類的話，午後我收到了發自索非亞的第一個報告説，科斯托夫什麽都不承認。

科斯托夫不承認的主要指控計有：

一、在保加利亞法西斯警察面前投降，

二、充當英國情報機構的間諜，

三、同南斯拉夫領導人勾結，陰謀建立一個反蘇的巴爾幹聯邦。

他只承認：

一、在工作中進行了反蘇活動和缺乏警惕性，致使黨和國家的機構中鑽進了特務，

二、他對蘇聯的整個態度是錯誤的，他在黨內的活動的動機是「一個布爾什維克黨的第一把手所不容許有的個人主義和個人野心」。

當科斯托夫說了這番話之後，法庭庭長趕緊中斷審判，以便對主要被告做工作。但是，半小時後，審判繼續進行時，科斯托夫依然態度不變。

《真理報》第二天早上怒氣冲冲地寫道：

「在科斯托夫講了頭幾句話之後，事情就變得清楚了，法庭所面對的是一個狡猾的、有經驗的、無可救藥的罪犯，他給自己提出的任務是，盡一切可能把法庭引入歧路，使它遠離基本的東西，使自己逃避主要的打擊……」

而我在新聞局的辦公室裏，用拳頭打自己的額頭：

「噯，弗拉迪米爾·德迪耶爾，你簡直是頭蠢驢。你在全世界面前指控人家是警察的暗探，你看看，人家表現得多麼英勇……」

同一天，我舉行了第二次記者招待會，承認了自己的錯誤。這是所能做的最起碼的事情了。

自那時以來，整整過去了二十年，我經常問自己，科斯托夫怎麼逃避了劊子手們的嚴刑拷打，他爲

什麼不同意演一場假戲，就如拉伊克、斯蘭斯基和其他許多人所做的那樣。最後，爲什麼其他這些人都這麼做了：是出於恐懼？是由於聽了虛假的諾言？是由於被説服了？老天，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政治謀殺之謎

如果我們不掌握原始歷史資料，也即不掌握偵查和訴訟案本身確鑿無疑的記錄，要對司法政治謀殺的動機作出評價，决不可能提出可靠的意見。

在約翰·肯尼迪總統被打死後，美國一些雜誌和電視台要求我，作爲一九一四年薩拉熱窩行刺事件歷史的專家，對於李·奧斯瓦德是否是兇手以及他的動機是什麼，談談自己的看法。

我回答説，我首先是根據確鑿無疑的偵查記錄和審判記錄，得出關於加夫里洛·普林齊普及其同伴們的動機的結論的。以前的奧地利罪孽深重，不過，畢竟還是一個法治國家，它使刺客有可能向警察、向預審法官以及在審判時陳述自己的動機，這些記録現在保存着，可供歷史學家們參閲，因此有可能得出結論。

但是在肯尼迪事件中，得克薩斯州達拉斯城的警方一口咬定，在提審被控謀害美利堅合衆國總統的李·奧斯瓦德時，竟然根本没有作記録。李·奧斯瓦德後來在警察圈子内被打死，隨身也帶走了秘密。

因此，缺乏這樣的文件，就不可能對任何政治謀殺事件作出嚴肅的評價。

我們在評價蘇聯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時期的司法政治謀殺以及東歐一九四九——一九五三年間犯下的一系列類似罪行的時候，我們的出發點同樣首先必須在於我們是否掌握確鑿無疑的偵查記録和審判記録，是否掌握政治機構和執行機關之間的關係史，是否了解發出過哪些指示，是誰發這樣的指示的以及有什麼樣的實質性的背景。

但是，斯大林死後，蘇聯政府給許多死去的老布爾什維克平了反，這無疑證明了這些人是無辜的，也就是説，他們是由於政治原因被謀殺的。同時，這些平反令也把籠罩住下令犯下這一類政治罪的人的動機的帷幕，揭開了很大一部份。

然而，這一切文件不是都可以看到，至少不是學術界都能看到的。

對於一九四九——一九五三年時期東歐的訴訟案中無辜犧牲和無辜被判刑的人的平反工作，不是各國都進行了，例如，在阿爾巴尼亞，科奇·佐治仍被認爲是應該處死的罪犯。即便在宣佈進行平反的那些國家裏，不論是在規模上，還是在原因方面，都對這些司法謀殺作了不同程度的辯白。在保加利亞，特拉伊喬·科斯托夫只是表面上被平反了，而沒有涉及這樣的細節：是誰下令通過司法途徑謀殺他的？只是保加利亞當局，還是莫斯科的什麼人下令的？匈牙利人曾經十分認真地試圖揭露拉伊克被害的全部真相，但是，他們也不敢探究這樣的問題：是誰下令拉科西和格羅殺害拉伊克和他的同志們並指控他們犯有那些罪行的？

一九四九——一九五三年時期，東歐國家的所有這些訴訟案顯然是按照一個版本進行，都懷有同樣的目的，就是把南斯拉夫説成是帝國主義的基地，也就是説，這些訴訟案全是由一個中心安排

的，不過，不能不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在這些東歐國家中，被送交法庭的首先是戰時呆在國內，同本國人民共命運的那些領導人，而不是一九四五年，在紅軍開到之後從莫斯科前來接管政權的那些領導人。

這裏還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從莫斯科來的那些領導人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以司法途徑殺害追求更爲人道的社會主義，而不是盲目照搬莫斯科的公式的那些領導人？

在這方面，一九六八年一月，特別是諾沃提尼下台之後所開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平反，使得歷史學家們得以最深入地看到斯大林主義的陰謀的背景，審訊被告和迫使被告承認他們所沒有犯下的罪行的方法，而最爲重要的是，暴露了蘇聯的偵查機構在多大的程度上領導了對無辜的革命者的所有這些屠殺。

蘇聯政府決定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原因之一很可能就在於制止進一步揭發這一駭人聽聞的真相。

爲什麼老布爾什維克們和東歐國家的革命家在這些訴訟案中承認了斯大林主義的荒唐的指控？如果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的話，那麼應當指出，並不是在所有情況下都同樣地採取相同的偵查方法的。

有人猜測，使用了藥品，迫使受害者承認警察要求於他的一切。據科學家們說，這樣的藥品尚不完善。

赫魯曉夫說，斯大林曾指示偵查人員：「毆打，毆打，再毆打」。但是，肉體的折磨不能說明所有這些訴訟案。這裏牽涉到的是革命家，他們以前在資產階級法庭面前對警察的恐怖給予了令人

驚嘆的反抗。

有人還提到偵查人員使用了欺騙手段。有一種可靠的說法說，曾向拉伊克許諾，他如果承認指控，就只把他假判死刑，然後把他和他一家人送往蘇聯。按照這種說法，在把拉伊克送往刑場，他明白過來他受騙了，他叫喊了起來，而偵查人員甚至把他的夫人帶到那裏，去聽，去看這一切！

要說清楚老革命家們在斯大林主義訴訟案中的態度，上述因素顯然不可能是有決定性意義的。應當了解這些革命家的心理，他們對革命事業的忠誠以及他們對斯大林主義教條主義的態度。在斯大林看來，正是這些老布爾什維克是最大的危險，因爲他們是一九一七年革命的人道思想的體現者，正如在東歐，他最仇恨的是戰時呆在國内，認爲有可能找到比蘇聯有人情味和比較文明的向社會主義過渡方式的那些共產黨人。

斯大林用黨性這個口號來代替忠於共產主義理想的思想，黨就是一切，黨造就個人並消滅個人：也就是盲目忠於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的樣板，盲目忠於他的絕對權力。偵查人員在調查過程中誘導被捕的革命者來討論更高的目的，來討論外界對蘇聯的威脅（而這樣的威脅也確實存在），並要求他們爲此而承認强加的罪行，接受必須高於他們的個人利益的目的。就這樣，在把他們從肉體上殺害之前，已經殘殺了他們的靈魂，或者科學地說：已經同侵略者認同。

在資產階級的監牢裏，這些革命者可能成爲英雄，因爲在他們身上，有一個基本的心理上的前提：他們不是孤立的，他們是有覺悟的羣衆的一部份。這給他們提供了精神上的力量，使他們能够頂住一切折磨。

而在斯大林主義的監牢裏，情况就不是這樣，至少絕大多數被捕的人不是這樣。在東歐，没有

出現過羣衆性革命運動，使這些人得以在一九四五——一九四八年時期從中成長起來。他們中有些人是掌權的，這些人是很聰明的，他們看到了在他們那裏不能再採用斯大林主義的方法。

在這些被捕的人中，許多人是從自己的角度看待南斯拉夫的。他們認爲，在國家的發展上，南斯拉夫不可能成爲他們高於蘇聯的榜樣，因爲南斯拉夫自己也開始採取莫斯科的許多方式。他們是讚賞我們的革命的，但是又有一種變態的心理。他們受到良心的責備，因爲他們未能實現這樣的革命進程。

對於這樣的教條主義，這樣的精神氣氛，偵查人員提出了關於南斯拉夫所謂的背叛的指責，說什麼在同南斯拉夫的衝突中還有某種更高一層的意義，只有斯大林才明白的某種意義，正如保加利亞哲學家托多爾·帕夫洛夫所說的，斯大林好比是「國際工人運動中的喜馬拉雅山」。

話又說回來，一九四八年，我們的一些正直但被教條主義浸透了靈魂的人，也有這樣的看法。他們中間有些人要求我們去布加勒斯特參加情報局會議，因爲「我們大家都有這樣的印象：迄今爲止提出的那些反對我們的東西不是最重要的；毫無疑問，這裏牽涉到從我們的立場或許不可能完全看清楚的計劃……我不能設想，竟有什麼情況會使我國的利益同蘇聯和整個反帝集團的利益相對立。」

拉伊克·拉斯洛就是犯了這種不幸的教條主義的一個典型人物，他以爲，在斯大林對南斯拉夫的指控中存在某種更高的目標，他作爲一個優秀的革命者是準備支持這樣的目標的。而當偵查人員巧妙地把這一點同許諾保住他的性命結合起來，拉伊克就上當了，對南斯拉夫提出的一切荒謬絕倫的指責，他一概予以證實。

在斯大林的調查方法中，無疑是有對異教徒進行思想灌輸的傳統的影響：其中有沙皇秘密警察——暗探局的許多經驗，而暗探局又是吸取了天主教宗教裁判的經驗。斯大林只不過使過去的這些駭人聽聞的方法得以完善而已。

我們如果提出斯大林如何强行逼取這些口供這樣一個問題，假如我們不考慮到這些中世紀的方法在二十世紀得以實現的一個國家的社會存在的性質，那麽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我們就會犯錯誤。原因在於：把社會主義只是看成是實現工業化，完全忽視了把人的品德提高到更高程度的工作；個人和社會之間的各種形式的相互關係懸而未决，反之亦然，包括民族問題在内；以「理想的社會」爲名而忽視個人，等等，等等。

只是用「個人迷信」的理論來解釋這樣的進程，就等於是從唯心主義的立場出發來闡述社會改造。

路易·亞當米奇之死的秘密

一九四五年七月的一天，我國代表團在聯合國舊金山會議結束後回到了紐約，原籍斯洛文尼亞的美國作家路易·亞當米奇來找我，要我去他在新澤西州米爾福附近的農場住幾天。

我在一九四五年的日記中曾記載過同亞當米奇的這次會見，我現在從中摘録若干段落：

「我同茹約維奇同志和斯塔諾耶·西米奇抵達美利堅合衆國頭幾天就會見了亞當米奇，我們談

得最多的是强大的南斯拉夫裔美國人聯合委員會這個組織的工作，這個組織做了許多工作，使美國人知道我國各族人民的鬥爭，而領導這個組織的是路易·亞當米奇和藝術家兹拉特科·巴洛科維奇；我向亞當米奇談到，我們在第四次攻勢前夕收到了他發表講話反對德拉扎·米哈伊洛維奇和王國駐華盛頓大使福蒂奇的第一條消息，這條消息對我們來說，具有重大的意義。

實際上，所有這些會晤都是短時間的，雖然有幾次持續了四個小時，我每一次會晤後都覺得同亞當米奇的談話沒有結束，僅僅才開始，說短時間，是從這一意義上說的。因此，我們那時就商定，最好是我到他的農場去拜訪他。

我們商定午間在亞當米奇落脚的旅館裏碰頭，我按照商定的時間準時抵達，亞當米奇笑着說：『南斯拉夫人總是遲到，我看鐵托的人是不按這條規矩辦事的』。我們想搭乘午間的第一趟火車，因爲在摩天大樓晒得熱乎乎的水泥牆内，使人覺得就像在烤火似的。這不是一般的夏天，乾而熱的夏天。當時有個低氣壓，潮濕籠罩着全市。太陽再一晒，熱空氣使得身體連呼吸都困難；我離開旅館時換上的乾淨襯衫，幾分鐘之後就濕透了。

我們乘出租汽車，駛過曼哈頓。曼哈頓一下子被遠遠地拋在身後，我們以很高的速度駛過那些熙熙攘攘的馬路，穿過漆黑的地道，抵達了賓夕法尼亞火車站。我們剛下汽車，剛拿下手提箱，第二輛出租汽車就開到了，隨後是第三輛，第四輛，一切都像輪盤似的運轉着。這裏熱得更令人難以忍受，不僅混雜着燒過的汽油的熱空氣使人窒息，而且出現了刺鼻子的煤烟味。

亞當米奇把我帶到一個大廳裏，把我安置在一個角落裏，他說我不用等多久，因爲他只是去買一下車票，而我望着這個在曼哈頓底下挖出來的螞蟻窩，望着數以千計的人匆匆忙忙地走過過道和

樓層，走向每時每刻都在駛抵這個車站的長長的列車。一切都按照一定方式在蠕動，在作響，使人產生了一種願望，想閉上眼睛，避開這種壓力。這種有組織的喧囂對疲倦的大腦的刺激似乎是與時俱增，好像要把它粉碎似的，突然在這一片喧囂聲中，通過揚聲器傳來了一位姑娘的聲音。她在報告，哪一次列車什麼時候啓程，在哪一個站台以及要遲開幾分鐘。嗓音柔和，每個字都說得很慢，在這熙熙攘攘的人羣中，在這種酷熱下，對我來說，這好比是一種安慰，就如游擊隊行軍越過杜爾米托爾山之後喝了一口蘇希奇湖的清凉的湖水一樣，或者就如經過六個小時的夜行軍之後在波斯尼亞格拉莫奇波列得到了一捆剛割下的麥秸一樣。即令是現在，有時候我的耳邊還迴響起這位姑娘的聲音。

亞當米奇買了票回來，不知道從哪裏給我買了點裝在紙杯裏的冰水，他領着我穿過若干過道和地道，穿過擁擠的人羣，最後我們在火車上坐了下來。列車經過赫德森河底下的隧道時，我們的耳朶裏感到有很大的壓力，但是當火車頭駛上了地面上的軌道——這裏沒有晒得發燙的摩天大樓和柏油馬路——吹起了小風，我們呼吸到了新鮮的空氣，我也好像復活了。

我第一次有機會比較長時間地觀察亞當米奇，觀察他的很高的額頭以及强壯的胸骨。這是他身上最突出的兩個地方。尤其是那强壯的胸脯，表明亞當米奇年青時在遼闊的美國爲了掙點麵包皮曾經幹過體力活。但是，你很難看到亞當米奇安靜過。他老是在活動，從自己的提包裏拿出各種雜誌，上面有的文章用紅鉛筆作了勾劃，拿出熟人給他寫的信；他問我，紐約的摩天大樓給我留下什麼印象，他自己開始談論這些摩天大樓，談論這種高超的技術，談到我國人民如何能够掌握這種技術，因爲我國人民有進取心，有活潑而頑强的精神。他談到，最好開始在美國各地搜集技術、醫學、農藝等方面的專業書籍，寄回南斯拉夫，使人民能够從技術方面受到教育……

在亞當米奇談論這些的時候，我注意到，他的整個這番話是很有邏輯，是很講究方法的，在我們以前各次會晤中，在我在舊金山逗留期間，他每隔一、二天寄給我的信件、電報、報章文章和書籍，也都是如此，亞當米奇掌握了美國的講求實際的精神，他一分鐘都不讓白白過去，他高水平地安排了自己的工作。

從美國的這種講求實際的精神中，不時地還顯露出他從故鄉，從斯洛文尼亞，從我們那裏帶去的某種精神。這就是幹勁十足，就是熱情奮發。他談到，我們的國家如何有朝一日實現工業化，現在應該如何來造就和培養我們的技術幹部，這些話有力地向我證實了上面的看法。

我們談論着這個題目，没有覺察到已經過去一個小時了，我們已經到達了旅途的最後一站了。我再一次覺得，這一次同亞當米奇的會晤也仍然是短暫的，談話實際上也僅僅才開始。在站台上迎接我們的是亞當米奇的夫人斯泰拉，一個温柔、矮小的美國女人。她穿着長褲，頭髮束了起來，一切看上去都很簡樸，但又是雅緻的；我的目光注意到她的雙手——上面可以看到家務勞動的痕跡，這立即使我產生了對她的一種友好和親近的感情。

我們坐進了汽車，開往亞當米奇的農場……整個這一地區佈滿了小山丘、小片森林，還有一條在平原蜿蜒曲折的河流，這使我想起，這一帶很像從索德斯卡到托普利察和新梅斯托途中羅格山下的多倫斯科地區，很像克爾卡平原。我把我的想法告訴了亞當米奇。他笑了笑，我覺得，他幾年前買下這座有三十來公頃土地，主要是森林的老式莊園時，促使他這麼做的正是這種想法。我們駛過亞當米奇的第一位鄰居，這是一個老農民，揮着手，我們繼續駛往他的莊園。這是一座砌得很結實的石頭房子，有將近一百年的歷史了，亞當米奇花了不少的錢使它適於居住。我們駛過菜園。在長

得高高的菜豆架中間，一位老人探出身來，他臉龐瘦削，背有點駝，手上拿着鎬頭。亞當米奇叫他過來，並告訴他，我是從哪裏來的，老人笑了笑，在藍色工裝褲上擦了擦手上的泥巴，同我握手：

『我叫安德烈·克里玆曼契奇，老家在的里雅斯特附近！』

老安德烈眨着眼睛，看上去有點激動，他表示少陪之後，很快就在葉子寬大的菜豆架中消失了。亞當米奇對我說，安德烈在美國已經呆了好多年，現在在他那裏幫工，替他看房子和照料菜園。近來，自從我們的軍隊解放了的里雅斯特，老安德烈就安不下心來了。他想回老家。就這樣，我們開始談論的里雅斯特。亞當米奇進而談到的里雅斯特對南斯拉夫的意義，特別談到它對斯洛文尼亞、斯洛文尼亞人民的意義。

我國哪一個民族也沒有像斯洛文尼亞人民那樣被搞得四分五裂。不公正的邊界使幾乎五分之二的斯洛文尼亞人置身於南斯拉夫境外，而現在他們第一次有機會統一在一個自由的國度裏。

亞當米奇說得很熱烈，帶點慷慨激昂。他對的里雅斯特的命運的關心，如同老安德烈和我們大家一樣。這一年的五月和六月，美國幾乎所有的報刊在的里雅斯特問題上對我們採取了完全不友好的態度，這時，人們聽到的美國輿論中有利於我們的第一個呼聲來自亞當米奇。他在開明的《午報》上寫文章，申述我們的權利，特別是猛烈抨擊了英國的政策。我們從菜園裏回來時，亞當米奇談到英國亞歷山大元帥鮮廉寡恥的一次講話，亞歷山大在講話中把我們同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裕仁相提並論。亞當米奇簡直氣得發狂：

『他竟然這麼來談論一個如此頑强勇敢地反對進犯者的人民。當然，這不是亞歷山大想出來的，

這是邱吉爾從倫敦指示他說的……』

我們進了屋，亞當米奇開始談論起英國的政策、英帝國的地位以及邱吉爾一九四三年秋天對羅斯福總統的訪問，當時亞當米奇偕同夫人一起應邀出席白宮的晚宴，他在那裏對邱吉爾談到了自己的想法。

夜幕已經降下，樹林裏吹來輕風，斯泰拉叫我們進晚餐。我們在安放在屋前的一張桌旁坐下，亞當米奇的岳母，一位安詳的老婦人也來了。一位身材魁偉的厨娘穿着白圍兜、白裙子、白襪子和白皮鞋出現在門口，開始打鐘。這是給老安德烈的一個信號，告訴他該回來吃晚飯了。

第二天清早，天還没有大亮，成百隻小鳥唧唧的叫聲把我吵醒，一時我不知道我在哪裏……我長時間望着樹林，吸着樹林裏吹來的新鮮空氣，聽着小鳥的叫聲。後來我又睡着了，九點左右，我聽到亞當米奇的聲音，聽到他在叫我，這才驚醒……那天整個上午，我們都在談論文學，談論亞當米奇的著作。他向我解釋，他如何安排寫書，如何搜集材料。我從許多熟悉亞當米奇的人那裏聽説，加上我自己所看到的，我產生一種看法，認爲亞當米奇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勤奮的人之一。他高度吸取了美國講求實際的精神，把這種精神運用於寫作藝術，致使他的整個工作，他的工作能力，他搜集材料的一套辦法，他的報紙，他同讀者的接觸，所有這一切都給人以一座寫書工廠的印象，在那裏，知道每一個螺絲釘安在什麽地方，知道每一個螺絲釘的價值，一切都是按照計劃進行的，一切都是事先作好算計的。

亞當米奇把全副精力投入到這一工作中去，他抱着極大的熱心寫某些書，以致一天工作十五至

十六個小時，不停地寫，一頁又一頁地接着寫。他的夫人斯泰拉是他的忠實的合作者。

第二天早晨我得返回紐約。亞當米奇和斯泰拉送我到車站。火車開得越來越快，我思量着我從亞當米奇的莊園帶走的信的意義。那天清早，有人敲我的房間的門。探進門的是亞當米奇的菜園工，老家在的里雅斯特附近的安德烈·克里茲曼契奇的瘦削、頭髮斑白的腦袋。他手上拿着一封信，對吵醒了我再三表示歉意。最後，他把信交給我，請我把信帶給鐵托元帥。信的題目是《一個的里雅斯特人的呼聲》，內容如下：

『信末署名的就是我，我以前是普里莫爾斯卡的里雅斯特人，我謹向進行了英勇戰鬥並戰勝了納粹法西斯的解放陣綫、鐵托元帥以及全體游擊隊員表示祝賀。

勝利還不是徹底的，你們應當進行一場外交戰，使的里雅斯特和整個普里莫爾斯卡也歸併南斯拉夫。

我還想提一個建議：把所有法西斯的主教們的羽毛剪除乾淨，免得他們在那裏危害我們的人民。消滅納粹法西斯，給人民以生命和自由。

安德烈·克里茲曼契奇及路易·亞當米奇

於新澤西州米爾福』①

① 此信原文爲斯洛文尼亞文。——譯者

我再一次同老安德烈握手，他走到門口對我說：

『請轉告鐵托元帥，我們感謝他，因爲他維護了我們斯洛文尼亞的權利！』——

從一九四五年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我没有去過美國，但是我一直在同亞當米奇通信。他一九四九年一月來貝爾格萊德爲他寫蘇南衝突的一本新書收集材料。

這本書在他一九五一年死後才問世，書名叫《山鷹和草根》。我在《美國紀行》這本書裏，根據我一九四五年的日記描繪了我同亞當米奇的第一次會晤，而他在自己的這本書裏則描繪了一九四九年二月初同我的愛人韋拉以及同我的會晤：

「星期六，二點至三點半，我在德迪耶爾家吃午飯，我在那裏見到了弗拉多的第二個妻子韋拉，這是一位漂亮、文靜的斯洛文尼亞婦女，她在那裏參加了游擊隊和革命。弗拉多的第一個妻子奧爾加，就職業而言是一位大夫，一九四三年在南斯拉夫西部山區英勇犧牲。

『韋拉和我昨天晚上爲了你而吵了一架！』——弗拉多趁韋拉去厨房的機會用英語這麼說。『實際上不是吵架，爭論了一番就是了。她想名副其實地宴請你一番，她設想，對一個美國人是應當那樣宴請一番的，而我不同意：去他媽的！如果他不喜歡我們每天都在吃的東西，那就讓他哪裏來的，回哪裏去。』

韋拉此時回來了，不明白弗拉多和我爲什麼笑得那麼歡暢。我給她解釋，『讓他哪裏來的，回哪裏去』這句話在美國有特殊的含義。這句話是美國的那些超級愛國者用來反對我們這些『外來者』的。

弗拉多接着説，『我跟韋拉説，我們在新澤西你家裏時，在厨房裏吃飯，我餓了，就自己打開

冰箱。因此，如果她不改變想法的話，這頓午飯就吹了。』

我回答說，對此我表示感謝。

弗拉多繼續說，『只有一件事，我同意闊氣一番，這就是在房裏生起爐火』。說着，他就把手伸向屋角裏的一隻瓷磚壁爐。『冬天，我們通常只在厨房裏生火。孩子們幾乎整天都呆在那裏。』

『我們爲什麽不在厨房裏吃飯？』

『厨房太小了。我還沒有冰箱，到處都是牛奶、油脂、鷄蛋、水果、各種果汁、可口可樂和冰塊。你跟我去看看。』使韋拉難堪的是，弗拉多把我拖進了厨房。孩子們的玩具和最小一個孩子的摇籃也在那裏。

作爲新聞局局長，弗拉多的地位等於聯邦副部長，根據當時實行的特權制度，他有權享受伙食特別補助。尤其是同外國人有接觸的官方人士是享受這種補助的，以便他們可以招待外國人。弗拉多說，他早晨七點離開家，兩點鐘回家，吃半小時飯，然後又去上班，很晚才回家，既沒有時間，也想不到去參加晚會，當然這無助於他的工作。

『對於這種事情，美國人那句俏皮話是怎麽說的？對了，我想起來了：這是菠菜，去他媽的！①話又說回來，韋拉和我，像其他許多同志一樣，我們並不要求特權，也不認爲我們需要特權。』

我問他，這些特權有沒有被人濫用。

弗拉多回答說：『有人濫用，因此市面上傳說紛紜。對於想儉樸地過日子的我們來說，這是不

---

① 這句話取自《紐約人報》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八日登的一幅漫畫，上面一位母親對孩子說：「這是菜花」，孩子回答說：「這是菠菜，去他媽的！」意指「胡説八道」、「瞎扯淡」。——譯者

愉快的，一般來說，這也是不妥當的。黨內正在展開一場反對特權的名副其實的鬥爭。這不那麽簡單……』

我在德迪耶爾家的這頓午飯只有一道斯洛文尼亞菜：里切特，它由大麥、菜豆、肉塊和土豆做成。此外，我們還吃黑麵包，加了菊苣粉的咖啡、包有果泥的薄餅。

韋拉送上薄餅，不安地望着丈夫說：『只是這一點是作爲例外，是給我們的客人準備的。』

『嘿，天曉得，你從哪裏弄到了酥油和鷄蛋！』弗拉多嚷道，在一個外國人面前模仿真正的巴爾幹的丈夫在家裏是怎麽一副家長派頭的。

韋拉笑了起來，把手指放在嘴上。

午餐後，弗拉多和我單獨坐了一回……在我們離開前，弗拉多把我帶到他那間小小的沒有生火的工作室。他給我看了美國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間出版的一大批反鐵托的書。

他說：『妙極了。其中有些簡直是白痴式的作品。你是否知道，這些書在那裏賣多少册？』

我對他說，發行量不大。

我說：『自從你們一九四六年擊落了那幾架飛機之後，南斯拉夫和鐵托在美國變得不得人心，以致連反南斯拉夫、反鐵托的書的銷路也不好！……』

……弗拉多對我說，他一直在收集關於共產黨在塞爾維亞，在貝爾格萊德的活動的材料。他說，這是勇敢和犧牲精神，愛國主義和與國際工人運動團結一致的名副其實的史詩。如果有時間的話，他打算把這一切都寫進一本書裏。隨後他沉默了一段時間，很可能是在考慮他所收集的那些材料……

……我對弗拉多說，在我在南斯拉夫的幾天逗留中，我所看到、所聽到的一切給人極其深刻的

印象，令人十分激動，南斯拉夫今天的情況，同革命時期一樣，是十分令人感興趣的。

我說：『近五、六年來，關於南斯拉夫，我或許閱讀了幾百萬的文字，而現在我發現，我一無所知。弗拉多，這或許是你的錯誤。你，或者別的什麼人，把這一切美妙的東西都包藏了起來。你還算什麼新聞局局長？』

弗拉多回答說：『你也看出這一點了，這使我感到高興，你要是見到老大，見到鐵托，請你也把這一看法告訴他……老實告訴你，我想擺脫這一職務，別的什麼都不幹，只是寫我們的現代史，而且是值得寫多少卷就寫它多少卷。鐵托、卡德爾、吉拉斯老是對我說，我應該做的正是這一工作，我有什麼辦法？他們認爲，我是一個紀律性强的共產黨人。此外，不論我對於新聞局長這項工作是多麼不勝任，現在看來，沒有別的人更適合於担任這項工作。我們缺少能幹的人。』」

在一九四九年二月的那些日子裏，寫一本關於同情報局的衝突的書，這個想法越來越激勵着亞當米奇。我向他提供了大力援助。鐵托、基德里奇、卡德爾和貝勃勒也表示要大力幫助他。

「我將充當你的忠實的黑人薩博，一切都交給你，對一切問題都給予答覆，只要你提出問題。」在《書中之書》中，從第十二頁一直到第十九頁，有亞當米奇寫這本書期間給我的幾封信。幫助他的，還有我在這一類事情上的忠實助手維利·亞格爾。

五月初，亞當米奇從奧帕蒂亞給我寫信：

「親愛的薩博，

請不要放過倫敦《泰晤士報》四月二十九日的社論。

過幾天，給你寄上我的書的草稿。你將有一大堆工作要作。

我到奧帕蒂亞時疲勞極了，並且病了。在這裏呆了三天，已經恢復了。

路·」

「我在仔細閱讀你戰時的《日記》。這是一本優秀的書，是一座名副其實的金礦。一、兩年前，我在美國就看過你這本書的大部份，但是當時我對於這一類書籍精神上是沒有準備的。我將引用你這本書裏的許多章節，不論是得到你的同意還是沒有得到你的同意。

路·」

亞格爾和他的班子全力以赴，亞當米奇需要的一切，全寄到奧帕蒂亞和斯洛文尼亞去了，那年春天的絕大部份時間，他是在斯洛文尼亞度過的。他還同鐵托、卡德爾、吉拉斯、蘭科維奇、基德里奇、泰波和其他一些人進行了長達數小時的專門的談話。他走遍了全國，遍訪各個共和國，同農民、工人、青年談話。

後來，他回美國，開始寫書。有時候，對於提出的一些新問題沒有及時作答，他就生我的氣。他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三日的信中寫道：

「……你一個字都沒有寫來。我給了你幾封信和好幾章文章，是寄到巴黎的。你是否收到了？你最好不時來信……

……你哪怕是給我寫上一行字也好。你必須這麼辦。

你的股票對我來說已降到了百分之〇點〇六……」

在一九五〇年二月四日的信中，他的心境好一些了：

「……六月中以前，書出不了。

我現在去不了巴黎。待我寫完書，我或許四月份去貝爾格萊德……

在這段時間，請你把各章通讀一遍，立即寄還，提出意見和建議……

……請你核實一下，我同鐵托等人的談話，我記録得是否確切……

亞格爾工作得很出色。請把這個意見告訴他。他寄來的東西，我全收到了……」

亞當米奇在自己的《趨勢和潮流》雜誌上發表了所寫的書的某些部份。這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對美國的進步人士。

來自莫斯科的反應是駭人聽聞的。亞當米奇遭受壓力，要他放棄寫這本書。《匹茲堡新聞報》發表一條消息說，某個伊麗莎白·本特麗，以前曾經是美國共産黨黨員，她主動向麥卡錫委員會自首，說從事了反對美國的活動，並在那裏聲稱，路易·亞當米奇在戰時曾充當蘇聯的間諜。亞當米奇後來寫信說，他不能向法院控告她誹謗和詆毁，因爲她是對參院的一個委員會説這番話的。

亞當米奇懷疑，情報局分子慫慂本特麗向麥卡錫告發，從而向亞當米奇挑釁，這只是因爲他不想停止發表關於南斯拉夫的這本書。

一九五〇①年新年前夕，亞當米奇寄給我一封短信：

「我疲乏極了。這件工作是可怕的，而我却承担了。我爲什麽没有出生在挪威呢！

① 此處似應爲「一九五一」年。——譯者

我跟約扎·維爾凡①談過話，他會告訴你全部細節，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的意思是你二月底或三月初到美國來。這將有助於使事情加速進行。同時，你來這裏，不像我去那裏那樣引人注目。」

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又來了一封短信：

「或許我在三月前寫不完這本書。你最好是三月中來美國。」

亞當米奇不屈不撓地寫書。你有許多材料，因此決定發表兩册。在他同我們一些領導人的談話上，發生了一些麻煩。有的要求把他們所說的話逐字逐句都予發表。這使寫書的工作拖延下來了，四月份我收到他發自紐約的一封心情憂鬱的信。

同時還常常發生對亞當米奇的直接威脅。本特麗的挑釁没有得逞。亞當米奇決定在自己的書中，在一條脚註中把情報局的這一鬼蜮伎倆公諸於衆。

後來，他家裏也發生了一些困難。他的岳母死了，妻子斯泰拉常常生病。那個年邁的斯洛文尼亞人克里茲曼契奇也死了。亞當米奇常常一個人呆在新澤西的莊園裏。

還在一九四九年底，當我最後一次同他在紐約見面時，他就向我談到，有人想暗害他：

「俄國人和我們美國的右派都想幹掉我。對這兩方來說，我都是眼中刺。」

一九五一年七月底，我得到我們的一位同志發自紐約的一篇報告，談他同亞當米奇的談話，他

---

① 約扎·維爾凡（一九〇八—　），時爲南斯拉夫駐聯合國常駐代表團團長，曾任副外長、共和國總統秘書長等職。——譯者

說，他認爲亞當米奇面臨危險。我在《書中之書》中抄録了這篇報告，現全文轉載如下，因爲它可以提供一些綫索，可說明路易·亞當米奇這位勇敢的人是如何結束生命的：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七日那一天，我同路易·亞當米奇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約四個半小時)。談話看來是十分親切的。

亞當米奇廣泛地談到，某些人如何由於他的那本關於南斯拉夫的書而威脅他。他說，他只向貝勃勒、羅格爾和我談到這件事。

一九四九年，亞當米奇受到共產黨情報局分子J·V·的警告。亞當米奇很熟悉他。V·到亞當米奇那裏去，向他提到，如果他支持鐵托，他就將成爲人民的敵人。儘管警告是十分尖鋭地提出的，亞當米奇認爲，V·不會對他採取任何强制性行動。

一九五〇年，V·再一次到亞當米奇那裏去，再次警告他，說他將成爲人民的敵人。亞當米奇和V·當時的談話是十分尖鋭的。

(耐人尋味的是，V·兩次到亞當米奇那裏去都是在星期三，都是在亞當米奇的妻子去看大夫，因此是亞當米奇一個人在家裏的時候。)

去年十月份(在我們代表團抵達之後，亞當米奇同卡德爾同志和貝勃勒談話之後不久)，來了四個人，乘着密執安州牌照的車來的。那一天，亞當米奇一個人在家裏。(他的妻子去西海岸了。)亞當米奇在菜園裏。汽車停在他的家門前。這幾個人下了車就向他走來。他們開始問他，他的書寫得怎麽樣了。問他手稿在哪裏。(亞當米奇回答說手稿在紐約。)這幾個人對他說，這是一本壞書，他最好不要把這本書付印。亞當米奇說，他們開始威脅他。這時，洗衣廠的汽車來了。亞當米

奇利用這個機會進了屋。他拿起了電話。然而，由於他的電話同另一隻電話是並聯的，而另一隻電話這時正好在講話，亞當米奇不能叫警察。但是他拿着電話，裝着在叫警察。大聲嚷道：『請警察立即到這裏來』，這四個人聽到了這番話。過了一會兒，他們坐進汽車開走了。

（亞當米奇還說，他由於幼稚而沒有記住汽車的號碼。只知道牌照是密執安州的。）

這件事使亞當米奇十分不安，他不敢在家裏睡覺。他在附近地區的一些朋友家裏睡覺。後來他決定去西海岸，到他妻子那裏去，而房子交州警察監視（他故意繼續保留這座房子，交州警察監視）。

在西海岸，他租了一座緊靠海岸的小房子。他不到社交場合去，免得同人談話，免得使人注意自己。

他的工作方式是在夜間工作。睡兩個小時覺，起來在海岸邊散散步，工作兩小時，再去睡覺，又去散步，又工作。就這樣，有一天晚上，兩點時他在海岸邊散步，突然有兩個人向他襲來。他們打他的臉，打他的耳光，把他打倒在地。他們罵他，向他談到書，說他寫這樣的書是可耻的事。他們要他的書的手稿。這兩個不認識的人在打罵了之後走了。

亞當米奇沒有把這一切報告警察。他對妻子也隻字未提（對於上面提到的其他一些事件，也沒有說起），因爲他不想使她不安……他只是說，在海岸上摔倒了。

上述這些威脅和所達到的頂峯（襲擊他的肉體），使亞當米奇十分害怕。他開始覺得有人跟蹤。這種感覺開始達到十分嚴重的地步，以致他去請精神病專家看看，他是否一切正常。專家斷定，他一切正常。

從同亞當米奇的談話以及他的舉止中，我得到的印象是，亞當米奇總是担心有人要謀害他，要殺死他。（例如，在我們在旅館裏談話時，突然停電了，亞當米奇十分驚恐！）

亞當米奇認爲，威脅來自極右派，來自烏斯塔希及諸如此類的人。」

在看到這份報告之前不久，亞當米奇把他的書的兩卷全文給我寄來了。第一卷有一篇序言和九章，第二卷有五章。每一章放一個卷宗，亞當米奇親手在卷宗上寫上題目。有的地方，亞當米奇還親自寫下意見和建議，註明我們的雜誌可使用哪些部份。例如，在第一卷第九章的封面上寫着這樣一番話：「如果《文學新聞》（亞當米奇很可能指的是《文學報》）或者其他哪家報紙想利用這份材料的話，我建議從第九十七頁上我關於約翰·岡特①的看法或者第六十八頁上我對萊基奇的看法開始，一直到第二本書。」

在《書中之書》第三十九頁上，我寫道：

「九月四日晚上，我讀着亞當米奇給我寄來的他的最新一章手稿。一片靜寂。響起了電話鈴聲。南通社告訴我：

『亞當米奇死在一座起火的房子裏。』

我呆若木鷄。是誰殺害了他？他近來曾向一些同志說過，由於書……他有可能被殺害……」

我立即打了一個電報給斯泰拉·亞當米奇，她於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八日給我回了一封信：

---

① 約翰·岡特（一九〇一—一九七〇），美著名記者、作家。——譯者

「親愛的弗拉多，
我熱誠感謝你的電報。我知道，消息必定會使你十分震動。路易的書將發表。我認爲這是一本好書，一本光明正大的書。
如若你來美國，我想見你。
向你和你的親人致以最熱烈的問候。
斯泰拉。」
信是寫在一張航空紙大小的紙上的，邊上燒焦了。對此，斯泰拉也寫了幾個字：
「這張紙在路易的房間裏，因此燒焦了。」
我把這封信當作聖物收藏在《書中之書》中，而亞當米奇最後一本書的手稿，我作爲禮物，轉交給斯洛文尼亞科學和藝術院保留。我從來没有收到斯洛文尼亞科學院的收據，證明已收到亞當米奇最後的手稿。不過，我認爲，手稿還在那裏。
亞當米奇的死亡之謎尚未解開。我没有看過調查記録，因此我不可能作出任何確切的回答。我仔細閲讀了美國報紙關於亞當米奇之死的全部報道。《紐約郵報》的記者報道説，亞當米奇是被打死的。他們訪問了亞當米奇的莊園，斷定亞當米奇是在起火的房子裏被用火器打死的。消防隊員衝進起火的房子時，發現他在樓上寢室裏坐着。頭被步槍子彈打穿，槍躺在一邊。
賓夕法尼亞州里杰維爾的消防隊負責人V·埃利斯也肯定了記者關於這是一次謀殺的看法，在

清晨四點二十分報警後，他同一批志願消防隊員第一個趕到亞當米奇的莊園。

但是埃利斯認爲也有自殺的可能性。屋子裏面洒滿了汽油，消防隊員好不容易才進去。一個人爲什麼要在這麼做了之後，又開槍打死自己呢？——埃利斯問道。

亞當米奇的女秘書夏普太太對《每日新聞報》說，上一年秋天有四個人曾揚言要弄死亞當米奇，對他說「最好是這本書該怎樣就怎樣，不然的話……」他並不認識這幾個人，但是知道他們背後有誰。他們向他提出了一系列問題。亞當米奇回答他們說，他已决心按照他的設想寫完這本書。他當時說：

「我得把事情做完，我要把這件事做到底。」

夏普太太近三年來一直在抄寫亞當米奇的手稿。她每星期五晚上到他家裏去，談上三、四個小時。她也同他談論國際形勢。

消防隊員埃利斯還向《舊金山紀事報》記者發表談話說，「火肯定是別人放的」。新澤西州警方也稱，這場火燒得可疑。房子的路對面是一座倉庫，據斷定，倉庫先燒着。消防隊員埃利斯還說，這場火，沒有人幫忙是擴大不了的。他還說，步槍很長，他不明白，亞當米奇怎麼够上扳機，往自己腦袋上打。

別的報紙報道說，驗屍沒有查出別的死因，沒有發現有別的什麼病可能促使亞當米奇自殺。亞當米奇的頭顱中有兩顆卡賓槍子彈。問題是他怎麼能够打第二槍，打了第一槍之後他就必定失去知覺了。

亞當米奇沒有給妻子斯泰拉，也沒有給朋友們留下任何信件。他曾向一位朋友借了一大筆錢，

在他去世十五年之後，在亞當米奇的房子的廢墟中找到了這筆錢。亞當米奇是一位仔細的人，他如果想自殺的話，他是會事先還清朋友的債的。

在亞當米奇身上找到的唯一的東西是剪報，一面報道前美共黨員伊麗莎白·本特麗向麥卡錫委員會控告他。

亞當米奇的夫人斯泰拉認爲可能是自殺。亞當米奇生前說過，他不想把關於脅迫的事告訴她，因爲她有病。

美國聯邦調查局拒絕就亞當米奇之死進行調查。

第七章　突破包圍

有的時候，你一起床就悶悶不樂，從早到晚都是心境很壞。我就常有這樣的事。我皺着眉，繃着臉，而我周圍的人趁早走開爲妙。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我在紐約參加聯合國會議，那一天，我的心境就是這樣。會議是在離城幾乎有一小時路程的城郊成功湖畔舉行的。交通堵塞，我們遲到了。我煩惱地翻閱着《紐約時報》。發自華沙的一條消息引起我的注意，消息說，到昨天還是蘇聯元帥的羅科索夫斯基元帥成了波蘭元帥，而且還成了波蘭的國防部長。

（聯合國）大會第三委員會那天在討論難民問題。我的顧問，個兒高高的達爾馬提亞人拉特科·普萊伊奇在一張小紙條上寫了句話告訴我，切特尼克的將領久伊奇神父坐在公衆席上。我轉身對他說，應當向美國國務院提抗議，怎麼讓這樣一個戰犯心安理得地在聯合國製造挑釁。這時波蘭代表，一個大鼻子的侏儒開始發言。儘管日程上沒有任何問題同南斯拉夫有關，而他却開始談論起「鐵托集團」來了，甚至侮辱鐵托本人，說他是美國的衛星，說我是衛星，凡此等等，完全是一派情報局的風格。

我氣得臉發白，要求就程序問題發言，這樣我就可以立即講話，不必等到其他已經報名的發言者之後才講。這一手法是我在法學院的教授米蘭·巴爾托什教給我們的，他也是我們代表團的主要法律顧問。

我很快起草了幾句話——這一小張紙現在就在《書中之書》第一頁上——我一得到發言權，就立即向那個波蘭矮小子開火：

「你們指責我們是一個外國代表團的衛星，說我們重複他們的立場。我可以對你們說，你們這麼說只是由於妒忌南斯拉夫所享有的獨立。你們指責我們，因爲我們沒有像波蘭那樣，同意充當蘇聯的衛星……」

我覺察到，我的顧問達爾馬提亞人普萊伊奇的强有力的手放在我的肩上。這是一個信號，表示他同意我所講的話，我更加激烈地繼續說：

「你們還直接攻擊鐵托元帥，因爲他是我們的元帥，我們真正的、我們自己的元帥，他是在我們中間成長起來的。而你們波蘭人這些天却不得不把一個外國的元帥當作自己的元帥，你們得到了羅科索夫斯基元帥……」

大廳裏一片寂靜，會議主席已經舉起小槌子想結束我的發言，我抓緊時間，把波蘭人搞得狼狽不堪：

「我們既不喜歡進口元帥，也不喜歡出口元帥，我們也不想以任何方式，哪怕是以俄國的方式，被人强加元帥……」

蘇聯代表，駐華盛頓大使潘友新從椅子上跳了起來，好像有誰用針刺了他一下似的，而那個波

蘭人則低下了腦袋。不久，主席就宣佈會議結束。我在收拾文件，我們的一位代表，一位外交官，臉色煞白地站在我和普萊伊奇的後面，伸開雙手說：

「沒有必要把事情弄尖銳了，你本應克制一下……」

第二天，報紙廣泛地報道了這一事件。巴黎《世界報》十一月十二日，對這一事件作了一番奇怪的描述，用的標題是：《南斯拉夫不是波蘭：蘇聯可以把自己的元帥留給自己》。

這篇報道說，蘇聯大使潘友新把我叫做「鐵托集團」主席，而我尖銳地反擊說：

「南斯拉夫以鐵托而自豪，是鐵托從敵人手裏解放了國家。我們的鐵托是真正的元帥，如果蘇聯想向我們提出，派它的某個元帥來掌管我們的事情，就像它在波蘭所做的那樣，我們的回答將是：不行，先生。」

事實上，記者們很少採訪第三委員會會議。他們只是後來才聽說，南斯拉夫人和俄國人之間在羅科索夫斯基問題上發生了什麼事，因此對這場衝突提出了他們自己的說法。

而在這裏，在我的回憶録裏，我要就我對潘友新的一番小小的惡作劇向他表示歉意。潘友新同志的特點是反應不快。特別使他感到棘手的是聯合國裏所用的多種語言同聲傳譯器。你把耳機帶上，隨後在一個小裝置上把開關扭到你所希望聽的數字上。一號是英語，二號是法語，三號是俄語，四號是西班牙語，如果你想把它關上，就把它扭到零號上。

蘇聯代表團坐在我們代表團附近，我們只隔着兩、三個位置。而我走到自己的席位上時，經過俄國代表身邊，我敏捷地把同聲傳譯器扭到零號上。我在自己的席位上坐了下來，並悄聲地對我的

顧問普萊伊奇說：

「俄國人現在又要出洋相了！」

會議一開始，潘友新就擧起手來，要求就程序問題發言：

「主席先生，機器失靈……」

聯合國的技術人員和秘書就趕緊跑到他那裏，替他撥到三號，而我們則敞懷大笑。我作弄了潘友新好幾次。而當他去北京當蘇聯大使時，我說過，這位仁兄在那裏不會幹出多少好事來的。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那天夜裏，我怎麼也睡不着。我住在紐約利克辛敦大街利克辛敦飯店第七層樓上。我同維爾科·米丘諾維奇合住一間房。在我們的窗前是飯店的紅色廣告，每隔十秒鐘亮一下，熄一下，亮光透過窗簾閃現，就好像我們身處杜爾米托山間的暴風雨中似的。

我在考慮寫一本關於南斯拉夫的書的問題，這本書要使世人了解我們的革命的發展情況。而起因就是同波蘭的那場决鬥。大國有强大的機構來散佈自己的想法，散發自己的書籍，而我們沒有這樣的機構。

米丘諾維奇也沒有睡着。他在黑暗中抽着烟。他先是談到一九四二年冬天黑山的游擊戰，隨後又談到聯合國的工作以及令人惱火的會議。

「嘿，老闆，我有一個想法……」

就這樣，在那天夜裏，更確切地說是在那天清晨，產生了寫一部鐵托傳的想法。開始了新的交談，那顛抖的廣告燈熄滅之後，我們才不再作聲。維爾科·米丘諾維奇同黑山的任何望族的好當家

一樣，審愼而持重。他談到種種困難，但他並不悲觀。

第二天上午，第三委員會的會議直到午後才開始舉行。在我們代表團在五馬路的所在地，我用了一小時就幹完了自己的工作。我們準備好了午後的講話。我們搞完之後，我對顧問普萊伊奇說，現在我得寫一份對俄國代表的回擊。

「等一等，弗拉多，我們不知道他們會說些什麼，怎麼來寫對他們的回答的回擊呢？」——普萊伊奇表示困惑。

「你聽着，我知道俄國人的腦袋瓜是如何轉的。對於我們的回答，他們會說這樣那樣一些話。我們可以打賭！對於他們的那些論點，你先作準備。我們有了準備，他們一開火，我們立即回擊！」

關於蘇聯的官僚的腦袋瓜是如何轉的，我的預料得到了百分之九十的證實！

我在代表團裏辦完事後，就步行到紐約市圖書館，這是我在這個蟻塚似的城市裏最喜歡的地方，在這個城市裏，你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你都得幹活。一切都在蠕動，都在擠來擠去，你四周所有的人都在幹活，這樣的生活速度使你不可能再當巴爾幹的懶蟲。

我在這家圖書館準備我的第三册戰時日記，我翻閱了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的《紐約時報》，看看他們對於南斯拉夫的鬥爭寫了些什麼。但是我這個巴爾幹人在這座機械化蜂巢中依然充滿了幻想。

我停止了工作，開始構思鐵托傳的大綱，看看每一章該是一副什麼樣子。我一直工作到兩點，忘掉了午飯和幾個約會。

我乘「瑪麗皇后號」回南斯拉夫。每天我都同米蘭·巴爾托什在甲板上散步。我把我的這一新的想法透露給他，我們就回到艙房，擬訂新的提綱。我們一直工作到半夜。巴爾托什是一個有板有眼的人。我對於所取得的成績表示滿意。

與此同時，鐵托從美國收到兩份建議，讓他發表自己的回憶錄。同一天我告知鐵托，請他緊急接見我。我帶了我的計劃前往。在《書中之書》中，對於這次談話作了如下的記載：

「我開頭說：

『外國人在寫，而我們却跟着他們受罪，收集資料，還是不令人滿意。讓我試試看，怎麼樣？我不會提出許多問題來折磨你的……』

鐵托眯着一隻眼睛說：

『你會要了我的命，你一開始提問題，就不會讓我安寧……你幹嗎這樣看着我？』

『我怎麼看着你？』

『好像你是第一次看見我似的？』

『是的，我已經看了你十三年了，我還弄不清楚你的面貌。有的時候，你的面容很慈祥、温柔，有的時候又很嚴峻，經常變化，我明白爲什麼没有一位畫家畫成過你的真正的畫像……』

鐵托笑了起來，後來我們開始認真地交談。他同意我寫。我說，我將把這本書在世界上以高價出售，這是這本書得以推銷的最好的辦法。西方害怕宣傳，這樣一來，出版商之間就會競爭誰先發表這本書。一句話，我將利用『資本主義的矛盾』。而得到這本書的出版商，將竭盡所能撈回自己的

錢。鐵托對這一主意很欣賞，他開始笑了起來。

我們再也沒有討論書的佈局以及在書裏寫些什麼。當時沒有討論，以後也沒有討論過。這一點他完全讓我來處置。」

南斯拉夫被選進安理會

布達佩斯的拉伊克案件，軍隊在我們東部邊界上集結，邊界事件大量增加，一九四九年八月底莫洛托夫的威脅性照會，蘇聯報紙上發表蘇聯製成第一顆原子彈的消息，這一切都促使我們外交部的同志們建議南斯拉夫政府，在紐約舉行的聯合國第四次會議上，南斯拉夫競選這個世界組織的最重要的機構——安理會的非常任理事國。

對這項決定，作了嚴格的保密。在我國代表團抵達紐約之前，沒有告訴過任何別的國家。我們抵達美國後，就着手提名我國爲候選國。蘇聯代表團立即提名捷克斯洛伐克爲對抗南斯拉夫的候選國。

開始了一場激烈、複雜的鬥爭，不僅是通過報界、聯合國的講壇，而且還在走廊裏進行。還使用了「黑色宣傳」。

我們「自封的老大哥」——當時的重工業部長盧卡・萊斯科舍克是這麽來給蘇聯命名的——在我們代表團前往紐約之前發表的一次講話中，竭力不讓我們當選。維辛斯基率領蘇聯代表團，他在

第一次發言中，根本不提蘇聯和南斯拉夫之間存在衝突。他的策略是，南斯拉夫屬於蘇聯的勢力範圍，是蘇聯的狩獵場，因此那裏發生什麼事，與聯合國這個世界組織無關。而在世界的這一地區，蘇聯享有「天然的」「社會主義的」權利，按照它的意願辦事。

但是，南斯拉夫代表團團長愛德華·卡德爾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的發言中列舉了事實。他提到，僅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四九年九月一日這段時間裏，在我國東部邊界上就發生了二百一十九起武裝衝突事件，他接着談了衝突的整個歷史，他用下面這番話結束了發言：

「維辛斯基先生在發言中尖銳地譴責了煽動戰爭以及進行戰爭威脅的政策。他還强調，蘇聯政府始終主張各國之間平等。他本着這一精神還向本屆大會提出了一個提案，蘇聯政府特別强調自己忠於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然而，南斯拉夫代表團必須指出，蘇聯政府有義務首先在實踐中，在最容易做到的地方貫徹這一立場，也即有義務對一個不在任何集團，不威脅任何國家，在地理上遠離蘇聯的國家，即對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貫徹這一立場。尤其是因爲維辛斯基先生在大會的發言中再次强調，蘇聯願意在平等基礎上同一切願意在相同條件下合作的國家展開和平的合作。南斯拉夫代表團願意强調指出，南斯拉夫正是對這樣的合作，而且只是對這樣的合作有興趣，因此始終準備展開這樣的合作。」

維辛斯基立即施展外交手腕，來打破我們的提名。他在這麼做時是不擇手段的。例如，他通過中間人向美國代表團表示，一旦南斯拉夫被選進安理會，南斯拉夫將像捷克斯洛伐克一樣投票支持蘇聯，也即加强當時某些美國人部份地還存在的這樣一種看法：蘇南之間没有爭端，這只是爲了蒙騙西方而已。

我們的代表，尤其是卡德爾、吉拉斯和貝勃勒向記者們公開談到維辛斯基的見不得人的宣傳所引起的一切問題，忙得不可開交。

同時，我們轉而在聯合國提出一系列建設性的提案。例如，十月五日，我們向聯合國秘書長提了一個各國權利和義務宣言草案，這項宣言草案首先規定了解決爲危及小國主權提供藉口的關係問題。

另一方面，維辛斯基特別暗示三大國大戰結束時就劃分利益範圍所達成的秘密協議。這些協議也涉及聯合國，雖然並沒有寫進這個世界組織的憲章中。某些大國，例如英國，雖然當時——一九四九年是工黨政府執政，還是信守這些秘密協議，支持蘇聯提名的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候選國捷克斯洛伐克，並公開說將投票反對南斯拉夫。

維辛斯基十分自信，他公開聲稱，東歐這樣的地理環境決定了安理會的候選國。而鑒於蘇聯是世界這一地區的主人，自然它就有權來確定東歐由誰來充當候選人。他甚至提到大國之間關於此事的君子協定，因而說把南斯拉夫選入安理會是非法的，因爲違反大國的這一協定。

同時，通過「黑色宣傳」，又抛出消息說，一旦南斯拉夫被選入安理會，蘇聯就脫離聯合國。耐人尋味的是，捷克人自己對於爭取自己當選沒有做多少事情，這無疑是受了克萊門蒂斯本人的影響。後來，這件事竟然使他掉了腦袋。

蘇聯的「黑色宣傳」不擇手段，特別是對那些追隨英國政策的動搖的小國施加壓力，甚至使用起美國政治生活中一種樂於採用的可鄙手段來了——抛出個別人私生活中的隱私，從而使他們信譽掃地。

還在一九四五年我去舊金山參加聯合國第一次會議的時候，奧森·韋爾斯給我看了他那部有名的電影《坎内市民》，電影反映了報界巨子威廉·赫斯特的形象，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曾競選紐約州長。但是，選舉的前一天，赫斯特的對手設法在旅館裏抓住他正同一位姑娘胡搞。醜事傳開了，赫斯特落選了。

一九四五年夏天，正好是在韋爾斯給我看了他的那部片子並談到這種手法幾天之後，切特尼克分子也給我設下了這樣一個圈套。有兩個黑山女人來到我們代表團下榻的費爾蒙特旅館來找我，求我把幾封信帶回黑山。我覺得這件事有點蹊蹺，就告訴她們，把信交給我們代表團的另一位同志，他是黑山人，是戰前南斯拉夫的外交官。

第二天午後，我正在參加聯合國會議，我們的年輕的女秘書科爾迪亞·米洛舍維奇慌慌張張地衝進會議廳，把赫斯特報系的一份《舊金山觀察家報》交給了我。報紙頭版大字標題：《怒氣冲冲的丈夫活捉鐵托的外交官同自己的老婆在一起》。到底是怎麽回事呢？一位黑山女人同這位外交官商定了約會，以把信交給他，在約定的時間裏，她果真來了，兩手抱住他的脖子，三分鐘之後，她的丈夫，暗探和記者都衝了進來。這都是國王彼得二世駐美國的大使康斯坦丁·福蒂奇安排的。

蘇聯代表團一九四九年也想用這種手法來對付我們。有一個女人用嬌滴滴的聲音打電話給我們的一位同志，一位外交官，説她聽了他在聯合國的發言，佩服得五體投地，一定要見見他，不然她就没法活下去了。我們的那個倒霉鬼上了那個女人的嬌滴滴的聲音的當，安排了約會。但是，我們的那些優秀的保安人員從蘇聯人士那裏獲悉，正在佈置陷阱。這件大醜聞本應向西方的小市民表明，南斯拉夫人破壞家庭和公認的準則，但是没有得逞。

在約會前十五分鐘，我們把我們的那個倒霉鬼帶到我們代表團團長卡德爾那裏，那個姑娘一個人去了一家酒吧間。我們觀察了她一伙的人，有五、六個彪形大漢，就等着我們那位不是命中注定的羅密歐出現，就衝上前去，製造一件醜聞。爲了向他們表明，我們也不是傻瓜，我們把他們全拍了照，把這件事存入歷史的檔案。

尊敬的蘇聯代表，爲了不讓南斯拉夫選進安理會，就幹出了這樣低級下流的事！作爲最後的手段，維辛斯基向美國代表暗示：「如果在選舉安理會時，美國不投南斯拉夫的票，(蘇聯)就在巴爾幹向他們作出重大的讓步。」美國報界對這一消息大加張揚，《紐約時報》甚至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八日就此事發表了一篇社論，提出「供貨的一方應當把打算做交易的全部貨物拿出來讓人看看。」

十月二十日，選舉的那一天終於到了。維辛斯基在投票前又走上了講台，要求不違反劃分利益範圍的協議和君子協定。

要以三分之二多數票選出三個非常任理事國。在第一次表决中，厄瓜多爾得五十八票，印度得五十六票，南斯拉夫得三十七票，捷克斯洛伐克得二十票，阿富汗得一票，菲律賓得一票。這就是說，我們沒有得到三分之二多數票。我們只少一票。在第二輪表决中，我們得到了這一票。我們是三十九票，捷克人是十九票。

我們與高采烈。我們駐華盛頓的大使，身體脆弱的薩維察·科薩諾維奇來到我身邊。他擁抱了我，我也擁抱了他。但是，突然間他喘不過氣來了，我們把他放在長沙發上，來了醫生，用担架把

他送進了醫院，醫院裏判明，我由於過分興奮，在擁抱時把他的兩根肋骨弄斷了。

爲此，我感到悔恨交加，正當我們取得了巨大勝利，衝破了斯大林迫使我們陷入的國際上的孤立狀態的時候，却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我的大學

從一九四八年起，一直到一九五三年，每年我都要花兩、三個月時間參加聯合國的會議。我從來没有像這幾年那樣學到那麼多的東西。我從中小學和大學裏所學到的東西，只是使我獲得了一些一般的概念，只是使我知道在哪些方面去補充我所不足。而聯合國第三委員會討論的不只是純政治的問題，而且還有當代社會問題的一些學術性方面，在那裏，我得了解每一個問題的實質，事先花幾個月時間作準備，然後在同來自各個大陸的不同意識形態、不同信仰的人們的公開的自由討論中，來檢驗我的立場有幾分是正確的，在多大的程度上，我的立場是符合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的現實的。這確實成了我的名副其實的大學。

我們的委員會在那幾年一直在討論兩大問題：關於人權公約草案以及關於新聞自由條約的一系列草案。這些問題，同其他幾個委員會的工作有共同之處，特別是同第二委員會（經濟問題）、第四委員會（托管國和殖民地問題）以及第六委員會（法律）。

因此，在需要深入弄清我們的委員會所討論的某些問題的時候，在其他幾個委員會工作的南斯

拉夫的代表們經常同我保持接觸。這樣，我就同萊奧·馬特斯、約西普·杰爾買以及米蘭·巴爾托什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我向這幾位同志學到了不少東西，對於那些日子，我保留着美好的回憶。

民族問題，各國人民的自決權，每一個國家的人民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的統一，特別是每一個國家有權掌握自己的自然財富，所有這些方面是當代燃眉之急的問題之一。我們的委員會那幾年一直在討論。

曾經有過形形色色的主張。西歐的一些中小國家的代表拋出了社會民主黨的老主張，認爲歐洲各國人民享有自決權，他們在世界經濟不發達地區的人民中有權起主導作用。在這個問題上，我常常同比利時社會黨人F·德斯教授進行熱烈的辯論。

例如，英國的工黨代表讚揚南斯拉夫解決了民族問題，讚揚南斯拉夫抵抗了蘇聯的霸權主義。應當感謝他們的這一支持，但是同時也應提醒他們，南斯拉夫爲之奮鬥的是，全世界——不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各國人民享有平等的原則。

我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的發言中，綜合地陳述了我國代表團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這次發言是就英國代表的發言而作的，英國代表說，各國人民享有自決這個說法不明確，因此在實踐中很難予以運用。

我先是談到殖民地的傳統的軍事佔領的各種形式以及它對受壓迫的人民的解放的影響。接着，我就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對人民自決權利的侵犯的各種形式是否僅限於此，我並指出了一些現象：「第一，對國家的新的奴役形式是，保留表面上享有主權的國家，而其國家機構受征服者的絕

對控制，其經濟成爲征服國的附屬品。這一方式的特點是，用已經發展的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來窒息國家的獨立，實際上使這些國家淪爲殖民地。南斯拉夫本來就要成爲這種體系的犧牲品。

第二，大國自認爲有權決定處於一定領土上的各國人民的命運，它們彼此讓與別國的領土，而不問一問有關國家的人民。這種做法，從理論上來說，早就受到譴責，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又重現了，因此，這種做法是當前許多緊張和衝突的起因。這就是利益範圍體系。

第三，發達國家照例在利用不發達國家的困難，通過自己的經濟潛力爲自己謀利，加强小國的依賴性。這裏，首先是經濟，其次是國家生活的其他方面，轉而受較强大的國家的控制，從而使這些國家的人民在不符合控制國利益的一切行動上，喪失自決權。較强大的國家以維護某個大陸的自由和獨立爲名，佔領這樣的地方，這樣的事例是不少的。

第四，今天，給妄圖主宰世界的侵略者幫忙最大的，莫過於否定其他國家人民的自決權。我決沒有低估建設防禦侵略者的物質手段的意義，但是，如果除此以外，全世界廣大羣衆不覺悟的話，不意識到每一個國家的人民都有權享有自由，有權不受阻礙地發展，每一個人都有權在自己的國家內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那麼，僅靠物質防禦手段是不足以抵禦侵略者的。奴隸不可能維護任何人，也沒有什麼可資保護。只有懂得爲什麼而鬥爭以及有東西可資保護的自由人，才能夠阻擋任何侵略者，不論侵略者作了多麼充分的準備，在物質上佔有多大的優勢，也不論侵略者是多麼狡猾。」

有一次，就世界各地，也包括蘇聯，對民族問題的解決，展開了討論。

我國代表團根據蘇聯的材料來源和蘇聯報刊準備了一份材料。我在材料裏指出，在列寧時期，

蘇聯對民族問題的提法以及在實踐中對民族問題的解決，堪爲全世界的表率。而現在，在這一點上，蘇聯陷入了危機。大俄羅斯霸權主義傾向在加强。採取行政命令措施，把一些共和國取消了，把一些民族遷移了。

「民族問題應當通過尋求讓各族人民在和平和平等合作的條件下共同生活的可能性，來獲得解决。蘇聯不是這樣做的，而是使一些小民族聽憑大民族領導人的擺佈，這些領導人甚至剥奪小民族存在的權利，把他們從地圖上抹掉！」

我在這裏提到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關於取消車臣—印古什共和國和改變克里米亞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爲克里米亞州的法令。在最新版的蘇聯憲法中已經不再有卡爾梅什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伏爾加日耳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以及卡拉恰伊自治州。

即便蘇聯憲法規定有權建立自己的共和國，成爲聯盟的一員的那些民族，也不是享有平等權利的，在實施本民族發展的權利方面，每天都受到越來越大的限制：

在白俄羅斯，俄羅斯人與白俄羅斯人之比是一與二十。然而，據官方材料，一九五一年，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共有代表——白俄羅斯人二百七十八名，俄羅斯人七十八名。這就是說，白俄羅斯人與俄羅斯人之比是三個半與一。吉爾吉斯和哈薩克的情况更糟糕。在吉爾吉斯，吉爾吉斯人與俄羅斯人之比是六十六點六與十一點七，而在最高蘇維埃裏，有吉爾吉斯人代表一百八十四名，俄羅斯人代表七十七名。在哈薩克，居民的比例是哈薩克人佔百分之五十七，俄羅斯人佔百分之十九點八，而在最高蘇維埃裏，却有一百三十四名俄羅斯人，二百一十八名哈薩克人。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處境尤爲駭人聽聞。我援引蘇聯憲法爲例。憲法規定，烏克蘭

的全部事務均由莫斯科中央政府管理。烏克蘭政府甚至無權管理自己的高等學府，工業就更談不上了。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領受了任務，對我所列舉的這些事實作答。他滿臉通紅，不敢直面看着我，但却大放厥詞。他特別指責我說了這樣一番話：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對東歐各國人民採用壓迫者的方法。

我立即要求答辯。我怒氣冲冲地說：

「我認爲，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有權以套上枷鎖而自豪，他有權向全世界申明，他對套上枷鎖是感到滿意的。但是，他决沒有權利讓別人也套上枷鎖並因我國維護自己的獨立而攻擊我國。

我並不認爲，我的政府在內外政策上不會犯錯誤。但是，我認爲，在這裏的我們——六十個國家的人民的代表在一點上都會取得一致意見，這就是南斯拉夫現領導近十年來頑强地維護了南斯拉夫的獨立，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反對德國和意大利的、保加利亞和匈牙利的征服者，接着是反對西方某些人士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間的種種壓力，他們曾試圖阻撓我們自由和獨立的發展，最後是，自一九四八年以來，蘇聯試圖侵犯我們的獨立」。

我說，這一事實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包括蘇聯代表在內，因爲他的政府自一九四八年以來一直公開地試圖奴役我國。

「他們在弄髒了自己的手之後，却又開始叫嚷，開始駡人，竭盡所能，給我國抹黑，把我們叫做蓋世太保的代理人、帝國主義的代理人等等。

促使他們盛怒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就體現了他們的良知，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先生，體現了你們已經喪失的良知。」

傍晚，我們在我們的代表團開會。同志們很欣賞我對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反擊，一位代表開玩笑地問我：

「你說，我們的政府也不是不會犯錯誤的。這是否意味着，如果你發現我們的政府犯了什麼錯誤，你也會提出批評？」

「走上這個世界講台來給別人上課，使一個人的良知負有很多義務……」

奧普萊納茨的惡夢

一九五〇年初，我離開了新聞局，但是工作絲毫没有減少。我被選爲國民議會對外政策委員會秘書以及南共中央國際委員會書記。

在新聞局時，我最喜歡的事情是記者招待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在我所舉行的最後幾次記者招待會上，一次，外國記者問我，我們南斯拉夫是否會慶祝斯大林七十壽辰。而那時正好在拉伊克案件和科斯托夫案件之後，在情報局第二個決議發表之後。這項決議把我們叫做殺人犯和法西斯分子。我回答說：

「在對南斯拉夫的社會主義建設進行了這麼多的誹謗之後，還來慶祝這個生辰，那完全是僞善

的……」

東方國家把慶賀斯大林變成了奴顏婢膝的奉承，他似乎是人間的上帝。情報局的報刊電台由於我說了那一番話而猛烈地攻擊我。布達佩斯電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說：

「正當全世界億萬勞動人民，包括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人民在內，懷着深切真誠的感激和愛戴之情歡慶斯大林同志七十壽辰的時候，鐵托的間諜集團甚至連這個機會也不放過，來對蘇聯和斯大林同志發泄他們惡毒的仇恨。十二月二十一日，斯大林壽辰的那一天，在貝爾格萊德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美國間諜弗拉迪米爾·德迪耶爾說什麼……」

我離開新聞局的一個原因，是想有較多的時間來寫鐵托傳。工作進展得很快，在搜集材料上，特別是維利·亞格爾、斯拉維察·弗蘭、多伊契洛·米特羅維奇和武卡·布加爾契奇等人幫了我的忙。只是同地方上的人打交道比較困難。許多人都想美化鐵托同志生平中的一些事情，因此，我不得不睁大了眼睛。

一九五一年四月底，我前往奧普萊納茨的塞爾維亞政府療養院，當年這是亞歷山大·卡拉喬爾杰維奇國王的一座王宮。在這座房子的附近是奧普萊納茨教堂，卡拉喬爾杰維奇一家就葬在那裏。那時，貝爾格萊德的同志們中間正就特權問題展開討論，議論誰有權使用汽車，有權從外交人員商店獲得供應等等。一個有關社會主義條件下道德風尚的具有轉折意義的難題出現了。我是同當時的塞爾維亞內政部長克爾宗·佩奈集奇一起去奧普萊納茨的。我們負有一項特殊的任務。亞歷山大·蘭科維奇要求我寫點關於德拉扎·米哈伊洛維奇一九四六年是如何被捉住的史料。克爾宗帶來了全部材料，我們談了很久，我才開始慢慢寫。我很快就寫好了，把材料交給了克爾宗。

「馬爾科同志說，你留一份在身邊！」克爾宗最後補充說。

我把這份材料放進一個白信封裏，用紅蠟封上，並把它夾在《書中之書》裏。這項工作使我激動，我本來身體不大好。克爾宗叫我，或者說，逼着我喝了一杯葡萄酒。那天夜裏我做了一個惡夢，我在《書中之書》裏作了描繪。這個夢實際上反映了白天折磨着我的那些事情，反映了有關在我們所創建的社會中人的平等的激烈的討論。

馬爾科·里斯蒂奇看過這一片段，很喜歡這段文字，因此我在這裏逐字逐句發表如下：

「克爾宗那天晚上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我獨自一人睡在彼得一世國王小小的夏季別墅裏，路對面就是奧普萊納茨教堂，老國王同他的兒子國王亞歷山大一起葬在那裏。

我的手發僵。怎麼也睡不着。我感到窒息，喝的葡萄酒也對我受過傷的、疲勞的腦子發生影響。我剛一睡着就驚醒。目光落在雪白的牆上。我似乎覺得這就是我們用來掩蓋一九四三年在羅曼尼亞山死去的奧爾加的那塊白色蓋屍布。這塊布升起來了，出現了奧爾加的黑髮。

每當我要犯病時，這副景象就出現了。奧爾加在向我說些什麼，被白色蓋屍布掩蓋着的手舉了起來。一切都在半睡狀態中。我一再想醒來，可是又墮入惡夢。

我周圍似乎有風吹檜樹的聲音，恰似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日，我們用手和刀子給奧爾加掘墳時，强勁的夜風吹彎了檜樹的樹枝。我覺得，我頭上的傷口流出的血滴在奧爾加的未掩蓋的墳上。我的手濕淋淋的。雙手黏乎乎的，好像在此之前幾個晚上，大概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三日或十四日，我作爲班長切了驢子的肉，一塊一塊地分給納佐爾、里巴爾、伊韋科維奇、弗拉特科·維萊比特和我班裏的其他人一樣。

最後，有什麼東西在響，我驚醒了。風吹得窗户格格響。我渾身是汗，望着牆上的亮光，我稍微清醒了一點。我起身，走到户外。夜，一片漆黑，我從奥普萊納莢高地望着托波拉和托波拉後面的遠處的村落。萬籟皆靜，只有狗在厲聲吠着。風在呼嘯，我覺得好了一點。我走回來，想再躺下。頭依然感到沉重，心在劇烈地跳動。我没有回到屋裏，走向十米遠的教堂。我全身靠在包着鉛的大門上，勉强把門推開。裏邊一片靜寂，一片漆黑。有一股香味。蠟燭殘盡。我覺得，似乎是在墓底。我用手摸着牆，倒在石板地上。

在那裏躺了多久，我不清楚。待我蘇醒過來時，天已大亮。頭依然沉重，耳朵隆隆作響。我似乎從遠處，一段一段地回想起了這一晚我所進行的談話。我夢見我同國王彼得和國王亞歷山大談了話。

先是出現了國王亞歷山大的像，跟我作爲十來歲的孩子在克羅地亞沿海的塞拉茨的戰爭孤兒院裏見到的一個樣。他那時來看我們，我被指定向他表示歡迎。院長察基奇夫人兩次考問我，看我是否把歡迎詞記熟了，我兩次都説得很好。而當國王亞歷山大一行來到時，我却不知所措，一聲不響。他的臉黑得像泥土。現在，在夢裏，他的衣着像杜尚皇帝在斯科普里加冕的那張大油畫上畫的一樣。

『你在我的莊園裏幹什麼？你在王宮裏大搖大擺地走來走去，你算什麼樣的共産黨人？』——國王厲聲問我。

『陛下，我在休息，我有病。』

『這一切都是屬於我的，你却鑽了進來，你是黑塞哥維那一個農民的兒子……你什麼都不交

納……』

『陛下，我是交錢的……布拉什科同志規定，一天交一百第納爾……』

『你和你那位布拉什科同志交得可不少呀……一百第納爾，那還抵不上你們吃掉的五分之一……哈，哈，哈，你們這些共產黨人可真不壞。你談論什麼勞動人民，却在這個宮殿裏大搖大擺地走來走去……現在斯大林將把你們統統從這裏趕走……這是一個聰明的人，儘管他一九一七年把我的未婚妻大公公主殺害了……可是，我恨你們這些南斯拉夫共產黨人甚於恨俄國共產黨人……』

這時出現了活像唐璜①的一個人形，使我們都黯然失色，他身着法蘭西領地地主的制服。從遠處傳來鏗鏘的聲音：

『我是彼得一世。我聽了你們的談話。我的兒子說得對，又說得不對……他走上了邪路。他把兄弟從王位上趕走了，還把兄弟毫無道理地關進瘋人院，他對年邁的父親相待也不好……我是一個簡樸的國王，我有什麼都分給別人。我總是把國庫同我個人所有的東西分開。而亞歷山大却很貪心。他揮金如土……只要看看他蓋了什麼樣的教堂就够了……』

『是這樣，不過，我可是國王呀！』——亞歷山大辯白說。

接着傳來了某種聲響，我覺得遠處有公鷄在啼叫。兩位國王鑽回墳墓，出現了米洛萬·格利希奇故事中的僵屍薩瓦·薩瓦諾維奇，格利希奇的家鄉離奧普萊納茨不遠。

『好呀，你竟在這裏』——滿身是血的高大的紅僵屍對我說——『我整夜都在找你……自從那

---

① 西班牙傳說中的風流貴族。——譯者

個格利希奇把我寫成之後，我就不得安寧。我得找一棵新的彎楡樹……』

僵屍薩瓦那時坐了下來，掏出一隻小背包，拿出一些素的乳酪、黍子、一頭洋葱，吃開了晚飯，把殘渣從胸前拭擦乾淨，在胸口上可以看到在磨坊得到的傷疤，在那裏米洛萬·格利希奇曾把他第二次殺死。薩瓦拿出《戰鬥報》，開始閱讀。

『那個斯大林將把你們消滅……他强大……而你們在心底裏却還相信他……他知道這一點……他狡猾……他的鬍子是危險的……』

『不會的，不會的……他老了……』——我好不容易說出這幾個字來。

『要是他不消滅你們，繼他之後上來的人也會……』

那時公鷄又啼叫開了，現在啼聲離得很近了，僵屍薩瓦駡駡咧咧地捲起《戰鬥報》，消失了。

第二天，我一整天都躺着。克爾宗來了。我把這場惡夢裏的一些事告訴了他。我在黑暗中爲奧爾加哭泣。他默然不語。只是握了握我的手，走出去散步了……

我一俟能够起身，就收拾起我的全部東西、書籍，逃回貝爾格萊德了。我害怕再做一個類似的夢。

有幾天功夫我没法工作，五·一前，我鼓起了勁。這一天由於鐵托不在而顯得陰鬱。他由於胆結石做手術在布萊德躺在病床上。鐵托不在場，這一點在游行隊伍中也可感覺到。幾乎没有人鼓掌。」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夜間和二十六日凌晨我在奧普萊納茨所做的那個惡夢就是這樣記下

的。

一個有教益的故事

斯大林通過一九四八年對南斯拉夫的突然打擊，使我國在經濟上和國家關係上陷於孤立。對於南斯拉夫來說，衝破這一鐵的包圍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

在《書中之書》中記載的一次談話中，鐵托說，蘇聯在一九四八年以後還繼續對南斯拉夫實行經濟封鎖「目的是在（南斯拉夫）國內造成經濟混亂，以便於更容易實現他的主要任務。他利用南斯拉夫的孤立來對南斯拉夫國家和南斯拉夫共產黨人施加更大的壓力。他下令全世界的工人組織和民主組織同南斯拉夫中斷關係，想在這方面也使我們陷於孤立。」

一九四九年，東方的經濟封鎖加劇了。拒絕簽訂新的貿易協定，而老的貿易協定只部份地完成。例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同蘇聯簽訂的協定，易貨額減少了八分之七。塔斯社的官方公報說，蘇聯政府如此減少易貨額是由於「南斯拉夫對蘇聯奉行不友好的政策」。這樣一來，蘇聯政府公開宣告了它出於政治原因而在經濟上歧視南斯拉夫。一九四九年年中，東歐國家的全部供貨都停止了。爲了給南斯拉夫的經濟造成更大的損失，加强對南斯拉夫經濟的壓力，交通聯絡和其他聯系也乾脆中斷了、減少了。羅馬尼亞中斷了鐵路交通和郵政往來，而匈牙利和保加利亞把鐵路、公路、郵政和電報往來減少到最低限度。阿爾巴尼亞除勉强保持郵政往來外，中斷了一切交通。我

們在多瑙河流經東歐國家的那一段河道的航運變得困難了，羅馬尼亞則阻撓協定規定的調整杰爾達普地區的航運的進行。不讓南斯拉夫的船隻進入黑海。蘇聯政府違反多瑙河公約，想把多瑙河變成一條「俄國的河流」。

另一方面，在西方，也製造困難。關於這一點，斯韋托扎爾·伏克曼諾維奇—泰波在回憶錄中說道：

「許多人認爲，在那些艱難的日子裏，西方立即滿足我們的願望。不是那麼回事。西方國家利用了我們暫時的處境，向我們提出了實際上意味着繼續掠奪我國那樣的條件。我們到他們那裏去，要求擴大貿易和獲得貸款，他們回答說，他們將欣然予以解決，條件是我們承担義務，一無損失地償還被我們没收的他們的財產（礦場、企業等等）以及償還戰前的南斯拉夫欠下他們的全部債務。

當時無路可走——我們被迫接受了這兩項條件，儘管他們通過開採我們的自然資源早就把在戰前南斯拉夫所投入的全部資本和給予的借款，成幾倍地撈回去了。而當我們去商談貸款時，我們不得不對貸款的歸還接受十分苛刻的條件。歸還期爲四至五年，利率高達百分之十一。我們對這樣的安排也同意了，爲的只是發展自己的經濟，擺脱落後。」

改變方針使我們不得不爲西方國家的設備重新搞設計，不得不按照這些設計重新興建工程。

西方國家利用南斯拉夫的困難處境，施加强大的政治壓力，以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産生的那些懸而未决的問題得到有利於它們的解决。特别是在意大利，有些人士認爲，莫斯科對南斯拉夫的壓力使西方也有可能來施加壓力。這首先牽涉到南斯拉夫的西部邊界、的里雅斯特問題、還有科魯什卡問題以及調整南斯拉夫和希臘之間的關係問題。

美國和英國的一些最好戰的人士想使南斯拉夫的對外政策完全從屬於自己的利益。他們中間也有個別頭腦清醒的人看到，南斯拉夫同蘇聯爭平等同時也是呼籲一切中小國家在西方世界爭平等的關係。他們中間有些人，例如佛朗哥，認爲南斯拉夫，再加上中國，比蘇聯還危險。據巴黎《世界報》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五日報道，佛朗哥對墨西哥《宇宙報》發表談話說：「向南斯拉夫人或毛澤東伸出手要比向斯大林本人伸出手危險得多」。

有些西方國家在同亞非國家以及亞非民族解放運動發生衝突時，就向南斯拉夫施加壓力，要南斯拉夫不承認這些新解放的國家的政府（例如，西方國家一九五〇年二月施加壓力，要南斯拉夫不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又如，對南斯拉夫施加壓力，要南斯拉夫在安理會中不支持正同英國石油康采恩作鬥爭的伊朗首相摩薩台。

在這兩件事情上——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三年，這樣的事情有不少——南斯拉夫都頂住了近乎訛詐的這種壓力，採取了講原則的立場。

另一方面，蘇聯通過自己的關係一再設法使南斯拉夫的處境更爲複雜化。最爲慘痛的是希臘解放運動事件。南斯拉夫從這個運動一開始，從一九四六年起，就一直在幫助這個運動，不顧斯大林所採取的不得觸及西方利益範圍的態度。情報局决議發表後，斯大林驅使希共領導出面反對南斯拉夫，說我們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等等。

關於這一點，斯韋托扎爾·伏克曼諾維奇—泰波說：

「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問心無愧的。我們一直向他們提供大量支援，而斯大林却驅使他們這樣地污蔑我們……他們不想停止這種攻擊，我們就在一九四九年關閉了邊界。」

列寧在蘇聯存在的頭幾年的對外政策在很多方面成了南斯拉夫在情報局封鎖時期的外交立場的榜樣。爲了保住革命和國家的生存，爲了粉碎帝國主義列强的統一集團，列寧曾不得不簽訂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

南斯拉夫在冷戰的條件下，憑藉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各國平等的原則，反對來自任何方面的集團和侵略。南斯拉夫就這樣衝破了孤立，同一系列中小國家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卡德爾一九四四年五月在信裏——鐵托同志是同意這封信的——向我談到的那一過程在某種程度上是加速實現了，這就是南斯拉夫在戰後時期不僅要依靠各個大盟國，而且要依靠中小國家以及解放運動。因此，南斯拉夫在一九四八年以後一再申明，不願加入任何集團。

我們到處公開地維護這一立場，吉拉斯和我一九五一年一月拜會艾德禮和邱吉爾時曾明確地表示，南斯拉夫不能加入大西洋公約，儘管南斯拉夫願意爲自己的防務接受經援和軍援。

我回到貝爾格萊德，對愛德華·卡德爾説：

「我們去了清真寺，但是没有祈禱。」

情報局的壓力加强之後，南斯拉夫同希臘和土耳其的關係比較接近，目的是想在世界這一地區建立一個地區性防禦聯盟。

同樣如此，南斯拉夫開始獲得西方三大國的經援和軍援，這種援助的數額決不是少量的。這種援助有助於鞏固南斯拉夫的獨立，有助於南斯拉夫爲爭取在世界上建立起平等的關係而進行的鬥爭。

這樣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結果。的確，決定性的因素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團結以及南斯拉夫軍隊的戰鬥準備，但是國際因素也起了作用。要是斯大林吃得準，這場局部衝突不會變成世界大戰的話，他本來是會向南斯拉夫發動進攻的。

似非而是的，我想說是瀆神的一個想法是：那個在一半對一半的基礎上在南斯拉夫劃分利益範圍的臭名昭著的協議，在一九四八年的局勢中居然還有它的好的一面，因為斯大林也好，西方政治家也好都拿不準，入侵南斯拉夫，入侵這個同時是地中海國家的東歐國家，對方可能有什麽樣的看法。

杜布羅夫尼克曾舉行過一次盛大的世界國際法協會代表大會。到會的有來自世界各地最出名的一些法學家。在辭別酒會上，像往常一樣，在祝酒時到會的人互開玩笑。我也請求講話，我問大家是否聽說過有一個國家在戰爭中自己同自己打仗。大家都嚷道，我指的是否內戰，我說不是，而是名副其實的國際戰爭。誰都答不上來，我就說了一則開杜布羅夫尼克玩笑的趣聞：

「在一五七一年勒班多之戰的前夕，現在保護着我們的這個城邦是薩爾格勒①蘇丹的屬國，根據條約，在發生戰爭的情況下，得向君主派遣十艘戰艦。薩爾格勒的敕令送達後，杜布羅夫尼克人一絲不苟地照條約規定辦了。

---

① 指土耳其帝城君士坦丁，即現在的伊斯坦布爾。——譯者

但是，他們又是天主教徒，當他們的精神之父教皇組織同盟來反對異教徒時，也要求杜布羅夫尼克人履行天主教徒的職責，派遣戰艦到天主教這方面去。

就這樣，杜布羅夫尼克由於所處的地理政治位置，也由於忠於自己的意識形態，結果變成了自己同自己打仗。」

我的講話受到熱烈的歡迎，我很快只是又補充了一句話：

「風向對土耳其方面不利，向蘇丹派去的戰艦遲到了三個小時，而在天主教方面的戰艦則參與了巨大的勝利……」

大家都發出笑聲，只有科查·波波維奇明白了我的意思，用手指威脅性地向我示意。

那個晚上，我在斯特拉敦散步的時間很長，我想：要是我們早一點擺脫僵硬的教條和盲從，科魯什卡問題、的里雅斯特問題以及西部邊界問題可能得到更好的解決……

同社會民主黨人合作

俄國的革命由於八國資產階級軍隊的武裝干涉而處境十分危險的時候，國際工人運動履行了自己的職責。英國的工會，儘管在意識形態上是不同於蘇聯的工會的，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仍然在裝載軍隊和物資去干涉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的英國港口成功地組織了罷工。

當斯大林一九四八年的封鎖威脅着我們時，我們想起了這一歷史事實。只是自身的教條主義使

我們作繭自縛。情報局決議發表一年後，我們這裏竟還在發表文章，用斯大林在希特勒在德國上台時使用的語言，指責社會民主黨人，也就是說，駡他們是國家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同盟者。

此外，蘇聯情報機構還給我們設置了另一類的巧妙的陷阱。莫斯科担心南斯拉夫同各國工人黨聯系在一起，這些黨得到本國大批工人階級的支持，對國家事務有影響，因此莫斯科多次設法使我們同一些毫無影響的教條主義者搞在一起。在他們中間，既有正直的人，也有暗藏的代理人。

最初，是由聯邦內務部的負責官員同這些人聯系，中央委員會國際委員會組成以後——我是委員會的書記——也是如此。南共中央政治局於一九四九年採取了原則性的立場：同一切羣衆性的工人黨保持聯系，尋求就世界社會主義的理論問題和政治問題自由地交換意見。

但是，貫徹這條路綫是不容易的。聯邦內務部的人認爲，同這些人保持聯系是自己的一大成就，因此勢必導致公開的衝突。我執行了黨對我的委托，迅速而堅决地執行了，我們確實處在名副其實的戰爭中，不能浪費時間。我是做對了，但是有些負責人把我寫進了自己的黑名册，等待着一有機會就對我本人進行報復，我們這裏有時就是這麽幹的，但是也不光是我們這裏是這樣。

同西方的一些羣衆性大黨的這些接觸很快就展開了。英國工黨、法國和比利時的社會黨以及後來的斯堪的納維亞和其他國家的社會黨，進行了一系列的訪問。進行了長時間的順利的討論。產生了創辦一家理論雜誌的主意，在這家雜誌上可以自由地探討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切重大問題。

隨着時間的消逝，我們和社會民主黨人之間的共同點反映出來了，存在的差異也反映出來了。一九五一年七月，我受英國工黨執行委員會的邀請，作兩次報告，談談世界和南斯拉夫的社會主義問題。在這兩次報告中，我簡要地分析了我們同社會民主黨人的關係。我概略地談了當時南共中佔

上風的一些看法。中央委員會國際聯絡委員會主席密洛凡・吉拉斯看了我的兩個報告，在一些地方明確了某些立場：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五日在倫敦作報告時，是由工黨總書記摩根・菲利普斯主持的。這次報告的要點如下（括弧内爲吉拉斯所作的補充）：

反對壟斷國際工人運動的意識形態。

社會黨國際一九五一年初在法蘭克福代表大會上譴責了目前這樣的共產主義。那時我說過，「俄國帝國主義樂意於許多人，包括西方的正派的人士把它稱做共產主義。爲什麼要把對於世界上千百萬人來説意味着擺脱現狀的真正出路，實際上就是社會主義這個概念的這一崇高目標（自托馬斯・莫爾①以來的最優秀的思想家們都企求達到這一目標），歸之於蘇聯擴張主義呢？這只是幫助（蘇聯政府）更容易掩飾自己的侵略目的（而且是戴上了人類最偉大最崇高的思想的面具加以掩飾）。再説，既然其他國家對於共產主義思想作出了如此衆多的貢獻，爲什麼要讓俄國人對於共產主義享有壟斷權呢？在其他國家中，我們僅以英國爲例。托馬斯・莫爾的這一思想正是開始於這個國家，繼而經過平均派和掘土派而到達天才的羅伯特・歐文和憲章運動者。《共產黨宣言》不是一八四八年在倫敦發表的嗎？」

是革命還是進化？

---

① 托馬斯・莫爾（一四七八——一五三五），英國政治家、作家，被認爲是空想社會主義的鼻祖，著有《烏托邦》一書。——譯者

「我認爲，提供這一類或那一類的絕對的規範，也即說和平的道路是唯一正確的，或者說革命是唯一的出路，是錯誤的。這取决於各個國家的歷史發展、當前的客觀條件、羣衆的覺悟問題、國際合作等因素。有的國家，特別是經濟發達的國家，最初的社會主義因素是經由和平途徑達到的，你們英國就是一個例子。依我之見，不排除英國今後的發展仍走同樣一條道路，也即走擴大現有民主的道路，但是假設現在維克斯·阿姆斯特朗公司①不同意實行國有化，而且組織了武裝抵抗，那怎麽辦呢？當然，對於今天的英國來說，這是無稽之談。但是，政府爲了實施國有化法是會被迫動用武力的。而這實際上意味着採用革命的手段來捍衛業已取得的成果——社會主義成份。

例如，我們南斯拉夫人曾經不得不通過革命的途徑來奪取政權，這並不是由於我們是喜好戰爭和流血的浪漫的巴爾幹人，而是由於除了革命，我們没有別的出路。

因此，在我看來，說什麽和平的道路是通向社會主義的唯一道路，或者，從另一方面，說什麽唯有革命才能取勝，這種種說教都是錯誤的（和有害的）。把經濟高度發展的國家的經驗推而廣之，運用於全世界，特別是運用於經濟落後的國家，是錯誤的和有害的。生活本身已駁斥了這一點。

應當考慮到實際情况。你們是通過和平的途徑，經過幾十年實現了工業革命。而落後國家由於客觀原因不是處於這樣的地位，現在必須在很短的時期内，在幾年内實現你們花了上百年時間才完成的事業。擺在他們面前的障礙不僅有同外國壟斷資本勾結在一起的封建主義和本國資產階級的殘

---

① 英國的一家著名的軍火公司。——譯者

餘，而且還有各國帝國主義、形形色色的帝國主義傾向和侵略傾向。因此，在落後國家裏，革命的道路仍然是可能和必不可少的，因此也是正當的。」

在同社會黨國際的關係中，我們的困難還在於，意大利社會民主黨利用自己在國際中的地位，迫使我們接受對的里雅斯特問題不公正的解決。社會黨國際在自己的一次代表大會上指定了一個委員會來調查的里雅斯特問題。我就此寫了一封信給摩根·菲利普斯，提請他注意幾個事實：社會黨國際是一個政治組織，它可以對世界上任何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發表意見，但是現在事關決定建立一個委員會，而且又是應一方面，意大利方面的要求建立的，不向爭執的另一方的我們通報此事，不問問我們的意見，這是錯誤的。的里雅斯特問題是一個國與國之間的問題。我們自一九四六年以來，向羅馬提了九次建議，以求解決的里雅斯特問題，羅馬對九次建議全拒絕了。你們沒有告訴我們委員會工作的內容是什麼，它將如何工作，只是要求給委員會成員發放簽證，讓他們訪問的里雅斯特自由港B區。我們沉默了兩個月，後來不加說明理由就拒絕了這一要求。但是三天前又提出要求給予簽證。因此，我現在向您轉告我們的有原則的立場，我們不希望建立不平等的關係，我們不想聽到命令，因此，對不起，不給予簽證。

關於我們在的里雅斯特問題上的工作，我一直同鮑里斯·克拉伊格爾和布蘭科·巴比奇合作共事。他們同意採取這樣的立場，這一立場實際上來源於鐵托同志。關於我們的國際聯絡委員會工作的一些最重大的問題，鐵托、卡德爾、吉拉斯、蘭科維奇每隔幾個月就一起討論一次，而我則列席會議，在問到我意見時加以答覆，會後則負責貫徹決定。

有時，遇有急事，我則從鐵托同志那裏直接接受指示。一九五一年秋，我們向聯合國控告了蘇

聯，在我國代表團啓程前往參加聯合國會議的前夕，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前副總理、社會黨領袖博胡米爾・拉烏什曼作爲捷克斯洛伐克的流亡者來到我國。這被認爲是我們的一大勝利。他來看過我，說應當給他一個無綫電台，以便他呼籲捷克斯洛伐克人起來反抗斯大林分子。我不怎麼欣賞這一想法。他後來受到鐵托同志的接見，他提出了同一個想法。後來，鐵托的秘書布蘭科・武契尼奇打電話給我，對我說，拉烏什曼將要找我，說老大已經同意了他的建議。拉烏什曼到我這裏來了，十分自負，對我說，鐵托已答應給他一座電台和一家報紙。而我却給他解釋，我認爲他的建議不可能實現。接着是不愉快的沉寂，他說要告到鐵托同志那裏去，說完他就走了。

後來，鐵托打電話給我。他怒氣冲冲。他把我臭罵了一頓。我聽憑他罵，爾後對他說：

「我們指責俄國人利用自己的領土來進行反對我們的宣傳，向我們的國民提供電台，來推翻我們的制度，而現在却犯他們同樣的錯誤。我們馬上要向聯合國提出控告，拉烏什曼這個要求會損害我們的控告的基本論點……」

鐵托繼續罵我，我一聲不吭，聽完了他對我講的話，後來我退讓了。事後，有一位同志安慰我，說我没有必要固執己見，而我則一再考慮我的立場，我對鐵托同志的態度。或許這樣一個事實在這裏也起了作用：我生平第一次遇到他時他是作爲一個普通的人，而不是作爲中央書記。大戰前夕的一年的春天，吉拉斯和洛拉・里巴爾把他帶到米洛什街的我的家裏，要我掩護他一段時間。這種事，他們以前也幹過。當時，我還不是黨員。一位中等個子、瘦削而蒼白的人來到閣樓上我的小房間裏。右手食指削掉了一點，我根據這一點判斷他是一個工人，一個鐵匠。一整夜我們都在談論西班牙、蘇聯、紅軍，過了幾天之後，他才對我說了他是誰，担任什麼職務。

我們可以不受拘束地交談的這種輕鬆感，在我同鐵托會見時始終保留着。他有一個好習慣。他要是聽到他所不同意的意見，有時他會發火，生起氣來，但是要是他看到，建議中還是有好的想法，過幾天後，他會再把人找來，要求比較詳細地闡明想法。這種情況我就遇到過多次。拉烏什曼事件也是如此。我在巴黎出席聯合國會議，在那裏，我收到鐵托的一封信，發信日期爲十二月二十八日：

「……關於拉烏什曼，情況是這樣：我確實說過，最好是他在我國工作並出版一份報紙。我沒有考慮到聯合國，沒有考慮到我們對俄國人的立場會削弱。爲此，我現在同意，就目前而論，他可在鄰國開始活動，以後我們再說。我想，他在外面不大可能取得多大成就。我考慮的是我們這裏有大量少數民族，這裏將耗盡用於工作和出報紙的物力。他來的話，請向他解釋一下我的立場。

請接受我的問候

約·布·鐵托。」

看過這封信後，我就想：有時候，咬緊牙關，固執己見，是必要的。

南斯拉夫向聯合國提出控告

同斯大林的較量進行了四年半。蘇聯和東歐其他國家的壓力雖然是波浪形地採用五花八門的形式施加的，但是壓力的强度一直在增强，直到斯大林去世爲止。例如，統計數字表明，在這漫長的

四年半時間裏，發生了五千多起邊界事件。例如，一九五〇年發生了九百三十七起，一九五二年就增加了一倍半，達到二千三百九十起。

儘管事件發生在我們與匈牙利接界的北部邊界，或者發生在與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接界的東部邊界，或者發生在與阿爾巴尼亞接界的西南部邊界，還是可以覺察到，我們邊界上所發生的這一切事件都是相互關聯的，都是受一個中心指揮的。將來的某位軍事歷史學家，如果研究了這些軍事挑釁的手法，就會發現在這漫長的一千五百多個日日夜夜裏，南斯拉夫由於不知道敵人將從何方突然而至而處於何等緊張的狀況中。這是一種無所不用其極的神經戰。

這些軍事壓力採用了各種形式，從在南斯拉夫邊界附近集結軍隊開始，直到其他的軍事示威。在那個時期確實有許多跡象表明，這些軍事示威是這樣一種性質的：可以意味着是直接準備採取武裝行動。

例如，一九四九年秋天，形勢就是這樣，而一九五一年秋天，這樣的形勢又再現了。莫斯科完全清楚我們的軍事形勢的全部困境，在重型裝備方面，尤其如此。我們由於相信斯大林，一直到一九四八年都是一條腿走路，武器的供應全靠東方。而且我們得到的不是現代化的武器，而是基本上爲戰利品，爲了換取這些戰利品，一九四八年以前我們向蘇聯借了九千萬美元的債。這樣，我們的軍隊在一九四八年竟配備有六十種火炮。我們不敢建立爲這些火炮製造彈藥的工廠，而是被迫從蘇聯進口。老大哥的擁抱可不是輕鬆的。

送到貝爾格萊德的情報表明，不僅在鄰國組織了軍事壓力，而且這種準備具有縱深的性質，在不同我國直接接壤的其他東歐國家的領土上也在爲對南斯拉夫發動軍事侵略作一部份認真的準備。

根據斯大林死後所了解的情況，莫斯科曾經作出過有關對南斯拉夫發動軍事入侵的決定，甚至從所有東歐國家準備了一定數量的摩托化師，供在南斯拉夫戰場的條件下的軍事行動之用。

但是，在決定此事的人們中間，在下面這一點上產生了不同的意見：一旦南斯拉夫的抵抗比較强大，戰事擴大了，可能產生什麼樣的戰略的和政治的後果。一派人勸斯大林要考慮到，在這種情況下，南斯拉夫的戰爭有可能變爲世界大戰，而另一派則認爲，不會發生這種情況，戰爭會局部化，如同朝鮮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樣。

斯大林死後，布爾加寧自吹自擂說，他是屬於勸告「不要捅馬蜂窩」的那些人的。誠然，布爾加寧這番話是在情緒比較愉快的時候說的，但是，我在聽了布爾加寧這番自我吹噓的話後，仔細查閱了我們的歷史檔案，我在裏面發現，他當時是多麼囂張地威脅南斯拉夫的。例如，一九四九年九月九日他自索非亞——不是自莫斯科——威脅說：

「鐵托這個猶大及其幫兇們是從社會主義陣營跑往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可卑的逃兵，他們把南斯拉夫變成了蓋世太保的監獄，在那裏自由思想和人權的任何表示都被扼殺，工人階級、勞動農民和知識分子的最優秀的代表由於致力於民主和社會主義事業而往往被野蠻地殺害。

南斯拉夫脫離了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後，日益淪爲國際帝國主義，首先是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整個進步人類都抱着厭惡的心情譴責這些討主子歡心的卑鄙的叛徒、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和幫兇。但是，南斯拉夫人民將發表意見。叛徒們將逃不脫本國人民的嚴厲審判。他們將因犯下血腥的罪行，將因他們對南斯拉夫人民和整個民主陣營的卑劣欺騙和背叛而受到懲罰。」

東歐的一位政治家一九五一年秋天曾公開揚言，對於南斯拉夫的侵略只會是一場局部戰爭，不會變成世界大戰。這個人就是瓦爾特·烏布利希。

烏布利希這番話曾是鐵托同志一九五一年八月底在斯洛文尼亞的布爾多向美國女記者、《紐約先驅論壇報》女評論家和瓦爾特·李普曼的助手瑪格麗特·希金斯以及瑞士和英國的另外幾個記者發表的談話的大部份時間的題目。

瑪格麗特·希金斯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

「鑒於情報局反對南斯拉夫的宣傳加强了，鑒於不久前發生了邊界事件和相鄰的衛星國在進行武裝，對於貴國來說，戰爭的危險是否增加了？」

對於這個問題，鐵托作了一番比較長的答覆：

「我始終認爲正在進行的反對南斯拉夫的宣傳是爲了進行神經戰，現在我仍然這樣認爲，我不認爲這對南斯拉夫有直接的危險，而是這是施加壓力，進行威脅。蘇聯衛星國的擴軍早已超越了和約所許可的範圍，今天比過去更爲危險，鑒於我們還沒有充分地武裝起來，這一危險就更爲嚴重。鑒於在我們的邊界上，其領導人對南斯拉夫不懷有友好意圖的一些國家正在武裝起來，這對於我國來說是一個日益嚴重的危險。至於邊界事件，這還不過是神經戰，雖說也有些成份是使人有點感到不安的。這種挑釁已不再是小規模的，但是我還是認爲這是神經戰，蘇聯人以後還會進行。世界報刊說，南斯拉夫從來没有像現在這樣受到威脅。很難確切地說這種說法是否有道理，因爲我們在這裏不了解他們在那裏想些什麼。如果他們意識到，一場戰爭有可能挑起世界性衝突，就不大可能發動侵略，如果他們不這麼認爲，那麼就存在侵略的危險性。但是，通過這些邊界事件、壓力和宣

傳，他們更多的是指望我們內部產生動搖，以期通過這種方式他們可以使我們發生某種內部變動，在我國佔據陣地。」

瑪格麗特·希金斯又問：

「如果衛星國在俄國不參與的情況下進攻你們，它們有多大的機會對南斯拉夫贏得決定性的勝利？」

鐵托回答說：

「我認爲，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將與它們周旋到底，即令是現在也罷，我們就靠我們所擁有的這些東西與之周旋。但是，這不可能沒有俄國，就像對南斯拉夫的進攻不可能是孤立的事件，不可能不變成世界性衝突一樣。」

對此，瑪格麗特·希金斯對鐵托元帥說，她前不久訪問東德時，曾有機會從德國領導人，特別是從烏布利希那裏聽到這樣一種假設：反對南斯拉夫的戰爭可能局部化，就如朝鮮戰爭一樣。她說，這是一種非常有意思的想法。對此，鐵托元帥回答說，他們的這種言論實際上就是我們所說的他們東方的想法。

不幸的是，一九五一年秋天，對南斯拉夫的獨立所施加的壓力不僅沒有緩和，而且威脅更加强了。在此以前就曾經呼籲過蘇聯政府不要攻訐南斯拉夫。例如，一九五〇年九月，愛德華·卡德爾在聯合國會議上就曾發出這樣的呼籲：

「……我以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名義，謹申明如下：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過去捍衛了，將來仍將捍衛國家的獨立和完整，抗擊任何侵略，抵制危害他們在自己國家內自行作出決定的權利的任何企圖。但是，他們不想參加任何侵略戰爭，希望同各國人民，尤其是同鄰國保持持久和平與和平合作。

本着這種始終不渝的愛好和平的立場的精神，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申明，它準備同任何一個鄰國簽訂持久和平和互不侵犯的協定。」

但是，這一呼籲被莫斯科看成是示弱的表示，因此不是伸出和解之手來，而是施加了更爲劇烈的咄咄逼人的壓力。

一九五一年春天，南斯拉夫政府發表了關於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等國政府對南斯拉夫的侵略行徑的白皮書。

在這個官方文件集中，關於南斯拉夫同蘇聯以及其他東歐國家的關係的材料包含對國際法的如下的踐踏：

一、施加政治形式的侵略性壓力

二、進行經濟侵略

三、採取直接的間諜活動和恐怖活動

四、在南斯拉夫邊界使用武力，作爲施加侵略性壓力的政策的手段

五、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致力於體面地和和平地解決爭端。

正如白皮書所說，南斯拉夫政府直到一九五一年春天，一直沒有把這個問題提交聯合國組織，因爲南斯拉夫政府首先致力於通過直接有關方面的直接外交談判來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白皮書接着說，如果蘇聯和東歐其他國家政府不顯示出願意尋求和平解決危及和平的這個問題的途徑的話，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將被迫把這個問題提交聯合國組織。

在這一段前言之後，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就它是如何看待同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關係正常化一事提出了具體建議：

「南斯拉夫政府和各族人民再一次申明，他們過去沒有、現在也不否認任何人都有權按照自己的見解對南斯拉夫及其政策和國內的局勢提出批評。當然，南斯拉夫政府和各族人民認爲，他們在同樣的程度上也享有同樣的權利。然而，關於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政府對南斯拉夫採取的行動，這與進行批評的權利無關，而是事關對一個主權國家施加侵略性的壓力，伴之以煽動戰爭的宣傳、經濟封鎖、威脅等等。因此，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各族人民希望聽到蘇聯和東歐國家政府對以下問題的答覆：

一、這些國家的政府是否願意停止對南斯拉夫進行咄咄逼人的威脅？

二、蘇聯政府和東歐國家政府是否願意放棄對南斯拉夫內政的干涉？

三、它們是否願意停止對南斯拉夫的經濟封鎖？

四、它們是否願意停止進一步惡化同南斯拉夫的關係？

五、這些國家的政府是否還願意同南斯拉夫保持和平的、正當的關係？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希望聽到如此頻繁地强調自己對外政策的愛好和平性質的那些人對這些問題作出答覆。

一個獨立國家的自由和和平的最高利益，巴爾幹和全世界的和平和安全的最高利益要求蘇聯、

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等國政府停止對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採取侵略行動，要求它們考慮國際和平和世界這一地區的安全。」

鑒於對這些問題沒有作出答覆，鑒於壓力增强了，而烏布利希又公開談到對南斯拉夫發動侵略的可能性，貝爾格萊德就決定在能够買到的地方購買重武器，以捍衛南斯拉夫的獨立和自主的道路。同西方國家開始了朝着這一方向的談判，同時又作出了另一個影響深遠的決定：把同蘇聯的爭執提交世界組織，在那裏進行討論。

我們參加聯合國組織一九五一年秋季會議的代表團的團長是愛德華・卡德爾，代表團團員有密洛凡・吉拉斯、薩瓦・科薩諾維奇、阿勒什・貝勃勒、萊奧・馬特斯、米洛什・米尼奇、鮑里斯・齊海爾、維爾科・米丘諾維奇、伊沃・韋伊沃達、米蘭・巴爾托什、基羅・哈季—瓦西列夫和我。

在貝爾格萊德時就擬好了我們的決議草案：

「大會

鑒於研究了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和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政府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政府反對南斯拉夫的活動向大會提出的控告，

十分不安地審查了就上述控告提出的有關緊張局勢的證據，

意識到聯合國的宗旨是『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爲根據之友好關係，並採取其他適當辦法，以增强普遍和平』，

意識到大會有權『對於其所認爲足以妨害國際間公共福利或友好關係之任何情勢，不論其起源

如何……得建議和平調整辦法……』，

知悉南斯拉夫代表團申明，南斯拉夫政府願意爲執行本決議的建議做一切必要的事情，

謹建議有關國家政府：

一、根據聯合國憲章的精神確定彼此的關係和解決彼此的爭執；

二、使彼此的外交往來同國際關係中慣有的規則和做法相適應；

三、經由邊界混合委員會和自行選擇的其他和平手段來解決彼此的邊界爭執。」

在貝爾格萊德時就決定，由愛德華·卡德爾在一般性辯論時闡明南斯拉夫政府之所以決定把同蘇聯的衝突提交聯合國的理由，他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也這麼做了，强調指出蘇聯集團各國政府的侵略行動成了危及和平的嚴重危險根源之一。

而控告本身則應由密洛凡·吉拉斯在特別政治委員會裏提出。據我在《書中之書》第四十四頁上記載，關於我的朋友，我工作上的頂頭上司密洛凡·吉拉斯的這次發言，我同他發生了一次激烈的衝突，在我們之間這一類事既不是空前的，也不是絕後的。

在貝爾格萊德作出決定後，我就問過吉拉斯，是否從國際法的觀點出發草擬了發言大綱，因爲我們是到聯合國去，也就是說，從國與國之間關係的觀點來討論同蘇聯的衝突，來確定他們由於對我們施加侵略性的壓力而踐踏了國際法的哪些原則和規定。吉拉斯說，他當然考慮到了這一點，並說，爲此外交部的一批同志在幫助他搞。

一九五一年，我是設在巴黎的聯合國第三委員會裏的代表，儘管我在那裏工作很忙（我們正在

草擬人權公約），在吉拉斯在特別政治委員會裏發言之前幾天，我見到了他的報告。我仔細地閱讀了報告，發現這不符合我們前來聯合國的目的。報告的重點不是放在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上，不是放在違反國際法上，而是成了一篇哲學領域內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術辯論文章，還混雜以神學上的誰對誰錯，差不多等於在辯論在針尖上可以站住兩個天使呢，還是三個天使？

在我們大使在德萊舍大街一號的官邸，卡德爾在樓上單獨有一個房間，而我們別的人都在同一層，我們常常見面，因爲我們都在自己房裏工作。吉拉斯和我在卡德爾那裏喝黑咖啡時碰到了，我就談了我對吉拉斯的報告的看法。但是這裏我又犯了我常犯的錯誤。我認爲，我的批評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說得十分笨拙，致使吉拉斯大爲生氣，似乎別人燒了他祖墳似的。

我使用了這樣的措詞：「這個報告對於某個馬克思主義的地下支部來說是不壞的，但是如果吉拉斯到聯合國去說，我們就會給國家造成損失」。吉拉斯跳了起來：

「你想些什麼？我不愛自己的國家！你怎麼能這麼說話，簡直荒唐……」

卡德爾只是舉起手來，眨了眨眼睛，要我們平靜下來，但是沒有結果。吉拉斯最後不打一下招呼，把門砰地一下關上，衝出房間走了。卡德爾責備我說話如此魯莽，他說，他自己要看一看報告。

那天，一直到夜裏我都倒了霉了。法蘭西共和國總統樊尚·阿里奧爾那天晚上在愛麗舍宮爲全體代表舉行盛大招待會，吉拉斯和我被確定出席招待會。我們穿上了燕尾服，我那一套不那麼合身。我像是一個比較高級的雜耍場的看門人。吉拉斯和我乘同一輛汽車去參加招待會，在汽車裏繼續進行下午開始的爭吵。我不想沉默，正當我們進入愛麗舍宮，穿制服的官員通報說「密洛凡·吉拉

斯閣下和德迪耶爾先生」來到時，我説了些什麽刺痛了吉拉斯，正當我們走向法蘭西共和國總統時，他一聲不吭轉身就往回走，我困窘不堪地站在頭髮斑白的阿里奥爾先生面前，他握着我的手説：

「吉拉斯先生，看到您使我感到很高興。」

第二天一早，卡德爾把我叫到自己房裏。吉拉斯也在那裏。卡德爾對我説，他不同意我昨天提意見的方式，但是同意我提的意見。他看了報告，報告確實不符合目的，必須重新寫。

吉拉斯同志式地接受了這一點。黑夜已經過去。我對於自己的魯莽向他表示歉意。我們之間的這一事件就算了結了。他再也没有提起過這件事，也没有從任何方面對我進行報復，儘管我們仍然一起工作。例如，他是南共中央國際聯絡委員會主席，而我是書記。回到貝爾格萊德後，他建議由我當主席，我立即拒絕了，因爲我是不那麽看重形式的。

我們同卡德爾、巴爾托什和維爾科·米丘諾維奇在一起擬定了新的報告大綱。我們日夜趕寫。我們不得不要求讓信使從貝爾格萊德給我們帶新的材料來。巴爾托什、維爾科·米丘諾維奇和我有二十八個小時没有睡覺，直到報告寫成爲止。

我們對蘇聯的控告列入特別政治委員會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日程。報告是這樣劃分的：

一、侵略性壓力的起源，這裏强調指出，公開的、露骨的壓力開始於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情報局的決議，但是蘇聯在我國和東歐的霸權則開始得還要早些，戰後不久就有了。

二、關於侵略性壓力的形式，曾作了這樣的歸納：

政治壓力：

干涉内政。

官方性質的威脅和阻撓正常的外交往來。
敵對的宣傳和動員非政府組織來反對南斯拉夫，特別是提到蓄謀策劃的訴訟案。
取消和廢除國際條約和協定。
經濟壓力和經濟封鎖
恐怖活動和破壞活動
侵犯人權
對南斯拉夫公民實施恐怖
强行扣留兒童。這裏提到這樣一件事。一九四五年，有九十一名九歲到十二歲的南斯拉夫兒童被送到蘇聯去學習。其中，一九四七年有十六名兒童返回南斯拉夫，一九四八年七月又有十二名回來了，因此在一九五一年時在蘇聯還有六十三個兒童。這批兒童所受的教育的目的不僅在於使他們背棄南斯拉夫，而且用仇恨祖國的精神教育他們。
迫害保加利亞、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南斯拉夫少數民族。不僅禁止我們的少數民族使用本民族語言，甚至還把一些人强行從邊界地區遷走。對南斯拉夫少數民族採取的這樣的措施具有集體懲罰的全部特性，進而變成了種族滅絕，因爲他們把屬於一個民族的人從肉體上加以消滅。
挑起邊界事件
施加軍事壓力，違反和約的軍事條款

對於我們的控告，蘇聯代表阿爾卡吉·索波列夫作了回答，他硬說「南斯拉夫的控告的目的在於欺騙輿論，因此這種誹謗性言論從本質上來說不值得予以任何注意。」

儘管索波列夫講了四十五分鐘，他一直迴避談具體事情，只是一再說，是南斯拉夫挑起了事件，尤其是在同阿爾巴尼亞接壤的邊界上。這一切還同布達佩斯對拉伊克的審訊聯系在一起：

「邊界挑釁的深遠目的在於爲對匈牙利進行軍事干預和對匈牙利領土實行軍事佔領製造一個表面的藉口！」

就這樣，索波列夫的講話的主要部份是以「闡述」布達佩斯對拉伊克的判決和索非亞對科斯托夫的判決爲基礎的：

「在法院審理賣國賊拉伊克·拉斯洛及其同伙的訴訟案中業經證明，南斯拉夫現政府的領導人士作爲教唆者和組織者參與了目的在於推翻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政府，殺害居領導崗位的政治家和在匈牙利恢復法西斯政權的陰謀。」

接着，索波列夫援引了對特拉伊喬·科斯托夫的訴訟案，在這起訴訟案中也「證明」南斯拉夫想「立刻吞併保加利亞，這一行動計劃得到美國人的贊同」……

在討論中，有幾位代表强調指出，南斯拉夫的提案是合情合理的。巴西代表、巴西駐南斯拉夫大使里貝羅·庫奧托特別指出了這一點：

「巴西代表團覺得，涉及異常嚴重的政治問題的這個提案是抱着極其克制的態度向委員會提出的，這種態度是善良意願和智慧的表示。如果我們不了解——我們是了解的——南斯拉夫政府是抱着謹慎的態度有時抑制自己受到傷害的尊嚴，它的政治上的成熟使它爲了巴爾幹和平的利益而犧牲

了這種尊嚴，這樣的克制態度甚至可能使我們感到意外……而這種智慧却只能使我們感到高興。它證明，南斯拉夫代表團懂得區分：在它勇敢地回答自己的對手——鄰國政府時，什麼是南斯拉夫政府有權和有自由説的以及什麼是它要求我們説和建議的，我們其他人的任務是在有人爲此目的向聯合國提出呼籲時，從法律上和客觀地貫徹憲章的宗旨。」

世界公衆看清了蘇聯代表的發言的弱點。倫敦《泰晤士報》評論説：索波列夫的發言充滿怒氣，這暴露了他的發言的全部弱點。西方其他一切嚴肅的報刊的評論也是這樣説。

因此，蘇聯集團的代表——烏克蘭代表、白俄羅斯代表、波蘭代表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第二天在討論南斯拉夫的控告時提供了自己的「事實」，但是不大成功。

白俄羅斯代表發言之後，密洛凡·吉拉斯立即向委員會主席要求發言：

「我想通過您請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費神對他在這裏講到的一些事情補充一些材料。或許他可以立即就作補充。我只想向他提出三個問題：

第一，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提到，在巴奇科市附近正在興建機場。鑒於南斯拉夫不存在這樣一個城市，因此我想問，他是從哪本地理書，從哪裏找出這個城市的？

第二，他還提到，南斯拉夫的卡姆尼克礦掌握在美國人手裏。鑒於南斯拉夫不存在這樣一個礦，他是否能够用具體的材料解釋清楚整個事情。

第三，他還説，南斯拉夫撤銷了工商業國有化法。誠然，他對於商業没有説什麼，但是他可能也是指商業而言的。我是南斯拉夫政府成員，對於南斯拉夫政府這樣的决定，我一無所知。我根本不知道撤銷工業國有化法。或許他掌握着這樣的材料。我們没有這樣的材料。

再之，他從哪裏得到材料說，南斯拉夫的特列普查礦和博爾礦是爲美國資本所擁有的。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甚至提到一家美國公司。他能不能告訴我們，他是從哪裏得到這樣的材料的？」

白俄羅斯代表一聲不吭，没有應邀對這些問題作出明確的答覆。

各國大約有二十來名代表參加了討論。特别政治委員會終於對南斯拉夫就蘇聯集團對南斯拉夫的敵對行動提出的提案進行了表决。

贊同南斯拉夫提案的有五十個國家，而反對的爲五個國家（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伊朗和阿富汗棄權。這兩個國家是蘇聯的南方鄰國，同蘇聯有漫長的邊界，而又没有足够的軍事力量來保衛邊界。

愛德華·卡德爾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七日在向駐在聯合國的記者發表談話時談到了南斯拉夫對蘇聯集團的侵略性壓力提出的控告獲得通過的意義。阿拉伯通訊社記者就此向他問道：

「我們饒有興味地聽取了吉拉斯先生關於南斯拉夫控告蘇聯集團的發言。南斯拉夫的控告還算是温和的。您能否向我們談談，爲什麼貴國選擇了這條道路？」

卡德爾作了如下的回答：

「南斯拉夫的控告反映了我們致力於使南蘇爭執至少局限於不再成爲危及和平的源泉的範圍内。我國代表團在聯合國裏申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要求於蘇聯政府的無非是讓他們在和平中生活。南斯拉夫代表團希望在决議中强調的，是要求蘇聯政府使自己對南斯拉夫的關係至少同對一個

國家的主權和獨立有起碼的尊重這一點相協調，沒有這種尊重，世界的持久和平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們使我們的提案局限於任何一個自稱擁護和平和贊同聯合國憲章宗旨的政府所能够和必須接受的起碼要求。可見，我們的決議的要求並不高。但是，決議所建議的，如果果真執行的話，那就足於改變我國邊界上的局勢，足於消除國際緊張局勢的一個策源地。

然而，誠如您所知道的，蘇聯代表團甚至對於這樣一項決議也横加攻擊和詆毀。蘇聯代表團沒有表現出絲毫願意消除我國邊界上的緊張局勢。這就再一次證明，和平對於它來說，不過是宣傳、虛假的空話，實際上是掩蓋它實際政策的霸權主義侵略本質。

然而，對南斯拉夫決議的表決情况表明，全世界都一致譴責蘇聯對南斯拉夫的政策。我們的決議取得成功的意義就在於此。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從聯合國得到的支持，在他們爲捍衛獨立和和平的今後的鬥爭中，將當真給他們以幫助。」

第八章　良心的自我反省

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我都認爲，我們在蘇捷斯卡戰役時處境最爲險惡，但是漫長的一九四九年這一年在我看來却是更爲嚴峻。情報局的壓力越來越大，軍隊在邊界上調動，西方不信任，國內局勢在動盪。由於東方的經濟封鎖，經濟陷於全面危機。開始興建的工廠荒廢了，變得死氣沉沉。同時，由於我們的教條主義，我們掀起了一個强迫集體化的浪潮。實行了嚴格的强迫徵購。我們向農民這個我們戰時的忠實盟友開了戰。城市裏實行憑卡購糧，而除了在農村得到糧食外又沒有別的辦法。可是農民不給。多少世紀以來，農民對於同國家，過去是同異國，現在是同自己的國家作鬥爭是有經驗的。有的地方，年輕同志沉不住氣了。他們在夜間把農民押到墳地，竭盡脅迫之能事，要農民給糧食。

我們要得到最必需的原料，西方就開出條件。我們不得不盡可能多地出口礦石，出口盡可能多的採自我們美麗的森林的木材。勞動力不足。爲了完成定額，而礦場又沒有足够的人手，民警也來幹活。簡直把所有活人都裝上卡車，運到礦場、工廠和森林裏去。出現了無法形容的混亂雜沓。一位大學教授就這樣被帶到阿萊克西納茨去挖煤。

誠然，這是一種例外情況。要是當時沒有羣衆的自我首創精神，沒有青年的自我犧牲精神，我們永遠不可能擺脫這場危機。這是我們的一場名副其實的文化革命，我們用革命的方法來解决經濟問題。但是，在這裏，也像任何這一類運動一樣，也有走過頭的地方。大部份人都是自願去的，但是也有個別人對於這種共同的努力不願幫忙。對他們就實行了强制，就發生了那位大學教授那樣的遭遇。貝爾格萊德西弗拉查爾區有一位熱心的人民陣綫成員，爲了在競賽中超過東弗拉查爾區，發表了這樣一道指示：正式徵召一切未自願報名者。他拿了自己所住房子裏的、本區各條馬路上的户口本，採取簡單的做法，要每一個市民都帶上鐵鎬到某處去報到。他忘記了在一條街上還住着一位外交官，因此連英國伊麗莎白女王陛下特命全權大使查爾斯·皮克先生也接到了參加義務勞動的通知。

這位受人尊敬的外交官立即去找我們的一位外長助理，表示歉意：

「我是很樂意去勞動的，我熱愛貴國，但是我在西綫在伊普雷 斯受了傷，我可能達不到定額……」

後來對造成這樣一些事件負有責任的人受到責備①，但是我們的人民陣綫成員和青年人仍然懷疑在那些艱苦的日子裏，在我們爲擺脫經濟混亂而全力以赴時沒有幫忙的每一個人。當時在貝爾格萊德的德迪涅住着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的一位我們的歌劇名演員。她當時前來探望丈夫。而我們的人民陣綫成員嚴格計算，在德迪涅誰響應號召參加了義務勞動，誰又沒有。（我的夫人韋拉當時正懷孕，仍然按時去勞動。）有一天，貝爾格萊德市委給南共中央鼓動宣傳部，給我們寄來了對津卡·

① 此處塞文版有脱漏，係照英文版譯。——譯者

孔茨—米拉諾夫的鑒定：

「她整天都没有幹活。只顧唱，拒絶參加義務勞動。」

一九四九年全年都在進行這樣的全國總動員，來興建關鍵性的工程。軍隊也全力以赴，雖然同時還要守衛邊界。而爲了滿足我們的武裝力量的需要，我們撥出了百分之二十二的國民收入。没有别的辦法。因爲，只要我們稍稍忽視軍隊的裝備，我們就會遭殃。

一九四九年可以感覺到加工工業有了發展，但是食品工業落在後面了。强迫集體化使得局勢變得更爲複雜。在城市裏，以及在小一些的城鎮裏，存在一個負責分配供應的龐大的機構，簡直是一個小型部。我們把企業都架空了，把所有的幹部都派到這個徒勞無益的官僚機構裏去了。

後來從這種經濟困境，從這種困難局面中產生了自治制度的第一個幼芽。這一過程是同對蘇聯的社會存在的認識過程同時進行的，我們在批判蘇聯的制度的同時，實際上也就批判了我們當時的制度。勢必要對當時有關信貸和市場的安排的準則進行修正。每天都通宵達旦地展開討論，尤其是在鐵托、基德里奇、卡德爾、吉拉斯和泰波之間。

鮑里斯·基德里奇特别一再倡議，我們必須找到自己的方式，因爲他同經濟的關係最爲直接。他以一種現代化的有效的方式組織自己身邊的工作，連最小的工廠的報告他都掌握，他走遍全國，同人們談話，回到自己在米洛什大街的辦公室，同助手們討論。每當他產生一個新的主意，他就打電話給卡德爾、吉拉斯，交換意見。之後，又趕到鐵托那裏，提出建議。

我在基德里奇、卡德爾、吉拉斯的辦公桌上意外地看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我知道，他

們在流放時曾研究過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但是現在又鑽研起《資本論》來了，把我們的實際情況，把我們所採取的措施，同馬克思的立場相比較。

基德里奇的親密助手弗拉伊科·貝戈維奇回想起那些日日夜夜和所展開的討論時寫道：

「有一個晚上，鮑里斯說，我們只有擴大我們的無產者的權利，我們才能保護他……對了，對了，工廠歸工人，土地歸農民……

後來，他在公開講話中一再闡明了這個想法：

『在我們目前的計劃制度和財務制度下，國營企業的幾乎全部剩餘勞動都轉入國庫，在那裏積聚起來，又從那裏重新實行分配。企業實際上只是分配工資基金，這是社會必要勞動。然而，從這一角度來看，企業的手脚被縛住了。當然，在我們的人民國家裏，在從新南斯拉夫一開始成立起就爲反對官僚主義傾向及其體現者進行了尖銳鬥爭的革命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交換手段——國庫裏的貨幣——的途徑積聚的這一剩餘勞動，是按照對勞動人民的社會有益的方式即社會主義方式進行分配的，並且也是爲此目的而進行分配的。也就是說，它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如果你願意的話，也可以說是官僚社會主義的，它在客觀上孕育着在蘇聯早就導致對勞動人民的剥削的那種種潛在的、隱匿的危險。』」

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南斯拉夫在鐵托、卡德爾、吉拉斯、基德里奇、泰波這一小範圍內一直在討論對蘇聯的社會存在作出評價這一問題。有一種看法認爲，那裏只是社會的形式是社會主義的，而內容則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鑒於吉拉斯負責鼓動宣傳部，他最有可能，也最有時間把這一新想法寫成書面意見。他也樂意從理論上探討一番。我認爲，是他首先提出關於蘇聯的社會存在的這樣的論點的。

當時也有別的看法，而黨員還不習慣於領導人的文章不代表黨的路綫這種情況。鐵托同志本人就曾多次照他同合作共事者討論那樣，公開地議論到蘇聯的社會存在。他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七日在貝爾格萊德舉行的近衛部隊黨組織第二次代表會議上講話時，提出了這樣一種看法：「一篇理論性文章不代表黨的路綫」。而在一九五一年夏天，南共中央全會通過了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的理論工作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決定，決定說：

「一、南共內新的理論觀點是在討論和意見交鋒的基礎上形成的。在這一基礎上，南共黨員確立自己的理論觀點。對於個別黨員——不論其担任什麼職務——的理論觀點以及理論工作者的觀點，南共黨員有充分的權利或是口頭上或是在黨的報刊和其他報刊上自由地發表意見和展開討論。

二、黨組織必須只學習黨的代表大會和機構的決定和指示以及個別領導人的具有這種性質的講話。至於居領導地位的個別黨員的具有明顯的理論性質的著作，只有在南共中央政治局明確地就這些著作作出決定，也即只有在這些著作是業已進行的意見交鋒和討論的結果並對黨今後的工作和發展具有直接的實際意義和意識形態意義的時候，黨組織才必須加以學習。

三、黨的一定機構的目前的理論性黨刊，應當成爲全黨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刊物，南共全體黨員都有權在這些刊物上展開討論。」

在羣衆在反對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的鬥爭過程中發揚自我首創精神的同時，南斯拉夫共產黨本身也民主化了。但是，要寫我們的自治史，不應忘記最初的幾步是十分艱難的，因爲尋找的是到當時爲止除了巴黎公社之類的經驗外，在實踐中所不存在的出路，而且黨內對於自治這個主張本身就

有不少抵制。教條老是使我們窒息。

但是，有一點我是可以問心無愧地說的。在尋找這條新的道路上，鮑里斯·基德里奇最爲急進。在這件工作上，他眞可以說是嘔心瀝血，把命都送掉了。

這一章節，我不是一口氣寫下來的。寫完時，我已困倦，時間已是凌晨一點，維奇教堂的敲鐘人正勤快地在敲鐘。我昏沉沉地睡着了。我又到了已經死去的自己人中間。這一回我是同鮑里斯·基德里奇在一起。我站在普雷舍恩大街他的紀念碑旁。他很憂傷：

「弗拉多，爲什麼我的關於一九四八——一九五三年的文章集就是出不來？爲什麼我的選集就到這裏卡住了？」

這時，我從夢中驚醒。時間是兩點鐘。一台火車頭拖着好多節車廂急速地向的里雅斯特駛去。這給我增添了力量，我也得勤快些，我又坐到寫字枱旁。

「弗拉迪米爾·德迪耶爾」合作社垮台

南斯拉夫在情報局決議後開始掀起了土地集體化的高潮。匆匆忙忙地建立了農民勞動合作社。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我國有一千三百一十八個農民勞動合作社，而同年十二月十日就有了六千四百九十二個合作社。同期，加入合作社的農户的數目從六萬零一百五十六户增加到了三十二萬三千八百四十九户，合作社的土地從三十二萬三千九百八十四公頃增加到了一百七十八萬二千六百一十四公頃。

我們爲什麽這麽幹？是出於教條主義。教條主義在我們這裏當時還是强大的，我們想「用行動」向情報局證明他們的「指控是没有道理的」，或者是由於這在當時是衆所周知的客觀困難，我們的官僚分子本該爲此而建立紀念碑：幹了蠢事，又没有勇氣來承認，把它歸之於客觀困難，就萬事大吉了。

有一次，我請鐵托同志回答我這個問題。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我到布里俄尼去看他，我央求我在貝爾格萊德第三男子中學的同學蒂恰·斯托亞諾維奇（他當時是鐵托同志的秘書）把我們這次談話用速記記録下來。我設法從蒂恰那裏拿到了速記記録稿（有些流言蜚語說，他還有一本同鐵托同志的一千次未經譯解的談話記録稿），我現在按照我記在《書中之書》中的樣子照録如下。讀者應當考慮到，鐵托那天上午情緒不大好，而我又格外固執。但是，後來還是展開了一次很充實的談話：

「德迪耶爾：老大同志，我感興趣的是你的工作方式。你如何爲講話作準備的？你如何發表講話？

鐵托：你什麽都想了解，什麽都想知道……首先，要是我在幹一件我很不喜歡幹的事，我就設法看看書，這樣時間容易過去些，就像現在跟你談話一樣……但是，我的講話，我從來都不事先寫下來，在議會裏發表講話和向報界發表談話除外。關於意大利的那篇（長篇）講話，我就没有寫下來，别人也没有起草。

德迪耶爾：我發現，經過戰爭，你在講話方面大有提高。

鐵托：人一生下來是不會馬上就會講話的。講話得慢慢來，有的人慢一點，有的人快一點。有的人根本就成不了演説家，而有的人則能够巧妙地說個没完。我先在腦子裏整理好講話。我想好什

麼是主題。譬如，我在談俄國時，我給自己提兩三個小問題，思考並加以整理，待腦子裏有頭緒了，我就不難發表講話。其他一切，我都在講話時，在同羣衆的直接接觸中構思。

德迪耶爾：因此有幾次講話，從收音機裏聽來效果不是那樣好。

鐵托：那當然囉，因爲我在發表講話時同羣衆交談。」

講了這一番話後，鐵托打開了話匣子，我們談到他如何寫報告，他看些什麼書，他懂哪些語言，程度如何（吉爾吉斯語他已忘掉），隨後談到繪畫（德迪耶爾：你對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怎麼看？鐵托：很不怎麼樣。這些玩意兒，老弟，好像是用掃帚刷成似的。列寧格勒美術館裏的人向我提出過這個難答的問題。他們問我是否喜歡格拉西莫夫。要我寫下自己的印象……）。

最後，我們轉到了嚴肅的話題，進行了嚴肅的談話。鐵托先是闡述了自己對於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的看法，隨後談到他給社會主義和「鐵托主義」下的定義，談到我們的革命的性質、社會主義制度下個人的自由，接着又談到集體化問題：

「德迪耶爾：你是否認爲，正是在農民問題上，俄國人給人留下了最惡劣的印象？

鐵托：我們照俄國的路去建立合作社是犯了一大錯誤。我們起了另外的名字，但是方法仍然是相同的。

德迪耶爾：不過沒有俄國那種强迫的做法。

鐵托：下面有，在基層，無所不有。

德迪耶爾：但是沒有西伯利亞……

鐵托：我們沒有西伯利亞，如果我們有西伯利亞的話，我們是會把人送到那裏去的……我認爲，

我們儘管知道在集體農莊方面那裏經過二十多年情況仍然不妙，而我們却還是走俄國人的路，這是犯了一個大錯誤。也就是說，這種辦法不行。我們没有從中吸取教訓。我們需要他們的錯誤做法來衝擊衝擊。我們還没有擺脱這種做法。我們現在聽憑農民自由去幹，但是合作社的形式，我們還没有找到。我們還得研究整個這個問題，爲農民經濟的逐步發展找到一條更好的路。我們必須找到合作社内部生活的方式，找到促使農民加入合作社的因素，因爲在合作社裏農民覺得自己是格格不入的。我們犯了錯誤，因爲我們走了俄國人的路，愈早擺脱這條路，就愈好。我們不能讓合作社現在就解散，因爲這樣就會影響農村農民經濟的建立。我們必須制止反對者，因爲在那裏有形形色色的反對者。一方面，那裏有階級敵人，他們想不惜一切代價阻撓我們。階級敵人喪失了自己的經濟陣地，但是他們在農村却頑固地固守着陣地。階級敵人固守着陣地，他們給我們製造的一切困難都來源於他們在那裏保持着强大的陣地。有的人熱愛社會主義國家，熱愛新社會，熱愛我們的道路，但是目前在具體情況下又看不到裏面有什麽可以吸引住他們的東西。或許在一小部份合作社裏有這種吸引人的東西。在合作社方面，我們必須做許多工作，使整個合作社的組織形式和生活能爲這些人所接受。像現在這樣，是行不通的。我們不應該過於激進，不應該一口氣辦成。我們現在過渡到經濟核算制。這表明是很不錯的，很大一部份合作社已採用了，但是經濟核算的全部好處還看不出來。内部的組織需要變動，在合作社裏，要讓個體農民當家作主，而不是讓數字來主宰一切，這正是農民所極其害怕的。我們的合作社還在使用蘇聯的方法。有時，你建立了一個新合作社，過了一年它就有了一個强大的官僚機構，從而還産生了對合作社社員的官僚主義態度。至於合作社的組織建立，應當在合作社裏實行最大程度的民主。可見，在一切方面，民主都必須佔上風。」

談話轉到了戰爭年代，轉到了農民參加我們的革命，這實際上是工人意識形態和廣大起義農民羣衆的結合。我提醒鐵托，他曾對幾個法國社會黨人說過，「要是沒有戰爭，我們的革命將是一場最不流血的革命」。

鐵托接過了這個話題：

「情況表明，我們的革命同蘇聯的革命不同的是，具有深厚得多的羣衆基礎。這正是我們的革命的特點。正是這種羣衆性，革命的這種廣泛基礎，是在我們革命的雙重性基礎上產生的，因爲我們的革命不僅具有反對佔領者的解放鬥爭的性質，而且具有反對一種舊的社會制度的鬥爭的性質。這就使革命具有那種廣泛的羣衆基礎。要是我們只是一場無產階級的革命，它在我國是不會成功的。或許只是靠了蘇聯的刺刀，才會成功，不過，那樣的話，就不成其爲革命了。那樣的話，我們就決不可能擁有這樣廣泛的基礎。這就是根本的東西，這就是南斯拉夫革命的特殊性質，也就是說，它既是一場解放革命，又是一場無產階級的革命。這一點我們是經常說的，沒有什麼新東西。一場革命的基礎愈是廣泛，它流的血就愈少。革命愈是集中在小範圍內，突擊力量愈是弱小和狹隘，這樣的革命流的血就愈多，因爲它是軟弱的，而軟弱勢必流很多血，因爲這樣的革命想通過流許多血來達到情況所不許可達到的目的。儘管我們具備這種廣泛的基礎，我們的戰爭還是流血的戰爭，這是因爲佔領者盤踞在我國。要是沒有佔領者，就不會出現帕韋利奇、奈迪奇和別的賣國賊，革命流的血會少得多。戰爭結束時，我們擁有巨大的革命物質基礎，階級敵人連動都不敢動。我們把他們的財產收歸國有，他們連手都不敢抬一下，一槍也沒有放。這只是由於我們革命的基礎極其

廣泛，是迄今爲止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没有的。」

我對鐵托説：「你看，你開始時還生我的氣，怪我纏着你，你看看，談話進行得多好。」

他笑了笑，我向他建議來五分鐘的「精神衛生措施」，也即我給他説個笑話。

「你知道嗎？弗拉迪米爾·德迪耶爾翹辮子了！」

「你説什麽蠢話！」——鐵托呵斥道。

「我説的是真話。奥布雷諾瓦茨附近的游擊隊老巢德拉日瓦茨村，早在一九四六年就建立了『弗拉迪米爾·德迪耶爾』農民勞動合作社。建立合作社的想法是馬爾科的母親達察大娘提出的。她讀了《日記》之後，向農民們建議，合作社以我的名字命名。但是，雖説我有一百多公斤重，合作社可不那麽神氣。老是奄奄欲息。加入合作社的只有十七户，而這個村子却是我們游擊隊的村莊，是馬爾科的村莊……關鍵在於馬爾科的叔叔。老鄉説，要是他加入，我們大家都加入。可是，這位大叔就是不加入。三年前，正當我們各地都在建立合作社的時候，有一天正好是久爾杰節①，馬爾科要人準備了烤羊肉，貝夫茨、吉多、馬爾科和我同馬爾科的叔父坐在一棵榆樹下，貝夫茨和吉多在説服他加入合作社，而老頭只是撫摸着長長的白鬍子，客氣地笑着……」

「後來怎麽樣？」——鐵托問道。

「貝夫茨對大叔拒絶加入是這樣解釋的：『弗拉多，老頭不願加入合作社，是因爲是以你的名字命名的』。這番話有道理。我們稍微放鬆了一下對我們游擊隊的老盟友農民的壓力，『弗拉迪米

① 舊曆十一月二十六日紀念聖徒喬治的教會節日，昔日在此日前後各一周間，農奴有權由一個封建主轉到另一個封建主。——譯者

爾・德迪耶爾』一夜之間就消失了。德拉日瓦茨的合作社垮了，好像從來就沒有過似的……」

建立人道關係的艱難道路

在像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以及一九四八——一九五三年那樣的革命和社會大動盪中，在我國的命運可以說是千鈞一髮的時候，權力是否可能是公正的，對每個人來說是同樣公正的？在這種氣氛中，無辜的人是否可能——或者不可能——遭殃？

早在一九四四年秋天，在我來到剛解放的貝爾格萊德的時候，我就開始考慮這個問題，直到今天爲止，我仍在思考人間的這個重大問題。

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一九四一年秋天，一個曾經是黨員，但是在一九三七年黨組織遭破壞時表現得不好因而被驅逐出共產黨員的隊伍的人，來到了我任政委的克拉古耶瓦茨支隊。他說，他願意戰鬥，以洗刷一九三七年的恥辱。我們給了他一枝槍，當天晚上他就同一批游擊隊員去活動了。第二天，那個排的排長送來報告說，那個人在戰鬥中把槍扔了，逃跑了。我們的巡邏隊把他逮住了，我們把他送交支隊的法庭，我們一致决定判他以死刑。

清晨，德國人强行向米拉諾瓦茨挺進，我在那裏受了傷，因此我不知道那個人怎麼樣了，不知道是誰把他槍斃了，是在什麼時候槍斃的。

我把這件事完全忘記了，但是當我一九四四年底在國民議會大厦裏同十來名游擊隊軍官一起接

受伊萬·里巴爾授予人民解放勳章時，我的目光落在站在我們這批人隊尾的一位同志身上。他穿着少校的制服。我仔細瞧了瞧，認出他就是由於在戰鬥中開小差而在一九四一年秋天被我們的法庭判處死刑的那位同志。

我驚訝萬分，我自問道，這樣的可怕的錯誤我們犯了多少？到底是怎麼回事呢？這位同志當時被送到一個營裏，在那裏執行死刑。在此期間，德國人襲擊了這個營，一些指揮員犧牲了，而這個人却拿起了槍，開始同德國人作戰，而且不是作爲普通戰士，而是作爲指揮員，因爲沒有別的指揮員了。戰鬥一結束，游擊隊員們看到，不能把這個人槍斃掉。第二天清晨，德國人繼續發動攻勢，而這位同志慢慢地，從一次次戰役中鍛煉得堅强了，到戰爭結束時，他是少校，而我，他的法官，則是中校。

一九四八年的衝突爆發時，當斯大林的情報機關撲向軍隊、國家保安處、黨和最重要的一些部的關鍵性崗位時，這個問題又使我感到煩惱。是否所有被捕的人都有罪？這些被捕的人的動機有沒有區別呢？有的是追求金錢、地位的特務，而有的則就是弄糊塗了。幾十年來豈不是我們用忠於斯大林和蘇聯這種精神來教育他們嗎？現在，許多人一夜之間轉不過彎來，不能像你按電燈開關那麼容易，人得痛定思痛，自己看到錯了才行。

我知道，我們的偵查機構——非軍事的和軍事的，都忙得不可開交。他們在同狡猾、陰險的敵人進行艱巨的鬥爭，富有犧牲精神地日夜工作，犧牲了個人的生活和其他一切，就如最困難的攻勢時的游擊隊員一樣。

但是，他們的準繩始終都公正嗎？他們不犯我一九四一年在克拉古耶瓦茨支隊裏對那個人所犯的那種錯誤嗎？一九四九年春天，我們的保安機關取得了巨大成就，徹底清除了蘇聯在我國的整個代理機構，在此以後，這個問題更是折磨着我。這些成就是否冲昏了他們的頭腦？他們是否因此而獲得了巨大的權力？他們在作出逮捕人的決定時動機是否正確？以及最後，他們的鬥爭方法如何？能够用新斯大林主義的方法來反對斯大林主義嗎？

當我從南共中央幹部部得到有關拉萊·伊萬諾維奇的材料時，我第一次公開地提出了這個問題，他以前是南斯拉夫駐華盛頓大使館的參贊，一九四八年時表示贊同情報局的決議，成了最起勁地宣傳這項決議的人之一。材料說，伊萬諾維奇戰時就成了特務。我問道，我們以前，在他是駐美大使館參贊時是否知道這一點？還是現在，由於他表示贊同情報局決議，才知道這一點？

討論進行得不愉快。有人指責我是疑心重的知識分子，而那天上午，我又情緒不好，因此我就說，俄國人就使用這樣的方法；斯大林就曾宣稱所有老布爾什維克都是天生的間諜。我們的做法與這一點雖然還不是一碼事，但是，我們的方法與此相距也不遠了。

第二天，我又同一位比較負責的同志談了話，他對我說，要我不要干擾國家保安處，說國家保安處不僅在同俄國人，而且在同西方特務機構，同烏斯塔希和切特尼克進行着生與死的鬥爭，說我們又處於高漲的革命之中，我們稍一放鬆，我們大家的人頭就會落地，國家就會淪亡。

然而，反斯大林的鬥爭的發展有它自己的要求，揭示了事情的另一面。我們唯一的支柱是羣衆，是人民，而這又要求加强民主化過程。一種比較人道的社會主義的萌芽已經出現，社會在肅清

我們這裏所積聚的斯大林主義的種種成份，不僅保安部門是這樣，一切生活領域都是如此。就這樣，我們在一九四八——一九五三年期間，允許兩個平行的過程同時進行，既加强政權，又削弱它的絕對性。

我自己就親身體會到了這一點。南斯拉夫書籍出版社要我準備爲戰時的《日記》搞一個新版，但是三卷得併爲一卷。在第一版的一千三百一十二頁中，要删掉三百頁。我接受了這項工作，在準備文稿。但是，南斯拉夫書籍出版社裏有人向國家保安處告密，說我在《日記》裏提到許多已經成了情報局分子的人。內務部一位負責人通過專綫電話找到我，說我必須把所有情報局分子從《日記》中删掉。我開始同他討論起來了，我說這樣一來這本書就完了，說斯大林使用這樣的方法，說這是誤會，但是他連聽都不想聽：

「我最後一次對你說，你得把他們删掉。我們正在進行極其艱巨的鬥爭，而你倒替他們做廣告……對於賣國賊，就得叫賣國賊……」

「老兄，他們在游擊隊裏時不是賣國賊……」

事情甚至鬧到了鐵托那裏，我向鐵托重申了自己的論點。他同意我的意見，我在《日記》第二版的前言裏寫道：

「在編纂第二版時，我作了某些我認爲必要的不大的壓縮，可是考慮到每一個事件的歷史的確切性和每一個人物的作用，因此没有作重大改動。」

在《日記》的索引中，鐵托的名字提到二十七次，吉拉斯十八次，蘭科維奇十四次，茹約維奇十二次，卡德爾八次，科查·波波維奇和佩科·達普切維奇各八次，阿爾索·約萬諾維奇六次。

但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關於茹約維奇和情報局的其他擁護者的另外一些句子被删掉了。這使我感到震驚，尤其是我的一位同事還出了點事。國家保安處送來報告說他是外國代理人。我跳了起來，全力維護他，勉强才算成功。我說，我願用腦袋來爲他担保。

隨着反情報局的鬥爭進展日益順利，我就愈來愈懷疑難道所有被捕的共產黨員——他們的人數已達數千人——都有罪，還是他們中間也有無辜的、迷了路的人。

我曾經向一家出版社推薦我童年時代的伙伴德拉戈什·斯特萬諾維奇，讓他寫旅遊指南，而他却從貝爾格萊德失蹤了。一九五一年秋天，我收到了他的一封奇怪的信，郵戳爲科帕奥尼克山下的魯德尼卡：

「弗拉多，

我聽說，你在生我的氣。你說，我丢了你的臉。是的。可是我在那家出版社再也呆不下去了。我到那裏去是搞寫作的，而不是當官僚，當小官吏。我不是去受那老娘、皺脖子老鵲的氣的。我是運動員。我是人，堂堂正正的人。而那裏要求我成爲沒有骨氣的人，馬屁精。

這，我辦不到。我也不想辦到。因此，我就離職了，我鑽進了森林。我現在遠離那些畜生……我拯救了自己。你再救救那些還留在那裏的人吧。

致以問候，

你以前的同志，現在的

流浪漢、漁夫德拉戈什。」

當時，我好不容易拯救了德拉戈什。聽到有些人說，他可疑，因爲他逃離崗位，是個逃兵。他的兄弟德拉什科在戰爭中像個共産黨員那樣英勇地犧牲了。德拉戈什在戰前從巴黎給我們帶來整箱整箱的秘密材料。我對他的了解，就像對我的眼珠一樣。

他是按照他的方式來經受同情報局的整個這場衝突的。斯大林使他很不好受，他工作所在的企業的那位女頭頭也使他很不好受。由於他是一個常常按本能行事的人，他就以他特有的方式作出反應。他在遠離城市的森林裏整整住了四個月，只同間或遇到的木筏工人或者牧羊女就伴。他的主要的伙伴是動物。當我最後總算把他找到時，他的頭幾句話是：

「動物比人好……你看看它們是如何相互幫助的。它們中間不只是存在生存競爭，它們還講道德……」

「你發現了美洲。這一點克魯泡特金早在八十年之前，比你還早就發現了……你這個傻瓜，現在過來吧，讓我們擁抱……」

德拉戈什的這番經歷有其更深刻的意義。我們往往忘記，在人類社會中價值最高的是人。而在一九四八——一九五三年間的反斯大林的鬥爭時期，有兩個過程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是人道化，而另一方面是某些結構，特別是行政當局的某些部門在增强。高里島的集中營是這種矛盾的一個最好的證明。正是那些戰後在蘇聯學習的我們的偵查人員，在我們這裏建立了這個集中營的那種嚴厲的制度，建立了斯大林主義的西伯利亞集中營的這個小樣板。

我當時不知道那裏發生了一些什麼事。但是這並不能使如此積極地參加了反對斯大林及其制度的鬥爭的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解脫道義上的責任。

斯大林、毛澤東和我們的足球運動員

斯大林早在一九四八年就曾下令，首先中斷兩國間的體育方面的往來，但是事有湊巧，違反他的意願的是，一九五二年七月在奧林匹克運動會範圍內蘇南兩國足球隊在芬蘭坦佩雷市進行比賽。在正常的政治形勢下，這是一次司空見慣的足球賽，但是鑒於蘇南兩國之間的衝突正好在那時處於高潮，二十二名青年人爭奪一隻球的這場體育比賽，在南斯拉夫就爲最廣泛的公衆所注目，甚至爲認爲足球是真該詛咒，只會使人變愚蠢的球藝兒的那些人所注目。

蘇聯對於這次足球比賽是如何反應的，除了後來得到的簡短消息外，没有確切的材料。而這次比賽的戲劇性的結局使得南斯拉夫的熱度更爲上升。

比賽開始時，對南斯拉夫人有利，米蒂奇在第二十七分鐘時踢進了第一個球，奧格尼亞諾夫在第三十五分鐘時踢進了第二個球，而澤貝茨在第四十四分鐘時踢進了第三個球。

下半場，南斯拉夫人繼續進攻，米蒂奇在第二分鐘時就把比分提高到四比〇。俄國人在第五十九分鐘時通過鮑勃羅夫把比分降爲四比一，而博貝克在終場前十五分鐘時又提高到五比一。

總之，看起來南斯拉夫獲得了大勝。但是時運變了。在最後十五分鐘，俄國人從四次角球踢進

了四隻球，把比分拉平了，差一點還贏了，因爲他們在最後一分鐘錯過了一個好機會。

這次比賽是通過電台轉播的，在貝爾格萊德和其他城市的人說，幾乎全國都呆在收音機旁。七月的那個星期天我在紐約，帶着寫完的鐵托傳的手稿去找我的出版商，但是當我回到貝爾格萊德，大家就向我敍述了，當俄國人在臨終場時開始一次接一次得分時，可以名副其實地說全國都在哀傷。我從一位鄭重的人士處獲悉，我們的一位電台台長張惶失措到這種地步，以致他通過電話，對我們在坦佩雷的廣播員說：

「你就嚷，說俄國人踢得野蠻，犯規，裁判偏袒他們，不然人們不明白，我們怎麼會輸的……」

在短時間休息後，比賽又兩次延長時間，每次十五分鐘，但是兩個隊都精疲力竭了，都沒有踢進球，最後以五比五（三比〇）結束。

兩天以後，七月二十二日，星期二，重新進行比賽，仍在芬蘭坦佩雷市舉行。這一回，我們的運動員比較鎮定了。儘管俄國人先進了一球，我們隨即拉平了，上半場以二比一領先。接着踢進了第三個球，是俄國後衛自己踢進的。這一次，俄國人最後沒有來一個衝刺，他們被從奧林匹克足球循環賽中淘汰了。

這次足球賽踢贏蘇聯之後，貝爾格萊德、薩格勒布、斯普利特和其他比較大的地方都舉行了慶祝活動。據七月二十三日的《政治報》寫道，南斯拉夫海軍的一些官兵向在芬蘭的南斯拉夫足球代表隊拍去了如下一封電報：

「我們所有艦隻的汽笛都拉響了，祝賀你們的勝利。這一勝利是社會主義南斯拉夫的代表的一次意義重大的成就。謹祝你們取得許多成就。」

《政治報》記者從烏日策附近正在興建一座新的煉銅廠的塞沃伊納報道，三千名工人保證，爲了這次勝利，他們將作出更大的努力，提前建成工廠。

《政治報》貝爾格萊德的記者們記下了貝爾格萊德歡慶的人們在特拉齊亞唱的歌：

「鐵托和黨，
我們的勝利，
拉伊科—博貝克。」

第二首歌是：

「鐵托和中央，
鐵托的人更强大：
我們的人勝過
斯大林分子！」

第三首是：

「我們的足球隊員，
名副其實的轟擊手，
我們的人勝過
情報局分子。」

我收到南斯拉夫國家足球代表隊領隊亞歷山大·蒂爾納尼奇發自芬蘭的一張明信片，内容如下：

「親愛的弗拉多，

這是我最幸福的一天，

在我們取得了最偉大、最美好的勝利之後，向你致以衷心的問候。

蒂爾克。」

後來，我見到了蒂爾納尼奇，他對我說，在我們贏了之後，在坦佩雷的球場上發生了不可思議的事情。蘇聯運動員不肯向觀衆和我們的運動員致意。南斯拉夫球隊隊長霍爾瓦特走向蘇聯球隊隊長，向他伸出手去，而後者竟然扭轉腦袋不理。芬蘭觀衆爲南斯拉夫運動員叫好，在南斯拉夫運動員離開球場時擁抱了他們。

歐洲的許多報紙對這次比賽廣泛地發表了評論。許多報紙對於蘇聯運動員輸球後不願打招呼一事表示指責。甚至連（意大利）《團結報》也爲霍爾瓦特向蘇聯球隊隊長伸出手去這一姿態所激動，寫下了下面這麼一句評論：

「體育使各國人民接近和和解……」

而我們的一些同志則認爲，這番話後面有情報局的陰謀。《戰鬥報》甚至發表評論說，《團結報》發表這一消息是爲了使西方覺得，我們將同俄國人和解。我不相信這一點，在《戰鬥報》編輯部會議上我談了自己的看法。

米羅·拉多伊契奇七月二十五日在《政治報》上寫了一篇十分親切的社論。他沒有譴責蘇聯的運動員，而是譴責了斯大林、他的絕對性、他的想控制所有的人，甚至想控制生活中的細微末節，一切都必須屈從於同一個目標的這種願望。誰都不指責蘇聯的運動員，爲了自己國家的聲望而渴求

勝利，但是，他們不懂得在輸掉時也要堂堂正正地表現出運動家的風度。

我在游擊隊員俱樂部的網球場上遇到米羅正同我們的朋友戈伊科·波特科利尼亞克在打網球，在那裏，我們一致認爲，在這方面，我們自己也同俄國人的水平差不多，我們也輸不起，我國人民有一句很好的諺語：「輸家生氣」。

法國有幾家報紙發表了一則不可思議的消息，說在坦佩雷失利之後，斯大林下令解散蘇聯足球代表隊。運動員被送到內地的一些小俱樂部裏去。這些可憐蟲。總算還好，本來是有可能被弄到西伯利亞去的。

南斯拉夫和蘇聯在坦佩雷的這次足球比賽，必須寫進我們同情報局的衝突的歷史記載中去。不管你是否喜歡足球，事實是，這一體育事件比什麽都更使南斯拉夫激動。

看來，斯大林青年時代從來没有從事過體育運動。因此才這樣地對待可憐的蘇聯足球隊員。而毛澤東不是這樣的人，至少南斯拉夫的經驗表明他不是這樣的人。一九五六年二月五日，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隊在北京同中國首都北京代表隊舉行比賽，在四萬名觀衆面前，我們以三比一踢贏了，也就是說，同一九五二年同蘇聯踢時一樣，又是三比一。只是中國對南斯拉夫的勝利的反應是另一副樣子。

二月六日，毛澤東親自接見了我們的足球隊員，甚至向他們發表了一篇很好的講話。我在一個檔案館裏找到了這次接見的一份偶然到手的記録。記録上說，毛澤東在一個大廳裏接見了運動員和代表隊領導人，一起照了相。接着，大家走進一個較小的會議廳，在一張長桌子旁坐下。在大廳裏照相時，以及在小會議廳的長桌子旁，都寫有每一個運動員和代表隊領導人應坐的地方。

南斯拉夫代表隊負責人布蘭科·佩希奇向毛澤東致意後，中國領袖講了話：

「我歡迎你們代表隊，並通過你們向你們美麗的國家致敬。你們代表隊贏了，我們將從失敗中學到東西。對於我們來說，這是一個經驗。我們將派一個隊去你們國家，請你們教他們，使中國隊也强起來，也能踢贏。」

同那幼稚無知的斯大林有多大的區別！毛澤東的話所反映的是一個有四千年不間斷文明的國度的名副其實的領導人。

《鐵托傳》問世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寫完了鐵托傳。這件工作整整花了三年時間。我邀請童年時代最要好的伙伴德拉戈什·斯特萬諾維奇來了一次經過巴諾沃布爾多和科舒特尼亞克的越野賽跑，以此來慶祝這一天。我發瘋似地快跑，我們穿過森林時，樹枝抽打着我的臉，一個小時後，我們到了我的家，喝了牛奶玉米粥。

德拉戈什談起了一九三〇年蒙得維的亞世界足球錦標賽上最優秀的球門員米洛萬·亞克希奇，他本是一個書商，是我們兩人的朋友，死於心肌梗塞。我同德拉戈什一樣認爲，亞克希奇真是個好人：「姆爾克①，你想想，亞克希奇當時不是黨員，而我一九四一年把我們《政治報》黨支部的全

① 德迪耶爾的外號，原意「褐色」、「黝黑」。——譯者

部檔案，以及我們的經費和另外一些東西全放在他那裏……貝爾格萊德解放後，我到他那條喬治·克雷蒙梭街，現在的洛拉·里巴爾街去，亞克希奇站在我面前，把所有的東西：檔案，還有黨的經費都交給了我……他冒着生命危險，照看了整整四個年頭，因爲蓋世太保常去他那裏搜查……這就叫做正直……」

這時斯拉維察·弗蘭進來了，她同我一起在搞鐵托傳，德拉戈什就嘲笑我剝削身邊的這麼些人而竟然不感到害臊。我笑着說，只要能辦到，我就剝削。我在紐約完成鐵托傳的英文版時，幫助我看清樣的有拉特科·普萊伊奇、帕亞·格雷戈維奇、雕刻家奥古斯丁契奇，特別是薩格勒布的戰前就同情我們的事業的盧約·瓦伊斯曼—戈拉寧。最後那位甚至給我寫了一首詩，嘲笑我對親近的同事的剝削。我在文件堆裏找到了這首詩，並唸了起來：

《超級書》

「弗拉多·德迪耶爾著書立說，
驅趕手下人幫忙效勞，
你抄我寫分工合作，
可憐的盧約忙得不可開交。

書寫得頂呱呱，可就是没完没了，
頓切克、拉特科、帕亞讀了又讀，

人人誇口說：『寫得既好又妙，
可就是把人整苦了』。」

在最後一行中，盧約・戈拉寧和其他幾位同事都垮了，他發出呼籲：

「弗拉多，噢，弗拉多，
何時你才算罷了！」

晚間，我同吉拉斯一起去鐵托那裏。我提出想法，認爲鐵托應該通過某種方式表示同此書無關，强調指出，只有將來才能對這些事件作出最終的判斷。鐵托立即表示同意，並請吉拉斯按這個意思起草一封信。之後，他又補充了一些更爲精確的提法。這封信稱：

「親愛的弗拉多同志，

我很愉快地看到了你收集整理在這本書中的我在戰前、戰時和近來就我的生活和政治工作同你進行的談話。

這種欣慰之感之所以產生，是由於通過這一方式，通過你這本書，我又重新回想起了我的一生。據書上講，我的一生不是輕輕鬆鬆的一生，但是我却是高高興興地度過了這一生，總的來說，即便現在，我也不會選擇別的生活之路。

應當指出，不僅這些談話被忠實地記載下來了，而且事實也是確切地敘述的。

但是，我認爲，你也是會同意這樣一點的，就是不能把你的書對某些事件的闡述看成是最後不可更改的，簡單的理由是，只有將來才能作出最終的判斷。

致以同志般的問候！

約・布・鐵托」

後來，我又提出了一個想法，認爲鐵托應該寫回憶録，只是事先應當整理好各種文件。他攤開雙手說：

「事情忙得不可開交，我怎麼能寫？」

隨後，他向我招手，我們坐到另一張桌子旁，他拿出棋盤：

「我看到，你爲（鐵托傳）美國版寫道，我棋下得很蹩脚，致使你這個自稱爲一竅不通的門外漢最近一次以六比二贏了我！」

「老大，你要小心點，你知道不知道，今年夏天，在哈斯丁高原，我還贏了象棋大師米拉・拉多伊契奇？」

鐵托同志和我的這一盤棋下成了平局。他並不感到滿意。

《鐵托傳》出書之前，先在世界上許多報刊上作爲連載文章登出來了。就這件事，我同馬爾科・里斯蒂奇進行了發人興味的討論。他認爲，應當在左派報紙和進步報紙上發表這些連載文章，而我的目標則是發行量最大的一些嚴肅的報刊，不論它們的政治傾向如何。因此，我挑選了巴黎的《費加羅報》、倫敦的《星期日泰晤士報》、布魯塞爾的《晚報》以及美國的《生活》雜誌。

這樣一來，書的內容就爲最廣泛的羣衆所知曉。西方的進步報刊發行量小，這不能怪我。所有這些國家的右派掀起了一場運動，來反對鐵托傳的片段。在美國，《生活》雜誌收到了大批抗議

信，特別是希特勒垮台後躲到美國去的歐洲法西斯分子的抗議信。而在我看來，主要的是，通過《生活》雜誌及其五百五十萬份發行量，讓美國羣衆了解關於南斯拉夫，關於鐵托的真相。在法國，彼得國王也捲進討論中去了。他給《費加羅報》寫了一篇續篇。我沒有作答。貝爾格萊德的社會民主黨人，戰時德拉扎·米哈伊洛維奇的親密合作者日夫科·托帕洛維奇也出面了。

這本書在報刊上經過這番連載後，總共用三十六種文字，出了三十八版。

莫斯科對這本書的問世的反應是激烈的。情報局主要機關刊物《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以《貝爾格萊德劊子手的傳記》爲題刊登了一篇述評文章，文章說我是間諜、殺人犯和匪徒。在我們看來，這是一個證明，表明這本書有助於衝破蘇聯想使我們陷入的孤立處境。莫斯科在世界各地擁有龐大的宣傳機器，擁有强大的共產黨，而這一切，我們一無所有，我們也沒有錢來採取這樣一個行動。我們主要是靠腦袋設法在這廣闊的世界安身的。不過，就是在這一點上也有困難。我們駐波恩的大使給我打了一封電報：「我找到了一位進步的出版商，他願出五千馬克來出版鐵托的傳記」。我回答他說：「我找到了德國最大的出版商烏爾施泰因，他將付給我們二萬五千馬克。」

這本書在財務上的總的效果是巨大的。例如，《生活》雜誌對於它發表的連載文章的每一個字所付的稿費僅次於它發表艾森豪威爾、邱吉爾和英國前國王愛德華八世的回憶錄時付給他們的稿費。我們本可以使這些加冕的和未加冕的首腦大爲遜色，但是鐵托同志不同意我抬高手稿的要價。在這場爭取盡可能高的稿費的鬥爭中，我在世界上的代理人約翰·菲利普斯幹得很出色，他是一位記者，戰時，在一九四四年，他從意大利來到游擊隊，拍攝了斯洛文尼亞游擊隊員直接襲擊德意之間的鐵路的鏡頭。

產生了這麼一大筆錢如何處置的問題。當時總共有一億五千多萬第納爾，按當時的滙率，等於五十多萬美元。吉拉斯主張我把全部錢都交給黨，而我則想用來紀念已故的奧爾加。她曾是黑山第二師外科隊的隊長。而在黑山，醫院很缺少，尤其是在尼克希奇地區周圍。

最後的決定是鐵托同志作出的。他認爲，應當滿足我的願望，而吉拉斯却嘲笑我，說我是小市民。我立即把我當時收到的全部款項，大約一億五千萬第納爾，寄給了黑山人。黑山的《勝利報》上登了一則公告，說弗拉迪米爾·德迪耶爾送來了第一筆錢有多少多少，供興建醫院之用。但是，錢陸續還寄來，因此我決定幫助別的地區。我同我的韋拉曾去過斯洛文尼亞，我聽說，斯洛文尼亞政府拒絕給波斯托伊納的劇院以進一步的補貼。這刺痛了我的心。在意大利的統治下，斯洛文尼亞人足足有四分之一的世紀不能使用自己的語言，而現在克拉尼人不給他們的劇院援助，斯洛文尼亞的語言正是在劇院裏培植的。因此，我對韋拉說，我要把今後幾周送來的鐵托傳記的稿費寄給波斯托伊納的劇院。

韋拉的臉泛着紅光，十分興奮。而在臨走前，我偶而聽到她在另一間房裏同我的母親米利察的一番談話，我母親在說服韋拉，給家裏留點錢：

「你看看，你們家裏連冰箱都没有，你看看孩子穿着什麼樣的褲子，弗拉多本可以把這得來不易的幾百萬留給孩子，留給你。你看，他有病，上帝保佑，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到時候你一個人帶着五個幼小的孩子……我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我自己就是帶着三個孩子的寡婦……」

韋拉把這一切都加以駁斥：

「我們是這樣的人，我們什麽都不需要。你看看，老百姓過得怎麽樣……你再看看斯拉維察。她一天幹二十個小時，在這本書快寫完時，她真的一天幹二十個小時，而當弗拉多想給她部份稿費，感謝她日日夜夜打字、登記所收到的材料，感謝她除了日常工作外所做的整個這部份工作時，她生了氣，她對弗拉多說，今後寫任何書，她再也不幫忙了，因爲這番表示使她受了侮辱……」

波斯托伊納的演員們的回答是熱情的。他們給我寄來了一封信、用皮革裝幀的他們所有的節目的演出單以及波斯托伊納的奇麗的鐘乳石。後來，當他們的劇院終於解散時以及我和我的家庭處於極大的困難之中時，他們也没有忘記我。

在我的兒子布蘭科一九五九年十月自殺以後，我在拉什科治病。只有韋拉和我兩人，我們抑鬱不歡。整夜整夜地，我們傾聽拉什科附近和拉什科鎮上教堂的鐘聲。韋拉説，她羨慕那些認爲人死後可以見到自己已死的孩子的母親們。一天早晨，我們收到當年的波斯托伊納劇院的兩名演員的一封簡短而熱情的信。他們聽説了我們的不幸。我們兩人痛哭了一場，我們感激他們幫助我們不喪失對人們的信心。

對於那得來不易的千百萬第納爾，我從尼克希奇一直没有得到什麽音訊。不通知我，我倒是可以諒解。但是已故奥爾加的父母却是等了又等，後來去世了，他們没有等到有人告訴他們以他們的女兒命名的醫院是否建成。

我爲此而傷心極了。幾年前，我對米奥德拉格·布拉托維奇説：

「你看斯洛文尼亞人和黑山人之間的差別有多大。對於前者來說，第納爾不論多少都是血汗換來的。因此波斯托伊納的那些演員没有把我們忘却，而對於你們黑山人來說，第納爾不過是補貼而已。你們從彼得大帝時起就學會了這一套……」

布拉托維奇憤憤不平地說：

「你對我們黑山人的態度不客觀，你得理解人們。他們在等待你寄去第二筆錢，那時就會告訴你，他們用第一筆錢幹了些什麼……」

南共第六次代表大會

同斯大林的鬥爭進行得愈久，雙方就都陷入了愈來愈激憤的狀况之中，純粹是動感情了。當時有一種宗教改革運動時期的宗教衝突的氣氛。隨着時間的流逝，南斯拉夫人儘管被莫斯科革出了教門，而竟然依舊活着，這就使得南斯拉夫的安全感上升了。這反映在每一次全會上，每一次代表大會上，反映在同老百姓的談話中。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日至七日，在薩格勒布舉行了南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會上總結了一九四八年以來同斯大林作鬥爭的經驗，批判了作爲制度的斯大林主義。這次代表大會作出的新行動特別在於把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名稱改爲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也就是說宣告了這樣一項原則：共產黨不再能充當日常工作的直接領導者，國家不能同黨等同起來，行政命令的領導方法必須讓位於思想

鬥爭和政治鬥爭的方法。這項決定是在工人自治被認爲是發揚社會主義直接民主的轉折性步驟的情況下作出的。

代表南斯拉夫人民軍向代表大會表示祝賀的科查・波波維奇强調指出，近四年來同斯大林的鬥爭粉碎了革命蛻化的危險性，也即爲社會主義生產力和社會主義社會關係的自由發展創造了條件。他說，「我認爲，這一事實是值得加以强調指出的，如果考慮到蘇聯和所謂人民民主國家的人民羣衆當今的悲慘命運，那就尤其如此了。」

他最後談到軍隊在保衛國家方面的作用。

「這裏講的是過去的四年，在這四年期間，『蘇聯』對南斯拉夫的侵略政策徹底失敗了。但是我們不抱任何幻想，不認爲危險已經過去。我們知道，我們在同誰打交道。潛在的侵略的危險依然存在。因此我們仍將不倦地加强我們的軍隊。」

米卡・特里帕洛談到了青年在戰時參加作戰的意義和現在參加抵制情報局的意義，他着重談到青年用自己的雙手建成了一系列工程、鐵路、貝爾格萊德到薩格勒布的兄弟情誼和團結公路。他宣讀了在一個這樣的工程上所建的紀念匾上的一段文字：「我們的祖國，我們的黨！我們把自己的部份青春獻給了勞動人民美好的明天。必要的話，我們將獻出全部青春，以捍衛我們在黨和鐵托的領導下迄今同全體人民肩並肩地所做的一切……願那新工廠中轟鳴的車床、沿着鐵軌行駛的火車、給遥遠的村落帶去光明的電流不斷地重申：『建設了這一切的年輕的雙手懂得以强大百倍的活力來捍衛這一切』」。

代表大會的第二天，鐵托作了政治報告。在報告的第一部份中，他談到了當今世界上一些基本

衝突的根源，特別譴責了邱吉爾、斯大林和羅斯福在大戰結束時達成的劃分利益範圍的協議。他說，西方大國的代表「按照自己老的、司空見慣的解決世界問題的帝國主義方式」行事，是不足爲怪的，但是對於一切「認爲蘇聯是無私的，相信蘇聯是小國人民的保護者這種說法的人來說，這不啻是第一次道義上的打擊，對蘇聯、對蘇聯政策的正確性第一次產生强烈的懷疑感。」

鐵托同志在報告中說：「蘇聯早在戰前、戰爭期間，特別是自德黑蘭會議以來，就不僅放棄了保衛小國主權的政策，而且放棄了尊重小國主權、尊重小國人民意願的政策。蘇聯爲什麼這麼幹？它這麼幹是因爲它出賣了社會主義原則，走上了老的沙皇俄國的道路、大俄羅斯國家利益的道路、實現這些利益的帝國主義方法的道路，並竭力用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利益來掩飾這一點！」

鐵托在接着的講話中談到蘇南之間的衝突的由來：

「蘇聯奉行這樣的非社會主義的對外政策的原因何在？原因在於蘇聯的現實，在於這個國家的整個內部結構——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蘇聯在內部發展中早就背離了社會主義的發展而走上了建有迄今鬧所未聞的官僚制度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官僚主義在蘇聯成了目標本身。它愈來愈變成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剥削者勢力，這股勢力不僅阻礙革命和革命思想的任何進一步發展，而且逐步消滅十月革命的成果，愈來愈具有反革命的性質。」

鐵托特別譴責了蘇聯的「主導民族」論，這種論調「對外就變成了蘇聯在世界上的主導作用論」。「蘇聯的主導民族，也即俄羅斯民族的實踐，導致了對非俄羅斯民族來說是駭人聽聞的後果。它們中的某些民族，曾幾何時，也即在受沙皇將軍們的奴役之前，不僅從人種上來說是密集的，而且作爲國家是獨立的，現在已經被從地球上完全抹掉了，而且是以最殘忍的方式被抹掉的，連希

特勒也會對此表示嫉妒的。在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裏，主導民族論反映了主導民族對該國其他民族事實上的民族壓迫和經濟上的掠奪。當然，非俄羅斯民族過去一直抵制這樣的理論和實踐，今天仍在抵制。某些人數比較少的民族因此而被完全遷移到西伯利亞的原始森林裏或者被消滅，例如：伏爾加流域的日耳曼族共和國，克里米亞的韃靼共和國、卡爾梅克人、車臣人、北奧塞梯共和國、唐努—圖瓦共和國；還有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拉脫維亞三國人民，他們在一九三九年蘇聯入侵時喪失了獨立，今天，他們被數以萬計地送往西伯利亞，通過這種方式使他們作爲一個民族不再存在，而不僅僅作爲國家不再存在。」

關於消滅老布爾什維克，鐵托說：

「世界上今天很少有人知道，很早以前，也即自一九三五年以來，這些國家人民的兒女，居領導崗位的共產黨人就曾堅決抵制莫斯科主要頭目的這樣一種帝國主義政策。今天，人們在某種程度上知道，以書記波斯季謝夫爲首的烏克蘭共產黨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們因此而遭到了什麼樣的命運；他和中央委員科西奧爾、丘巴爾、斯克里普尼克、波波夫以及其他許多人由於所謂的民族主義傾向而被逮捕並被殺害，因爲他們抵制了莫斯科帝國主義。蘇聯其他一些共和國的一些居領導崗位的共產黨人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例如白俄羅斯共產黨，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間，在四百二十一名被開除出黨的人中，有三百六十一名中高級領導人被幹掉了。

斯大林及其一伙使用這種殘酷的方法，把人幹掉，首先是把較小的一些民族共和國裏的領導人幹掉，以使這些人民屈從於莫斯科的霸權。斯大林逐步地把所有有功的老布爾什維克都幹掉了，不僅是指地位而言，而且也是指從肉體上幹掉。」

鐵托接着談到南斯拉夫和國際合作，談到同世界上進步的國際運動的關係，隨後談到經濟和人民政權機關權力下放和管理民主化的問題，談到南斯拉夫的經濟發展，蘇聯及其衛星國實行經濟封鎖的後果，談到增加國防開支，各種經濟問題，最後談到南共自第五次黨代表大會到一九五二年的工作和發展。他在報告中對於南共爲什麼要改名爲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作了解釋。

鮑里斯·基德里奇在一九五三年初去世之前，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發表了他最後一次講話。他談到南斯拉夫新的經濟制度的各項原則：

一、工廠和企業由直接生產者自行管理。

二、新經濟制度應當建立在客觀經濟規律的基礎之上，應當盡可能避免採用行政命令方式遏制這些規律。

三、社會對客觀經濟規律的控制應當堅決地在最廣泛的範圍內進行，在我們當代的計劃工作術語中，我們把它叫做社會計劃的基本比例，社會計劃確保社會生產不致於出現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同時又爲國家的經濟的發展指明了總的方向。在基本比例的範圍內，要最大限度地發揮直接生產者和公社的主動性。

四、社會真正佔有勞動和對剩餘勞動實行社會主義的管理。

最老的革命家之一，的里雅斯特的斯洛文尼亞人伊萬·雷根特的發言受到熱烈歡迎，他談到是什麼原因使得南共有勇氣來頂住莫斯科的政策。

愛德華·卡德爾談到同東西方的國際關係，强調指出，蘇聯的侵略政策是造成世界當前緊張局勢的主要原因，他也談到關於把南共變成共產主義者聯盟的建議：

「我認爲，鐵托同志提出的建議明確地指明了我國的這樣的一種事態發展，也即建議恰好包含着南斯拉夫社會主義發展中的最重要的和新的東西，這就是：同官僚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進行最後的較量，確認社會主義民主爲工人階級以及全體勞動人民唯一可能的實際權力。」

關於南共綱領，密洛凡·吉拉斯發了言，他特別談到一九四八年第五次代表大會的綱領，這個綱領充滿了幻想：

「至於說到我以及其他許多共產黨人，我一點也沒有看清、沒有預感到蘇聯的實際情況，一直到一九四七年年底和一九四八年年初……真誠坦率地說，以革命者的身份說，即便是幼稚可笑，也始終覺得是正確的……沒有必要爲我們的革命的幻想感到羞愧……也沒有必要爲我們一九四八年的綱領感到羞愧。這樣一個綱領對我們來說仍然是親切的，雖說是錯誤的，充滿了幻想……」

米哈·馬林科作了一番熱情的發言。他還批評了我們新經濟制度中的官僚主義傾向，譴責了回到通過行政命令方式指揮經濟活動的任何做法。弗拉伊科·貝戈維奇談到了南斯拉夫的理論工作。弗拉迪米爾·巴卡里奇和米亞爾科·托多羅維奇陳述了自己對農村和農民勞動合作社的工作問題的看法，而亞歷山大·蘭科維奇則就共產主義者聯盟新章程發了言。

代表大會正好在十二月①七日十月革命節那天閉幕。那天密洛凡·吉拉斯發表了自己一生中最精彩的一次講話，他說，南斯拉夫革命撿起了斯大林扔在泥淖中的十月革命的旗幟。

第六次代表大會有一派戰鬥氣氛。這裏有一種扎波羅熱的哥薩克給蘇丹寫信時的氣氛，每一個

① 原文如此，應爲「十一月」。——譯者

人都脅迫執筆的人要把他對博斯普魯斯海峽那邊的帝王的謾駡都寫上去。

在這樣的氣氛中，事情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是不足爲奇的。羅馬教皇和柳博德拉格·久里奇不公道地遭了殃。前者由於宣佈任命薩格勒布的斯特皮納茨主教爲紅衣主教，我們就決定在聖誕節這個和平和仁愛的節日的前夕同梵蒂岡中斷外交關係。而不幸的柳博德拉格·久里奇，這位拯救了蘇捷斯卡戰役的光榮的無產者第二旅旅長感到苦惱的是，某些有地位的人待他本人不好。他喝足了酒，鼓起了勇氣，走上代表大會的講台來發泄他自己的怨恨。這位不走運的人被趕下了台，被宣佈爲叛徒，說他是按照敵人的命令這麽幹的，後來證明，他忍受不了由於確實使他蒙受的委屈而感到的痛楚。

斯大林之死

一九五三年三月四日傳來消息說，斯大林正瀕於死亡。這個消息在南斯拉夫使人——如果我說絕大部份南斯拉夫人，我想我是錯不了的——產生了希望，覺得這可能使蘇南之間的關係朝好的方面發生變化。

後來，我們看了莫斯科的正式公報。吉多說：「寫得這樣詳細，好像是從醫科大學的教科書裏抽出來的。我覺得事情有點可疑。」

午間，維爾科·弗拉霍維奇、維爾科·米丘諾維奇和我在吉多處進午餐。我們吃了土豆玉米麵粥和酸牛奶。

我說，「這是爲斯大林追祭亡魂！」

我們談論着斯大林，談論在各個時期對我們來說，他意味着什麽。吉多說：

「他仗打得還不壞。」

我們談到戰前時期。我說：

「我們有什麽好悲傷的？」

吉多說：

「對我們南斯拉夫革命者來說，他的名字是同許多艱難鬥爭的時期聯系在一起的。對我們來說，他就是這種鬥爭的象徵。不過，每一場革命也都有幻想。」

後來，維爾科·弗拉霍維奇補充說：

「現在可以看到，我們揭露了他，我們在歷史上是立下了多大的功績。我們可以想一想，如果他没有同我們發生衝突，他的人格會完全是另一副樣子，又會要很多時間來恢復他的真面目。」

三月五日，星期四。

布蘭科·武契尼奇今天通知我晚上八點去科舒特尼亞克車站。

我到時，見到了貝夫茨、吉多、馬爾科、戈什尼亞克和另外十來位同志：泰波、弗拉多·西米奇、切恰、維爾科·米丘諾維奇、科查、貝勃勒。老大當時要去英國。他喜氣盈溢。我抽空子對他說，要他明天看一看將通過《圖畫郵報》發表的告英國人民書。火車啓動了，老大開玩笑說：

「你們給我照看好南斯拉夫……」

之後我們討論了老大這次英國之行的意義。這次訪問進行得正是時候，這不僅是由於俄國發生

了同斯大林得病有關的事件，而且由於我們是口袋裏裝着巴爾幹條約去倫敦的。這個條約是不壞的，不僅可對付東方可能的侵略，而且也可節制西方的意大利的野心。

吉多說，我的書在斯大林死之前問世是再好也没有了。這樣，我們在他生前就當着他的面擺出了真相。

貝夫茨又補充說：

「此外，情况還將表明，我們對他的行動的批評是正確的。」

我半夜過後回到家裏，剛睡着，南通社就打來電話，告訴我斯大林死了。

一九五三年三月七日，星期六。

兩位維爾科和我又在吉多處進午餐。今天上午我們開了一個短會，研究了蘇聯新領導的名單。吉多說，這是件有歷史性意義的事情：

第一，實質上，這是一次反斯大林主義政變。他的屍體未凉，現在就在改變最近一次黨代表大會的決定，無論是在黨的章程方面，還是在人員組成上，都是如此。這是具有巨大意義的事情。

我說，我對蘇聯報紙對列寧的逝世和斯大林的逝世的報道作了比較。對斯大林所表示的敬意遠不及對列寧。

吉多說，挑選馬林科夫是出乎意料的。吉多本來以爲莫洛托夫會被選上。他後來笑着說：

「要是馬林科夫步斯大林的後塵，怎麼來給他貼上『偉大的馬林科夫』的標簽呢？因爲馬林科夫在俄語中的意思是『小人物』。」

《展望》雜誌要我就斯大林之死寫一篇文章，一千字給三千美元。我拒絕了。我們不是里加，

我們不靠反蘇宣傳過日子，我們不向美國老爺提供材料。

三月二十日，星期五的一段日記是饒有興味的：

「吉多今晚設晚宴招待剛從印度回國的維爾凡夫婦。泰波和馬爾科也在場。我們討論起蘇聯的事情，有人提到，最壞的情況是軍隊控制政局，那就會意味着奉行軍事侵略的方針。

那時，我拿了一隻空烟盒，把盒底撕下來，拿出自來水筆，寫上了這麼一個瀆神的想法：

『聲明

我們還要對這個斯大林表示哀悼……

並將在蘇聯建立秘密的斯大林小組……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日

弗拉迪米爾·德迪耶爾』

我大聲宣讀了我的鄭重聲明。蘭科維奇拿走了我的條子，在上面寫道：

『我拿走這張紙條』，接着他笑了起來，說還是還給我。

我在上面又寫上『同意。弗·德·』，當天夜間，我把紙條貼在我的日記上，作爲第一張插頁。

這是斯大林死後第一次提到，蘇聯有可能由比他更壞的人上台掌權。

斯大林這一仗打輸了，不是在他去世的那一天輸掉的，對於我們中間的許多人說來，早得多，他就輸掉了。還在一九四九年秋，我就堅定地得出結論：上帝已經消失，對我來說，再也沒有上帝了。

『正直的傻瓜們』，至少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覺醒了。斯大林不僅在人們的心目中輸掉了這一仗。他在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三年間對南斯拉夫的不成功的攻擊還向全世界表明：

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社會充滿了矛盾，這不是指從十月革命所消滅的那個社會繼承下來的矛盾，而是指新的社會主義結構所產生的矛盾。

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產生霸權主義，也可能壓制其他國家，壓制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甚至是通過侵略來這麼做。

用『個人迷信』這個說法是解釋不清斯大林主義這個現象的。斯大林一九五三年死去了，而斯大林主義却存留下來了。誠然，有一段時間斯大林主義藏匿起來了，但是一九六八年仲夏清楚不過地表明，它仍然活着，仍然是危險的。

道德觀念是抽象的，還是有階級性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中積聚起來的種種問題的解決使人認識到，道德觀念是普遍的，不能把孩子同髒水一起倒掉，革命的階級只能從業已消逝的時代吸取精華，把它提到更高的水平，並以進步的名義這麼做。

社會主義的目標決不能是單純的工業化，而應是把人們的品德提到更高的水平。這是南斯拉夫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三年間同斯大林的鬥爭的一大經驗。我在《約瑟夫·布羅茲·鐵托傳略》這本書的末尾，對鐵托對社會主義的看法作了如下扼要的叙述：

『簡言之，這就是南斯拉夫人對於國內外的一些主要問題的態度。這就是一國人民的態度，他們決心走自己的道路來建設一個沒有人剥削人，個人完全擺脫國家的桎梏，個人充分享有經濟和政治的全部權利的社會，鐵托稱其爲社會主義。』」

的確，一九四八年，斯大林玷污了社會主義的旗幟，這面旗幟落地了，而我們把它舉了起來。但是，我們也不對社會主義享有壟斷權，南斯拉夫的道路也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我們的革命有它的特點，誠如二十世紀的任何革命都有自已的特點一樣，正因爲如此，南斯拉夫的革命不能充當世界其他人的樣板，只能是一個說明革命犧牲精神的例子，實現似乎辦不到的事情的例子，以及證明在覺醒了的羣衆面前是沒有推不倒的障礙的。

在我的無休無止的獨白中，在一處地方我記下了一個想法，在我關於人民解放鬥爭中的道德觀念，自發性和意識形態在革命中的關係以及這種道德觀念基礎的必要性的手稿中，這個想法宛如一盞明燈。請看我經過長時間思考是如何想的：

「我們這場革命只是由於善於同羣衆强大的自我首創精神所反映的全民的天賦才幹水乳交融，才得以成功。因此，南斯拉夫革命的偉大就在於它的民主性，而革命領袖的偉大恰好就在於，也只在於他們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不應同這種全民的天賦才幹相悖，不應爲了使戰爭只局限於自身的精神範圍內而阻礙革命的自我首創精神」。

我這麼說是因爲我意識到我是在提出一種說法，就目前而論，在我目前的認識水平上，這個說法最全面地道出了南斯拉夫革命的秘密。這場革命不再是在原則上、思想上接受領導的，而是事實上是民主的、直接的，它是强大的，並愈來愈强大。

在一場空前殘酷的戰爭的條件下，我們的革命在經受戰爭的種種可怖情況的同時，勢必採取廣泛的人民民主制的某些基本形式，提供了發揚自我首創精神的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例，不僅在南斯拉夫各個民族的範圍內是這樣，而且尤其是在地方自治機構裏是這樣。不過，後來的事態發展忽視了

這種精神，削弱並破壞了這種精神。

這樣一場具有形形色色的成份和不同組織形式的革命，勢必會提供成功的榜樣和失敗的範例，而說明英勇氣概的事實本身就是革命的最明顯不過的反映，同時又證明了革命動力的複雜性，繼之又證明了革命動力的簡單。

「我感到自豪的是，我走上了男子漢的道路，我流的血將產生自由」。這番話是黑山安德烈維察的一位農婦由於掩護游擊隊而被拉出去槍斃時說的。難道這番話只是反映了一種迫不得已的英勇氣概。不，決不是這樣。這番話還反映了一種說明廣泛的社會感情的態度。在宗法守舊、原始落後的環境中多少世紀以來一直受壓迫的這位黑山農家婦女的道番吶喊，豈不同時又是利他主義道德觀念這個歐洲文明最强有力的成份的深化，而且是這種文明的基本要素——追求平等的願望——的深化？

在我們這場革命中，每一天我都看到類似的願望。在一九四三年激烈的第四次攻勢期間，在冰天雪地的波斯尼亞山地印刷的《戰鬥報》上，有一條消息報道敵人的一名罪惡昭彰的軍官被打死，消息說，他的年方七歲的孩子被俘虜了。游擊隊報紙上的消息的標題是《孩子無罪》。

又如：在伊利亞·愛倫堡在《真理報》上以《打死德國人》爲題一篇接一篇地寫文章，而斯大林在伏爾加河上遷走了日耳曼族共和國的同時，南斯拉夫大部份游擊隊員中間却存在另一種意識：「只打死手執武器衝向你的人民的那種德國人，向想成爲真正的人的那種德國人伸出手去」。就這樣，同年在斯拉沃尼亞建立了以「卡爾·李卜克内西」命名的第一個德國人連隊。

請再看美好的利他主義的許多事例中的又一個事例：舊政權在鬥爭中垮台了，在它的基礎上建立了革命的新政權。但是，新政權從誕生的一開始起也傳染上了病菌：軍人這個革命的奴僕是否會

變成社會的主人呢？南斯拉夫革命也未能避開這一過程。它是從最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瑣事開始的，對於這些瑣事，你作爲一個革命者如果沒有警惕，如果不及時注意到，它就會像惡性病那樣，開始時是溫和無邪的，悄悄的，以後才猛然發作，以致毀滅强壯的機體。

而這些「小節」就在於，一個革命者是否由於自己所處的地位，由於自己以革命的名義行使的權利，而對周圍的事情，對伙食、傢具、馬匹享有的權利超過自己周圍那些一樣在作鬥爭的人。從革命的第一天起，考驗是嚴峻的，請看塞爾維亞的一位幾十年來確信共產主義的老農民提供了什麼樣的藥劑，以免於死亡。他一九四一年時是革命第一年塞爾維亞最享盛譽的瓦列沃支隊的指揮員。請看杜迪奇在日記中寫了些什麼：「夜間在野外吃晚飯。吃的是煮的食物。對此，我不可能說什麼，因爲我沒有吃上。在我們的支隊裏有一條原則，領導人享受權利在後，而履行職責在先，也就是說，剛相反。」

請讀者原諒，我又一次援引了杜迪奇日記中的這一段話，但是他在德國坦克在烏日策把他輾死之前在一九四一年提出的這個難題，我們在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三年間同斯大林的鬥爭中又感受到了。在許多方面，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三年間的戰鬥的深刻根源在於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間的革命和戰爭，至少在道義方面是這樣。同情報局的鬥爭，不只是喊一聲「烏拉」就完了，事情不都是按照直綫發展的，不都是黑白分明的，而是如同起義的初期一樣，又產生了社會主義的一些至關重要的問題。

在（蘇聯人）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間撤走以後，羣衆的首創精神大爲發揚，出現了自治制、集體參與制的最初的萌芽。光明的前景隱約可見，發生了一些社會變化，在這些變化中有兩個

完全背道而馳的過程，一方面是追求使社會主義人道化，追求調整個人和社會的關係，出現了擺脫壓力的恐懼的最初跡象，而另一方面却是加强執行機構，由於戰勝了蘇聯的特務機構而產生的某種程度的自我陶醉，某種程度的目空一切的情緒，我們早在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注意到了這種情緒的最初的一些跡象。

能不能不只是用斯大林主義的手段，也用別的手段來同斯大林主義作鬥爭？這個可怖的惡夢一直使我們大家感到苦惱。因爲不把斯大林奉爲上帝這個過程，在所有的人身上不是同時同等地進行的。

有些人確實是意志消沉，雖說他們並沒有表示支持情報局。揭露斯大林一事使得他們的心靈變得空虛，出現了某種真空，而他們是用「我們長不了了，讓我過過日子吧」這樣一種最低級的想法來塡補眞空的。

另一些人同情報局直接展開鬥爭，在他們身上又可以看到另一個過程，加强自身的力量和實力的過程，尤其是在斯大林的攻勢接連敗北的時候。當他們決定他們手中的人的命運的時候，他們是否始終都像革命者那樣行事？對於爲了金錢而被招募的特務和被整個衝突搞糊塗而在意識形態上迷惑了的人，他們是否正確地加以區分？同斯大林的衝突是可怕的，是不擇手段的，喪失的一分一秒都可能是生命攸關的，對於如何來反擊敵人，必須迅速作出決定，這一切都要求執行機構以及給執行機構發佈指示的人行動果斷，但是在這上面難道就沒有犯什麼主觀的錯誤，就沒有任意專斷嗎？難道上了情報局的當的那一萬名共產黨人果眞全都有罪嗎？我的這些文章發表後，我收到了不少信，寫信的人對這個鬥爭時期的一些不公正的做法鳴寃叫屈，有些人還提供了揑造的訴訟案的證據。

在這種事情面前，要做到安之若素，是不可能的。必須光明磊落，深入了解人們的痛楚，因爲只有這樣才能從時間上和空間上，從所參與過的歷史過程中首先認清自己，儘管有最美好的意願，人還是經常犯錯誤的。

知識分子必須懷疑一切，尤其是懷疑自己。在我國，最清楚地揭示這一偉大眞理的莫過於伊萬·倉卡爾了，因此他的作品是不朽的，直到今天還使形形色色的市儈們憤憤不平。

英國人所說的良心的自我反省是一門艱深的學問，但是又是使人向前進，使人通過障礙重重的旅途，走向未來的唯一良藥。

在這上面，一個人必須要有離經叛道的精神，才能不被小市民的泥淖所淹死。始終應該憑良心作出反應。我自己就曾經歷過許多這樣的考驗。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初，紐約的氣氛沉重——共和黨人選舉獲勝了。這是否也意味着令人生畏的麥卡錫參議員及其宗教裁判的勝利？在聯合國，有一位官員自殺了。羅斯福夫人不那麼客氣地被撤掉了，不再是本國駐聯合國第三委員會的代表。接替她的位置的美國代表查爾斯·斯普里格，我想，曾當過美國西部某個州的州長或者副州長。他參加了對蘇聯提出的《粉碎戰爭宣傳的措施》議案的討論。他在發言中把蘇聯同共產主義等同起來，他說，東歐國家「處在共產主義的桎梏之下」，說蘇聯在世界上擴散「共産主義宣傳」。

當時南共六大正在舉行。我起草了針對這個美國人的一次發言的提綱，就在那一小塊紙的上角

我寫道：「爲了慶祝南共六大，在這瘋狂的美國，讓人們聽到有人反對這種反共叫囂」。

我向他提了三個問題：

「尊貴的美利堅合衆國的代表談了自己的看法，但是我認爲，說東歐國家正處於共產主義的桎梏之下，這是完全錯了。在我們那個地區，我們不這麼看，依我們的見解，共產主義思想同蘇聯制度的霸權主義傾向毫無共同之處，共產主義思想不是支持蘇聯擴張主義的動力。

第二，不僅在我們那個地區，而且在世界其他許多地區，人們並不認爲共產主義是爲一個國家所壟斷的，而是像英國的托馬斯・莫爾、羅伯特・歐文，法國的聖西門和傅立葉，德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俄國的列寧這樣一些人類最偉大的天才多少世紀以來一直爲之奮鬥的目標。每一個國家都有權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己的世界觀。

第三，我想提請美國代表注意，他由於把蘇聯在東歐的霸權主義傾向叫做『擴散共產主義』，實際上他使整個問題變得模糊不清，從而幫助了蘇聯來實現它在東歐的意圖。」

對於我的發言，我們代表團裏有不同的意見。「職業外交官們」激烈地反對，認爲我操之過急，可能使我們同美國新政府的關係變得困難。唯有代表團團長維爾科・弗拉霍維奇爲我辯護：

「一個人不能不講革命的良知……」

這是我在聯合國的最後一次發言，下一次會議我沒有去參加。但是，我的神聖的信條依然是：決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不論是在國內問題上還是在國際事務上都是如此。

正是這種對自己良心的呼聲的諦聽，這種對靈魂的經常自我反省，這種始終驅使着我的心緒不

寧，使我一九六七年五月到了斯德哥爾摩，參加羅素越南戰爭罪行國際審判法庭的會議。我們工作了十天，通過了一些決定。會議結束時，我請求讓我作爲主席談幾點個人的看法：

「我知道，我們大家都意識到我們的法庭在世界的民衆中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大批電報向我們十分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對我們抱敵對情緒的機構和組織是强大的，它們是反對我們剛才所宣告的真理的。

我們中間有的人可能因此而蒙受壓力，尤其是在美利堅合衆國。我的同僚，美國法官杰維・德林杰、考特蘭・考克斯和卡爾・奧格爾斯比，我知道，你們都是滿心仁愛之士，我知道，你們個人的品德高尚，你們將經得起一切考驗。

你們是貴國傳統中最美好的品德的維護者，你們是應當在各個大陸的人與人之間，在不同膚色、文化和信仰的人與人之間建立起來的橋梁的捍衛者。

我們決不能忘記，越南人民這樣一個小農業國人民竟遭遇到了世界上實力最强大的國家的軍事機器的蹂躪。

我們決不能忘記，與在聽取旁證期間提交我們這個法庭的武器相同的那些武器，用來對付老百姓的那些駭人聽聞的炸彈，此時正投入河內，投向其他城市和越南的村莊，像杜萬玉這位小證人那樣的數以十萬計的牧童注定要夭亡，他來到我們法庭面前時由於受到凝固汽油彈的襲擊而被燒得體無完膚。

我們以我們的良心的呼聲宣誓，作爲自由和獨立的人，我們將竭盡所能，制止這種大規模的屠殺行爲。我們的法庭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人民的意志，全世界民衆的意識的基礎上的，這種意識正在

逐步變成一股强大的物質力量。」

我們的會議是以一種世界上任何法庭所沒有見過的方式結束的。我們是一個革命的法庭。我們中間第一個猛然站立起來的是北越軍隊的何文樓上校，他一一擁抱了我們並哭了起來，滿滿的會議廳裏的瑞典人也全都跟着他站了起來。

屋外，天空灰暗。我走向港口，在一張長椅上坐了下來，從口袋裏拿出安德里奇的《日本的故事》。我閱讀這本書而感到欣慰的心情莫過於這一次了：

「在阿波運女王掌政時，在三百五十名受審判的謀反者中間，被判流放的還有一位詩人森韋保。他在七個島中最小的一個島上的一小間茅屋裏度過了三個年頭。當女王得了病，她的權勢日益衰敗時，他像三百五十人中的大多數人一樣回到了京城家裏。他住在市郊一座廟宇的偏房裏。市民們受够了瘋狂、殘暴的女王的血腥統治，都熱愛這位詩人，而三百五十人中間的那些人都成了他的莫逆之交。人們競相傳閱他的歌頌英勇氣概和死亡的短詩，在他們展開討論的時候，他的微笑好比作决定的發言。

那時，女王由於受到普遍的憎恨而出乎意料地突然死去。她的那些惡劣的宮內侍從紛紛逃跑，她脹鼓鼓地令人厭惡地躺在空曠的王宮中，没有人願意把她埋葬。

三百五十名謀反者很快就聚集在一起，接管了政權。他們彼此分賜了官職和榮譽稱號，開始統治起這個統一的七島王國來了。

在當年的女王的王宮裏舉行了第一次盛會，列數了三百五十人，發現有一人未到，而在宣讀了全體謀反者的名單後發現詩人森韋保没有來。他們不想在缺少他這一票的情况下開會，他們立即派

了一名奴隸拉一輛黄包車去找他。過了一段時間，這位奴隸拉着空車回來了，有人告訴他，森韋保外出了，並給三百五十人大會留下了一封信。大會最年長的一位接過一張捲起來的紙，把它交給了大學士，後者開始高聲朗讀：

『森韋保在此離別之際謹向同僚們——謀反者們致意！

感謝你們，我的志同道合者，與我同担患難、共持信念、分享勝利，請你們原諒我，我不能像同你們一起戰鬥那樣共掌政權。但是，詩人同別的人相反，只有在逆境中才是忠誠的，他們離棄諸事順遂的人。我們詩人是生就的鬥爭漢；我們是滿腔熱血的獵人，但是我們不吃狩獵之物。把我和你們隔開的是一層薄而看不見的壁障，但是，利劍也並不算厚，仍然是致命的；我不可能在不傷害自己的靈魂的情況下來到你們那裏，因爲我們除了權力以外，一切都能忍受。因此我離開了你們，謀反的同伴們，我去尋找是否還有什麼地方有沒有實現的思想，有沒有兑現的願望。而你們就審慎地、幸福地統治吧，如果我們這個七島王國遭遇什麼不幸和考驗，需要從事鬥爭，在鬥爭中需要救助，那就請你們來找我。』

宣讀到這裏，耳朵有點背的大會主席打斷了信的宣讀，他懷着老年人的不耐煩的情緒，憤憤地大聲說：

『三百五十人進行公正而不抱偏見的統治，王國又會發生什麼不幸呢？』

與會者都點頭稱是，年老的人們露出表示鄙視和憐憫的笑容。發生什麼不幸!?信沒有宣讀下去，而是開始商討關於進口和關税的法律。

只有大學士悄悄地把詩人的信看完了，把信捲了起來，收藏在當年的女王的檔案裏。』

原書附錄

一九四八——一九五三

一九四八年

二月十日　斯大林向（由卡德爾、吉拉斯、巴卡里奇組成的）南斯拉夫代表團提出最後通牒式的要求，說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應當立即聯合。

三月一日　南共中央開會。卡德爾作報告，說季米特洛夫告訴他，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可以建立一個比蘇聯更好的聯邦。茹約維奇把整個會議的情況轉告了蘇聯駐貝爾格萊德大使拉夫倫季耶夫。

三月十八日　巴爾斯科夫將軍通知科查・波波維奇，蘇聯從南斯拉夫撤退軍事專家。同天，鐵托就此事寫信給莫洛托夫。

三月二十七日　拉夫倫季耶夫到薩格勒布將聯共（布）黨的第一封信交給鐵托。召開緊急會議，出席的有鐵托、卡德爾、吉拉斯、基德里奇和蘭科維奇。

四月十二—十三日　南共中央開會，會議通過了我黨中央對聯共（布）黨的覆信。會議通過決定，將兩封信向南共黨員宣讀。

五月四日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對南共中央四月十三日的信作答。他們拒絕了下面這樣一項建議：由聯共（布）黨中央派一個代表團實地核查第一封信提出的指責有多少根據。

五月九日　南共中央開會。斯大林的要求被拒絕，我們對聯共（布）黨中央的覆信獲得通過。

五月二十日　南共中央開會。會議一致決定，（南共）不參加情報局會議。會議還決定召開南共第五次代表大會，這次代表大會將具有全黨投票表決的性質。

五月二十二日　聯共（布）黨中央發出第三封信並下令（南共派代表）前往烏克蘭。

六月二十日　南共中央對聯共（布）黨第三封信作答。

六月二十八日　情報局發表關於南斯拉夫的第一個決議，決議號召南斯拉夫人民起義。

七月二十一—二十九日　南共舉行第五次代表大會。一致擁護南共路綫，擁護鐵托。

十月三十一日　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承認北朝鮮民主共和國。①

一九四九年

五月十一日　地拉那開始了對科奇·佐治的法庭訴訟。

九月十六日　布達佩斯開始了對拉伊克·拉斯洛的訴訟。

---

① 原文如此，應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譯者

九月二十八日　蘇聯政府廢除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一日簽訂的友好互助條約。
九月三十日　波蘭和匈牙利廢除友好互助條約。
十月一日　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廢除友好互助條約。
十月四日　捷克斯洛伐克廢除友好互助條約。
十月五日　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十月二十日　南斯拉夫當選爲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
十一月二十九日　情報局發表關於南斯拉夫的第二個决議，决議稱我們爲「殺人兇手」和「法西斯分子」，再次號召起義。
十二月七日　索非亞開始對特拉伊喬·科斯托夫的訴訟。

一九五〇年

二月二十二日　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儘管西方施加了壓力，要南斯拉夫不承認；幾天後，胡志明攻擊南斯拉夫，表示贊同情報局的立場。
九月二十八日　匈牙利軍隊在南斯拉夫邊境舉行演習。
十一月十一日　由於我們的外交官在地拉那受到凌辱，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中斷同阿爾巴尼亞的外交關係。
十一月十九日　南斯拉夫在聯合國提出的關於在發生敵對行動情況下國家的職責的决議案獲得通過。

一九五一年

一月八日　同美國政府簽訂向南斯拉夫提供糧食援助的協定。

三月十日　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發表白皮書——關於蘇聯和東歐國家政府對南斯拉夫的侵略行徑的文件集。

八月二十九日　美、英、法三國政府向南斯拉夫提供五千萬美元的經濟援助。

九月二十九日　匈牙利軍隊在與南斯拉夫接壤的邊界上調動。

十一月十五日　同美國簽訂軍事援助協定。

十一月二十六日　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巴黎向聯合國控告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

一九五二年

一月八日　美國和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簽訂經濟合作協定。

十一月三日　南共第六次代表大會開始舉行。

十一月二十日　布拉格開始對魯道夫·斯蘭斯基、弗拉迪米爾·克萊門蒂斯等人的法庭訴訟。

一九五三年

三月六日①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斯大林去世。

---

① 原文如此，應爲五日。——譯者

中譯本附錄

共產黨情報局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情況的決議

（一九四八年六月）

由保加利亞工人黨（共產黨）、羅馬尼亞工人黨、匈牙利勞動人民黨、波蘭工人黨、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法國共產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和意大利共產黨底代表組成的情報局，在討論了南斯拉夫共產黨的情況並宣佈南斯拉夫共產黨底代表已拒絕出席情報局會議之後，一致達到下列的結論：

一、情報局指出：南斯拉夫共產黨底領導機關，最近在內政、外交的基本問題上，執行了一種不正確的路綫，一種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綫。因此，情報局批准了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底行動，即主動揭露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底不正確的政策，尤其是鐵托、卡德爾、德熱拉斯和蘭科維奇底不正確的政策。

二、情報局認爲：南斯拉夫共產黨底領導機關，對蘇聯和蘇聯共產黨（布）執行着一種不友好的政策。在南斯拉夫執行了一種誣衊蘇聯軍事專家和誹謗蘇聯的可恥的政策。南斯拉夫對蘇聯的文職專家設立了一種專門的機構，使他們處於南斯拉夫國家保安機關底監視之下，並不斷受到釘梢。蘇聯共產黨（布）駐情報局底代表尤金同志和蘇聯駐南斯拉夫底一些官方代表，都受到了南斯拉夫國家保安機關底這種釘梢和監視。

這些事實以及其他同類的事實證明，南斯拉夫共產黨底領導者已採取了不是共產黨人所應有的立場，開始把蘇聯底外交政策和帝國主義國家底外交政策混爲一談，並以對付資產階級國家的同樣態度來對付蘇聯。正是由於這種反蘇的立場，從反革命托洛茨基武庫中借來的所謂蘇聯共產黨(布)「蛻化」、蘇聯「蛻化」的誹謗宣傳，才在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得到散佈。

情報局斥責南斯拉夫共產黨底領導者底這種反蘇立場，認爲這種立場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不相容的，它只是適合於民族主義的立場。

三、在對內政策上，南斯拉夫共產黨底領導者離開了工人階級的立場，背離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他們否認資本主義成份在他們國內的增長，從而否認階級鬥爭在農村中的加劇。這種否認是從機會主義的觀點出發的，即：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不是階級鬥爭底尖銳化，如像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教導的那樣，而是階級鬥爭底熄滅，如像布哈林式的機會主義者所斷言的那樣，後者曾鼓吹資本主義和平生長爲社會主義的理論。

南斯拉夫底領導者在農村中執行着一種不正確的政策，忽視了農村中的階級分化，把個體農民看作是一個整體，而這就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違反了列寧底著名

論點——小生產的個體農民經濟每日每時地都在不斷地、自發地、大量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不僅如此，南斯拉夫農村中的政治情況，並沒有令人沾沾自喜和引以自滿的根據。在南斯拉夫，個體農民的經濟還佔着優勢，土地還沒有收歸國有，土地私有的制度還存在着，土地還可以買賣，大量土地還集中在富農底手裏並可以使用僱傭勞動，——在這種情況下，如若用模糊階級鬥爭和調和階級矛盾的精神來教育黨，就一定會使面臨着社會主義建設的困難的黨解除了自己底武裝。

南斯拉夫共產黨底領導者在工人階級底領導作用問題上，脫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走向民粹主義的富農黨的道路，認爲農民是「南斯拉夫國家底最穩固的基礎」。列寧教導我們說：無產階級是「現代社會中唯一革命到底的階級……在全體人民爭取徹底的民主變革的鬥爭中，在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反對壓迫者和剝削者的鬥爭中，必然是領導者。」

南斯拉夫底領導者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一論點。

就農民而論，農民中的大多數，也就是說，貧農和中農，是可以和工人階級結成聯盟的，在這個聯盟中，工人階級起着領導的作用。

南斯拉夫領導者底態度，無視這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論點。

不難看出，這種態度是反映了適合於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觀點，而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

四、情報局認爲：南斯拉夫共產黨底領導機關修改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黨的學說。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黨是國家主要的指導和領導的力量，它有自己特別的政綱，並且不把它自己溶解在非黨的羣衆之中。黨是工人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和最重要的武器。

然而，在南斯拉夫，認爲國內的主要領導力量不是共產黨，而是人民陣綫。南斯拉夫底領導者縮小了共產黨底作用，實際上把黨溶解在非黨的人民陣綫之中，而這個人民陣綫是包含着極複雜的階級成份（工人、個體農民、富農、商人、小企業主、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等等）以及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別，包括某些資產階級底政黨在內的。南斯拉夫底領導者固執地拒絕承認他們底觀點的錯誤，硬說南斯拉夫共產黨不能够而且也不應當有自己特別的政綱，而應以人民陣綫底政綱爲滿足。

在南斯拉夫，在政治舞台上出現的只有人民陣綫，而黨及其組織並不用它自己底名義在人民面前公開出現，這一事實不僅降低了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而且使黨不能成爲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而黨是負有通過公開的政治活動，通過公開宣傳它底觀點和綱領，以取得人民日益增長的信任並擴大自己對廣大勞動人民的影響的使命的。南斯拉夫共產黨底領導者正重複着俄國孟什維克底錯誤，把馬克思主義的黨溶解在非黨的羣衆組織之中。所有這一切，說明南斯拉夫共產黨存在着取消派的傾向。

情報局深信：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底這種政策，威脅着共產黨本身底生存，並在最後帶來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蛻化的危險。

五、情報局認爲：南斯拉夫共產黨底領導者在黨內造成的官僚主義的統治，對南斯拉夫共產黨底生存和發展是致命的危險。黨內沒有民主，沒有選舉，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和鐵托與卡德爾底沒有根據的保證相反，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底大多數委員都是指定的，而不是選舉的。共產黨實際上處於半合法的狀態。黨底會議或者是不舉行，或者是秘密舉行，這種情況只會破壞黨在羣衆中的影響。南斯拉夫共產黨底這種組織形式，只能稱之爲宗派—官僚主義的組織。它導向取消

黨，使之不成爲一個積極的、獨立活動的組織，養成黨內軍事領導的方法，如同托洛茨基從前所主張的方法一樣。

在南斯拉夫共產黨黨內，黨員最基本的權利都被剝奪了，黨內對錯誤措施的最輕微的批評，都受到野蠻的壓制，這種情況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情報局認爲：像中央委員尤約維奇和赫布朗兩同志之被開除出黨與被逮捕的一類行爲，是可恥的，他們之被開除出黨與被捕是因爲他們敢於批評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者底反蘇態度，並要求南斯拉夫與蘇聯友好。

情報局認爲：共產黨內不能容許這種可恥的、完全是土耳其式的恐怖統治。南斯拉夫共產黨生存和發展底利益，要求結束這種統治。

六、情報局認爲：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和其他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底錯誤所作的批評，和它們用這種方式給予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兄弟般的幫助，爲南斯拉夫共產黨提供了一切必要的條件以迅速改正它所犯的錯誤。

但是，南斯拉夫共產黨底領導者不但不誠懇地接受這些批評，採取布爾什維克式的改正錯誤的道路，反而由於害上了極端野心、驕橫和自大的毛病，以挑戰和敵視的態度來對待這種批評。他們走上了一概否認自己底錯誤的反黨的道路，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一個政黨對待自己底錯誤所應持的態度的學說，從而加重了他們底反黨的錯誤。

南斯拉夫底領導者由於不能面對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和其他兄弟黨中央委員會底批評，便走上了公然欺騙他們自己底黨和人民的道路，把中央委員會不正確的政策所受到的批評，向

南斯拉夫共產黨隱瞞，同時並把對尤約維奇同志和赫布朗同志採取野蠻措施的眞正原因，向黨和人民隱瞞。

最近，縱然在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和其他兄弟黨批評了南斯拉夫領導者底錯誤之後，南斯拉夫底領導者仍然企圖頒佈若干新的左的法令。他們匆匆地頒佈了一個把中等工業與商業收歸國有的法令，然而，實行這一法令的基礎完全沒有準備好。由於這樣的匆忙，這一決議只會妨礙對人民的商品的供應。他們以同樣匆忙的方式，頒佈了一個新的糧食稅則，這個糧食稅則的頒佈也是無準備的，因此，它只會使城市居民的糧食供應脫節。最後，南斯拉夫底領導者在不久以前，還大喊大叫地宣佈他們對蘇聯的愛戴和忠誠，然而，實際上大家都知道，他們正在執行着一種對蘇聯不友好的政策。

問題還不止於此。南斯拉夫共產黨底領導者最近以完全自信的態度，宣佈了一個在南斯拉夫消滅資本主義成份的政策。鐵托和卡德爾在四月十三日給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的信中寫道：「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批准了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提出的在國內肅清資本主義殘餘的措施。」

根據這個方針，卡德爾四月二十五日在南斯拉夫國民議會中發表演說時宣稱：「在我國，人剝削人的最後殘餘存在的日子，已屈指可數了。」

在南斯拉夫現存的條件下，南斯拉夫共產黨底領導者關於消滅資本主義成份，從而消滅富農之爲階級的態度，只能是冒險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因爲，只要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資本主義的個體農民經濟在國內還佔優勢，只要大規模的農業集體化的條件還未具備，只要勞動農民的大多數還未相信集體耕作方法底好處，這個任務是不可能得到解決的。蘇聯共產黨（布）底經驗證明：要消

滅最後一個也是最大的一個剝削階級——富農階級，只有在大規模的農業集體化的基礎上才能做到；而消滅富農之爲階級，乃是農業集體化底一個有機的組成部份。

爲了消滅富農之爲階級，從而消滅農村中的資本主義成份，黨必須進行細緻的準備工作，以限制農村中的資本主義成份，加强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使社會主義工業能够製造集體農業機構所需要的機器。在這個問題上的急躁冒進，只能帶來無法補償的損害。

只有在周密準備和堅持實行這些措施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從限制農村資本主義成份，轉到消滅它們。

南斯拉夫底領導者匆忙地或者以一紙命令的辦法來解决這個問題的一切企圖，如不是說明這種冒險行爲是預先注定要歸於失敗的話，就是說明它只是誇張的、空洞的和籠絡人心的宣言而已。

情報局認爲：南斯拉夫底領導者力圖用這些虛僞的和籠絡人心的手段，來表明他們不但贊成階級鬥爭，而且甚至走得更遠，並超過了南斯拉夫共產黨根據實際可能性在限制資本主義成份問題上所能提出的要求。

情報局認爲：由於南斯拉夫領導機關這些左的法令和宣言都是籠絡人心的，在目前條件下是不能實行的，因此，它們只能沾污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建設的旗幟。

這就是情報局爲什麼把這類冒險主義的手段，看作是卑鄙的手段和一種不能允許的政治賭博的原因。

由此可見，南斯拉夫領導者方面底這些左的、籠絡人心的措施和宣言，目的乃在於掩蓋他們拒絕承認錯誤和拒絕老老實實地改正錯誤。

七、考慮到南斯拉夫共產黨底情況，並爲了向南斯拉夫黨底領導者指出脫離這種情況的道路起見，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和其他兄弟黨的中央委員會曾建議：南斯拉夫共產黨問題，應當根據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上討論其他各國共產黨的活動那樣的正常的黨的原則，在一次情報會議上來加以討論。

可是，南斯拉夫底領導者拒絕了各兄弟黨關於在情報局會議上討論南斯拉夫共產黨情況的屢次建議。

南斯拉夫底領導者爲了逃避兄弟黨在情報局會議上的正當批評，杜撰了似乎他們處於「不平等地位」的謊言。這種謊言是絲毫也不真實的。大家知道，在情報局成立的時候，各國共產黨是基於這樣一個無可辯駁的原則進行工作的，即任何一個黨可以向情報局提出報告，如同任何一個黨有權批評其他的黨一樣。

在九國共產黨第一次會議上，南斯拉夫共產黨曾充分地利用了這一權利。

南斯拉夫黨拒絕向情報局報告它底活動，拒絕聽取其他國家共產黨底批評，實際上就意味着破壞了各國共產黨間平等的原則，事實上等於要求南斯拉夫共產黨在情報局中享有特權的地位。

八、鑒於上述事實，情報局表示完全同意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於一九四八年三月到五月給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一些信件中對南斯拉夫共產黨情況的估計，對南斯拉夫黨中央委員會所犯的錯誤的批評以及對這些錯誤的政治分析。

情報局一致得出結論：南斯拉夫共產黨底領導者，由於他們底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黨、反蘇的觀點，由於他們底整個態度和他們之拒絕出席情報局會議，已使他們自己處於和參加情報局

的各國共產黨相對立的地位，走上了脫離反帝國主義的統一的社會主義陣綫的道路，走上了叛賣勞動人民國際團結的事業的道路，採取了民族主義的立場。

情報局斥責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這種反黨的政策和反黨的態度。

情報局認為：鑒於上述一切，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已使它本身和南斯拉夫共產黨處於兄弟的共產黨底大家庭之外，處於統一的共產主義陣綫之外，從而處於情報局的隊伍之外。

* * *

情報局認為，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機關所犯的這些錯誤的根源，在於下列無可置疑的事實：從前用僞裝形式存在的民族主義分子，在過去五六個月中，在南斯拉夫共產黨底領導機關中取得了統治的地位，因此，南斯拉夫共產黨底領導機關就背離了南斯拉夫共產黨底國際主義傳統，走上了民族主義的道路。

南斯拉夫底領導者大大地過高估計了南斯拉夫內部的民族的力量及其影響，認為他們不要其他國家共產黨底支持，不要人民民主國家底支持，不要蘇聯底支持，也可以保持南斯拉夫底獨立並建設社會主義。他們認為，新南斯拉夫沒有這些革命力量底支持也能生存下去。

南斯拉夫底領導者不了解國際形勢和帝國主義者底訛詐與恫嚇，認為他們可以用讓步的辦法來博得帝國主義國家底歡心。他們認為，他們可以和帝國主義國家就南斯拉夫底獨立來討價還價，並逐步地使南斯拉夫人民傾向於這些國家，這就是說，傾向於資本主義。在這一點上，他們是心照不宣地從著名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論點出發的，即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對南斯拉夫獨立的危險，比

蘇聯對南斯拉夫獨立的危險還要小些。」

南斯拉夫底領導者顯然是不了解，或者可能裝作不了解：這種民族主義的路綫只能導使南斯拉夫蛻化成爲一個一般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喪失它底獨立，並變成帝國主義國家底殖民地。

情報局並不懷疑，在南斯拉夫共產黨內是有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忠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國際主義傳統的、忠於統一的社會主義陣綫的充分的健全分子的。

這些健全分子底任務在於迫使他們目前的領導者公開地、誠實地承認錯誤並改正錯誤，脫離民族主義並回到國際主義方面來；並且用一切辦法來鞏固統一的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陣綫。

如果南斯拉夫共產黨目前的領導者證明不能做到這點，那末，這些健全分子底任務就是要撤換他們，並選出一個新的國際主義的黨的領導機構。

情報局不懷疑南斯拉夫共產黨將能完成這一光榮的任務。